# 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自述

罗学蓬

目录

导读

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直至逃离延安，何福圣做了他 6 年的贴身侍卫，这 6 年中，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重要场合、台前幕后。红军将领、中共领袖的大量生离死别、恩怨情仇、荣辱沉浮，红军统帅张国焘的风云变幻、隐秘历史、蜕变轨迹；还有红军将士的英勇悲壮、苏区儿女的爱恨悲欢……何福圣亲为亲历亲见亲闻，通过著名纪实文学作家罗学蓬整理、考核，娓娓道来，那种人世沧桑、历史苍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笔者采访何福圣

篇前语

或许是因为缘份，在今年召开的重庆市政协全委会上，市参事室一位列席此会的老参事（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对我说："学蓬，你是专门写文章的，我给你介绍一位老人，保证你能从他身上写出篇大文章来。"

"谁？他是干啥的？"我问。

"他叫何福圣，从大巴山来重庆看望儿孙的，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跟了张国寿 6 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寿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

我一听大喜过望，当即表示希望能尽快地与何福圣见面。在参事的帮助下，第二天上午我即"逃会"赶到了重庆下游的望江机器厂，并末费力，便在一片宿舍区里找到了何福圣老人。

参事巳经在电话里向何福圣介绍过我的情况。几句寒暄后，采访随即开始，话匣子一打开，老人谈兴大发。午饭后，老人略微休息了一下，又接着再讲。我们摆谈了几乎整整一天。

听何福圣讲那过去的故事，恰似笔者独自翻阅着一册充满传奇色彩，激荡着壮阔波澜的人生长卷。

一天的时间显然远远不够。于是，结束采访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市区，向做记者营生的朋友借了一部采访机，第三天即随送何福圣返乡的吉普车，千里迢迢一路风尘地驰进了地处大巴山腹地的竹峪关。

虽然我巳经知道眼前巍巍大山曾经为炮火硝烟所笼罩，为鲜血尸体所覆盖,阳春三月的大山展现在我眼前的却分明只有两种浓重的色彩：金黄与苍翠，金黄是田坝上金波荡漾的油菜花；苍翠是大山沉雄苍劲亘古不变的本色。

在静静地聆听老人讲述往事的时候，我久久地凝神注视着他那巳经谢顶的锃亮头颅，和只在边缘处还保留着的一圈银色的头发。思维却不时穿透时空，努力地进入到老人叙述的历

史之中：好一个英勇骠壮的小伙子，头戴红星帽，身穿蓝军装，皮带上插着两支 20 响，双手勒缰高踞在马背上，两腿一夹，骏马迎风而立，仰天长嘶。

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使已近 90 高龄的老人变成了一束熊熊燃烧的火。一段段精彩绝伦的人生片断随着滚烫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燃烧着他，也灼烫着我。

老人专程陪我前去瞻仰了王坪村红军烈士墓。眼前，躺着由 3800 名红军英烈的坟茔组成的陵园。老人告诉我，这座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是现在的巴中市三座红军烈士陵园之一。他还告诉我，这 3800 名英烈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左倾路线的屠刀夺去生命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被自己的首长和战友杀掉的……惟其如此，这座烈士陵园在笔者心中才显得更加凝重。

陵园高大的牌坊与红军烈士纪念碑还是当年担任红 4 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亲手设计的。这位英姿飒爽，在川北老百姓眼中“惹眼得很、能干得很”的红军女将领绝对想不到，30 几个年头以后，她和她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时期的英雄丈夫陈昌浩、一位叱咤风云的旷世伟男子，会双双出演一场民族大悲剧中极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迈进巨大石牌坊的那一刻，由铺天盖地的 3800 座坟茔坟组成的山峰巍巍然挺立在我眼前……坟茔、墓碑，红星帽、蓝军装，仿佛全都像海浪一般涌动起来、金戈铁马，轰鸣不息！那种巨大的震撼深透骨髓，荡涤心魂。冥冥之中似有一股神秘巨大而又难以言说的力量当头贯下，紧紧攒住了我。思维像一帖神奇的催化剂，使泪水立时就在心中涌荡而且汹涌地漫出眼窝。“立正！稍息!”、“起立！出发!”脚步如潮水般哗哗响起。在飘扬着镰刀斧头红旗的红土坝子上，司号员挺胸鼓腮吹响嘹亮的军号，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嗬嗬”有声，挥舞着粗壮的膀子，操练开了雪亮的大片刀。

历史竟然是如此的鲜活……幻觉吗——不!

一瞬间，耳边仿佛响起了天籁之音：那是半个世纪之前中央慰问团团长王维舟伫立在这片陵墓前向活着的与死去的人说出的话，每一个字，重若千均，每一声川腔，都浸透着烈士的鲜血……

我已经从白发苍苍的何福圣的泪眼里看到了什么叫历史——老人久久地伫立在陵园的纪念碑前，举眼向天，老泪纵横。仿佛在用心，与他长眠在这青山碧峰之上的众多战友交流。

我在何福圣家中住了 5 天。老人从红军时期开始直至抗战期间曾侍卫张国焘长达 6 年之久，张国焘叛逃时才与其分手，其间充满太多的传奇色彩。老人娓娓叙述了他在张国焘身边时的亲历亲闻亲见：当年许许多多追随张国焘出生入死的红军将士，经历了怎样苦痛的磨难与无法抗拒的迷乱？这位历史见证人翔实的讲述，使我感到惊心动魄，恍若自身也经历了几十年前的刀光血影风云变幻，见识了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张国焘其人。

于是，就在这块曾经为鲜血所浸透的土地上，我提起笔来，写下了本书的第一行文字……

## 第一章 武馆生涯

我满 10 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真拳实腿，招招着肉……师傅战死高家寨，王树声调我去当他的警卫员……新集党代会上许世友找我比武，张国焘看中了我……从此，我当上了弟兄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 1、拜师学武

我叫何福圣，是民国二年（1913 年）生人。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五十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6 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鄂豫皖交界地方地处僻荒远角，盛产毛竹、桐油，也出大烟和土匪，自古民风勇武，是男人都会几下拳脚功夫。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背《汤头歌》，学推拿按摩。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用场。

我满 10 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

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前朝时曾在清军黎元洪标下当过武术教习，民初又在凌铁庵的第 5 师里任过营长，后来回到仁和集买下"裕丰华"货栈老板、仁和集商会会长刘清汉在南头场口外的一处宅院，开设"私棚"（武馆），收徒传艺。邱固元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深厚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

拜师这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12 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

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 3 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福圣，让俺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已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唰唰唰唰"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摧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

师傅侃侃言道："你的拳虽然打得劈哩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已。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惟求显技逞

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摊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我自从进了私棚，吃住都和师兄们在一起了。私棚是“流水席”，不时有人来，也不时地有人走，走的人有的是吃不了这份苦，有的则是学得了几分样子了，拿着师傅的举荐信到大户人家当保镖护院去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去当兵吃粮的。

师傅对徒弟们要求极严，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懈怠。徒弟们每日凌晨4时许就被师傅用竹鞭赶下床，或在河畔溪旁，或在竹下林中，专门练习内功。弓箭步、四马平步、含机步……十趾抓地生根配合吐纳呼吸，一站就是一炷香的光景，再换步练习。师傅也时常前来指点。

早饭后，众位弟子听师父讲解拳理，也间杂讲些江湖趣闻、武坛掌故。至十时又练功。师傅授徒，重在搏击实用，所以拧筷子、扯钉子、提坛子、甩石锁、滚铁桶、插沙桶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下午的“散手”，师傅要求真拳实腿，招招着肉，我们身上脸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师傅在场子边上架起一口煮牛肉的大铁锅，终日热气腾腾，我们随时可捞肉吃、舀汤喝。就这样大家仍然经常觉得腹中饥饿，体力消耗之大，由此可知。

我师傅有一门硬功绝技“铁沙掌”，木桶里装满河沙，然后左右手交替向沙子内插去，功夫越深插得越深。师傅一声“嗨”，能一插到底，练习此功苦不勘言，不消数日，十指鲜血淋漓，皮翻肉绽。我在武馆六年，一日不曾断过，到我参加红军时，十根指头已练得齐崭崭像鼓棰，皮肉又粗又硬反将指甲包盖住。十指如钻，竟能以掌穿墙，连师兄们见了，也都心惊。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7年功夫，庭院中一株水桶粗的老槐树，竟被我们活活打死。这时，我已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30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五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2、师傅当上了团总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蒋介石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当地刚刚兴起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杀个人真像是杀只鸡宰只兔一样平常。老百姓对死人见惯不惊，人性中残忍的一面也因这一特殊性轻而易举地被激发了出来。邻里吵架，动不动就抡刀动枪；鼠窃狗盗之徒，被抓住后也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活活打死。

这年 5 月，共产党先在河南举行了商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9 月又在湖北发动了黄麻起义，后来，这支武装在黄梅县考田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15 军。到 1931 年 3 月，红 1 军与红 15 军在河南商城南部地区合并为红 4 军。红军攥指为拳，大大增强了作战能力，并以七里坪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各地反动武装或被歼，或逃遁，或凭险据守。

过去以保民护境为己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的保民团，也都面临着打红旗或是打白旗的选择。以前这里一直属于三不管地区，土匪多如牛毛，地主富商纷纷拥兵自保，连普通商号都养有三五个枪丁。红色势力一强大，国民党急忙派大军前来剿灭，各地保民团态度毕现，泾渭分明。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在地方夙负众望，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 200 余人，枪 40 余支。

当上了团总，肩负起全镇百姓的生死安危，曾经在外面闯过大码头，操过大场伙的师傅，也注重起派头来了。密门对襟换成了长袍马褂，脑壳上多了顶博士帽,进出都有滑竿代步，而且还挑选出几名得意弟子充保镖，外出时挎着短枪威风凛凛地跟在师傅的滑竿后面跑。

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刺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己任的，身处夹缝，左右逢源，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像商南沙窝镇的大土豪顾敬之（老百姓叫他顾三毛子），人枪上千，势力最大，就投向了国民党，成了红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给红军造成很大的麻烦。

后来红军粉碎了白军的围剿，掉过头来决心将顾三毛子连根拔掉。军长曾中生、政委余笃三派了红 4 军中的两大主力徐向前指挥的第 10 师与许继慎手下的第 11 师 30 团去商南征讨，可谓用两把牛刀杀一只鸡崽，谁知却连吃了败仗。直到后来红军失利后撤出鄂豫皖地区，也没能把顾三毛子打掉。

原来，这顾敬之之所以能打败红军，全靠着他的一个亲侄子顾鲁丞。顾鲁丞原是中共党员，被中共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牵连进了托派小集团，差点儿被砍了脑壳。受此惊骇，顾鲁丞回国不久，便脱党回到了家乡，被他大伯顾敬之倚为臂膀。叔侄俩采用共产党的一套作法，在管辖区里实行了减租减息、助贫会等一系列措施，居然将顾的管辖区建成了远近闻名的“清区”。“清区”相对其它地方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庄稼也盘得比其它地方好得多。所以红军打来时，老百姓大都站到了顾敬之一边，跟着顾敬之上了高家寨。

高家寨是顾家及沙窝镇的几户望族祖上合资建成的一处躲避兵灾匪患的堡垒，随着年深月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小镇。

从远处望去，起伏的丘陵中异峰突起，小镇恰似搁在峰尖上的一条船。山顶古老的城墙环绕着一个同样古老的小镇。而小镇的四周皆是陡峭的绝壁。

3、随师傅投红

1931 年 3 月里的一天，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

在鄂豫皖，“老 30 团”团威名远扬，率领这支红色铁军的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树声。

王树声参加革命，是受了他堂兄的影响，他 18 岁那年考入麻城公立高等小学，校长就是他这位已经是秘密共产党的堂兄。在校期间，王树声因组织学生大闹教堂而被国民党县政府强令开除，校长堂兄也罩不住他，只好把他介绍到武昌董必武办的学校读书。1925 年，王树声读完高等小学后回乡，当了马岗区初级小学校长。次年，王树声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麻城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部长，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农民协会的任务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反剥削。而当地民愤最大的土豪当数王树声的亲舅公丁枕鱼。王树声大义灭亲，率领农友手持梭标大刀冲进丁家大院，抓住亲舅公，不仅将二尺多高的纸帽子扣在舅公脑壳上，押着他手敲铜锣游街示众，还分了舅公家的粮钱土地，烧了舅公家的地契帐簿。农民拍手称快。王树声随后又亲自主持农协召开大会，宣布将作恶多端的舅公父子押赴刑场，当众枪决。王树声大义灭亲的壮举被老百姓口口相传，在当地极快地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

1928 年 7 月，王树声率部随副军长徐向前两次出击京汉路，三战三捷，扩大了红军队伍，改善了武器装备。1931 年率团参加攻打新集战斗，他采用“坑道爆破攻坚”战术，炸毁围墙，攻下新集（今河南新县），使这里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新集战斗之后，王树声又率部参加了双桥镇战斗并担任主攻。此战全歼国民党第 34 师，活捉了包括师长岳维峻在内的官兵 5000 余人。在鄂豫皖地区的历次征战中，王树声是一位威名远播的虎将，他敢打敢拼，不怕恶仗硬仗，每次战斗要么亲自率领官兵冲锋陷阵，要么站在最前沿指挥。他多次负伤，甚至不等伤愈就参加战斗。由此以来，使他和“老 30 团”的威名很快便响彻了鄂豫皖地区。

我师父很佩服这位 20 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 6 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 20 两重的上等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 300 发子弹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盛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

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 200 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已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

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赶紧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我师傅和当时地方上不少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一样，为保一方平安，表面上和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被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86 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 30 团”的驻地新集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 18 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师傅之死。参军不到一个月，红军就大举进攻高家寨，顾敬之和顾鲁丞狡猾透顶，见红军主力挟威而来，并不正面接火，而是主动放弃了沙窝镇，把当地老百姓全部集中到高家寨里，粮食也一颗不剩地搬到了寨子里。并派出信使和各地反动保民团、国民党地方部队联系，邀约他们从各个方向攻击红军。我们开到沙窝镇，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进攻高家寨的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由于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粮食又极度匮乏，再加之上山的农民全都追随顾敬之，坚决与红军作战，所以打得十分不顺。红军仰攻到山顶城墙脚下时，弹雨挟着擂木滚石，以及烧沸的黄粪汤汤一齐打下，最终寨子没能打下来，红军反倒伤亡了近千人。

对于兵败高家寨，张国寿、许世友、罗应怀在各自的回忆录里，都有详尽的记述。

在打新集时担任敢死队队长，因夜袭县衙，刀劈敌守军团长孟云卿，生擒敌县长刘芳，威逼刘芳下令守城敌军向红军围城部队缴械投降而威名远扬的“老 30 团”2 营营长许世友，也身负重伤，差点丧命。

新集县城的解放尤为重要，从这以后，新集也就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被誉为“赤都”。

3 天后，即 1931 年 11 月 7 日，七里坪镇的倒水河滩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 4 方面军于这一天宣告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许世友也因军功由营长升至第 12 师 34 团团长，从许继慎的第 11 师调到了新由倪志亮任师长的第 12 师（稍后不久由中央派来的陈赓任师长）。这次攻打高家寨，许世友仍担任敢死队队长，仰攻到城墙脚下时被滚木砸中脑袋，当场昏死过去。幸亏当时的敢死队员罗应怀等弟兄拼死将他救回。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命虽保住了，一身武功却从此后大打了折扣。

战斗激烈时，“老 30 团”特务连也被拉了上去。几次冲锋下来，师傅阵亡，还丢了 20 来个师兄弟。我们一帮师兄师弟跪在师傅面前哇哇大哭——师傅周身被机枪子弹打成了个蜂巢，死时还差 3 个月满 40 岁，可惜了他那一身好武艺。

4、我与许世友“以武会友”

第二件事，则是我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从沙窝镇撤回新集后，已经升任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就把我调去当他的警卫员。实际上，我还兼干起了武术教官。团部的一帮人都找我学，连队的不少人也跑来拜师，因为当时红军官兵习武受到鼓励，蔚然成风。这样，军内外很快便传开了：王树声的警卫员是个武功了得的高手。

1932 年 5 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在新集召开。会场设在镇外一块土坝子临时搭盖起来的大竹棚里。代表们在竹棚里开会，各级首长带来的警卫员无事可做，便聚在坝子边上席地而坐，抽烟、摆龙门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识我或听人说起过我的名字。这时便鼓动我起来走几路拳脚，让大家开开眼界。

我那时年轻气盛，禁不住众人一起捧、劝，也很想露上一手，但又担心影响开会，就说在这里不合适，嘈杂起来影响了首长开会可不得了。有人便提议说到镇里的城隍庙坝子上去。于是，我在百余名警卫员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城隍庙。

在万年台前面的坝子上。我先打了一路僧门看家拳“虎抱头”。稍一凝神，把气运上来，一个复手便打将起来。扫手、快转、猛踢，气势凶猛，动作刚健，紧密相衔。接着一个侧身提拦，移花接木，进身换式，脚踏龙虎步，掌上分阴阳，一招“猛虎撩尾”似恶虎拎羊，一个“进身大取”若毒蟒潜踪，“芙蓉滴露”使人胆寒，“青丝拂柳”令人心惊。待众人正看得如痴若醉时，猛然一个收式，气势威猛而动作干净利落，顿时激起一片叫好声。走罢拳，我又找来一根木棍代剑，舞了一套“惠灵剑”，刚才走拳时我目露精光，英姿飒爽，而剑招一出，却一反刚猛勇厉之态，疾行如风，身体飘忽，时而似岩鹰扑食，疾如闪电。时而又若风中弱柳，倏然间一个反弹，真可谓看似警猴，快如飞矢，更赢得了众口喝彩。

我出尽风头，心中也不免沾沾自喜。

没想第二天上午一到会场，邝继勋军长的警卫员给我透风，说 12 师的许世友团长，也是个会家子，听说我武功了得，一会儿要来会会我。

我一听就急了，许世友过去也是我们“老 30 团”的人，打高家寨时负伤，出院后刚调到 12 师当团长，而我只不过是个警卫员，怎好和这位名贯全军的大英雄比武？而且我早就听说他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和尚，武艺高强，尤擅腿功，心里不免有几分敬畏。

会间休息时，就见一大群党代表走出竹棚，来到了坝子边上。

王树声也在里面。他笑呵呵冲我喊：“何福圣，这位是许世友团长，他听说你武功厉害，一定要来找你以武会友。你莫怕他，把他丢翻了，我这里有赏。”

那时候的许世友也不过 20 岁出头，圆头豹眼，矮墩墩黑呼呼，恰似一尊铁铸金刚。他

把军帽揭了，紧紧腰带，嚷道：“谁丢翻谁，还得拳脚上见哩，并莫把话说早了。”

我见大呼小叫着赶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更加紧张，忙说：“许团长，我们……以武会友，点到即止。”

许世友咧嘴一笑，豪爽地说：“你莫怕，我要挂了红，带了彩，决不怪你。大家都是会家子，武德为重嘛。”说罢，亮了亮招，示意我招架，紧跟着就欺步上前，向我进击。

我只好出手相迎，几招过后，我见许世友底盘扎实，身手朴实严谨，绝非花架子。但他似未摸到我的虚实，也不敢贸然起腿。交手十余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

王树声一旁见我仅是一味游走闪避，不敢主动攻击，知道我心中有压力，就大声喊着给我打气助威：“何福圣，莫打让手！丢翻了他，我赏你两板子弹！”

警卫员们也一齐吼喊：“何福圣，上、上！”

这一团事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助威声显然刺激了许世友，只听他大喝一声：“小心，我来了！”话音刚落，他便展开猛烈攻势，使用连环腿左右开弓进击。

我虽仍是一味游走闪避，却渐渐看出他在急欲求胜中露出了疏忽可乘之机。

此刻，观战的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将我和许世友围了个密不透风。我偷眼看到不久前刚到鄂豫皖的张国焘主席、沈泽民张琴秋夫妇、陈昌浩，还有苏区大名鼎鼎的首脑人物曾中生书记、余笃三政委、邝继勋军长等认识或不认识的高级首长也都站在一旁观看，也就抖擞起精神应战。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得让许世友下得了台。拿定主意，我便以“克法”出拳，套用一句现在足球场上说的术语，也就是打起了“防守反击”，让许世友占尽上风。

许世友果然腿上功夫厉害，裹风挟雷，频频向我袭来。我暗暗聚起内功，当许世友又一腿向我腰部扫来之际，我提足气，牙关一咬，身子猛地一扭，装着避闪不及的样子，用肩背之际硬接了他一记飞腿。围观者看来我是重重地挨了一下，许世友却不糊涂，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然他这一腿已让我胸中有数，再度交手时，见许世友刚一起腿，我突然急步上前“抢背”紧跟着一记“劈山靠”，将许世友仰面朝天地掀翻在地。顿时，掌声、喝彩声像打雷一样响起。

我慌忙上前，双手去搀许团长。

许世友一跃而起，拍着身上的泥土连声道：“厉害，厉害！这小子暗地里让着我三分，我许世友仍不是他对手。”

邝继勋军长笑道：“你这和尚，刚从医院里出来，身虚力乏，咋能上场较技？”

“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啊？”方脸阔腮、头戴军帽、身材高大皮肤白净的

张主席满面笑容地上前问我。

在后世人看来，张国焘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历史罪人。他逃出延安，背叛革命，共产党控制大陆前他又逃到了国外，最后客死异乡……可是，那是教义和概念中的张国焘，抽象的概念一旦进入历史就会显得格外的具体和丰富。那时候的张国焘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威风凛凛，赫赫有名。五-四运动中，他是陈独秀手下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最著名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人是傅斯年）；此后，他出席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再以后，他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长驻在令世界各国的每一位共产党人无不神往的莫斯科。而且，他诞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大富大贵之家，“萍乡张府”，在江西省声名赫赫，城中私房成片，乡间良田千顷。他家里不仅有用不完的金钱，还是世代书香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孝廉公。他的叔父则在民国以后做过国会议员。而偏偏这个出自富贵双全的豪门巨室中的公子哥儿秉性特异，同情穷人，厌恶富人，成为了他的家庭和阶级的背叛者、掘墓人。这样的奇特经历，怎能不让出自穷苦人家的广大红军指挥员对他产生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爱戴之情？

“报告主席。”我“叭”地一个立正，向张主席行了个军礼，大声回答：“我叫何福圣，是王副总指挥的警卫员。”

张主席表扬我说：“好，很好，红军战士，就要像小何这样，精精神神，会打枪，会武功，上了战场，才能以一当十。”随后，他拍了拍站在他旁边的王树声的肩膀，笑着说，“小何是我们红军里的一个宝贝，你要给我好好爱护哟。”

话虽如此说，王树声却已经没有机会来爱护我了。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当时便通知王树声，速调我去担任张主席的警卫员。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

## 第二章 败走巴山

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分散突围还是集中突围，徐向前一语挽救了红 4 方面军……枪声响了，倒下的是张国焘等高级指挥员的座骑……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1、激烈的党代会

我去总部报到时，新上司是叶南生排长。

张国焘那时刚满 35 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中央分局书记，分局军委会书记，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能给这样的大人物当警卫员，我自然觉得万分光彩——这样的自豪感不单是我何福对一个人独有，普天下的警卫员恐怕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自己负责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主席当警卫员，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主席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主席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

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但任书记之前系红 4 军军长)、红 4 军政委余笃三、红 4 军军长邝继勋、以前当过军长现任 11 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像。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临时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莫斯科回来的王明手中。

1931 年 4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 月 22 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9 月，中共中央在巳遭破坏的情况下，成立了临时中央，博古（秦邦宪）任临时中央书记。10 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临时中央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王明遥控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并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我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们不是着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武装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口号，而是不恰当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未能顺应民心，而不能有效地领导正蓬勃高涨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并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他们甚至把同国民党统治有矛盾而在抗日问题上态度积极的中间派别认定为“最危险的敌人”，继续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关门主义的策略。这样一来，就使中国共产党丧失

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有利时机。他们还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因而要求红军趁机攻取大中城市，并对华中重镇武汉取包围态势。同时在白区工作中，盲目强调“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步骤，而采取了当时情况不允许的“硬碰硬”的斗争形式。他们诬称抵制其错误的刘少奇为“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他的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

我更不知道，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的组织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到 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江西根据地。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中央全权代表赶往各个红色根据地，夏曦到湘鄂西；张国焘到鄂豫皖；曾洪易到东北，邓刚到广西左右江，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以严厉的手段来“改造各级党的领导”，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把反对这种政治路线者一律视为反革命，以残酷手段予以清除，将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左倾冒险主义极快地漫延到了中国农村各个革命根据地。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肃反”，很快便在全国各主要根据地泛滥开来……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主席来到鄂豫皖，自从红 4 军改编为红 4 方面军以来，张主席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 1931 年 11 月红 4 方面军成立，到 1932 年 6 月这 8 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 4 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方面军也发展到两个军 45000 余人。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 350 万，并建立了 16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4 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主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英明”、“伟大”、“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大会小会上，各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张主席于是陶醉于 4 次战役所取得的胜利，鼓吹“国民党已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乘胜挺进，夺取武汉，饮马长江”的问题，继续推行他的“不停顿进攻”的方针。

张主席在会上放了把火，而比张国焘陈昌浩早来鄂豫皖几个月的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发言，更是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

沈泽民是茅盾先生的亲弟弟，当时他已经是全国有名的大作家。他与年轻洋派的妻子张琴秋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28 宿”成员，他在上海时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长，看上去文质彬彬，说起话来却是情绪激烈，言语尖锐。他跳起来怒视着许继慎高声叱骂：“你必须老实向党交待，你是不是有土匪的享乐主义？是不是有军阀恶霸的习气？你要老老实实地向代表们回答！你这样的人，也有资格做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吗？”

许继慎，1923 年入党的安徽六安市的青年学生，黄埔一期生，中共第一届黄埔军校支部干事，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毕业后被党组织派赴军校教导团担任连党代表，英勇善战，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叶挺有力的臂膀，著名战将。1928 年上海中共中央将他调到军委机关工作。1930 年春奉命前往鄂豫皖边区将当地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任军长。后与徐向前的部队汇合后，红 1 军改编为红 4 军，军长为中央派来的曾中生，他则改任 12 师师长。

此时的许继慎眼光复杂地盯了一眼张国焘，鼓足勇气说道：“我向党保证，我从来没有

强迫过一个妇女。但是我承认，我有一些作风问题。我的行为有时太浪漫……”

“浪漫？”沈泽民推推眼镜，冷冷一笑，“仅此而已吗？你难道没有花钱请人专门给你拉皮条，把年轻漂亮的女人源源不断地给你送上门吗？郭化仁这个名字，我想你肯定不会陌生吧？”

一听这个名字，许继慎沉不住气了。

“我刚才已经承认了我作风上不检点……确实有错误，我虽然是个共产党员，由于长期从事军事工作，沾染了军阀习气，离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要求还很远。”

这种火辣辣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场面令我瞠目结舌！一个战功赫赫的的师长，玩玩女人算得了什么？那时候，红军中大多数指挥员本身就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红军士兵的成分除了少数农协会员，大部分也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地方民团的团丁，其中还有“绿林好汉”。在他们的心目中，玩得上女人，不仅算不得耻辱，相反，还被大家视为有本事哩。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郭化仁，这个以前在七里坪开酒店，红军打下新集后又把酒店开到新集县城来的商人竟然被保卫局的战士押到了党代会上，当众指认经他之手玩过女人的红军指挥员。

这个皮条客已被打得伤痕累累，半死不活，不知是被打懵了还是吓坏了，在会场上乱指一气，害得十几名红军指挥员叫苦连天，大呼冤枉。

党代会结束后没几天，我在街上碰见和我一起参军的师兄郭清财，他已经在不久前调到政治保卫局去了。郭清才告诉我，郭化仁立下“大功”，也未能赎罪，他已经被处决了。

郭清才还悄悄地对我说，许多老苏区的同志对中央派来的人有情绪，说他们借生活作风问题想把老同志打下去，把大权抓在自己手里。

我一听赶紧叫他不要乱说，这话传出去可不得了。以当时我的地位，我自然不会想到这其中还有什么奥妙。作为张主席的警卫员，我也只能完全彻底地站在首长的立场上去看待任何问题，首长认为谁正确，我就认为谁正确，首长认为谁有罪，我就相信谁肯定有罪。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原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降为红 4 军政委，原红 4 军政委余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任，原红 4 军军长邝继勋降为第 73 师师长（刚创建编制，不足一团人枪，让邝自己去发展）。许继慎因战功卓著，在红军中威望极高，打仗离不开他，所以仍维持原职。红 4 军军长，则由第 10 师师长徐向前接任。

随后，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 10 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主席评价毛泽东当年在井岗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上泊聚义的那一套作法，含有浓厚的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在座的都

是接受过正统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人，你们想想，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他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张主席的这番话分明引起了新来的首长们的共鸣，像当过上海大学生运动领袖的黄超，与陈昌浩、张琴秋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李特，都赞同张主席的观点，引经据典地对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

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主席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份子占了绝对的优势。"

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主席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 2、肃反浪潮

一进 9 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

这时，张主席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已经卧床不起。

而一场“重大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主席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主席的护理。

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 4 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作法。

“这个报告是给我们的一个哀的美顿书！”沈泽民操着一口浙江口音的京白愤慨地说道，“他们刚打了几个胜仗，便居功自傲，想对我们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认为我们和他们之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思想上的分歧，而是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焘同志

啊，我对这份报告有一种预感，他们是别有用心，说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包藏祸心！”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 4 军政治委员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蔡申熙的建议得到了一致赞同。

张主席撑持着病体想坐起来发言，我赶紧跑到外屋把黄超和叶南生床上的被子抱进来，垫在他的身后。

张主席补充道：“我以为昌浩同志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 4 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 4 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黄超根据张主席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 4 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主席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的 73 师师部。张主席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称一切都已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已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

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 200 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主席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张主席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

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 4 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 4 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动部队包围了第 11 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拔枪反抗，被许继慎制止。

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

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 4 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

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处置，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相当有力。他说："如果我真地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和曾中生可以作证。"

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已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已毫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政治上不可靠的角色。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被周纯全局长下令抓起来了。

关于自己的妻子，许多年后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附带说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我和程训宣同志是 1930 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在檀树岗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1930 年反 4 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保卫局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 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里弟兄 5 个，全部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兄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 25 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以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了，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张主席听完陈昌浩的汇报后大怒，立即派人将曾中生许继慎连同 200 多名红军军官押回新集，听候处置。

此时的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年初，"1-28"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即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5 月中旬，即红 4 方面军歼敌 35000 千余人，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后，蒋介石便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6 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首先集中主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地区红军，然后再全力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7 月上旬，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紧锣密鼓之声已经喧嚣入云，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左中右 3 路大军气势汹汹向鄂豫皖苏区杀来，其中何成睿指挥的左路军专对付湘鄂西外，中、右两路军共 24 个师又 5 个旅，约 30 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敌军如乌云般压过来了，可是，张国焘却被前期的胜利遮住了双眼，看不到严重的敌情，夸大了红军的力量。

9 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

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11 师政委）、周维炯（第 11 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

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已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AB 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改组派"、"AB 团"、"第三党"，也无须什么证据，只要有人检举指证，谁就大祸临头，抓进去不问情由严刑拷打，然后便是人头落地。而且多数毒打都是群众性的，打的群情激愤，边打边呼口号，被打的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一申辩便属态度顽抗。不少人经受不住这种折磨胡咬乱吐一气，顿时，被牵扯上的人员也马上被愤怒的官兵拖了出来。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

31 团团长李先念遇到了和徐向前同样严峻的问题。他的亲哥哥被打成反革命，而且还当着他的面押上刑场处决。在交臂而过时，兄弟俩默默地对视了一眼，李先念把脸移开了，哥哥被手提大片刀的执行队员推走了。就在哥哥走到场口处时，他突然奋力扭过头来，向着弟弟大吼了一腔："兄弟，干个样子出来，让他们看看，我们李家……没有反革命！

这股熊熊大火的助燃剂便是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在大肃反中都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惟有如此，才能给自己多少增加一点保险系数。

## 3、自伤元气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肃反中，全面的情况我不可能了解，但我知道我过去呆过的"老30 团"仅团级干部就换了三批，营连级干部更是走马灯似地三天两头换。被撤职后抓起来的干部中，除王树声等少数人大难不死，其余的全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给杀掉了。在这次肃反中，"老 30 团"被陆续杀掉的干部战士就有 500 多人。

有被逼上梁山的红军士兵也曾进行过自发性的反抗。但这样的反抗除了给他们更快地带来灭顶之灾外，相反更加坚定了张国焘肃反的认识与决心。

大约是 10 月初的一天，一连隶属政治保卫局的士兵前往布防在傅流店一线防御北面之敌的第 31 师，抓捕了该师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在返回新集途经泼陂河时，遭到驻在该地的六安独立团少数士兵的零星射击。

张国焘得到报告后大怒，立即下令将六安独立团班以上干部 200 多人全部抓起来，未经任何审问，便被押到泼陂河边用机关枪打死。

张国焘听完处置报告后只是心疼费去的子弹，指示：“以后要节约每一颗子弹对付战场上的敌人，对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宜采取另外的办法解决。”而这“另外的办法”就变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绳子吊、用石头砸。

我被这股血淋淋的杀人风吓坏了。我目睹了众多的红军官兵被杀害，我更知道当初一起跟随师傅投红的不少师兄师弟被处决了。这批师兄师弟中的少数人的确存在私分战利品，打骂群众等违犯纪律的现像，可就因为这，他们中的 24 个人却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了。我听到他们被杀的消息后除了害怕，便是庆幸，幸亏自己调来给张主席当了警卫员，要还留在“老 30 团”，这次恐怕也难逃大劫。我不敢也不要能对这场肃反运动本身表示出丝毫的怀疑，因为这样的怀疑一旦流露出去便足以将自己的小命送掉。

而且，这样一场运动又是自己敬爱的首长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难道，我能够怀疑敬爱的张主席？

这股“杀人风’很快由军队刮到了地方上。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组织中，工会农会中也大开了杀戒。

10 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黄超从总部警卫排要去了我们 6 名战士当保镖。因为当时杀人杀得整个苏区路断人稀。内部矛盾激化，向首长打黑枪的事件时有发生。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 4 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 1932 年 10 月。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潢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大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潢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已经布好了警戒线。因前一天下过大雨，潢河发了水，浪子哗哗响。执行队员大概有 100 多人，手里提着大刀和梭标，也有枪。被杀的有 30 来个。周维炯临刑前死活不跪，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标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

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

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军的命……”

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

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红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我们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干掉了！"

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漠糊。他们死的时候都年轻得很，许继慎刚满30岁，周维炯最小，才23……

大肃反后，红军中大批非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被清洗干净了，新提拔起来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党员。

有个现像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主席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多次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还常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课，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曾经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致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10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巳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4、兵败柳林河

红4方面军此时巳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群众纷纷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末有过的艰难。国民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红73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

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等将领力劝，邝继勋才暂时保住了

性命。张国焘责令邝继勋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 73 师残部与 74 师合并，仍称 73 师，师长由蔡申熙兼。

一直到西征途中的小河口会议后，邝继勋才重新恢复原职。

霍邱惨败，给苏区造成的震动已不可估量，再加上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策略，极大地动摇了苏区老百姓的斗志。

徐庭瑶军攻占霍邱后，将被俘的 1000 余名红军、2000 余名地方武装与运输队员迅即资遣，发给衣物、粮食，每人一块银元。这数千名俘虏浩浩荡荡地回到苏区，本身就起了一种巨大的宣传作用，对苏区军民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强烈的冲击，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过去对苏区人民斩尽杀绝的政策变了，觉得蒋介石的中央军，毕竟不同于过去的杂牌部队——其实，蒋介石哪里会变，等到把苏区彻底控制在手中，他们就开始杀人了，而且比杂牌军杀得更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刚刚结束的大肃反在苏区军民心理造成的伤害这时也显现出来了。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官兵有组织的携械叛逃、群众反水的事件。

总部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紧急从政治保卫局抽调大批干部，以特派员的名义下到各作战部队，以更严厉的手段来预防和处置图谋不轨的官兵。

而几天以后，又发生了第 12 师 25 团 2 营在战斗激烈的关头突然枪杀了党代表和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临阵易帜，反戈一击的严重事件！

有一次，我在替张主席做按摩时听到陈昌浩总政委在张面前充满忧虑地感慨道：“我们前些时候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现在情况严重了。这次在冯寿二与刘峙作战，需要紧急征用民夫，花钱也没人愿意帮我们，老百姓都跑到刘峙那边去了。”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红 4 方面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 8 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

血战、乱战，方圆数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都在燃烧，在沸腾，在呐喊，在厮杀。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国民党的大批飞机从汉口轮番赶来助阵，从天上往红军头上扔炸弹，用机关枪狂扫。用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来形容绝不为过。

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倪志亮都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百人。

敌人已近在咫尺，叶南生率警卫排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趴下了。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黄超、李特和一帮参谋人员已经开始烧毁文件。

在这种时候最紧张的肯是定是我们几十个卫士，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死活，惟一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首长被打死了，挂彩了，或是被敌人俘去了，卫士就没脸活了。

徐总指挥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子弹击穿的，他的警卫员漆树仁吓得哭喊起来。叶南生鼓起眼睛一个耳光扇去，大骂道："你狗日的想给敌人报信么？"漆树仁这才醒悟过来，收住哭声，伸了下舌头，赶紧向敌人开火。

幸亏这股乱冲乱突的敌人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是红军中的什么人物，遭到反击后没有全力进攻。再加之左侧的余天云师长虽未得到命令，发现情况不妙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驾，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战斗从头一天下午开始，一刻不停地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军终感不支，遂仓促撤出战斗，向新集方向退走。

柳林河大战，红 4 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连同被俘的人数在 3000 人以上。

当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疲惫不堪的大部队向新集以北移动时，张主席在我们警卫排的护卫下，轻骑向新集疾进。

仅隔数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赤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了。敌人的飞机将全镇炸成了一片废墟，满眼弹痕累累，四处断墙残壁，张国焘的住宅老县衙也被炸毁了。

在镇外的一户农家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分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少数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各机关的留守处负责人。

张国焘简略地介绍了苏区面临的险恶局势，决定任命原 36 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苏区内所有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 4 方面军则相机冲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中央分局，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里的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加强指导，至于各县区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则转入地下，或上山打游击。

安排妥当，张国焘第二天上午即前往新集西北 40 余里的晏家河，赶上了大部队。

敌人已在这里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并摆开了欲与红军大战一场的架势。

张国焘在陈昌浩徐向前的陪同下登上高地视察前线的情况，看见敌人正在构筑野战工事，

纵横十来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当地的村庄住不下，还在田野里、坡地上立起了密密麻麻的帐篷。几位最高首脑马上商议，决定停止和正面敌人交战，迅速脱离晏家河地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

部队突然撤出阵地，向东经白雀园向安徽的金家寨冲去，蔡申熙与邝继勋率领编成不久的第 73 师也在金家寨加入了大部队。16000 余名红军战士离金家寨昼夜南行，在英山打了一仗，再由英山转头西行，到了黄安以南的高桥。红军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都已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便决定移师河口，伺机突破平汉路。

这时，追敌已经尾随而来，担任掩护的蔡申熙，就是在河口一仗阵亡的。

河口对张国焘来说是块不祥之地，他在这里连折了两员大将，死了蔡申熙，伤了陈赓。

26 岁的蔡申熙无疑是红军中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徐向前许继慎陈赓同为黄埔一期生，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被派往鄂豫皖之前，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张主席来到鄂豫皖苏区后，蔡申熙是他军事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听到他战死的消息后，连平时不太容易动感情的张主席，也当着许多人的面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比张主席还要伤心的当然是蔡申熙的妻子曾广澜了。她和蔡申熙结婚已经 5 年，已经有了一个 4 岁的女儿，叫蔡萍迹。曾广澜带着女儿站在蔡申熙的坟头，发誓要为丈夫报仇——她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进入川北通江后，她一手创建和发展了大名鼎鼎的妇女独立团，直到妇女独立团（师）最终香消玉殒在杀机四伏血雨纷飞的河西走廊时，她也依然是这支受尽磨难名垂青史的英雄部队的主要领导之一。

腿部膝伤的陈赓，先由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一带时，因伤口发炎，张国焘吩咐叶南生安排人员，将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转往上海治疗。

护送陈赓的任务，落到了自幼学过医的我和另外三名警卫员的肩上，并由我负责。

我们雇了一辆小推车，将化装成商人的陈赓推着走，四名卫士则身着便衣，扮作跟随。

因为红军刚刚过去，一路上不断地遇到民团盘问，我们都用钱对付了过去。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镇子上住下了，几个人正围桌吃饭，三个保丁背着枪前来查店。因为陈赓是湖南人，口音不对，惹出了一场麻烦。

保丁问陈赓从哪里来？

陈赓回答说：“从樊城过来买桐油的。”

保丁又问他住在樊城哪条街上？

陈赓从来没有去过樊城，但知道那里濒临汉水，顺口答道：“在河街上。”

不料却被陈赓蒙上了。樊城恰好有一条河街，而且正是桐油商贩聚集的地方。

保丁们半信半疑，又问买桐油，为啥带这么多人？

陈赓笑笑说："眼下兵慌马乱的，多带几个伙计，也不过是壮壮胆嘛。"又拿出三块银元，给他们一人一块，还大声吩咐老板添酒加菜，邀请三名保丁入座。

保丁们心花怒放，把银元揣进兜里，坐下来和我们划拳打码，一直到吃得醉醺醺的，才摇摇晃晃地离去。

保丁走后，陈赓马上说："小何，看见没有？人多了反倒容易惹人注意。这样吧，明天一早你们就赶大部队去，我自已坐这辆车到郑州去就行了。"

次日天亮，我们与陈赓就此一别。

红 4 方面军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东冲西撞，在根据地中兜了一个大圈子。10 月 8 日，部队又被敌第 1 师、第 88 师迎头堵住了，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情况万分危急，10 日，张主席在黄柴畈主持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张主席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受到了沈泽民坚决猛烈的抨击。

沈泽民和他哥哥沈雁冰一样，当时也是个名气不小的作家。他待人热情似火，对党忠心耿耿，却胸无城府，有啥说啥，属于典型的文人气质，易冲动，爱争论，语言尖锐很有杀伤力，并辅以有力的手势，常令对手败下阵来。也正因为如此，他身边的人敬他的少，怕他恨他的多。

沈泽民批评张主席的军事策略是"逃跑主义"，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丢失了根据地，丧失了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把红军主力拖散拖垮。他激动地表示，与其让敌人拖散拖垮，不如回头与敌军作孤注一掷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来个置之死地而后生。

虽经张主席竭力解释，沈泽民仍不妥协。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长、并在张国焘到来之前担任着鄂豫皖苏区党政军一把手的人物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张主席下不了台。更令他恼怒的是几位在晏济河军事会议上赞同他的意见的人物，见沈泽民出头扛着，此时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

张主席冷厉地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膛，以强硬的口气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同意见，留到以后有条件再争论，总指挥部制订的行动方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责任，由我向中央承担。"

沈泽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起身大吼道："国焘同志，此次重大行动涉及到红军和苏区的生死存亡，你不能太武断，在党内搞个人独裁！"

张主席怒不可遏，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沈泽民，你不要太猖狂！我是中央全权代表，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

谁都明白如此声色俱厉的公开威胁意味着什么，大肃反的阴影在许多高级干部的心中尚未完全消散。全场顿时变得像一潭死水，只有傅钟不满地嘀咕了一句："这是党的会议，有话好好说嘛，不要采用威胁的口吻。"

既然沈泽民坚决不肯离开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索性就把他留下来和徐海东一起上山打游击。他的妻子张琴秋那时是彭（湃）杨（殷）军政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军校要随大部队行动，夫妻俩只好就此分手。

1932 年 10 月 11 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 4 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铁路。

5、风雪漫川关

蒋介石很快便判明了红军的去向，号令各路纵队紧紧撵了上来。

对这支处于强敌重重包围之中，不仅丧失了根据地，更严重的是丧失了群众支持的疲乏之师来说，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时节令已进入深秋，红军出鄂豫皖后一直穿着夏衣，携带的粮食也早巳吃完，解决饥寒交迫也成燃眉之急，而红军所经过的新野、邓县、淅川地区，由于连年军伐混战，和旱涝虫害，到处是一片荒芜。村庄变成了废墟，田野里长满了蒿草，难闻鸡鸣狗吠，难见人迹炊烟，即便有时走到有人烟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在反动宣传的欺骗下，谁也不敢与红军接近，任战士们站在门外给他们说上多少道理，村民们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官兵这才深深地体会到丧失根据地的痛苦与无奈。这一切给部队的行军、宿营、筹集粮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官兵们只能靠野果、野菜充饥。严寒难敌，则将枯草捶绒充做棉花，聊把夏装改冬装。

11 月初，在追敌三面赶来的情况下，总部决定，由漫川关进入汉中。

漫川关是千峰万壑的秦岭山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 2000 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地形十分险要。11 月 11 日，红军来到了漫川关，老百姓不是跑了，就是躲进了深山里，留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

几天以来，官兵们忍饥挨冻，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已经十分疲乏。附近的地里长有不少大萝卜，可红军用钱买，老百姓不敢卖。没办法，大家只好自己动手挖萝卜，然后把银元放在附近的人家，或者强塞进老人们的手中。

天黑下来了，群山隐入了茫茫的夜色之中。战士们在料峭的寒风中席地而卧，冻得直哆嗦。

而在漫川关的一间民房里，烟雾腾腾，红军的首脑们正在召开会议。根据派出的侦察人员报告，敌陕军三个团已经占据漫川关前面的山头防守，堵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敌第 44

四师已占领了漫川关左侧一线，对红军进行拦截；而尾随而来的敌第 65 师、第 50 师也迫至漫川关以东，断了我军的退路；敌第 42 师正由漫川关以北向南压迫，基本上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

强敌如林，而红军连续行军作战，很长时间没有休整与补充，战斗力巳大大减弱，加上地形对红军非常不利，山高壑深，回旋余地狭窄，兵力无法展开，部队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所有参加会议者均巳明白，此时此刻，红 4 方面军的命运巳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张主席向奉召而来的指挥员们通报情况和敌情后，明确指出："我军没有后勤，没有补充，又处在如此险恶的地形条件下，要死守是不可能的，那样最终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导致全军覆没。我的意见是，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四字一出口，指挥员们无不震愕！

但是，张主席那种"非常时期不容讨论"的独断作法，以及大肃反留下的后遗症，使他们不敢直抒自己的胸臆。

许许多多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凝聚到了徐向前清瘦的脸上。

徐向前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张国焘心中的位置，政治上他属于"异己分子"，甚而指使政治保卫局将他的妻子也抓起来审查，至今死活不知。然而在军事指挥上又离不开他，所以只好让他掌着这枚"帅印"。可是，他这方面军的总指挥，事无巨细，必须要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点头才能通过，好在陈昌浩对他还算尊重，对他的工作也能给予大力支持……

正因为他心中雪亮，所以在张国焘面前，他从来是不多言不多语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指挥作战上。

可现在，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

徐向前开口了，声音清晰而坚毅。

"我看，分散突围，只能是死路一条。"

所有人屏息静听。

"卫立煌、胡宗南、萧之楚全都扑上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散突围即等于全军溃散，4 方面军将不复存在，不如集中突围，来一个鱼死网破！于百万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陈昌浩也道："国焘同志，向前同志的意见应当考虑，集中突围好比一块肉，敌人想吞也吞不下，如果把肉切开，恰好让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张主席揉着下巴想了想，说：“分散突围，我也知道不是上策，可是……啊，向前同志，你还是详细谈谈你的想法吧。”

徐向前走到桌子前面，用竹烟竿指着摊开的地图，进一步说道：“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我军逼进从康家坪到任岭的这十余里的一道狭长深谷之中，然后逐步挤压，最后一举歼灭我们。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并未形成坚不可摧的铁桶阵，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置之死地而后生，马上从敌人布防的薄弱环节实行突围。而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在敌 44 师两个旅之间的接合部。大家都来看看。”

所有的指挥员都站起身来，围到了地图前面。

徐向前继续说道:“看清楚了吗？就是这个叫做垭口的地方。我们马上组织一支敢死队，从垭口杀出一条血路，保障我全军通过。”

张主席猛然抬头，大声问道：“谁来率领这支敢死队？”

“我来点将，让 12 师 34 团团长许世友上。”

张主席同意徐向前的意见。

当高层意见统一后，徐向前与陈昌浩立即带上警卫员，策马赶往任岭，来到了许世友的团部。

一看到两位首长的神色，许世友就清楚一定又是遇上了严重的敌情。

果不其然，徐向前扼要地向许世友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交待了任务，然后，紧紧地握着许世友的双手说道：“世友同志，全军安危在此一举，作为全军的敢死队，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许世友望着徐向前那充满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两位首长放心，34 团只要不拼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布置完任务,陈昌浩却不走了,他不顾徐向前和许世友的强烈反对,坚持要留下来亲自指挥这次至关重要的战斗。

从漫川关胜利突围。在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之际，陈昌浩充分显示了他把握战机、敢打恶仗的韬略和勇气。吝于颂人的张国焘也在后来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称赞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

许世友率领的 34 团是红 4 方面军的一个主力团，以善于攻坚闻名全军，无论官兵，人人一把大刀一支枪。只要有战斗，战士们无不像他们的团长一样，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

夺取垭口的战斗打响后，一营冒着暴雨般的子弹，迎着炮弹连续爆炸的火光，勇猛地向垭口冲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去。

眼看着第一次攻击受挫，许世友急了，拔出驳壳枪大吼道："警卫排也全跟我上！拿不下垭口，我们 4 方面军就全完了！弟兄们跟着我，冲啊！"他带着敢死队员和警卫连的小鬼，一个冲锋，扑上了垭口，机枪连和 2 营、3 营也紧跟着冲了上去。

冲在最前面的是罗应怀，他是一营的打旗兵兼勤杂班班长，也是许世友手下的一名勇士，打新集、打高家寨，每一次许世友带领的敢死队里都少不了他。此时，他紧紧地擎着一面战旗，狂呼大叫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在当时的红军部队里，战旗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既是前进的方向，又是胜利的象征，战旗指向那里，部队就冲到那里。旗在，部队在，阵地在。官兵们一看见战旗，浑身就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正因为如此，各支部队都挑选出最勇敢，最机灵的战士来担任。打旗兵虽然职务很低，却很有威望，因为他代表着团队的荣誉。

敢死队紧跟着一刻不停的战旗，冒着敌人的炮火终于冲上了垭口上敌人的阵地。一排长抱住敌人的机枪手滚在一起，拳打脚踢还用嘴咬。罗应怀着了急，急中生智，用旗杆底部的铁矛"噗"地扎进了敌机枪手的太阳穴，红的血白的脑浆，像喷泉一样射出老高，溅了他满胸满脸。

罗应怀挺立在垭口阵地，高举着被旗帜被弹片撕成一条条碎片的战旗，像头发狂的雄狮一样大声怒叫。敌人的包围圈终于被敢死队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垭口一仗，红 34 团差不多拼光了。罗应怀所在的一营冲上去时是 314 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 82 人。战士们攻下阵地后人人大汗淋漓，山顶奇冷无比，很快战士们就被冻僵了。等到撤离命令下来时，有十多名战士由于长时间爬卧在冰天雪地里，已经被严寒夺去了生命。

大部队刻不容缓地跟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垭口，部队能精减的东西全扔了，行军锅被砸成了碎片，一些瘦弱的骡马行动迟缓，立即被推下了山涧，连那些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山炮和迫击炮，此时也不得不炮口对着炮口地炸成了废铁。

陈昌浩站在小路边，亲自指挥部队迅速通过垭口。子弹的尖啸声中，不时传来他焦急的声音："快，快一点。"

敌人也深知垭口一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又发狂似地向着垭口冲来，想把缺口重新堵上。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都竭尽了全部力量在拼杀。枪声巳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出啸声。四面大山仿佛在微微发颤。当敌人的两个旅重新合拢时，他们捡到的只是红军扔下的一堆破烂。

笔者近照：

6、小河口"逼宫"

红 4 方面军突破垭口，翻越漫川关，攻占陕军把守的竹林关，又一次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钻了出来。接着折向西北，以两昼夜急行军 200 多华里的速度，进抵商县西五十余华里的杨

家斜，然后又南下北折，分左右两路纵队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早在红 4 方面军进入秦岭之际，敌人就狂妄地宣称：“自古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二峪保长安’，红军不死于炮火，就死于冻馁。”可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支连遭各路大军围追堵截，长途征战的疲弱之师，居然从重重包围圈中突了出来。

西安杨虎城对红军的突然出现十分恐慌，赶紧调孙蔚如第 17 师赶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紧接着，在漫川关扑了空的敌第 1 师、第 65 师、第 51 师、第 35 师也赶了上来，敌第 2 师与第 42 师则沿陇海线向红军逼近。

红军刚突破了一个包围圈，可眼前，敌人又撒开了一和更大更严密的网。

红军无路可走，只好又掉头扑向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毕竟，大山是摆脱追兵的最好的地障。12 月 3 日，红军于周至县的辛子口出发，再次进入了秦岭山脉。

秦岭山脉位于汉水渭河之间，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均为海拔 2000 米以上的大山。为了甩掉追兵，红军选择的道路几乎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高寒区，加上老天爷毫不客气地落了几场大雪，使得红军的行军更为艰巨。

由于长时间的行军，官兵的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都可以看到斑斑的血迹；有些人的脚已经发炎，不停地流淌着腥臭的脓血；有的人连鞋子也没法穿，只能在脚上缠上几层破布赶路。经历过战争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烂脚不算病，行军要老命。而这支磨烂了双脚的部队，偏偏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崎岖的山道上前进。长长的路伍后面，留下的是一条红色的血路。

能吃的一切，飞禽走兽、草根树叶、白鳝泥，全都被官兵们塞进了肚子了里。饥饿使病员不断增加，断粮使行军速度大大降低。枪声响了，倒下的是高级指挥员们的座骑，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的战马全都被吃掉了……

行军、作战、饥饿、受冻、流血、牺牲……红军像一队无家可归的惊雁，被历史的狂风暴雨放逐到了汉水以南的地域。

经过 7 天的艰苦行军，红军一连翻过 9 座 2000 米至 4000 米的大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终于在 12 月 9 日到达了秦岭南麓城固县的小河口。

小河口太小了，仅有的几间民房容纳不下这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各支队伍只能分散到山岩下，背风的深沟里、密林中，燃起一堆堆篝火取暖。当夜晚降临后，满山遍野火光点点，情景蔚为悲壮。有的人怀抱拐杖在火堆边睁着双眼，有的人把玉米须和树叶搓成的细末放进烟锅，“吧吧”地抽着；有的人默默地擦拭着武器。忽明忽暗的火光映出了一张张深深思索着的脸，他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放弃了鄂豫皖苏区？究竟要跑到哪里才是个头？中央知道我们的行动、处境吗？

战士们在思考，指挥员们则不仅仅是思考，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所思考出的结论采取行动了。

对历史而言，1932 年 12 月 9 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那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峰，一条接着一条的深涧，在冬日的乳白色雾气中涌动着，隐现着，如同一座座澎湃的洪峰。悬挂在峰峦上的峥嵘怪石，似人似物，似怪似兽，给人以扑朔迷离的联想。

一场大雪白了山川，也给山沟里一幢破破烂烂的土房子披上了银妆。深夜，窗户紧闭的的土墙房子里那盏马灯扑闪着浑黄的光亮，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世界带来一丝儿生气。

……一张刚毅的脸膛被马灯照耀着。他眉头紧锁，来回踱步，虽然举步维艰，虽然拄着拐杖，然而他像一位临战前的将军，正筹措和谋划着一场生死决战。他就是曾中生。他带着伤痛，冒着生命危险率先挺身而出，在这里召集一个秘密的会议。

当鄂豫皖大肃反进入白热化程度时，这位在红军和地方上有着崇高威望的苏区党和军队的重要负责人就已经被张国焘排斥出了核心领导班子。直到黄安战役胜利，黄安独立营被扩编为独立师时，张国焘才安排曾中生担任独立师的师长。他左臂负过伤，在 4 次反“围剿”时腰部又受重伤，行动很困难，张国焘原打算在撤离鄂豫皖时扔下他，徐向前不忍心看到自己过去的上司落入虎口，亲自安排张仁初几名同志护送曾中生。张仁初等不分昼夜用担架抬着曾中生随部队爬山越岭，曾中生过意不去：“仁初啊，让我下去爬几步，也能减轻一点你们的负担啊。”说着话，他果真蓦地翻下担架，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张仁初等人含着泪水扑上去，把他重新抬上担架，大吼道：“首长，我们就是累死，也要抬着你走！”

伤痛折磨着曾中生，然而更折磨人的是心灵上的伤痛。

革命已到了危急关头，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土屋里人影幢幢，先前联络的高级干部们都勇敢地出现了。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朱光、刘杞、傅钟、舒玉章、还有女将张琴秋。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空气仿佛已经凝固。

“同志们，我们已经陷入了绝境，部队在流血，在大量地消耗，官兵们怨声载道。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必然是死亡，是毁灭！”

曾中生首先发言，语气沉痛而又透着悲壮。他激愤地撑着拐杖挺胸站起来，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将手中的拐杖奋力一挥。

“不，共产党员再也不能沉默！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他虽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党中央及其政策已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并疑心重重，但眼下他更关注的是有人谎报了军情，欺骗了中央，应当迅速地派人向党中央报告其真相。

郁积在心头的怨愤像潮水般冲决了堤岸……与会者全都慷慨陈辞，一致赞同派人去向党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反映他的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挽救危亡中的红4方面军。

小河口涌起了春潮。

当决定向中央写信一事决定下来后，有的同志提出，眼下离党中央路途遥远，担心还没有送到，部队就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

由于意见不一致，这群血气方刚的将领最后放弃了派人送信前往中央，而改由与会者签名，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势向张国焘直接陈述大家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光明磊落的表现，也寄望张国焘看完联名信后能改变态度，从谏入流，吸取教训。

这亦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意见书》。

曾中生是被担架抬着来见张主席的。他委婉地陈述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呈上了意见书。

张主席看完意见书后，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跨出了门槛。

我们几名卫士紧跟了出去。

张主席站在风雪之中，大口抽烟，任飘飞的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在他的头上、肩上。

张主席毕竟是大政治家，大约两分钟后，他扔下烟头，转身回到了屋子里。

此刻，他的神情变得肃穆，语气也十分沉痛。他感谢同志们如此直率地给他提意见；他对自己尚未意识到的不良作风深感震惊；他提议马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定会正确地对待同志们的金玉良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干部会议是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张主席以一种大丈夫的坦荡和谦恭，接受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诚恳地承认自己诸多错误和不足；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接连颁发命令，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邝继勋仍担任73师师长，张琴秋为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如果说此前参加“小河口”会议的同志们还有些忐忑不安的话，张国焘的态度，不仅让他们放心，甚至让他们感动。

然而，当他们不久以后发现这只不过是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图缓和大家的情绪时，已经迟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鲜血、是自己的头颅。

第二天，部队继续南行。当红军前锋抵达秦岭出口处的新口子时，陕敌孙蔚如第17师两个团突然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红军的去路。邝继勋的先头部队红73师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乖乖地让出了道路。当天晚上，部队赶到了沙河营一带的汉水西岸。

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源出陕西西南部米仓山西端。下游由汉口注入长江。虽说眼下已到枯水季节，但横堵在红军面前的汉水，仍然宽达两百米以上，透过朦胧的夜色看去，两岸浅水处已结了一层薄冰，而江中心依然是水流湍急，激浪翻滚。茫茫的水面上，没有只帆片影。

为了争取时间，总部决定全军徒涉过江。陈昌浩、徐向前亲自沿江选取定了徒涉地点，挽起裤腿，带头破冰下水，率领全军涉江。

由于一天的行军，官兵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一阵阵冷风吹来，冻得直打哆嗦。下到江水以后，立即尝到了寒水似刀的滋味。官兵们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在齐胸深的深水中，一步一步地向对岸挪去。当夜，全军渡过了汉水，到达城固县的上元观地区。

这时，从鄂豫皖一直尾追红军的胡宗南第 1 师已被甩在了遥远的关中，肖之楚的第 44 师和刘恩茂的第 65 师因贺龙领导的红 3 军活跃在鄂陕川边境，也调向了安康地区。南郑一带仅有孙蔚如的第 17 师一部驻守，兵力空虚，对红军已构不成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终于败脱了西征以来极为被动的局面！

## 第三章 进入川北

陈昌浩总政委大声喊："起来，都给我起来，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请老百姓抽鸦片，他们才肯为红军提供情况……田颂尧的探子火烧瓦斯铺，没想却帮了红军的大忙……张国焘被川北老姓当成了"真命天子"。

### 1、雪夜过巴山

1932 年 12 月 15 日，雪后初晴，空气清新，一轮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给千里冰封的汉中大地洒下了万道金辉。

无数匹战马从四面八方奔来，汇聚到一个小村子里。

一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报纸，促使 4 方面军总部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

钟家沟是大巴山北麓的一个小村庄，方面军总部就住在这里。因为这是 4 方面军西征以来的第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会议，所以指挥员们都非常关心会议的内容。

和往常一样，依然是张主席主讲。他首先总结了部队西征以来的情况，嘉奖了许世友的 34 团和其他作战有功的部队，接着便宣布了翻越大巴山，挥戈川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这消息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离开鄂豫皖后，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能得到暂时的休整。现在刚把敌人甩掉，来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板凳还没有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看上去张主席的精神也好了许多。他笑咪咪地解释道："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邻，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军事地理学的知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可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川北比陕南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区域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刘湘与刘文辉正在川西大战，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之中，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时机。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会议结束后，指挥员们马上赶回驻地，向战士们传达会议精神，并作好入川的物质准备：每人三天的干粮，三双草鞋和五斤稻草。

就为这点干粮、草鞋和稻草，部队又不得不在西乡县多呆了五天。当时，陕南由于连年遭灾，庄稼歉收，又加之屡遭兵匪蹂躏，群众生活相当贫困。虽然每人仅准备三天的干粮一双草鞋和五斤稻草，可全军一万两千余人，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啊！

18 日夜里，命令下达了，一点钟开饭，两点钟集合出发。

深夜两点，总部机关的数百人冒着风雪，整齐地站在一片空地上，一边跺脚取暖，一边看着兄弟部队披雪开进。

总部警卫排排长叶南生问卫士们："大家能不能走？"

警卫排的战士百分之八十脚上裂了口子，一半的人裂口溃烂化脓。而作为卫士，不仅自己要翻过山去，还首先得保证张主席能安全地翻过大巴山。叶南生自然很担心他的战士眼下的状态。

我说："排长，你就放心吧。"

卫士们的精神也都很饱满，一片声嚷："警卫排的人不会装熊，不会掉队的！"

这时好几个老头老太太点着火把来了，惊奇地嚷道："张主席，陈政委，你们现在不能走，大巴山上七十，顶七十，下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都是羊肠子路，悬崖峭壁，眼下大雪封山，有的地方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要走，你们也得白天走。"

张主席充满自信地说："老大爷，我们能过去，我们连秦岭都能翻过来，就一定能翻过大巴山。"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没见过哪个队伍敢在冬天大夜里过大巴山的。"

"不是俺说话难听，就凭你们这单衣草鞋能过巴山，冻也得把你们冻硬的呀！"

我也笑着说："老乡们，我们红军死也不怕，还怕一座山吗？放心吧，我们的身子硬着哩。"

过了一会儿，谁也没能说服谁，老乡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不过，看着他们那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也兀地感觉到大巴山的确不比寻常。

出发前，刚刚上任的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扬起拳头，对大家响亮地说道："同志们，漫川关我们闯过来了，秦岭我们爬了两次，大巴山也一定能够过去！我们要团结互助，不要让一个战友掉队。大家说，能不能做到？"

"能!"同志们响亮地回答。

"出发!"

在朦胧的夜色中，巍峨的大巴山，像一条巨龙横躺在川陕边境。

我觉得上山的头三十里比较好走，风雪不太大，身上也不太冷，路上的荆棘都被先头部队砍掉了，走起来和平常爬山差不多。可天亮以后，越往上走，气候就越恶劣，狂风卷起漫天大雪，劈头盖脸地打来，官兵们眯着眼睛，猫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前移动。光滑如镜的冰坡，虽然已被先头部队打上了一道道梯阶，但经过前面几批人马的践踏，已经被踩光滑了，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有的战士和牲口甚至滑进了深达上百公尺的沟涧，眨眼之间，就连影儿也看不见了。

叶南生排长指挥着我们几十名卫士，赶在前面不断地用稻草垫在容易滑脚的地方，以保证总部首长不出意外。可就这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仍被摔得像个雪人似的，眉毛挂上了霜花，身上背的稻草上也挂着一支支小冰棒，被风吹得"哒哒"响。

部队走走停停，时断时续。每次碰到陡峭的冰坡，都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这时候，也正是张琴秋一帮政工干部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跑前跑后，站在危险的地段上，一边拉扶着战友，一边不断地高喊："共产党员和干部带头，帮帮伤员和体弱的同志。"

记不清爬过了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官兵们只好手脚并用，脸都快贴到雪地上了。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艰难前行，终于爬上了山顶。这时天已经黑了，又走了三四十里才宿营。荒凉的山顶上，白雪皑皑，没有一间房屋，我们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就是"房屋"，垫一把谷草，就是"床铺"，战士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口地吞下去。不吃呢，肚子饿得慌，吃呢，越吃身上越冷，冷得浑身发抖，上下牙齿直打颤。

半夜里，迷迷糊糊的士兵们被惊醒了，我睁眼一看，见陈昌浩总政委走来走去大声喊道："起来，都给我起来，不要睡了，大家都活动一下，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

张主席跺着脚，一边伸展着双臂，一边问身边的卫士们："我给你们提个问题，等到我

们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你们打算怎样来收拾这大巴山？”

叶南生说：“我要修一条公路，让大家坐着汽车过去。”

我说：“要是我啊，干脆把这大山炸平，种上庄稼，叫它给咱们出大米。”

洪安清说：“我不同意炸掉，那时候，地主老财的地都归穷人了，还不够你种呀。”

张主席说：“对，我同意洪安清的意见，把它留着，叫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来爬一爬，让他们知道，好日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大家活动一阵，又睡了一会儿，一夜就这么折腾了好几次。可第二天起来一看，还是有一些战友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不是冰便是雪的下山路上，更容易摔筋斗出意外。天气虽然好起来了，但是悬崖峭壁不断出现，碰到这些地方，我们就解开绑腿拧成绳子，从岩上放到岩下，首先让张主席等首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抓住绳子往下滑。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还得在他们腰里拴上一根绳子，小心翼翼地拉着，起个保险的作用。首长轮着下完后，卫士们再下。

21 日上午，队伍终于翻过了天险大巴山，来到了快到山脚处一个叫做观音岩的地方，远远看见了匐匍在山沟里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镇子岔口。可是，红军刚一踏上川北的土地，迎接我们的便是一通毫不客气的子弹。

红军一眼便看出，向我们开火的不是四川军阀的正规部队，因为这些人都穿着和老百姓一样破烂的服装。

为避免误伤老百姓，红军的政工干部开始喊话，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来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

可回答我们的，依旧是零零碎碎的枪声。

红军的冲锋号响起来了。战士们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奋不顾身地向着沟底的镇子冲去。

镇子大乱了，男人女人，拿枪的没拿枪的，全都往镇子后面的山上跑。

红军大声喊：“老乡们不要跑，手里没武器的，我们一律不杀！”

可没人相信红军的话。

等到我们进去时，看见镇子里静悄悄的，青壮年和女人全都跑光了。

果然不出所料，向我们开火的，是名震川陕边界的大巴山巨匪王三春的手下。

2、火烧瓦斯铺

镇子很小，喊一声全镇都能听见。总指挥部住进一家茶馆后，张主席叫我们几个卫士马上到街上去找几个老百姓来了解情况。

我们到了街上，看见战士们都分散到店铺和老百姓家中借住，以暂避风雪。

老百姓很害怕，因为他们对红军完全不了解。我们几个警卫员分头去找，我接连走了好几家，费尽口舌，主人都不愿意来。后来我许愿请他们抽鸦片，才弄了两个大烟鬼来。

警卫员们请来的十来个人全都是老头子，一个个满面烟容，瘦得不成样子，全都缠着盘头帕，穿着一件空心长棉袍子，有的外面还套着件兽皮背心，腰间扎着根绳子，勾着腰驼着背，双手捂着一个小烘笼在胯下取暖。而且，这里面很可能还有田颂尧的侦探。

张主席等首长们却把这帮烟客待若上宾，先请他们过足了烟瘾，又请他们饱餐了一顿酒肉，慢慢的气氛便相当融洽了。

吃完饭，卫士们已经在屋子中间放上了一个燃得旺旺烈烈的火盆，屋子里暖意融融。在两张污渍很厚的方桌前，围坐着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几位首长和客人们。

张主席亲切地向客人们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纪律严明的军队，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决不会杀人放火，骚扰百姓，红军到这里来，不过是借贵处一块宝地，以利红军休息过冬。他请客人们将他的这番话传出去，希望外出躲避的老百姓都能尽快地回来安居乐业。他还对客人们说，如果谁有路子和田颂尧联系，也请给他捎个话，红军到这里来不是和他为敌，而是和他做朋友的，红军现在暂时有困难，希望他能帮一把，今后他若有难，红军也可帮他，望他不要心存顾虑。

张主席说完后，陈昌浩、徐向前也都作了补充。陈昌浩的湖北话，张主席的京片子他们听得懂，而徐向前的山西口音就让他们大感吃力了，还得需要也是川人的傅钟不断地给他翻译。

接下来，主人请客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四川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军阀彼此拼杀，战乱纷争的环境里，养成了察颜观色，随机应变的才干，而且尤擅辞令。这帮烟鬼在过足烟瘾，酒足饭饱后，更是说得来头头是道。他们提供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令红军领袖们极感兴趣。

当天夜里，为了拟定“红 4 方面军入川纲领”，首长们忙了足足一个通宵。

总部在岔口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得到前锋部队已攻占通江县城的消息后，才离开岔口镇向通江县城进发。越往南边走，沿途集镇越加热闹。

总部在瓦斯铺宿营时，田颂尧派来的特务放火烧镇子，企图转嫁于红军，没想反倒弄巧成拙，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火是清晨烧起来的。当时，总部和随行部队千余人正在镇子外面的田坝上整队集合，准备出发，镇上忽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街房多是木头结构，遇火即燃，火势很快便漫延开去。官兵们立即冲进镇子救火，抢救财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一时成了“消防大军”的指挥员。经过大家奋勇扑救，保住了全镇大部分房屋商号，为居民救出大批财物。还有好几个红军战士在救火中负了伤。

镇上的居民在红军开到之前大都逃到附近的山上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起火的时候，逃避的人仍不敢回来，聚集在山头上心急如焚地观望，后来见红军真心救火，才鼓足勇气纷纷赶回来参加救火。救火的群众越来越多。而头一天傍晚红军队伍开到时，红军中的政工人员吼破了喉咙，他们也不敢回来。大火扑灭以后，红军又把抢救出来的财物一一退还给原主，并积极安顿灾民。群众目睹了这一切，大为感动。就在这时候，镇子外面的老百姓抓住了两个纵火嫌疑犯，并把他们带进了镇子。

原来，起火时，山头上老百姓看见这两个家伙神色仓皇地从镇子里跑了出来，便拥上前去将其截获。押回镇子后，一家客栈老板当众指认这两人是昨天中午到他店里住宿的客人，起火后便不知了去向。

经陈昌浩亲自审问，这两个家伙承认火是他们放的，田颂尧派他们来放火烧镇子，是想嫁祸给红军。陈昌浩当即下令将这两个特务枪毙在十字街口上。老百姓人心大快，消息飞快地传遍各地，从此各地群众再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听说红军要来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闻风而逃了。

## 3、张国焘派我当信使

一杆大旗重新抖擞威风，像一团火焰映红了千里大巴山。

1932 年 12 月 18 日，担任全军前锋的邝继勋的 73 师先头部队 217 团进入通江县境内的两河口，击溃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一个营，在此建立了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两河口乡苏维埃政府。

19 日，邝继勋率 73 师沿通江河继续南下，从泥溪分兵三路向通江进军，在途中歼敌两营，并与通江地下党派来的吴瑞林等同志汇合，在吴瑞林等人的引导配合下，于 25 日占领通江县城。随后，又与 11 师于巴中清江渡击溃田颂尧部 7 个团的反扑。

21 日，73 师于南江大河口与田部二路司令刘汉雄激战三日，歼敌一个团，向南江县城挺进，12 月 29 日，在通江县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由邝继勋任主席，所遗师长一职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

紧接着，我军组织大批工作队，各支部队分区负责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并协助建立地

方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开始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26日上午，天上飘着雨雪，红4方面军总部抵达了川北重镇通江城。

这是红军西行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此，张主席下令举行隆重的入城式。

我们这支被迫放弃根据地，转战数千里，已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形像已变得来的确狼狈不堪。许多战士穿着沿途补充来的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绸缎衣裤和姑娘媳妇的红绿夹袄。还有披着破烂被子、毯子的。那时正是大巴山上的严冬，夜里能冻死人的。头上的帽子也是千奇百怪，礼帽、毡帽、瓜皮帽、啥都有。人人面孔黝黑，头发又长又乱，满脸胡须。像啥？不太好形容，反正红军一到，把当地的老百姓全吓跑了。

到了通江城外的河边，红军官兵奉命整理军容，将完整一些的军装集中起来给入城的队伍穿。这样总算整齐一些了。红军战士扛着枪，排成六人纵队，高唱着军歌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骑着高头大马，频频向两边被我们的先头部队组织起来的群众与学生挥手致意。

这样的场面也让我们这些当兵的振奋不已。这一路上，我们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磨难，死了多少弟兄！如今，总算寻到了一块落脚的地方，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通江县城依山傍水，城里有一条军阀田颂尧修造的水泥大道和一座中山公园，还有前朝留下来的一座古色古香的文庙。文庙与中山公园一墙相隔，背抵炮台山，前临诺水，由大成殿，东西两庑以及乾门、棂星门、万仞宫墙、泮池等组成，高墙重门，巍峨屹立。大成殿造型疑重，结构严谨，石柱板壁，穿斗架拱，主体建设雕梁画柱，屋面琉璃生辉，房脊雕龙嵌凤，拱托30根大木，石庭柱的座墩上，镌刻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

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就设在了文庙里。与文庙紧紧相连的中山公园原来是建于清朝中期的学宫，分左右两院、前后两院，相互连通，建筑全是木质。其中一幢一楼一底古色古香的宽房大屋，以前是县长的宅邸，现在则成了方面军政治部所在地。张主席也住在这栋木楼里。

田颂尧盘据通江多年，将前朝留下来的学宫改建成了中山公园。红4方面军总部进驻文庙后，就把中山公园改成了列宁公园。大巴山的老百姓见识短浅，老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列宁就是这支红军队伍里最大的一个官。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刘湘占有川东及重庆一带，刘文辉占有成都、川西及西康一带，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川北为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割据。

田颂尧占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等26县，势力最为强大。刘存厚占有达县、万源、城口和宣汉等县。杨森势力最弱，仅占有营山、渠县、广安和岳池区区5县。而这些军阀们在各自的防区里横征暴敛不说，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

而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男人普遍吸毒，农业手工业则主要由妇女承担。俗话所说的“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正在川西坝子上争城夺地的田颂尧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支红军大部队出其不意地杀进他的老巢，占了他的地盘，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向我们大举进攻。

四川军阀本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入川，攘取主川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怕蒋介石，更甚于怕红军。所以当红 4 方面军最初进入四川北部时，刘湘为首的一帮军阀立即取联名至电蒋介石，表面上主动请缨，同仇敌忾，保证“穷全省之兵，将共匪剿灭”，而骨子里则是以此为借口，将胡宗南、肖之楚等中央军拒之门外。

而已被红军痛打了几棍的田颂尧也有心计，他既痛恨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更害怕引狼入室，日后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后患，更加之他手中还有四万兵力，敢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以为对付区区万余从鄂豫皖逃蹿出来的“赤匪残兵败将”绰绰有余。所以反对其他军阀派兵进入他的地盘内剿匪，只要求他们分摊军费份额则可。

1933 年 1 月 27 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子弹 100 万发，飞机 4 架，军费 20 万元。28 日，田颂尧在老巢三台县城正式就职。赓即以所部 38 个团近 6 万人，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田颂尧以左纵队为主攻，中央纵队和右纵队助攻。左纵队为敌 4 师、5 师、独立师等约 17 个团组成，由 4 师师师长王铭章指挥；右纵队第一、第二两师和何瞻如的第三路等部约 11 个团组成，由第 1 师师长曾南夫指挥；中央纵队以第 3 师和李伟如第 1 路等部约 10 个团组成，由第 3 师师长罗乃琼指挥。时在达县、万源之敌刘存厚的边防军 8 个团进驻万源竹峪关，威胁红军后路；盘踞在营山、渠县之敌杨森的 20 军亦准备出兵配合。

待一切计议停当，田颂尧才得意洋洋地通电全川，纠集 6 万大军，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杀来。

此时，王铭章的前锋罗泽洲部已进抵通江西面约 30 华里的鹰哥咀，与红 73 师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一天上午，我见陈昌浩、徐向前和从前线匆匆赶回来的老首长王树声、73 师政治委员甘元景、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等齐聚在张主席的办公室里开会。

一会儿黄超秘书长出来，叫我上后勤经理处拿几包烟送进去。当我回来把烟送进屋时，见张主席正飞笔写信。我放下烟后出来站在门口。不一会儿，听见张国焘在叫我，我又赶紧进屋去。

顿时，我感到很奇怪，这些我全都早已认识的首长一齐把目光落到我的身上，好像打量着一个陌生人似的。

张主席笑嘻嘻地说：“怎么样？何福圣这副相貌，不会丢我们红军的脸吧。要精神有精神，要气派有气派，而且还会武功。”

首长们都说行，就派他去好了。

原来，张主席是派我去当他的信使，带上他给田颂尧写的一封亲笔信，立即随 73 师的

首长们赶到鹰哥咀，把信交给敌方第 5 师师长、王铭章派出的前敌指挥罗泽洲。

这信里写了些啥？张主席当然不会告诉我。一直到几十年后，我才从地方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看到了这封信的内容。大意是红军入川并无与田颂尧作战的意图，我们反对的是蒋介石，并不愿与四川军人为敌，到这里的目的只是略事休整，如果他能谅解，明年春天，我军仍准备返回鄂豫皖地区。希望双方协商划分防区，千万不要轻启战端，弄得两败俱伤，让渔翁得利。

我将信揣好，立刻随同王树声等人策马向鹰哥咀疾驰。到了 73 师师部。王树声通知前沿阵地与敌方联系，告知他们我方有信使要过火线。

没过多久，参谋来报告已经联络妥当。我即上马离开师部，上了前沿。

敌我双方都在山梁上，中间是一片开阔地。在自己的阵地上，我还为自己能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兴奋不已，一进入开阔地，心中顿时便空落落的了。我深知那一刻不知有多少枪口对着我。

刚进入敌方阵地，一帮川军官兵就把我围了起来。我下了马，对为首的一名军官说道："我是红军最高首长派来送信的，我要面见你们的罗师长。"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四川军队。我注意到川军的军官很讲究摆场，大都衣饰鲜亮，团长师长还穿着锃亮的高桶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披着外黑内红的斗篷。士兵则普遍个头矮小，身体精瘦。

敌军官要我把枪交出来，我照办了，然后跟着他们往山顶上走去。

罗泽洲的指挥部设在这座山顶背后的一所地主的院子里。警卫森严。我走进大堂屋，见了罗泽洲的面，向他说明来意，并把信交给他。罗泽洲看了信，吩咐勤务兵给我泡茶，待我还算客气。然后拿着信进屋去了。

我猜他可能是用电台向驻在三台县城的田颂尧请示。罗泽洲出来后态度一下就变得极其傲慢，对我说："你回去告诉张国焘，赤匪不是军队，是一群打家劫舍祸国殃民的乌合之众。现在逃蹿到此，我奉命毫不留情地予以剿灭。他要是聪明，就赶快向我部投降。"

我飞骑赶回通江报告。

张主席听后对陈昌浩、徐向前说："他实在要打，没办法，我们只好陪他打了。"

笔者注：七七事变后，王铭章率部出川抗日，于台儿庄大战中死于滕县保卫战，成为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

## 第四章 重整军威

张国焘被川北老百姓当成了“真命天子”……像林黛玉那样的古典美人，在红军队伍中肯定会受到唾弃。王新国，就是因为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而掉了脑壳的……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 1、连战皆捷

当时我军入川不久，根据地还不巩固，回旋区域小，部队数量不及敌人的三分之一，要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显然是有困难的。

但有利的是红军骨干多，士气足，且入川两月，已获得了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红军在通、南、巴地区已初步发动了群众，熟悉了地形，并开始建立地方武装。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和川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特点，方面军总指军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后发制人来打破敌人的进攻。

2 月 18 日，敌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巴河全线发起进攻。红 4 方面军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经十余天的激战，在南江的长池、木门（今属旺苍县）一带歼灭担任主攻的左纵队 5000 余人。陈昌浩、徐向前见第一步大量消灭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乃于 28 日开始有计划地后撤，主动放弃了长池一带阵地。3 月 8 日撤出巴中县城，撤退中又在旧场打了一个埋伏战，歼敌 1 个团。18 日，我军继续撤出南江县城，收紧阵地至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杀牛坪、得胜山、麻石场、龙凤场以及大明垭口一线，故意给敌人一个我军已溃不成军的印像。4 月 26 日，自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的田颂尧再次发动猛攻，其中央纵队由两河口经大明垭口，一齐扑向通江城，左纵队主力则由南江向东猛插，企图将红军主力压缩包围于通江县城以北地区而聚歼之。红军继续以少数兵力依托工事，以猛烈的火力和灵活的战术，顽强地阻击敌人。歼敌约 3000 人，继续诱敌深入，于 29 日撤出通江，再次收缩阵地，将主力集中到方圆不到 100 华里的空山坝地区。

空山坝地区海拔 1000 米至 2000 米，境内群峰林立，古树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反“围剿”作战的地区。

4 月 25 日，蒋介石电召四川各军代表齐集南昌，面授“剿匪”机宜。蒋介石恩威并举，迫使川省各将领答应立即派兵协助田颂尧，将川北“赤匪”尽快肃清。5 月 8 日，蒋介石发表原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为 23 军军长，刘存厚喜不自禁，为露上一手，趁田颂尧军左纵队正在向空山坝一线红军猛扑时，于 5 月中旬突然出兵抢占了竹峪关、草坝场等红军阵地。

5 月 15 日，余天云、李先念率红军主力 11 师夜袭竹峪关，击溃了刘存厚部 8 个团，解除了敌对我后路的威胁，同时也掀开了红军大反攻的序幕。

17 日，张主席在空山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敌左纵队 13 个团的部署。会后，陈昌浩与徐向前即飞骑赶往前线指挥。

5 月 21 一日凌晨 4 时许，红军冒着瓢泼大雨开始了全面反攻，将敌左纵队第 4 师王铭章部 5 个团、独立师刘汉雄部 3 个团及覃世科旅 3 个团、何瞻如部两个团共计 13 个团，分割包围在通江北面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于 24 四日全歼敌 7 个团，击溃 6 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近 5000 人。红军乘胜猛追，先后于 20 日收复南江，29 日收复通江，6 月 6 日收复巴中，直追敌到仪陇。接着我军收复长池、木门、旺苍坝、歼敌一个旅的大部，并继续分别乘胜追击直抵苍溪、广元城下。另一条战线上，我 11 师、12 师向驻守营山的 20 军杨森部发动猛攻，连破杨森 7 道纵深防线，占领营山县城。随后，又占领嘉陵江左岸蓬安县属的周口镇。

田颂尧闻讯，急调重兵驰赴邻水、大竹、渠县，增援杨军。

因田颂尧所派援军已进驻渠县，10 月 16 日，红 4 方面军便转向刘存厚防区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等地进军。19 日下宣汉，20 日克达县，刘存厚弃城逃走，21 一日占万源，直抵城口县近郊。

自该年 5 月红 4 方面军开始反攻至 10 月，师行所及，势如破竹，先后击溃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路大军，声威所播，直使全川军政当局无不感到震恐。

反击田颂尧三路围攻之战，到此胜利结束。总计历时 4 个月，毙伤敌旅长杨选福以下 14000 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等以下官兵万余人，缴获长短枪 8000 余支，机关枪 200 余挺，各种火炮 54 门，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

田颂尧被打得损兵折将，“忧愤巳极”，下令“各县官绅民众戒除宴乐”，以示哀悼，否则“决予惩处”。

田军损失近半，余部退守嘉陵江沿岸。田颂尧自认“轻材任重”，电呈蒋委员长“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之职，另择贤能接替”。

红 4 方面军在对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发起大反攻之后不久，由总指挥徐向前主持，于 1933 年 6 月底在旺苍、南江、巴中、苍溪四县交界处的木门镇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总结了前期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的经验，确定了扩大红军的方针，并决定扩编部队、进行训练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

7 月，总部根据木门会议决定，决定将红 4 方面军原 4 个师扩编为 4 个军。

第 10 师编为红 4 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第 11 师编为红 30 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第 12 师编为红 9 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第 73 三师编为红 31 军，军长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政委张广才。4 个军共计 11 个师、29 九个团，共 40000 余人。

许世友也因战功卓著，升任红四军副军长兼 25 师师长。

红 4 方面军设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曾传六。

这次扩编，不少人都注意到，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 4 方面军的元勋，以及前不久在小河口才当上总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均被张国焘冷落一旁，闲置不用。

8 月 12 日，红军挟大胜之威趁热打铁，开始进行仪（陇）南（部）战役。9 军全军担任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由巴中以西之恩阳河地区向仪陇和南部发动进攻，31 军一部向苍溪方向逼近；以 31 军一部向广元方向进击配合 9 军的行动；另以 4 军在江口和洪口场等地牵制敌杨森和刘存厚的部队。9 军向仪陇进攻，先在尹家铺击溃敌一个团，迅即包围仪陇县城即外围兴隆场、黄木石、日兴场、凤仪场等据点，经过一周多的连续作战，打下外围各个据点，歼敌一个多团，于 23 日攻克朱德的家乡仪陇县城。9 军占领仪陇后，继续向南部以东之嘉陵江沿岸地区挺进，据守该地之敌纷纷向嘉陵江以西败退。

仪南战役历时半月，总计歼敌 3000 余名，缴枪上千支，解放了仪陇全县，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区和陕南宁强一带。

红 4 方面军为了解除敌杨森 20 军盘踞在巴中以南的威胁和向南扩展根据地，夺取对食盐的控制权，决定先消灭突出于北端玉山场、鼎山场地区之敌，尔后向南发展，突破敌之纵深防御，相机歼灭其主力。

9 月 22 日，开始营（山）渠（县）战役，9 军 73 团以隐蔽突然之动作，插入玉山场、鼎山场背后占领敌人险要阵地，包围敌第 2 混成旅的一个团于鼎山场，而玉山场之敌在我 30 军的强大压力下不战而向南溃逃。9 军和 30 军随即冒着大雨向营山挺进。

10 月 3 日，9 军和 30 军各一部向大庙场、新店子一线敌军发起猛攻，9 军之各部冒着敌人猛烈炮火，英勇冲入敌阵，开展肉搏，连续突破敌 7 道工事。此战中，曾经领导过省港工人大罢工的军长何畏左臂被炮弹片炸断，依然不下火线，更激起官兵冲天斗志。营山县城守敌和来援之敌第 3 混成旅及第 5 混成旅，在红军猛烈打击下，被歼 2000 余人，余部逃向嘉陵江西岸。当晚，9 军解放营山县城，6 日占领蓬安对面的周口镇（今蓬安县城）。

何畏负伤后住院后，由孙玉清出任代军长。

营渠战役历时 10 余天，共歼敌杨森 20 军所部 40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2500 余支，夺占了营山、渠县大部和蓬安县嘉陵江以东之广大地区，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华里。

而且，此役还攻占了盛产食盐的南部县洪山、三合、碑院地区，占盐井 90 余口，夺盐 10 余万斤。控制大批盐井，对于保障根据地军民的食盐供应，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时，根据地内食盐奇缺，有的农民终年吃不到一粒盐。当红军占领了这样多的盐井时，官兵们真比发现了神话中的宝窟还要高兴！

2、杨森与陈昌浩暗订密约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四川军阀一个个心怀鬼胎，虽然迫于蒋介石的压力不得不暂停“撕内皮”，转而将枪口一致对准红军，但私下里仍以保存自己的力量为第一要务。甚而巴心不得红军能将自己过去以至于将来的对手一举消灭或是削弱。

尤其是杨森，正处于他当上 20 军军长以来最穷困最潦倒的时候。1928 年底，他在下川东战役中为刘湘大败，率残部龟缩于川北广安、渠县、岳池、营山、蓬安、顺庆 5 县。他把军部设在广安城里，决心把桑梓之地当作自己的根据地，韬光养晦，再图发展。没想偏偏就在这时候，红军从后面杀来了，而前面又有宿敌刘湘等军阀虎视眈眈。蒋介石要他发兵配合田颂尧打红军，他不敢抗命不遵。可自己躲在渠县、广安一带喘息了两年，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元气，不想再把老本儿拿去孤注一掷，便使出花拳绣腿，只派第 5 混成旅旅长夏炯带领本部人马稍稍北进虚应故事。部队到了江口（今平昌县），与红军稍一接触交火，就立即退到巴河南岸固守，与红军隔河相望。

杨森这一次犹如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仗打胜了，好处全落到了田颂尧脑壳上，连口残汤剩水也没他的分。打败了，伤筋动骨的则是自己。他的 20 军弟兄粮饷无着，靠东挪西凑和友军接济过日子，军官不论大小，每人每月一律只发两块大洋。杨森当时经济上窘迫，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处在夹缝中的杨森自不愿为蒋介石拼光了自己的家当，遂命令夏炯掘壕据守，千万不要主动去招惹红军。

这时候，夏炯手下有一个姓刁的团长，过去当“绿林好汉”时与川东游击军的总指挥王维舟等人来往紧密，并暗中加入了共产党。他看出杨森对围剿红军并不积极，知道杨森有难言之隐，就向杨森的心腹爱将夏炯大胆进言，表示自己与川北红军头目有些私交，如今两军对垒，既不和，也不打，双方徒然消耗实力，反正双方本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不如以彼此利益为重，大家坐下来直接会谈一次，最理想的是各自放弃小利，联合起来，一致对敌，争取大利；退一步，也可以寻求划定边界、互不侵犯的条件，各自谋取自身的发展。

夏炯知道此议正合杨森的心思，即将刁团长的建议报了上去。

对一心想当“四川王”的杨森来说，最大的敌人当然不是红军而是刘湘、田颂尧等军阀。他认为如果川北红军确实有联合互保或划界自保的诚意，倒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经过慎重考虑，杨森责成让夏炯去经办此事。杨森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自己不出面，即便一旦事情暴露，可以推说不知道，一切都是“手底下人”办的。只要能保住他自身，部下即便得到处分，仍可以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他对夏炯手下那位与王维舟私交甚笃的刁团长不放心。因此，只能让他干些牵线搭桥的事，而代表他去和红军谈判的，则挑选了成都讲武堂毕业生、此时正在夏炯手下当团长的李麟昭。

通过刁团长的往来拉线，双方终于决定进行一次正式的会谈，地点选在巴中县东南方向的得胜山（今属平昌县得胜乡）。该地既不是红军的势力范围，也不是杨森的防区，这样以示公平。

这头一次，双方都是“单骑赴会”。

代表红军的是陈昌浩，青衣小帽，一身收山货的外地客商打扮。杨森这边，则是李麟昭，

他是当地人打扮，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白布，穿一身靛青土布长衫，看上去像个土老肥。

红军代表的气焰却令杨森十分的气恼，杨森让李麟昭带去的意见是：双方在平等的前提下成立联军，目标是共同对付刘湘的 21 军。但是联军只是行动上的联合，除了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分头作战之外，两军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

陈昌浩带来的张国焘的意见却是：要求杨森取消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的建制和番号，完全脱离蒋介石的控制，改编为红军，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红 4 方面军的命令。而且陈昌浩咄咄逼人，明确强调杨森既然要向红军靠拢，就要彻底抛弃蒋介石，不能做骑墙的两面派。不然，所谓“联军”，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日后杨森如果有了反复，不但红军无法控制，也会影响红军的声誉。

双方反复商讨，由于基点相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李麟昭只好在“回去向军长汇报后，再决定行止”的借口下，客气告辞。谈判无结果而终。李麟昭回到广安，向杨森汇报了谈判经过，杨森冷笑一声：“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长得像个啥样子，投靠你张国焘，我还不如投靠蒋介石呢！”从此，与红军谈判，成立联军的事儿，杨森就再也不提了。

这是 1933 年上半年的事情。

几个月后，张国焘见杨森对联合反刘一事持冷淡态度，也意识到自己“要价”太高了，于是主动“落价”，通过刁团长这条渠道，提出第二次商讨的建议。杨森觉察到红军这一次有比较大的让步，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就责成夏炯亲自出面与红军谈判，并给予比较大的自决权以“便宜行事”。

夏炯建议谈判地点就在他的旅部岳池县公园内，经过刁团长的往返联络，红军方面表示同意。

到了约定的日子，红 4 方面军的代表陈昌浩和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化装成商人模样，进入夏炯防区，即由夏派去的人接着，从速送往岳池公园。双方从晚饭的饭桌上谈起，一直谈到深夜。20 军的正式代表是夏炯，杨森的秘书杜重石为随员。双方挑灯夜谈，经过讨价还价，总算达成了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两条：一、红军与 20 军各不相犯；二、由红军出兵攻打刘湘部队，由 20 军负责军需补给。

这个协议，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并没有形诸文字，没有让杨森和张国焘签字，只能算是口头上的“君子协定”。这是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杨森的精细之处。如果正式签订协议书，一旦落到蒋介石或特务分子的手里，对红军无所谓，对杨森来说，脑壳就保不住了。

达成协议以后，夏炯立即调拨军装 2000 套（包括帽子、鞋袜、毛巾、水壶、皮腰带在内）、子弹 8 箱以及许多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作为礼品赠送给红军。杜重石也拿出两支崭新的德国造 20 响快慢机送给陈、黄二人，并说：“这是杨森军长的心爱之物，特意送给二位作自卫用。”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夏炯和杜重石的这一次谈判对红军、对抗日来说都是绝对有利的。尽管杨森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于报复刘湘的夙怨，但对当时败退川北的红 4 方面军来说，却

是雪中送炭，给予十分有力的支持。

但张国焘在击败田颂尧的三路进攻后没把杨森放在眼里，违背这一口头协议，突派重兵杀入杨森的地盘，打掉他 4000 余人，夺去了他不少地盘，气得杨森在广安城中的涵虚山庄里拍着桌子大骂张国焘比浑水袍哥还不讲信用！

一气之下，他下令把他最精锐的独立旅（旅长任炜章）也派上了前线，决心和红军大打一场。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夏炯的一生既打过共产党，也帮过共产党，解放战争后期虽然也投向了解放军，但是起义不久即以莫须有的所谓“叛乱”罪被镇压。在那个极“左”路线当政、“株连九族”的年代，夏炯的女儿夏文湘被放逐新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杜重石写信告诉她夏炯当年与红 4 方面军密谈，并暗助红军之事，叫她大胆写信给徐向前同志。他是当年红 4 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的搭档,现在能证实此事的，只有他一人了。此事务必抓紧，徐向前年事已高，倘若他一辞世，你父亲的冤屈，就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了。夏文湘赶紧鼓起勇气给徐向前写了一封信，不知通讯地址，她就把信寄给了“北京市中央军委”，请中央军委转交徐向前元帅。信发出后，她忐忑不安，却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以军办信发字（82）第 46 号函代为答复。复信全文如下：

石河子红山嘴电厂党委：

你厂夏文湘同志来信，请徐向前同志谈其父夏炯的情况。经徐向前同志回忆：

夏炯与当时红 4 方面军秘密谈判确有此事。同时夏炯还为我红军解决许多医药、军需物资，对红军帮助很大。此事当时是张国焘、陈昌浩具体商量决定的，徐向前同志当时在前方打仗，虽知此事，但详细情况不清楚。

请将此情况转告夏文湘同志。其父夏炯在四川与红军接触的这一段，肯定是办了好事的，对中国革命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现将夏文湘同志的来信转去，请阅处。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印）

1982 年 3 月 9 日

这样一封“尚方宝剑”，对于帮助夏文湘为父鸣冤，自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继连败田颂尧、杨森后，随后的打击便落到了刘存厚的头上。红 4 方面军为继续扩展胜利，又组织了宣（汉）达（县）战役，对盘踞在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地区的刘存厚的边防军主动发起进攻。10 月 16 日开始发起攻击，19 日，由孙玉清任代军长的红 9 军解放宣汉；20 日，余天云李先念的红 30 军攻占达县县城；21 日，王宏坤周纯全的红 4 军占领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宣达战役历时 11 天，共击溃刘存厚川陕边防军 12 个团，俘旅长以下 4000 余人，缴枪 8000 余支及大批军工设备和军用物资。刘存厚投下巨资，苦心多年建造起来的一个完整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兵工厂，也完好无损地落到了红军手中。

红军在将这座工厂的设备拆散运回根据地的同时，还不惜血本把该厂的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尽可能地动员到了苏区。

这几次战役以后，四川军阀在红军的威势面前吓得心惊胆战，继田颂尧被迫引咎辞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之职后，刘存厚也被蒋介石下令革职查办。

此后不久，由王维舟、杨克明领导、并配合红 4 方面军解放宣汉、万源的川东游击军与红 4 方面军在宣汉南坝场胜利会合，随即改编为红 4 方面军第 33 军，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至此，红 4 方面军已达 5 个军 8 万余人。

红军官兵深知这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能打胜仗，是与川北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不过，川北老百姓支持红军，并不是由于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有多么吸引人，而是要感谢两个东西，一是军阀盘剥；二是封建迷信。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此时却被各路军阀搞得民穷财竭。军阀挖空心思征税征捐，苛捐杂税，名目惊人。种田要收田赋、缴粮捐，除此之外，什么壮丁费、马路费、种烟费、被服捐、瘾民捐、月儿捐、子弹捐、火线捐，连讨饭的乞丐都要交花子捐；不种鸦片的农民还要交“懒捐”。田赋是一年数征，年年预征。1933 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等地，田赋征到了 1983 年；田颂尧统治的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旺苍、昭化、剑阁、苍溪、南部等县稍好一些，田赋也征到了 1950 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田的地主富农与无田的干人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 1928 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次年，在川军中担任旅长的邝继勋又领导了遂（宁）蓬（溪）兵变。

红军入川前夜，王维舟、杨克明等又组织发动了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游击军。川东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

四川老革命家王维舟是宣汉县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在上海加入了共

产党。1925 年回到大巴山后，创办宏文学校为掩护，即积极从事组织农民武装斗争。1929 年与李嘉俊领导川东北两万余农民起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川东游击军。

王维舟身材高大魁梧，四川军阀把他画成肥头大脸，悬赏几万大洋，买他的脑壳！川北老百姓却不叫他的名字，叫他“王善人”。

劳苦大众拥护王维舟，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这又真得“感谢”田颂尧——这位川北土皇帝多年来对当地人民敲骨吸髓，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路有饿殍。人们形容说“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军阀梳子梳，

豪绅篦子篦，

甲长保长刀子剃，

收款委员来剥皮。

而红军一来，马上就分田分地，废除苛捐杂税。老百姓是最重实际的，很快便由开初对红军的害怕，改变为信任、拥护，把红军当成了大救星。红军与田颂尧作战，他们也就能够全力支持了。

紧跟着发生在通江总部门前的一件非常荒唐可笑，但对我们这次作战以及今后的发展很有利的事情。让具有浓厚迷信思想的苏区民众对张国焘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而这种封建迷信思想在红军指挥员中间，同样十分普遍。

民国初年，通江县苦草坝青年农民张昌祥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暴动，被官府血腥镇压下去后，张昌祥不知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远走高飞了，反正从此后再无下落。

20 年后，突然有一个姓张的男人带着红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通、南、巴，同样是专门整地主豪绅，帮助穷人。

苦草坝一带的人很快便传出消息，说如今这个姓张的男人肯定就是当年的农民暴动领袖张昌祥，他大难不死，在外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现在又领着神兵回来了。

这种说法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老百姓中间影响力非常大，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通、南、巴地区。如果张国焘不是苦草坝的张昌祥，为什么他会带着大军开到大巴山来？而且视大巴山为家园，对“干人”爱护备至、视作亲人？那个年代的人，满脑袋神权命运旧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他们祖祖辈辈所见所闻过的四川军阀部队截然不同的红军，而这支红军全中国那么多地方不去，偏偏要到这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开到这块地方，总是胡作非为，闹得人心大乱鸡犬不灵，惟独这支红军一反其它军队所为，专替穷人说话撑腰打抱不平。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财物分给穷人，盘古开天地，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事？他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懂苏维埃政权是怎么一回事，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证明这一切。由此一来，所有的谣言都集中到了张国焘身上，沸

沸扬扬地把张国焘说成是“真命天子”。前方越是打胜仗，这种传言在后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一天下午，我突然听见文庙大门口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正在屋里议事的张国焘和黄超也听见了，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下了木楼，往大门口走去。一眼，便看见门口围着许多农民。这帮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裤腿高挽着，脚杆上沾满了泥巴，一看便是走了很远的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正一片声围着站岗的特务营的战士嚷嚷着要见张主席。

特务营长徐泽明已经到了门口，人多嘴杂，声音听上去很激动。

我赶紧跑到大门口问是怎么回事。

徐泽明还没来得及回答，老百姓见我背着杆盒子炮，以为我是个当官的，就纷纷拥上来和我说话。

原来，他们都是苦草坝的人，其中就有那位传说中的农民领袖张某的妻子、孩子、父母，其余的，也都和张某沾亲带故。他们说，他们从苦草坝一大早走路到这通江城里，就是想看看红军的张主席是不是他们的亲人。

我向他们解释了几句，可他们谁也不信，表示不亲眼看看张主席，决不会回去。

没办法，我只好返回去报告。

张主席听了很重视，对黄超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出去向他们解释清楚，老百姓要把我当成个陈世美传开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恐怕就有影响了。”

为了确保安全-——因为那段时间反动组织“盖天党”、“白扇会”和清平寨的神兵在苏区四处大搞暗杀、破坏，连我们在德汉的后勤军火基地也给他们炸掉了——警卫排长叶南生带着 20 几个警卫员换上便装先到了大门口，分散到人群中，我和黄超才陪着张主席出来。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围观的人群已经挤得来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奔着喊着来看“真命天子”。

几名警卫员已经从旁边一家茶馆里借来一张方桌。张主席站上去，微笑着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响亮地说道：“老乡们，你们看清楚了，我就是张国焘，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不是什么经过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的真命天子。我也不是你们四川人，而是江西萍乡人，生于 1897 年，今年 36 岁……”

那位满怀希望前来寻夫的农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还哀哀连声地说：“不是他，不是他，他比我男人高得多，胖得多，也白得多……我连我男人……都认不出来么？”

旁边却也有执迷不悟的人给她打气：“那倒说不准，神仙点化过的人，当然带富贵相了，

你要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还叫脱胎换骨么？”

接下来，张主席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

可是，无论当过大学教授的张主席一张嘴巴讲得来开花开朵，老百姓仍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都是替天行道的“法语”，张主席仍是个“真命天子”。

这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诈传，风靡了整个川北根据地，客观上在征粮派款，动员群众当兵，支前等工作上给了初来乍到的红军不小的帮助。

那一天，后来成为许世友第二位妻子的雷明珍恰恰也在场，她便属于那类坚决不相信张主席解释的迷信群众之一，仍然执拗地认为张主席就是“真命天子”。而红军，自然就是“真命天子”麾下的“神兵天将”了。

红军开进通江县城时，雷明珍那一年巳经满了 17 岁。因为反动派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把通江城里的女人全都吓跑了。雷明珍和母亲本来也想跑到乡下大骡坎舅舅家去躲一躲，可开茶馆的父亲被地痞用板凳砸伤了脑壳，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照料，没法离人，母女俩这才留下了。红军进城后，雷明珍足足有半个月没有下过楼，母亲除了照料楼下卧床的丈夫还得照料楼上的她。可是，躲在楼上的雷明珍，却仍然受到了红军的影响。她家的茶馆就开在文庙大门边上。红军进城后，即将文庙作为总部机关驻地。文庙门口有块坝子，红军的宣传队每天在下面宣传，她在楼上不仅听得清清楚楚，还能从窗缝里看见那说话的人。

雷明珍生前为通江党史办留下的一份资料上写到：“宣传队里有个当官的女红军，惹眼得很呐！盘子脸、大眼睛，短头发。她穿灰布军装，戴红五星帽，打绑腿，扎大皮带，挂在腰杆上的手枪把上拴着两朵红通通的绒线花。她走起路来一阵风，做事干脆利落，讲起话来，又亲切，又惹人听，能干得很呐。我参加红军后，才知道这个女军官，就是张琴秋。”

### 4、飒爽英姿的红军女将

雷明珍第一次看见张琴秋讲演，就被她的风彩迷住了。她后来参加红军，既抱着当一个张琴秋那样的女红军军官的想法，也还有对张国焘的神权崇拜思想。

很快，雷明珍便成为了“真命天子”麾下的一名“神兵”，到王坪红军总医院当了名小护士。

让雷明珍喜出望外的是，她到王坪没多久，她最崇拜的红军女军官张琴秋，也被调到王坪红军总医院来了。

张琴秋是被张国焘一禅杖打下凡间的。

当时，肃反运动巳经开始，当初参加小河口上书的人几乎都遭到了厄运。而张琴秋大难

不死，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者是，她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沈泽民已经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而张国焘最信任的陈昌浩因为与张琴秋一起在莫斯科生活的那样一段经历。张琴秋上的是中山大学，那是苏联政府根据与孙中山的协议，为培养国共两党的干部而专门创办的，像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冯洪志，女儿冯弗伐，冯弗理，以及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也在此学习。而陈昌浩所在的中国劳动者大学，则是苏联政府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而创办的。正因为这样的背景，当时的许多活动，均是两校联合举行，两校的学生来往自然就多。那时候，陈昌浩与张琴秋就熟悉了，张琴秋比他大两岁，又早来莫斯科两年，所以陈昌浩就叫张琴秋大姐。在红 4 方面军中，他与大姐平时说话处事都很投机，此时，便常常去安慰开导大姐，想使大姐能早一些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毕竟是两人都是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人，虽然张琴秋早就知道陈昌浩汉阳老家有妻子，但革命在外与家庭早已中断联系，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之中的人，思想上的条条框框也没那么多，时间一久，这一对孤男寡女就产生了感情。俗话说“纸包不住火”，男女之间的事是最不容易瞒住旁人眼睛的。很快，总部的人都说总政委在和总政治部主任谈恋爱。张国焘风闻后也问过陈昌浩，陈昌浩坦然承认有这么回事。这就让张国焘在处理张琴秋的问题时，多少有了一些投鼠忌器。

再者呢？书生气十足的张琴秋在小河口参加秘密会议后，思来想去，觉得张国焘十分信任陈昌浩，如果能让陈昌浩也站到自己一边来做张国焘的工作，岂不更好？她就主动去对陈昌浩说，部队上下对张主席很有意见，希望昌浩劝一劝张主席，改变一下领导作风，团结全军同志，使队伍能迅速地走出困境。显然，她对陈昌浩谈到的会议的情绪、议论、发言，远远地超过了与会者联名给张国焘的《意见书》的内容——她的愿望是良好的，遗憾的是她对陈昌浩的这一番谈话却让自己摔了个跟斗，并且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地漫延到了众多参会指挥员的头上……

而陈昌浩在向张主席汇报这一重要情况时，同样是出于保护大姐的好心，竭力对大姐的政治态度给予了肯定，把大姐与其他的“反张小集团”区别开来……

但即便如此，张琴秋在红 4 方面军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始而由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贬到红江县（今通江县的涪阳坝）担任县委书记。她也是川陕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继而又调到王坪总医院当政治部主任，再后来创建妇女独立团时，又将她调去任政委。

不少同情张琴秋的同志为她打抱不平，可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同志，张琴秋却是拿得起，放得下，一头扎进自己新的工作之中。

这些年，我看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回忆中写到张琴秋，以及文人学者关于张琴秋的研究文章中都把她写成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漂亮女将。在通江，在旺苍，在长征路上，我和张琴秋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光彩照人是真，漂亮这词儿用得不准确。张琴秋的确“光彩照人”，但她“光彩照人”不是靠她的脸蛋，而完全是靠她人所不及的魅力。她上过大学，留过洋，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带着宣传队一上街，满街的眼睛就沾到了她脸上。她是街头宣传的头号主角，除了讲话口若悬河，她还会唱歌，中国歌，苏联歌，她啥歌都能唱。除了唱歌，她还会跳舞，中国舞，苏联舞，她啥舞都能跳。连我们总政治部前进剧团的不少节目，也是她亲自前去手把手教的。像乌克兰的马克舞，俄罗斯的水兵舞，多喽。前进剧团也住在总部大院里，排练节目的时候，我们警卫排不当值的小伙子经常跑去守在一边看。墨水喝得多的人就是不同，红军刚进通江时，总部提倡学四川话，张琴秋是学得最快最好的。当时的

一切中心工作都是围绕着战争来进行，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大都目不识丁。所以凡面向群众的布告、文告、通知，宣传材料等，张国焘一律不允许用历朝历代官府沿袭下来的“等因奉此”之类的骈散体文风，也不用知识分子习惯用的书面语，而尽量使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如莲花落、金钱板、鱼鼓词等。

当时进入通南巴地区时，群众为军阀宣传所惑，纷纷逃进山中避难。为揭露反动宣传，动员群众回家，以红 4 方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了第一道安民告示，在红军占领地区广为张贴，这道布告的作者，就是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穷人快回家，莫听土豪话，

红军是救星，专门杀恶霸。

穷人快回家，安心盘庄稼，

庄稼耽搁了，拿啥喂娃娃？

我们是红军，秋毫不犯人，

敬老又爱幼，鸡犬不准惊。

妇女如姐妹，老的当母亲。

军队如违令，立即处死刑。

合辙押韵，琅琅上口，土得掉渣，但效果奇好！

这就是我眼中“光彩照人”的张琴秋，她就是靠这样一些东西让人敬，让人爱。当然，张琴秋长得也不丑，脸盘比较大，身体很结实，眼睛很大，也很亮，戎装在身，就显得英姿飒爽。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张琴秋这副模样和打扮，也就是当时女红军的标准形像，像妇女团的女战士，就一窝蜂地跟着她学。而像林黛玉那样的古典美人，在红军中肯定会受到唾弃。后面我要谈到的前进剧团的女红星王新国，就是因为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而掉了脑壳的。

张琴秋属于那种遇事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丈夫牺牲，自己又遭贬谪，但她在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依然把工作搞得来有声有色。院长苏井观对她的工作很支持，她就把医院的年轻人集中起来，每天早上由她带着到大操场上搞军训。射击、投弹、刺杀，把每个医务人员也当做战士来练。雷明珍以前仅是躲在楼上偷看了张琴秋几眼，就对她崇拜得不行。最今能得到自己崇拜的偶像手把手地教，更是心花怒放，练得也十分展劲。

## 第五章 巴山英雄的故事

看见熊国炳那副模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

1、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1933 年 2 月里的一天，张主席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川北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那年 34 岁，是大巴山深山老林中的猎户。长得来虎背熊腰，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有一种不怒而威的神彩。他身穿短襟，外面套着件兽皮背心，头上盘着一条宽大的帕子，赤脚套一双麻窝子草鞋。看见他那副模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把他带进张主席的办公室，黄超也参加了接见。我退后几步笔直地站在墙边。

这是我们内卫的特权也是重要的责任，在当时那种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稍有不慎，任何不测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受到张主席的单独接见是莫大的殊荣，同时也肯定会使被接见者忐忑不安，因为内卫的眼睛从始至终一直盯着他。不仅对熊国炳这样的初次被接见者需得这样，连对一些被张主席视为“异己”的高级指挥员，我们也须对他保持警惕。有时张主席为主动表示对被接见者的信任，也会示意我们回避。可我们人在门外，也要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屋里的动静。内卫一旦失职，后果就不堪设想。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熊国炳刚走进屋，张主席便离座向他迎上，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哈，我们的巴山英雄真是气宇不凡，英气逼人呐。坐，请坐。”

张主席连声邀坐，可熊国炳却不敢坐，仅是将半边屁股虚虚地放在椅子边上，双手捂着膝盖，像个规规矩矩的小蒙童。

张主席为了消除他的拘谨，故意说了一些刚学会的四川土地话来逗趣。黄超乐得哈哈大笑，我在一旁也忍俊不住。熊国炳也笑了，但笑得小心翼翼。

等到气氛稍微随和融洽了一点，张主席便开始谈正事。他要熊国炳出任即将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职。

熊国炳那一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醒豁。"

黄超马上向熊国炳解释。这位过去在上海组织大学闹学潮的青年领袖，能言善辩，也是

红 4 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他说苏维埃是俄文的译音，含意是会议和议会代表。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创造的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他越解释，熊国炳的眼睛瞪得越大，木讷地问："黄秘书长，你说的俄国是个啥东西？那个俄文……又是个啥东西呢？"

这下轮到黄超把眼睛瞪大了，不知该怎样往下说才好。

张主席开心一笑，摸着下巴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国炳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两眼一抹黑，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主席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不但能当，还一定能够把这省主席当好。"

1933 年 2 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天主教堂（当时的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隆重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以全票当选省主席。闭幕式上，熊国炳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黄超等首长平起平坐，一跃而成为最高层领导人物之一。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了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 4 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 3 座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 5 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苏区人民必须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在群众眼中是位豪杰。豪杰当官也自有豪杰的特点。

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太婆在省苏维埃保卫局门前跪着痛哭喊冤。熊了解后得知她男人是通江名医许昌，为不少红军将领治过病疗过伤，被人告发毒死县农协领导张家其，保卫局便将许昌和已经参加红军的儿子抓起来定成了死罪。

熊国炳明知插手保卫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烦，但他仍然去找到当时的川陕省委书记兼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调去亲自复查。仅用半天工夫，便将案子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由于许昌医术高明，拥护红军，治愈了不少军政干部，以封建会道门面目出现在苏区各地的反动地下武装"白扇会"、"盖天党"对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许昌药铺拿药的张家其，以此嫁祸于许昌。

冤案大白后，父子俩立即被释放。此事轰动全苏区，群众称熊国炳为“青天大老爷”。

2、难忘的见面

1935 年春天红 4 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即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广泛地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公告，长达 92 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布告的开篇是：

“国民狗党真可恨，

罪恶多端数不清；

苛捐杂税千万种，

拉夫派款又抽丁；

连年混战二十载，

屠杀工农和士兵；

城市农村齐破产，

全国遍地是饥民；

奸污烧杀都占尽，

整得干人不聊生。

帝国主义大强盗，

原是工农大仇人。

……”

结尾是：

“同起组织苏维埃，

独立自主中国新；

豪绅地主齐打倒，

封建残余一扫清；

全国干人齐努力，

最后胜利归我们；

帝国主义消灭净，

工农百姓享太平。”

我是 1935 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

张主席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把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熊国炳因在茂县时，袁克服等人联名上书张主席，反对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熊也在上面签了名。袁克服等人被撤去职务，送进了随军劳改队，与先期被关押的曾中生、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背着绳子长征。张国焘念熊国炳“本质”好，系无知被袁克服“利用”，就把他贬到方面军后勤部经理处当处长，和我们白天一起行军，夜里一起宿营。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他就成了我的大舅倌，一路上彼此照应不说，歇下来时还多了个说话的伙伴。

10 月中旬，红 4 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红 4 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11 月 10 日，中央电令已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 11 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又重新成为红军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生还的李先念到延安后，被降为营教导员，前来看望已遭批判的张国焘时，我向他打听熊国炳的消息，连他也不知下落，当时大家都估计熊国炳已经不在人世。

谁知到了 1960 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

而那次在特殊政治气候下独特的、也是此生惟一的见面，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心酸。

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4 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

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地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

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

大巴山中，那场大饥饿造成的灾难随处可见，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垒的坟茔，野菜、树叶、白鳝泥成为主要的充饥之物。百业凋零，路断人稀，偶尔见到的几个山民，也是衣不遮体，满面菜色,其状之惨,远远超过了当年被四川军阀封锁的红区.

竹峪关离桥溪口 20 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已经很闹热了。桥溪口那一天逢场，满街都是背背篼担箩筐的男女在拥挤。

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

“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

“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睛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把盖碗茶都喊好了。”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 20 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脸色像大西北的戈壁一样焦黄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熊大哥，你老了哟!”

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潮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选举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

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 6 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一路打乞讨回到大巴山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狗日的张国焘千不该万不该项，不该跑去投蒋介石，他这一跑，把我们 4 方面军的弟兄全坑苦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在城里见到王波和李玉兰，他们虽然当了官，对这件事的情绪也很大，说不应该由 4 方面军的广大官兵替张国焘背这黑账。还说总有一天，这个冤案要翻过来。"

我还告诉他，李先念的警卫员刁仕昌如今也只能在土陶店里卖碗。

熊国炳说："他总算有个单位，比我好嘛。我在大西北这些年里，啥子'烂滩'都搞过。"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马家军骑兵的包围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十分惨重。

1937 年 3 月 13 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已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李特、黄超、熊国炳、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两名主帅在危急关头离队而去。无疑会大大动摇军心。但在当时那种生生存亡的关头，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徐向前本来是不愿离开大家随陈昌浩回潜陕北的，王树声、李先念等人也不愿意他走。可陈昌浩怒火冲天固执己见，说要回去和中央进行斗争，要追究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后来，徐帅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为自己当时无法坚持意见迁就了陈昌浩，犯了错误。坦诚直书，并深感疚愧。而不像有些人那样为自己的失策和错误文过饰非。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 200 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其它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他在那里等到伤势稍好，便离去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方知西路军已全军覆没。

本来，前一年红 4 方面军还在懋功、阿坝一带盘桓时，他就从由川北跑来追部队的人员中了解到，红军和苏维埃撤出不久，一支国民党军队开到熊家湾，宣布熊国炳是罪大恶极的"赤匪"头子，当场将他的妻子赵秀兰和两个儿子杀害，弟弟逃走下落不明，父母遭毒打致残，三个妹妹也遭迫害。这消息使他悲痛不已。如今他又孤身一人流落在戈壁荒原，更是倍

觉凄凉。

后来，能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时间一长，便与道长熟悉了。

这道长虽不知道熊国炳的真实身份，但看出他心中埋藏着巨大的痛苦，劝说他皈依道门，或者在此地成家立业。熊国炳当然不会改变信仰当道士，但为了生存，他便和一位拖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白玉生结了婚。白玉生开有一家汤面馆，熊国炳入赘后就挑着副货郎担子走街串巷卖杂货，从此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1949 年 9 月酒泉解放，当彭德怀麾下的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巳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政府按照当时的规定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 10 块银元和 1 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就不再管他了。他当过红军的高级将领，有了一些政治思想和分析能力，就很知趣，从此后再也没有向政府申诉过。他巳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白玉生回通江老家，他也没有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巳经过世，母亲和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愤愤道：“现在 4 方面军虽说被弄得黑不溜秋的，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周纯全、袁克服、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

他说：“这事我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有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咋个能厚着脸皮去找党和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巳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巳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巳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我听他这么说，心里酸得不行，埋起脑壳喝了两口茶水，又问他：“当初我排里那个南江水口寺的——，你还想得起么？”

熊国炳想了一下，摇了摇脑壳。

我告诉他：“1937 年年底，保卫局把张国焘从川北带到延安的警卫排收了，弟兄们一窝蜂全都走了，就他妈我一个人没走。我从给张国焘当上警卫员后，每天要给他按摩一次。这东西习惯了，一天不做都周身不舒服。当时张国焘为留下我，还跑去和周兴吵了一架。后来又找我单独谈话，走不走，由我拿主意。我觉得首长落难，我屁股一拍就溜了，有点亏心，

就硬起脑壳留了下来——就是那时走的。妈哟，没想这家伙命硬福大，1955 年第一次授勋就混成个少将，当上了——军区的后勤部长。1958 年夏天带着婆娘娃儿警卫秘书保健一大帮突然衣锦还乡。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跟前跑后地照料。他回到老家，去老汉老妈坟上磕了头上了香。还掏钱在老家院坝上摆了两天流水席，杀猪宰羊办起“九大碗”，来者有分，连方圆好几个公社的叫花子都赶去了吃了个肚儿圆。他也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叫花子，去了就亲亲热热叫老乡，还挨桌子估到敬酒。人都走了半把年，农民还在说他的好话——这狗日娃娃，当了大官，倒还没忘记老区的穷苦百姓，算他有良心……”

“他没来看一下你这老上司？”

“后来听说他一来就到处打听过我……嘿嘿，我想，恐怕是我脑壳上这顶黑帽子把他这小将军吓住了吧？”

中午我想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一下这位远客。可熊国炳说他经济上比我松活，说啥也不让我掏钱。那天运气不错，饭馆里有两样东西卖：红萝卜缨缨炒青海椒，包谷粑。更让人高兴的是还有高价红苕酒！我们整了两盘菜、6 个包谷粑、1 斤红苕酒。不敢再接着喝，一斤下肚两人都有些醉意了，怕喝多了打胡乱说，大家都脱不到爪爪。

我们晓得今后再见面是不太容易了，都很珍惜这点时间，从上午一直摆到下午 4 点多钟，我才送他到公路边等开往通江的长途车。分手时我们都留了通信地址，可我怕连累他，没给他写过一封信。

谁知到了第二年的 10 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我难过得很，初时也想到乡场上的邮电所去拍封吊唁的电报，可想想自己的政治身分，觉得不妥，也就算了。

当夜，我拿上厚厚两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一张张地焚烧了。然后站起来，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老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巴山英雄熊国炳）

## 第六章 苏区剿匪记

王维舟派人打入神兵组织，又请人去动员杨永生接受中共领导，却遭到拒绝……任俊卿率红 33 军军部警卫营前往红 30 军助战……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任俊卿成为名震苏区的大英雄。

1、川北“神兵”

1933 年 7 月，刚刚被田颂尧封为“川军 29 军特遣司令部”司令的杨永生组织神兵敢死队深夜袭击红军设在德汉城（今通江县永安乡）的军火后勤基地，炸毁了兵工厂，焚烧了被服厂、斗笠厂（斗笠当时是红军战士的装备之一）。

张主席对从刘存厚手中缴获来的这座兵工厂极为重视，对随这座工厂来到根据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更是优礼有加。他曾在总部亲自设宴招待该厂的工程师何伯阳等 4 名技术人员，许以极优厚的待遇。至今，在永安乡刘仁芳老人家的墙上还能看到“何伯阳，80 元、许贵林，65 元……孟善福，2 元”等字迹。

80 块银元是何伯阳的月工资，而当时这座兵工厂的熟练工人的月工资，仅是 6 块大洋，至于普通只有力气没得技术的工人，则更低，每月只给 2 元。差距是十几倍，几十倍。

所以，张主席对知识分子也并不搞“一刀切”，他认为对革命事业有危害的，就毫不留情地杀；有用的，还是会想方设法用特殊政策留下来。

张主席得知德汉城的兵工厂被彻底破坏以后，大为惊怒，亲自赶往德汉乡视察。我们去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遍地浓烟。

张主席从德汉视察回来，痛下决心，一定要彻底剿灭清平寨杨永生股匪，彻底除掉这把插在苏区心脏地带的尖刀。

杨永生教名“灵功”，那一年 40 多岁，在大巴山中算得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

当然，他本身的经历也富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杨庆云，乃前清武举，武艺高强，为人正直，有胆略，识大体，遇事果断，镇人多为敬服，那时，哥老会盛行，崇尚“结仁”、“结义”，华庆云被公推为通江“仁”字堂口龙头大爷。邻近各县袍哥亦仰慕其大名，纷纷派人前来联系。庆云素有反清复明之志，对哥老会尤为重视，乃在祖宅设“南北通武馆”名义上收徒授艺，暗地里却大肆招徕八方江湖朋友。杨永生系庆云独子，爱若奇珍，自小便亲授其艺。杨永生聪颖无比，且练功不畏艰苦，是以武功逐日大进。庆云虽系一介武人，眼光却颇为远大，自忖当今世界，仅凭着拳脚功夫已难以蹬打天下，便亲自登门，意欲将通江城中一饱学之士，前清秀才傅璋请至家中，悉心教授永生。傅璋时已丧妻，膝下遗一小女，靠着一间塾馆，十几个蒙童的束修糊口，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他见庆云言辞恳切，再三恭请，便关了塾馆，携小女傅筱竺搬入了庆云家中，用尽全部心血，教授杨永生与筱竺。少男少女，竹马青梅，杨永生十三岁那年，考上由英国教会办的顺庆（今西充县）惠仁中学那年，杨庆云傅璋即给这一对金童玉女订下了终生，决定等杨永生学业完成，即回来与筱竺完婚。

不料就在杨永生快从惠仁中学毕业时，他那名震川北的父亲，却栽到了“白棚”郑稷生手里。

郑稷生家有租石上千，街房成片，系通江城中第一大户。他不仅在城里独资开设“大吉亨”号，专事经营川盐生意，连成都、重庆、汉口的著名盐号里，也有他买下的股份。但家有万贯金银的郑稷生，在桑梓之地却入不了袍哥，孤零零“白朋”一个。于是他亲自上门拜

见通江“仁”字堂口的总舵把子杨庆云，送上白银 2000 两，1000 两给杨庆云，另 1000 两则捐给堂口。赠此厚礼，无非是希冀入会。

岂料杨庆云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怒不可遏地将银票掷之于地，当众斥道：“你郑稷生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蛮子蛮孙，一个根骨不正的杂种，居然也想来‘嗨’袍哥！我决不能让一颗耗子屎弄坏一锅汤，让你坏了我‘仁’字堂口的清白。你给我滚！滚!”

杨庆云手下弟兄也陡地暴出一通吆喝。

郑稷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言不发，拾起银票转身而去。

原来，郑稷生母亲原是北平一贝勒家中的婢女（川人俗称为“蛮蛮”)，英法联军进攻北平时，咸丰帝偕朝庭避难热河，满城惊骇，富室贫家尽皆外逃。郑稷生之母趁乱偷出一只御赐的嵌玉赤金盆，逃到荒僻的川北通江小城，隐姓埋名，后嫁与一郑姓男人，将赤金盆弄到武汉买与英国商人，携回一笔重金，买田置屋，开设盐号，积月累年，终成大富。

遭这奇耻大辱，郑稷生万难咽下这口恶气，他索性将通江家产卖尽，携家小离乡而去。临行时扬言：“愿罄家财，必置杨庆云于死地!”

辛亥事发前夕客居成都的郑稷生偶见省督府悬牌，知令在省候缺的云南人吴良桐调补通江县令，即四处托人打听吴的情况，得知吴苦于短少川资，迟迟不能启程赴任。郑稷生大喜，立即登门送上白银 3000 两，伴吴赶赴通江上任。返乡途中，郑稷生又跪拜于吴良桐母亲膝下，恳求将其收为干儿子。吴就任通江知县后，感恩图报，且见郑稷生也确系一精明干练之人，便委任郑为通江警备队长，主管全县警防，郑大权在手，却对昔日仇人杨庆云处处恭敬，不敢冒犯。

辛亥年，成都保路风起，各地义旗高扬。吴良桐得知朝庭钦差端方于资中被诛，川督赵尔丰暴尸锦城街头，吓得魂飞魄散，急令郑稷生组织民团，发配枪械，深沟高垒，意欲据城固守。

杨庆云闻风急动，寅夜携家出城，利用袍哥名义广发公片宝札，并四乡奔走呼号，几天之内，将全县各堂口、武棚的弟兄集中起来，组织起两千余人的同志军，由杨庆云统领，包围了通江县城。

众人正鼓噪着准备攻城，忽然听得城中陡地一串锣响，城楼上高竖起大书“汉”字旗，竹竿参差，高挑出吴良桐阖家 12 口男女首级。

杨庆云等正惊讶不已，只见郑稷生已站立城头，高声喊道：“吴良桐逆天而行，不听忠告，稷生出于义愤，将其诛灭，已宣布成立通江蜀军分府，决意与同志军同挥反妖之戈，共舞降魔之杵。”郑稷生猛然挥刀，将头上发辫割去，续吼道：“诸位头领若是不信，稷生削发以示反清妖之决心。”

杨庆云一声大吼：“既如此，请速打开城门，让我部进城。”

郑稷生道：“义军挟威而来，意在取城。今通江既已宣告反正，还望杨总舵爷体恤民情，让大队人马安驻城外，至于各位头领，百姓必箪食壶浆以迎之。”

杨庆云自然明白郑稷生此举纯系投机，不过事已如此，再攻城便师出无名。再说此时与郑稷生计较往日恩怨，也有悖大义。与众头领匆匆商议后，只好将队伍驻扎城外，欲与几位手下大爷进城。不料城头蓦地一声炮响，顿时枪声骤起，弹矢如蝗，早已埋伏在此的民团与警备队漫山遍野如狂潮般冲杀而来。通江北门处田坝上几成屠场，同志军猝不及防，无力招架，各股人马，或被杀，或缴械，逃脱者寡。杨庆云见大势已去，痛心疾首，为避被擒受辱，一头栽进百丈深峡，悠悠一脉英魂，竟随滔滔通江河水东去矣。

除掉杨庆云，郑稷生立即在城中贴出告示，污蔑杨庆云“明为同志军首领，实系惯匪害民”等罪名，予以正法。旋即又带领警备队，在城郊圣钟坪抓获了杨庆云父母妻小以及傅璋父女，将傅璋父女押回县城，庆云亲人则被锁入一间柴房，一把大火烧了个灰飞烟灭。

郑稷生见 13 岁的傅筱竹眉目俊秀，清丽可人，遂将其收为三姨太。傅璋性子刚烈，将郑稷生骂了个狗血淋头，竟 10 日不进水米而亡。

尚在达县的杨永生得知噩耗，含血喷天，悲痛欲绝，又恐吴良桐心狠手辣斩草除根，派人前来追杀，于是含恨离校，前往清平寨姐姐家暂且栖身。

途中在一个叫香洞子的客栈歇宿，正逢东坪堡著名迷信职业者冉瑞益聚众传教，自称“通天大师”。各地信徒涌涌而来，将“通天大师”的法力吹嘘得赛过了太上老君。

杨永生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正苦于欲救老母而又手无缚鸡之力，闻此消息不禁大喜，暗想邂逅异人，莫不是菩萨显灵，特意前来超度我得道成仙，倘能将那神功奇法学到手，报仇雪恨，岂不是易如反掌？

杨永生赓即前去拜冉为师，学练“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之法。

冉大师见他面目清秀、知书识礼，实为信徒中之佼佼者，便收杨为徒，并赐教名“灵功”。

杨永生到了姐姐家后，遵师之嘱，每月初一和十五，风雨无阻前往香洞子练功学法，因悟性极高，嘴巴又乖巧，深得师尊器重。

平素日子，杨永生便约同其姐夫沈开举于每晚二更到自家屋旁川主宫佛爷殿上既练武功，也练神功佛法，十余年间，从无间断。

1921 年，附近乡绅姚子虎、陈先治、古子龙、丁开泰等陆续拜杨为师，到年底，清平赛以及附近的村寨已有数百人随他练功。

1927 年春，冉瑞益“驾鹤升天、羽化成仙”而去。夏末，杨永生即在老鹞岭上的清平寨自立佛堂，把教徒改称神兵。杨自命为仙长，沈开举为副仙长。树黄色方形帅旗一面，称为“黄云”，教徒们一律身穿黄褂，头缠黄巾，使用刀矛、紫荆棍（酒杯粗细，长约七八尺的斑竹棍）、双天炮（双管土火枪）等武器，把祭祀和练功叫做“祭将”和“盘营”。祭将每

月初一和十五进行，以猪羊、玉米、酒菜为祭品，摆设香案，焚化纸钱，由杨仙长“发相”（以神的名义发布命令和训示）。众神兵则跪地叩拜，接喝杨仙长御赐的神水，“盘营”一般则在“祭将”后进行，由执法官指挥，先放冲天炮两响请神，随后在先行官的导引下，神兵们左手按心窝，右手持刀矛跳行，盘“螺丝转”。先行官边走边唱“神兵来盘营，两脚要站伸，如若不站伸，军棍不饶人”的盘营歌。接着，执法官和先行官各执一面方形大黄旗凌空挥动，指挥神兵齐声高唱杨仙长写的“黄旗饶饶白云间，随带神兵上仙山；跟随仙长下凡尘，杀尽魔兵享太平”的“神兵歌”。边唱边操练，并在操练时不断高声呐喊：“打不尽，杀不尽，炮子来了两边分”。神兵们无不相信，只要把功夫练好，就能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了。杨仙长还给神兵定下了“不进民房，不偷不盗，不贪不奸，不吃鸦片”，“抱忠孝之心，去害人心和嫉妒心”等纪律及“借菩萨神威，保佑农民不受奴役之苦”的宗旨。

那时的通江县长郑稷生，拼命搜刮民财。仗着山高皇帝远，他居然违抗朝庭命令，强迫农民种鸦片，不问年成，一律按窝计税，故称“窝捐”。

杨永生的神兵势力兴起后，他提出了“不完粮，不出款，不整干人杀坏人”的口号，专门与官府和土豪劣绅作对，先后在德汉城设伏杀了郑稷生的收款委员（收税官）张蕴山，又聚集数千神兵强攻下小昌，杀了郑稷生派来监收盐税的一排税警队的兵丁，深得民众拥戴，从四乡八寨径往清平寨投于麾下，势力愈发大盛。

2、仙长成为县尊

1927 年 7 月，军阀吴佩孚战败，被杨森接至奉节。吴命其所部军长周肇歧到通江招兵卖马。周肇歧到通江后拉丁抢掠，无恶不作，通江人民不堪忍受，便暗遣代表到清平寨搬神兵
解救。
杨永生慷慨应援，立调小庙沱刘子真和八树坪神兵共约 2000 攻打通江县城。

9 月 15 日，神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教师爷刘子真率领，经通城坝，经五溪口直捣通江东门，缴了周军长派驻在此地的一排兵丁的械，杀死兵丁 14 人，一路由仙长杨永生亲自率领，于 16 日抵通江西门外凤凰山后，立即设坛“祭将”，放冲天炮，请“二十七宿”降临人间，扶助降妖。“祭将”完毕，众神兵手执大刀长矛黄荆棍，口念咒语，高喊着“打不杀，杀不进，把羊子兵（当时川人对北洋兵的俗称）杀干净！”向通江西门南门猛扑。

周肇歧的新兵和郑稷生的警备队与团练兵远距离盲目放枪，虽弹发如雨，但仍见神兵铺天盖地而来，认为神兵真的刀枪不入，吓得不战而乱，纷纷弃城而逃。

神兵攻到西门处时，城门已闭，西门口“碗碗香”茶馆的老板刘景孚有心帮助神兵，与两个儿子一起跑出家去打开了城门，却在混乱中被冲进城来的神兵乱刀砍死。

杨永生进城后得知周肇歧与郑稷生均已逃遁，立即派两路神兵火速追杀，一路追至苦草

坝时，截获绿轿两乘挑夫百余，将坐轿的两人和轿旁随从 50 余人当场砍死，缴获银元 80 余担。事后方知轿中两人正是周肇歧军长和他的参谋长顾大用。另一路追至女儿洞时，将躲在山洞里的通江县长郑稷生阖家 21 口抓住砍死（傅筱竹也在其内）。

杨永生进入县衙，在县长的办公桌上发现通江大户周宏辉给郑稷生的“神兵明晨攻城”的密报，杨永生大怒，立即令人前往南安街，将周全家杀死，并烧毁住宅。随后，又下令放出狱中人犯，次日，又将“洋衙门”（法国人的天主教堂）付之一炬，将福音堂的耶稣像打碎，将陈设、器具抛置街上。

然后，杨永生命令通江商会会长陈鹤洲出面鸣锣，沿街呼喊：“天降神兵下凡，杀尽贪官污吏、羊子兵，保护忠臣、孝子、烈妇”，以此安定人心。又命各户沿街摆设香案，燃烛焚香拜神。随后在土地宫设立佛堂，供木雕人像为神，早晚上香膜拜，“发相”念咒，遍施神水，大办“开化”，广揽信徒。

杨永生还将缴获的周军长的银元弄到街上，给刚入教者每人一把，甚至朝天抛撒，任人去抢。由此一来，不少居民也都参加了神兵组织。

杨永生入据通江县城后，即派人到南江、巴中、万源、城口、达县，以及陕西的岚皋、镇坪、汉中、紫阳等县的边境地区“办开化”，使各地神兵组织迅猛地发展起来，连一些啸聚山林的匪棚，也都打出了神兵的旗号，两省八县边境各地，到处都挂起了黄旗尖角旗，神兵总数达到 3 万之众。

杨永生将各地神兵统一编为一百个“参”，并不定期地将各“参”中的骨干分子调集到通江城中“盘营”受训。

1928 年初夏是川北神兵的极盛时期，杨永生重修扩建通江城中的川主宫和祖师观，塑神供佛，并将祖师观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庙内香烟缭绕，灯烛辉煌，庙外“盘营”、“祭将”，喊声雷动，神兵声威，如日中天。

为便利出征和交通，杨永生还下令修筑了川垭子到九拐岩的大路，架设了郭家河的铁杆桥，大做善事，深得人心。

由于四川军阀混战防区制割据的需要，各军阀部队往往是假“招安”之名，行扩充之实，把收罗土匪与封建武装作为补充兵源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反动官府因剿匪不力，也只好祭起“招安”的法宝，给大大小小的匪首神汉封官加委，于是绿林草寇摇身一变成为军官。

在四川最早的一批军阀中，刘湘的第 2 师曾招安廖光明营、吕超的第 5 师，也曾招安李绍舟营。1920 年以后，招安土匪扩充军阀势力之事，更是屡见不鲜。

川北神兵势力坐大，不仅杨森、田颂尧等四川军阀争相派代表前往拜会拉拢，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也派出中共宣汉县委委员刘子泉和中共地下党员易心谷两人打入神兵组织，以此接近杨永生；继后又请宣汉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杨寿轩去通江见杨永生，动员杨接受中共领导，成为革命的武装，却遭到了杨永生的拒绝。

杨永生面对各方势力的拉拢，审时度势后，认为田颂尧势力最为强大，最终投向了田的麾下。

田颂尧以一纸国民政府的任命，杨仙长遂成为通江名正言顺的一县之长。

红 4 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通江县境后，杨永生也调集神兵配合田部与红军作战。

在九拐弯，一个“参”的神兵 400 余人向据守在山顶上的红军反扑。红军战士开初看到这些黄云一般滚滚而来、口中狂呼大叫着咒语的神汉，也很是害怕，直到指挥员几颗手榴弹往岩下扔去，炸得神兵血肉飞溅，再加上爆炸引起丛林起火，烧得神兵们鬼哭狼嚎，纷纷逃蹿，这一下，神兵“打不进，杀不进”的神话不攻自破，大长了红军士兵们的士气，争先恐后地从石岩后、树丛中跳出，向溃败的神兵追杀，杀死神兵 200 余人。

红军占领通江县城后，杨永生即率神兵退回老鹞岭上的清平寨，以此为根据地，频繁派兵袭扰红军。

3、打进匪窟

剿灭杨永生神兵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红 30 军军长余天云与政委李先念的肩上。

余天云是放牛娃出身，文化不高，但作战英勇，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年仅 20 岁便升至一军之长，与许世友同为张国焘最为信赖的爱将，也是许多中下级军官崇拜的偶像。

因红 30 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绝大部分是从鄂豫皖过来的，对川北的情况不甚了解，总部遂从王维舟的红 33 军中抽调力量协助此次剿匪行动。

过去，川东游击军为对付军阀的进攻，考虑到川北民众迷信思想严重这一事实，也曾仿效神兵的作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红军队伍中建立起自己的神兵组织，与敌作战。再加上红 33 军的官兵全都来自大巴山各地，对当地风俗、民情了如指掌，与神兵中的不少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遂派曾任峰城乡团总的任俊卿率军部警卫营前往红 30 军助战。

任俊卿是宣汉县峰城乡长田湾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担任中共宣汉县委委员。随后，地下县委派他打入敌人内部，到峰城乡当上了团总，其目的是把当地的 180 多条枪控制在地下党的手中。

成立红 33 军以后，任俊卿率领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部特务营，有人枪 300 余。

在这次征剿行动中，任俊卿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正是他打入清平寨，生擒了仙长杨永生。

余天云、李先念与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曾传六一起制定了“打入虎穴，擒贼先擒王”的剿

匪计划。

1933年7月28日，任俊卿率警卫营到红30军报到之后，立即被带到了曾传六面前。

曾传六问他："古泽宽被抓起来了，你晓得吗？"

任俊卿吃惊地说："他已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是小庙沱乡赤卫队的中队长，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曾传六说；"前次我们打达县，他带人支前回来后，私藏了一对金圈子和一支手枪，这人以前参加过川东游击军，后来又在王驼子手下当过土匪，参加革命，是想投机。他这次私藏黄金和手枪，就是思想反动的表现，所以我们把他抓起来了。"他接着说，"俊卿同志，这次有个重要任务，我和余军长，李政委商量了，准备派你去完成，看你愿不愿意？"

任俊卿说："分配我干我就干！"

曾传六说："这个任务很危险，你接受就说，不接受就算了，你考虑好以后我再告诉具体要你去干啥子？"

任俊卿想了想说："曾局长，那我就考虑一下再给你扯回销。"

第二天一早，任俊卿又去找曾传六，说："曾局长，我已经想好了，干！"

曾传六问："不反悔么？"

任俊卿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反悔！"

于是，曾传六这才开始给他交待任务说："当前，苏区各地到处遭到杨永生神兵的袭击，还破坏了我们宣汉城的后勤军火基地，张主席非常冒火，要我们一定尽快地将杨永生股匪剿灭。我和余军长、李政委商量出一个打入虎穴的计划，决定派你和保卫局的苏少云同志假装背叛革命，投靠神兵，打入他们的内部去相机行事，争取能够接近杨永生，寻找机会将他打掉，杨永生这个'活神仙'一死，群龙无首，大部队打清平寨也就容易多了。挑选你去，是党对你的信任和重用，也是严峻的考验，在未行动之前，你必须严守秘密。"

任俊卿慨然道："感谢首长对我的信任，上刀山，下火海，掉了脑壳我也不后悔！"

当日下午，余天云、李先念、曾传六召见任俊卿与苏少云，交代任务，布置行动方案。

余天云说："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既是信任你们，也是考验你们。你们打进去以后，敌人也会考验你们。假如你们被我围剿部队或是赤卫队捉住，挨打受屈，都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要求送军部处理，如果随便暴露，也视为叛变论处。"

李先念接着说："此行不是你们死，就是他们亡，对于匪首杨永生，能抓活的最好，不过恐怕不容易，听说这人武功很好，为人又非常机警。不能抓活的，打死也算你们立了大功，

总而言之，你们决不能空手回来。”

曾传六最后说：“你们要直接见到杨永生，希望不大，只有先投靠已经加入‘黄云’的凉风垭王驼子匪棚，作为跳板，才有机会接近杨永生。你们这次装个土匪，就要像个土匪，不能露出破绽，土匪吃鸦片，你们也吃几口，土匪抢人，你们也跟着抢，土匪骂共产党，你们要骂得更厉害，首先要争取得到土匪头子的信任，到时里应外合，打掉杨永生。”

按照首长的布署，当天下午，任俊卿单独一人去见了被关押的古泽宽。

古泽宽过去和任俊卿同在川东游击军中担任小队长，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回到小庙沱家中治疗，因姐夫方宗华在凉风垭王驼子匪棚中任军师，古泽宽在家治伤期间方宗华曾带王驼子前去看望过他，并给了他金钱和物质上大力帮助，为感恩图报，伤愈后古泽宽就加入了王驼子的匪棚。红军进入川北后，王驼子利用古泽宽当过川东游击军这层关系，派他打入小庙沱乡苏维埃，为自己通风报信，并由方宗华与他联系。

见面后，任俊卿安慰他，要他老实向党交待，相信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

在任俊卿的劝告下，古泽宽交待了手枪藏在小庙沱土地庙里的菩萨座位下，还给王驼子、方宗华二人写了一张便条，证明任俊卿与苏少云均是他发展的人员。

随后，任俊卿把会见情况向曾传六作了汇报。

曾说：“这枪由你俩去取，作为护身武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先打死王驼子，抓个本钱。

按照首长的周密安排，次日凌晨，任俊卿和苏少云悄悄到曾传六的寝室里藏起来。

上午 9 时，曾传六宣布任俊卿与苏少云叛变逃跑了，并通知县城、小昌、龙溪等地戒严搜捕。

宣布之后，有的同志气愤地把他俩的被盖、衣物撕得稀烂，有的高喊要活捉任俊卿与苏少云。

这些，任俊卿和苏少云在曾传六的寝室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两天时间，红军和各地苏维埃兴师动众，大肆搜捕叛变投敌的任俊卿和苏少云，故意把任、苏二人逃跑的消息传遍了全县各地。

8 月 2 日半夜，曾传六叫醒任俊卿和苏少云，带着他俩来到由红军把守的南城门，才与二人告别。

曾传六逐一和他俩握手，送给他俩的最后一句话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莫忘你是革命人”。

任、苏二人离开通江县城，向着小庙沱方向进发，日行 120 华里，于当天傍晚赶到小庙沱土地庙，取出了古泽宽藏匿的手枪和 80 多发子弹。并在小庙沱打听到王驼子带着匪众前一日袭击了覃家乡苏维埃，杀了 30 多人，刚刚回到凉风垭口老巢。

3 日中午，两人径往凉风垭口，在山脚下被土匪岗哨拦住，任俊卿说我们是从红军大牢里逃出来的，特意前来投靠王大爷的队伍，请先带我们去见方军师。

见岗哨要搜身，任俊卿主动把手枪和子弹交出来。到了山寨，岗哨去叫来了方宗华，两人便将情况向他述说一番，并拿出古泽宽给他的信。

方宗华见是古泽宽的亲笔信，并未起疑，马上带他俩去叫王驼子。

王驼子满脸杀气地问他们："你们为啥也来干这一行？"

任俊卿说："大哥古泽宽被押，怀疑我们与他有牵连，也要把我们押起来，我们知道了风声，就带枪跑了。这几天，连天日也不敢见。"

王驼子又说："你们莫非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不说实话，就休想活着回去！"

方宗华连忙说："王大哥，他们逃跑是真，前几天小庙沱、覃家乡场上戒严，挨户搜查，说是抓两个叛变分子。我妹弟也确实是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任俊卿也急忙说："过去我在老家峰城乡那边当过田颂尧的团总，共产党来了，我就等于被埋了半截，哪里还有我的路走？所以古大哥一动员我投奔王大爷，我就答应了。若不相信，可朝天发誓，我如说了半句假话，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死无葬身之地！"

王驼子听他如此一说，态度遂缓和下来，说："不入佛门，不受佛戒，若有三心二意，莫怪哥子我无情，按江湖规矩，哪里见哪里发财，黑铲（暗杀）处之。"

言毕叫一个大汉左手提鸡，右手执刀，另一人提一壶酒，拿四个杯，并把任俊卿和苏少云带到坝子中间跪下。王驼子一刀把鸡头剁下，将鸡血滴入杯中，大家一起喝了，对天盟誓。

"仪式"完成后，王驼子和方宗华便将二人带进一间屋内，让喽罗拿出一支步枪交给苏少云使用，把任俊卿交给他们的手枪也还给了任，于是，他二人便正式地加入了匪棚。

4、击毙杨仙长

第二天傍晚，王驼子亲自带领一队土匪避开大路，专绕小道翻埂子、过山梁，夜行 20 多华里，到了巴中境内的小石板一户人家。

任俊卿与苏少云也参加了。在路上，王驼子让他俩走在最前面，并不准他们向后看。

起初，任俊卿以为王驼子要黑铲他俩，内心虽然惊恐，但表面上仍装得若无其事，以免引起怀疑。

到了那户人家后（后来才知是当地的农协主席），王驼子吩咐两名喽罗“堵水”（放哨），任俊卿与苏少云“加楔子”（砸门）。两人刚砸了几下门，便听到屋里传出了吼骂声，并有一支土火枪开了火。门砸开，大家一拥而入，钻进各间屋中，先朝有响动的地方放了一通枪，然后点亮油灯检查，看见一个壮年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已经断气，桌子旁边还躺着一个正在抽搐的妇女，随后从里屋搜出一个老太婆和两个小娃娃，全部推到坝子上，用刀砍死。而且，王驼子还叫任俊卿与苏少云动了手。

由于任、苏二人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尚佳”，王驼子对他俩的疑心消除了，并让他俩参与坐地分肥，享受与其他土匪同等的待遇。

而这一时期，红 30 军分兵数路，将铁门关，白椿坪、高滩子等地的神兵、土匪逐一歼灭击溃，前锋已距老鹞岭不远。

20 多天后，长池乡袁正明股匪中的两个头目，原国民党长池乡乡长罗柏林与乡队副陈元登带着 10 几个喽罗前来投奔王驼子，说袁正明已被红军打死，袁部已经瓦解，红军剿匪部队马上就要前来攻打凉风垭口了。

王驼子听后胆颤心惊，与方宗华商议后决定，九月一日率部投向清平寨。

任俊卿苏少云一听，暗暗高兴。

9 月 3 日傍晚，已经全部穿上黄褂，打着黄色三角旗的王驼子股匪 324 人到达老鹞岭。

如此危难关头，居然有部下冒死率兵前来“勤王”，杨永生喜出望外，立即大开寨门，将王驼子、方宗华等五位头目请进寨中，其余人员，则被带到寨墙外的一排棚子里住下。

中午，杨永生又吩咐神兵杀猪宰羊，为王驼子部接风洗尘。杨永生与沈开举还亲临王部驻地训话打气。

是夜，老鹞岭上，月明风清。

任俊卿与苏少云出了棚子，缓步来到峰顶上。

山岩边，道道工事里神兵一片片一团团地露天而卧，黄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山脚下，苍山若海，小河如带。鸡不鸣，狗不吠，天地宁静空朦。而在远处，一串串火光在夜色中闪烁跳动。那是杨永生的神兵正在大搞坚壁清野，烧毁已被裹胁上山的那些老百姓的空房空屋。

自己的队伍肯定已经在不出数里远近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没法与之联系。好在他们已经来到了杨永生身边，两人悄悄商定，待到红军攻山之际，趁乱将杨永生打掉，群龙无首，神兵必然大乱……当然，能多打掉几个匪首，那就更好。

9 月 5 日，朝阳如血，霞光倾泻在万仞群峰，碧绿田坝之上。红军先以各种火炮向老鹞岭上实施了猛烈的轰击，炸得神兵们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后面的清平寨也不断挨炮，四处墙塌屋倒，狗奔鸡飞。

老鹞岭上的工事里，死尸累累，硝烟弥漫。

清平寨神兵的教师爷（负责军事操练的教官）与残存的神兵持械伏于工事中，紧张地注视着从突然沉寂下来的红军阵地上大步走出的一名红军军官。

万籁俱寂，在无数黑洞洞的枪口逼视下，红军军官的双脚踩踏着尸体、血迹坚定无畏地前进。

军官在半岩处站住了，威风凛凛地仰首叫道：

“杨永生，出来说话。”

教师爷虎地站了起来，怒目狂喝：“仙长没空见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军官喊道：“我奉余天云军长之命勒令你部马上投降，否则寨破之时，玉石俱焚，你就后悔不及了。”

教师爷回道：“要我神兵投降，瞎了你娘的狗眼！回去告诉你那狗屁长官，从速退兵，我们和红军从此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军官道：“立即无条件投降，听候我军处置，这是最后通牒！”

“去你妈的！”话音刚落，王驼子手一抬，红军军官应声倒地。

战火重起，军号声、呐喊声、枪炮声震天动地。红军官兵潮水般向山顶上冲去……

听到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看到寨子里的神兵一窝蜂拥出寨门，任俊卿向苏少云丢了个眼色，两人混入到寨子里搬运弹药的神兵群中，进了寨门，直奔插着黄色帅旗的杨永生所住大院而去。

此时，大院里也是一片混乱，女人叫，娃儿哭。

身着同样黄褂的任、苏二人进得内院，并未让人起疑。任俊卿谎称有重要军情向仙长禀报，探清杨的住屋，遂径直前去，到得门前，看到杨永生与沈开举正在用菜油擦枪，手枪拆散摆在桌上。

“不准动！背靠墙角角站好！”

任俊卿大喝一声，一长一短两支枪，对准了杨永生与沈开举。

沈开举认出他俩是王驼子带来的人，还以为是王驼子起了歹心，想除掉杨永生，乱中夺权，坐上这清平寨的头把交椅，遂强作镇定地说道："你们要干啥子？仙长善待你们，你们居然敢对仙长下手，菩萨会显报应的。"

任俊卿喝道："去你妈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杨永生一听，飞身蹿出敞开的窗口，狂奔而去。两支枪同时响了，只见杨永生突地顿住，然后软软地倒在了后院的荷花池边。

沈开举吓得魂飞魄散，双膝触地哀告道："红军饶命，我投降，我投降！"

任俊卿一把将他揪起，喝令道："马上把院子里的人集中起来，听我训话。要敢乱来，我首先让你脑壳开花！"

二人将沈开举反捆了，将院内神兵集中到院坝上开大会。

任俊卿大声吼道："我已经把你们的杨仙长打死了，连他那样佛法高深的活神仙都打得死，你们还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么？"

神兵们闻此言，又见沈开举被擒，都表示："我们拥护你们王大爷来坐镇清平寨！"

任俊卿向他们宣布："你们错了，我们不是王驼子的土匪，是红军派来的。你们多数都是干人，是被杨永生骗来和逼来的，你们要懂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穷苦老百姓，你们只要放下武器，跟共产党走，共产党不但不会追究你们，还要帮助你们返回家乡，安居乐业！"

神兵们一听，当场放下了武器。

这件事，当时登在了红 4 方面军政治部办的《战士报》上，任俊卿与苏少云顿时成为了苏区军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英雄。报上同时还登了，任俊卿与苏少云各立一等功一次，发给奖状并奖给每人黄谷 1000 斤。

## 第七章 血泊中的红五星

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焘，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洪口关帝庙的后院里，我亲眼目睹邝继勋被吊死……张国焘巧设鸿门宴，将红 33 军指挥员一网打尽……不久前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的大英雄任俊卿也被杀害。

1、严峻的敌情

红军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场大肃反肃掉的的全都是好人，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妥当的。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的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身上。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就可以使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张国焘并没有在瑞金，可是，中央苏区同样搞了大肃反，湘鄂西没有张国焘，可他们在大肃反中杀掉的红军官兵绝对不比川北根据地少，连贺龙这样的人物，不是差一点也被夏曦肃掉了么？所以，结论只能是，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焘，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甚至包括军事路线，都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已。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要不搞肃反，很可能他的脑壳也得搬家。

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陕苏区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地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帮助红军畅通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 13 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1933年8月，暗藏在红29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苏区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在此次事变中，只有副军长刘瑞龙一人生还。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德汉城我军后勤军火基地被杨永生的神兵彻底破坏的重大事件。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我认为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必需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来漫无边际，不少对党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推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泥巴往脸上抹，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都不幸成了肃反对像。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蒴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入川不久即被夺去兵权，去刚成立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当主任，很快又被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上任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4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2、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主席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军前敌指挥罗泽洲之后不久，张主席也亲临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视察。在邝继勋送张主席出了大门，准备上马时，张主席好像突然想起似地对邝继勋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是在川军中起家的，故川军中朋友部属甚多。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罗泽洲我帮过他的大忙。这次他两个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两封写给罗泽洲和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邝继勋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贵州人，起家在四川，死，也会死在四川。

邝继勋的老汉是个走乡窜寨摆地摊卖药的“打打匠”（会点武功，但主要卖跌打损伤膏药），常年奔波在外，最恨的就是各地的恶霸，辛辛苦苦找点钱，大都被这帮家伙盘剥去了。为了不让儿子将来也像他一样受人欺侮，老汉发狠心自小就逼着儿子习文练武，每日苦读诗书，舞枪弄棍，吃不了苦，就用棍子打着练。俗话说“黄荆棍儿出好人”，邝继勋长大成人后，果真成为一个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男子汉大丈夫。

1922 年，刚满 17 岁的邝继勋投身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当兵。正月初七，赖心辉率部攻打什邡县城。盘踞该城的川西巨匪张申庭躲进北门真武宫巷子一厕所内，持双枪作困兽斗。因巷道狭窄，追击士兵死伤多名，于是追击部队在巷道口架起机枪，对准厕所猛烈射击，厕所内传出张的疯狂叫嚷：“老子早赚够了!还有哪个不要命的，靠拢来呀!……”声音未停，突然有一手持马刀的士兵沿屋檐猿伏猱行，接近目标后飞身而下，一刀将他劈倒。张申庭被杀的消息一经传开，什邡县城万人空巷前来围观。张的头颅被悬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三天。

这个勇敢机智，刀辟巨匪的，就是穿上军装还不到一个月的邝继勋。

赖心辉授给邝继勋奖金 1000 大洋，为其披红挂彩，还下令：“邝继勋直接擢升排长!”

邝继勋深知，对他这种没有后台的兵大棒来说，要想提升得快就得拿命去换。当上排长的邝继勋在每次在战斗中冲杀在前，没打几仗又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连长。

第二年夏天随师部驻内江，在这里他又率部歼灭了罗焕文、罗少文两股土匪。内江城里人一天之内就给军部送来几十面锦旗。赖心辉大喜过望，当即邀请地方官员和各界名流，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当众重奖邝继勋大洋 2000 块，并宣布：“邝继勋擢升营长!”

1926 年，邝继勋任江防军第 7 混成旅主力团第 2 团团长。该旅旅长系江津人刘丹五，是个国民党左派，对邝在部队进行的革命活动比较支持。邝将留学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秦青川请来担任该旅的政治部主任，从此邝接受了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这年岁末，由秦青川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 年秋，四川各军阀之间爆发“下川东之战”。在与刘湘的这场混战中，“四川同盟军”一方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各路军阀全都战败。只有江防军中邝继勋指挥的第 7 混成旅，在前往广安支援罗泽州时，一举从刘的悍将范哈儿(绍增)手里夺回罗的防地代市场。连吃败仗的罗泽州，高兴得紧紧握住邝继勋的手，连呼“救命王!”

1929 年 6 月 29 日(农历五月十一日)，邝继勋在蓬溪县牛角沟(今属大石乡)宣布起义。邝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

不久，起义失败后的邝继勋奉临时中央的命令来到了上海。他一来，上海滩上顿时血雨

纷飞，命案不断。

同年 11 月 11 日，原临时中央军委秘书，此时已成叛徒的白鑫，得意洋洋地怀揣蒋介石的奖金，准备远飞意大利逍遥。当他和五六个护送的特务刚从霞飞路一道大门里出来时，突然从对面一家咖啡店内冲出三个持短枪的精壮汉子。为首一人手持双枪，左手一抬，“哒”一个点发打得白鑫脑袋开花，应声倒下，右手一抬，“哒哒哒”一个连射，两三个特务或死或伤。接着双方凭借街树、房柱展开了对射，子弹惊心动魄地呼啸。街上人群纷纷逃离，地面上到处是人们丢弃的帽子、鞋子、提包……

这位当街击杀叛徒白鑫的好汉，就是刚到上海的邝继勋。

这年夏天，叛徒、特务和青帮相互勾结，对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形成严重的威胁。为了党中央的安全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成立了“特工科”(又称“红队”,“打狗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邝继勋奉调来上海。他胆大心细，勇敢机智，使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外表又像是上流社会的人，便于隐蔽，所以一到上海就成为了红队的骨干。

共产党的大叛徒于光天化日之下暴死街头，吓得许多与共产党有过节的角色胆颤心惊，连上海青帮的“老头子”黄金荣也睡不着觉了，他知道在“4-12”事件中，为了帮当年的门徒小蒋总司令的忙，他派出大批手下去砸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挥部，还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他马上派手下打听详细情况。

当天晚上，黄金荣就得到报告，说那个当街耍双枪的壮汉叫做邝继勋，刚到上海不久，过去在四川当过混成旅旅长。黄金荣一听，不禁心中发怵：共产党能把混成旅旅长调来当杀手，这次是真地要演大戏了，自己很可能就是姓邝的下一个靶子!好汉也不能吃这眼前亏啊!从这天起，他就深居简出，连场面上的应酬，能推的也尽量推掉。

过了些日子，黄金荣觉得风头过去了，一天晚上就带着几个保镖去日新浴室洗澡，待他洗完从池子里爬起来，披着浴衣浑身轻松地走进自己的雅间，一拍巴掌，马上进来两个花枝招展的日本艺伎。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叭”一声枪响，接着“叭叭”又是两声枪响，室内一片漆黑，一阵混乱之后，有人打着手电一看，黄金荣右手按着左肩，血从指缝中渗涌出来，墙上两盏壁灯破碎，两个日本艺伎吓瘫在地上，嘤嘤哭泣。

杜月笙、张啸林闻知“老头子”大难不死，登门看望时，黄金荣心有余悸地对他们说道：“我看清了的，这个耍双枪的一定是邝继勋，但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第二枪、第三枪打壁灯，这说明人家是给我们点脸色。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月笙，快些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写封信，告诉他，从今后，我黄金荣和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

后来，邝继勋被被中央派到鄂豫皖地区工作，在此期间，他率领红 6 军和贺龙领导的红 4 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于 1930 年 7 月 4 日组成了红 2 军团。红 15 军和红 1 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后，邝继勋任军长，他和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率领该军打大仗、打恶仗，使豫皖苏地区南面恢复到黄安、麻城；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面恢复到英山、霍山。根据地人口达到 200 余万，红军也壮大到了 15000 余人。可是，自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他的厄运便接踵而至……他申诉，抗议，一切无济于事。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已经是九点来钟，天已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已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已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开牢门，大声喝道："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不要罗嗦，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

"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去，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这里栽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处决进行得干净利落，两个执行队员上前，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邝继勋——这位红军的一代名将就被高高地吊起在空中。他的身子挣扎着、抽搐着，一只鞋子掉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黄超没有把邝继勋留下的纸条带回去，当邝继勋被带出去时，我进屋去把他留下的遗书拿出来，交给了黄超。黄超看了看没有任何表情，马上将其撕碎，扔进了墙角的尿桶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

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 5 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

“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 1935 年 9 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3、请君入瓮

至此，小河口联名上书的反对者巳几乎被张国焘一网打尽。

由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军的 33 军的指挥员们，也成为了肃反的重点对像。近些日子，全军许多部队被调离原防地，被集中在宣汉的南坝场、马桑沟、黄石杠、土门子几个地方集中整训学习。方面军派来了 300 多名河南籍、湖北籍、安徽籍的干部“掺沙子”，执掌 33 军中的各级统兵大权。政治保卫局也派出十几个肃反工作团一头扎进 33 军，根据他们掌握的名单，在王维舟的部队里大抓起了反革命，而且严刑拷打，草草审讯一下，仅根据口供，就开始处决反革命。肃反团的一切工作，33 军各级指挥员一概不得介入，弄得下面的各级指挥员提心吊胆，叫苦不迭。

就在噩耗频传不久，连骁勇善战的王波师长也受到了一场惊骇！这天，王波接到罗南辉副军长的电话，通知他第二天前往双河场，参加审查 33 军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的会议。双河场在宣汉境内，离他统帅的 93 师驻地有 80 多华里。王波带着 4 名警卫员半夜里出发，快马加鞭，赶到双河场时，太阳巳经升起老高了。双河场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镇子，过去是他们川东游击军的脚窝子地方，王波在这里常来常往，连场上的婆娘娃儿见了他都亲热得如同一家人。

到了双河场上才听一些先到的 33 军首长的警卫员们说，会议在场外两里处一座叫做杨家祠堂的大宅院里举行。只允许首长前去，警卫员们则能留在场上等。

王波把警卫员留在场上，与刚刚飞马赶到的蒋群林师长、3 团政委龚堪彦步行出了场口。他们看到今日的警戒不同凡响，沿路两侧隔几步就站有一名持枪的红军士兵，而且从服装上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他们 33 军的兵，目光相互对视了一下，蒋群林师长轻轻嘀咕了一句：“我的个老伙计，今天这阵仗，恐怕要出鬼哩。”

即将发生的惨案被蒋群林不幸而言中，连他这一师之长，顷刻间也做了刀下之鬼。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一天之前，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长巳经亲自率领 300 名执行队员赶到了双河场，把杨家祠堂变成了一座杀机四伏的陷阱。然后守株待兔，等着 33 军的高中级指挥员们规规矩矩前来引颈受戳。

王波和蒋群林、龚堪彦一进祠堂大门，便被几名面生的红军军官要求将随身携带的武器缴出来统一保管，待会议结束后再领回。他们三人刚刚把武器交出，抬头看见了站在大厅台阶上的保卫局长，心中顿时便有了不祥之兆。因为像他们这个级别的红军指挥员没人不知道他这政治保卫局局长是专门干什么活路的。

王波被允许继续向前，穿过天井登上阶梯，进入大厅会议室。而蒋群林师长和龚堪彦政委却各被两名彪形壮汉架住双臂，顺着贴墙的廊道带往后院。龚堪彦大叫起来，叫红军士兵松开手。没想立即受到了更严厉的对待，红军士兵将棕绳一抖，把他和蒋群林反捆起来，脚不沾地地拖进了后院。

王波心惊胆颤地走进大厅，注意到 33 军 3 个师长只有他一人在，98 师蒋群林师长刚刚被抓，91 师师长冉南轩也没看见人影。过去开会时见了下级指挥员的面总喜欢说粗话“涮坛子”，显得特别亲热的罗南辉副军长，今天也仅是神情冷漠地向他点了点头。而且，那眼神中分明含有什么难言之隐？

指挥员们都在悄声议论：咋个回事，连分局保卫局长都从通江赶来了，莫非今天要拿我们 33 军的头头脑脑们开刀么？

果然，后院很快便有叫喊声怒骂声传到堂屋里。堂屋里的指挥员们惊慌起来，许多人坐不住了，神情激动，纷纷交头接耳，出现了紧张恐慌的气氛。

王波师长第一个吼叫起来，大声质问坐在主席台上的罗南辉和保卫局长：“你们不是通知大家赶来开绥定道（今达州市）党的代表大会么？咋个又下枪又捆人，弄得来神秘兮兮的——到底是啷个回事啊？”

罗副军长犹如泥塑木胎，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在座的人多年来跟着王维舟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的战斗，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斗争经验，只不过警惕性再高，也绝对想不到今天会落到自己人布下的陷阱里。他们情绪激动地想离开堂屋，却被门口荷枪实弹地执行队员拦住。杀机毕现，堂屋里的指挥员们的情绪开始狂躁起来，纷纷离座，欲夺门而去。

这时，保卫局长得知除 33 军政治委员杨克明、政治部主任魏传统尚未落网，其余上了死册的 73 人巳全部就擒，虎地站了起来，厉声喝道：“大家不要嘈动，在座的同志都是党的忠诚战士，只不过反革命分子太阴险狡猾，他们以假相蒙住了你们的眼睛。我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向大家宣布，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不是白吃饭的，我们巳经掌握了混进 33 军中的‘盖天党’、‘白扇会’分子的准确情报，才对他们采取行动的。”说到此，他抬头向着早巳等候在堂屋大门外的执行队长高声喝道：“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

执行队长一声令下，已经被五花大绑的33军参谋长黎时中、91师师长冉南轩、98师师长蒋群林等73名33军的高中级指挥员被押到了天井上。四周，围满了手执雪亮大片刀，杀气腾腾地执行队员。再外面，则是手持子弹已经上膛的步枪手枪冲锋枪的执行战士。

厅屋里的指挥员们也紧跟着保卫局长、罗南辉副军长拥了出来，齐聚在石阶上。许多指挥员一看眼前情景，紧张得连呼吸都停止了。

黎时中一看这场面，怒气冲冲地向着保卫局长吼道："看样子今天这场面是你在当掌墨师了——我问你，大家都是共产党张主席领导的红军，你凭啥要把我们捆起来？"

保卫局长喝道："黎时中，你还有脸说你也是红军！你能干啊，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居然也混到我们的红军队伍里，还爬到了军参谋长的位置上!"

"哈哈!"黎时中狂笑起来:"我是反革命,你他妈的简直是血口喷人!你说我是反革命，你把证据给我摆出来，让大家断断道理？"

保卫局长道："对你这样的家伙还能没有证据？让我告诉你，你黎时中混进红军之前当过国民党宣汉县政府的学监，是宣汉有名的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地主富农的狗崽子？地主富农哪一个不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就必须杀掉,所以你这样的臭知识分子就应该杀掉!"

黎时中让这堂而皇之的荒唐道理气糊涂了，他昂起头，红眼灼灼地瞪着保卫局长吼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照你这混帐逻辑，我们川东游击军的主要创始人李家俊、王维舟都成反革命了！可我要提醒你，李家俊不但把万贯家财都捐献给了革命事业，而且还在被敌人押上刑场，脑壳落地之前大声呼喊'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他要不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今天是不是也要被你们当成反革命，死在你们的屠刀之下？"

保卫局长没有耐心与他理论，将目光落到执行队长脸上，猛然大喝道："愣着干啥？还不动手。"

一声令下,众战士提着雪亮的大片刀,一拥上前,向着红军指挥员们的脑袋抡刀便砍……

而此时已被打入死册的杨克明，魏传统与几名警卫员已经驱马来到了双河场的场口处。不料刚到场口，一位原川东游击军战士的老汉背着背篼从路旁的毛竹林中飞跑出来，变脸变色地喊去不得去不得！他说他刚才在杨家祠堂院墙外面割牛草，听见里面叫嚷得凶，悄悄爬上墙外的树子一看，川东游击军的好多头头们已经被"外省老乡"捆了起来，祠堂后院里捆了一坝坝，看样子要砍脑壳。杨克明魏传统大吃一惊，赶紧掉转马头，策马扬鞭狂奔而去，才幸免于难。

趁热打铁，张国焘又下令将33军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学习为名集中关押，将邓廷壁、高继升等200余人陆续处决。

当已经被释去兵权的王维舟得知双河场惨案发生，听到他的众多部下惨死的消息后，他被强烈地震惊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万难想像，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怎么会用比对付敌人还要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他的部下？他极度悲怆，极度郁愤，黎时中、冉南轩、蒋群林、龚堪庸……他们都是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好战友！对党忠诚的革命战士！他们还很年轻，就这样死在了张国焘的屠刀下，我怎么向他们的婆娘儿女交待啊？我们一起血里火里冲杀过来，好容易盼来了主力红军……可现在他们死了，死在了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主力红军手里……啊，张国焘，你到底怎么了？

当初他这川东游击军的总指挥得知 4 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的消息时，他是那样的欣喜若狂！他立即派出王波率人前往迎接。嗣后，他的部队被改编为 4 方面军 33 军，敲锣打鼓放鞭炮，每一个官兵都为自己能成为主力红军中的一员而倍感骄傲。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连红军的军装也没有来得及换上，就落入了张国焘设下的一个又一个圈套，砍头的砍头，活埋的活埋，死得来惨不忍闻，不明不白！悲痛交加的王维舟不顾个人的安危，闯进总部找到张国焘为屈死的战友们喊冤，却遭到了张国焘严厉的驳斥：“什么党的忠诚战士？一个个头上包着白帕子，身上穿着长衫子，动作稀稀拉拉，我一看就和土匪差不多嘛。维舟同志，我们虽然算得是老战友了，可是，我仍然得提醒你，在当前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你必须加强自己头脑中的敌情观念。”

是的，他的的确确和张国焘算得上是老战友了，那还是在 1922 年，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在列宁亲自主持的东方和平会议期间，他和张国焘就已经认识了。而且，在中共党内，他俩都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元老级人物。张国焘 1921 年参加了党的一大，并分管组织，可王维舟入党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 1920 年 3 月——王维舟在上海参加的是受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韩国共产党，后转中国共产党，党龄从 1920 年 3 月算起，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早了半年——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怀疑张国焘对党的忠诚——正如同他绝不怀疑自己对党的忠诚一样！他不仅痛苦，而且迷惘……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长时间脱离党中央，带着一帮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孤军奋战在大巴山上，对党的方针、路线的认识有了偏差么？但是，面对川北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袖对英勇忠诚的 33 军的无端指责与污蔑王维舟决不能容忍，他愤怒地反驳道：“国焘同志，你的意思是，我王维舟这么多年来在下川东就率领着一帮土匪在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是谁把我川东游击军当土匪？是国民党，是军阀！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样的话，居然能出自你这共产党中央全权代表之口！”

张国焘冷冷说道：“维舟同志，你太意气用事了，我采取断然措施，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等到发生了 29 军那样的事件，就后悔不及了。”

王维舟万万没有想到，他历尽千辛万苦创建起来，并且在共产党的旗帜指引下与敌人经历了无数次战斗付出了无数人牺牲的川东游击军，居然在张国焘眼中与毫无政治信仰，反复无常的土匪神兵无异，悲愤之情，倒海翻江，他不由泪花滚滚地向着张国焘吼道：“我是 33 军的军长，你一口气杀了我几百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为什么不把我也当反革命和他们一起肃掉算了？”

“因为我还相信你王维舟不是反革命，而是受了反革命的蒙蔽。我的回答，难道还不清楚吗？”

与张国焘的争辩丝毫未能减轻王维舟的痛苦。而且，他还得遵照张国焘的命令，回去收

拾这副烂摊子。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从来没有对党的事业产生过半点的动摇。当他的部下们情绪冲动地要他带领大家离开 4 方面军，象过去一样另树红旗另立山头时，他坚决地制止了他们的行为；当少数人被张国焘搞的大肃反吓得心惊肉跳，背着他密谋准备拖枪投敌时，他毫不犹豫地先发制人，采取严厉手段予以处置。正因为如此，肃反风过去后，王维舟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他虽忍着心中的隐痛，为了顾全大局，一如既往地带兵打仗……

1950 年，王维舟则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时，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向肃立墓前的生者以及死去的英烈悲愤地说道：

“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 300 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地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和我风雨同舟，在地下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屠刀下牺牲了。"

（大肃反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

被张国焘冤杀的，还有红军独立师师长任炜章。4 个月以前，任炜章还是围剿红军的川军杨森部的独立旅旅长。该旅是杨的精锐，有 2000 多人，火力配置很强，有不少手提式机关枪、迫击炮。

当时和任炜章在战场上对峙作战的是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红 73 师，其装备远远不及任炜章旅，力量尤为悬殊。可就在南江城外，任炜章经张逸民策动，毅然反戈一击，投向了革命阵营。喜得王树声紧握着任炜章的双手不住声地说：“革命不分先后，过来就好，过来就好！”

任炜章的独立旅被改编为红军独立师，他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从鄂豫皖过来的刘杞任政治委员。

不久，田颂尧卷土重来，任炜章率独立师在空山坝迎战，给了田军重重一击。任炜章也因此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通电嘉奖。

但是，张国焘骨子里从未相信过起义、投诚过来的的部队，尤其是军官。他固执地认为，这些军官今天可以把人马带过来，明天难免又随时可能把人马带过去。他对他们时时心存戒备。他在与亲信们的谈话中，多次强调过对起义、投诚部队，要枪、要兵，不要官。

6 月下旬的一天，几十匹战马抖鬃扬蹄，卷起一路灰尘，向着南江县木门镇（今属旺苍县）奔去。那是川北党和红军的最高统帅带着他的参谋和警卫人员，赶到木门镇去主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广华寺”，一座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古刹座落在一片同样小有名气的山林里。

寺庙内外，古木森森，枝叶繁茂，蝉儿在枝头吟唱，此起彼落，悠扬清亮。倘若在太平年间，朝山的香客会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焚香化纸，顶礼膜拜。眼下由于战乱，由于土匪出

没无常，这块圣地早已被人们冷落了。

上午 9 时左右，张国焘的马队到后不久，各军师级以上的指挥员也先先后后地陆续赶到了。他们满以为是奉张国焘之命来这里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而绝对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或衷心敬爱或心存敬畏的最高统帅会煞费苦心地在这座古刹里设下了一个“鸿门宴”，正等待着他们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来自投罗网。

而我却知道，肃清红军中高级军官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早已在通江便制订好，张主席亲自赶往南江，不过是具体地实施这一计划罢了。

而且我还知道，张主席路经南江县城时，住在他尤为信任的一位爱将的指挥部里，并且叫这位爱将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提前赶往“广华寺”，将这座古刹四周的山头、要道全都控制了起来。

我们这个精锐的警卫排更是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都预先作好了防范措施。

指挥员们在古刹前下得马来，一下就感觉到了气氛非同寻常，四周不仅设立了岗哨，还有荷枪实弹的巡逻队走来走去。庙门处、庭院里、通往后面禅院的廊道上，肃立着武装的警卫。

充作会议室的大雄宝殿里一片寂静。高踞宝座之上的如来佛惊讶地注视着聚集在他的宝座之下却对他视而不见的人们。

是的，红军的指挥员们无暇顾及如来佛，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眼中，他们的统帅远比如来佛高大、具体得多。“真命天子”的传说让具有迷信思想的人对张主席顶礼膜拜，这在红军指挥员中同样为数不少。而真正的唯物论者对张主席也没有理由不肃然起敬。

张主席抬起头来，逐一审视着各位与会者。当他的目光透过薄薄的镜片射到任炜章脸上时，分明还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

可是，笑意转瞬即逝，统帅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指挥员们，声音不高却透着雷霆之力。

“我把大家从前线叫来，是因为我必须向你们中的某些人强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过去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地发动群众与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是号召反革命分子主动自首，没有解释号召反革命自首，仅仅是我们对付反革命的多种策略中的一种，似乎也就引起了一些暗藏在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幻想，这是非常错误的。”

他突地站了起来，声音也倏地响亮了许多。

“有的地方肃反不坚决，不彻底，有的人参加红军之前是反动派的爪牙，当了红军依然去抢地主老财家的钱财，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女人都强奸了，结果怎么样呢？口头承认一下错误，叫家里人给部队抬两口猪来，就算是自首了。有的部队，混进的地主富农分子不少，甚至还担任了不低的职务。我要问某些领导同志，这样的队伍，到底算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巳

经演变成了地主富农的武装……”

任炜章心中猛一揪扯，一丝淡淡的愁绪，凝聚在他的眉宇间……

的确，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成分复杂，改编为红军独立师后的这三四个月时间里，虽然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可抢劫民财，私分战利品，甚至奸污妇女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对于这种种劣行，他和刘杞、张逸民毫不手软，都按照红军的纪律作了严厉的处置，还把强奸地主家大小老婆和女儿的三个为首分子公开枪毙了。张主席此刻说的，想必就是这件事情了……

还有更令他紧张的是，独立师前几天出现了一些异动。川军进攻时，他手下一个叫杨西如的营长带着人在火线上哗变了。当天晚上，张逸民就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至今还不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统帅的声音还在大殿里回荡着。

“第一，必须在红军中继续清查阶级成分，经常注意考察，要考察得周到、迅速，特别要加强对投降士兵和新兵的考察，要坚决彻底地把一切坏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淘汰出革命队伍。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的计划，各级政治部及军区指挥部，必须大力清洗地方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分子。第三，必须加紧改造苏维埃，将暗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

张主席说到这里，把拳头重重往桌上一击，犹如晴空一声霹雳炸响。

绝大多数与会者面面相觑，愣了一会儿，才附合着那已经响起的热烈的掌声。

心事重重的任炜章猛然回过神来，也赶紧鼓掌。

掌声中，张主席突然沉下脸，猛地一声怒吼：“把混进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任炜章给我抓起来!”

任炜章一惊，没等他张口申辩，早就站在他身后的两位保卫局的战士立即将他的胳膊反扭到背后，抖开棕绳，把他捆绑起来。

任炜章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和死神这样迅疾地紧紧地攥住了他。他头上的军帽被揭掉了，露出一头猪鬃样的短发。他的个头很高大，黑红的脸膛上被阴云覆盖，喉咙发痒，想叫……

他挣扎着抬起头凝视着一脸杀气的张主席，一时又不知道说啥好……

还有什么可说的？谁叫你在军阀部队里担任过高官？谁叫你不管束好你的部下？

他被拖了出去，立即，身后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就在这次会上，张主席宣布了一长串“反革命分子”名单，念一个名字抓一个，捆一个，第一名就是任炜章……

黑夜降临了，狂悖的夜风敲打着牢房的牛肋巴窗子，弄出一片恐怖的声响。

半夜，一个南江口音上了年纪的士兵当班，他隔着破门，看了看坐在一堆乱草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淌着鲜血的任炜章，突然压低嗓子说道："任师长，我是晓得你的呀，你和张参谋长都冤，可我……没办法救你出去。"

"张逸民……咋样了？"

"三天前，他就被处决了。"

得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一些，既然生的希望已经破灭，他只渴求死得壮烈一些。

士兵说："任师长，哪个会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哟!"

"我不后悔，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只是觉得我还年轻，还能为革命做点事……我的兄弟们都是真心实意过来的，杀我就行了，不要再连累他们，他们还年轻，很多小兄弟还没有成家。"

"任师长，你说那些，我咋做得到？你有啥话留下，我想办法给你屋头的人带去。这个，我做得到。"

"有话，不要把我的死讯告诉我娘和堂客耳朵里。"任炜章的声音异常平静，"还有，把我和张逸民埋在一个坑里……啊，有烟么，我想再抽一支。"

任炜章被抓后，红军独立师里连级以上的干部也全部被关进大牢。他们成为犯人后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便是用石头砸他们敬爱的师长。

任炜章被推进一个坑里，随着一声令下，犯人们排起长队，每人手中抱起一砣石头，依次上前往坑里砸。2 团长邱正和与任炜章是拜把兄弟，跪在关公像前磕过头喝过血酒的，拒绝动手，当即也被反捆双手，推进坑里。

这是川北大肃反时常用的一种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卓有成效的，既能检验参予者是否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又能激发参予者强烈的阶级感情，而且还可以借此发现暗藏的阶级敌人。

石头像冰雹、手榴弹一样往坑里飞去，没有一个人敢哭出声，可是，抱起石头砸人的人和被砸的人，一张张脸膛上，早巳是泪飞如雨。

巳经变得像血人一般的任炜章不忍部下遭到和他一样的厄运，仰头大叫："弟兄们，砸呀……快砸!"

鲜血喷起来老高，邱正和倒下了，任炜章还在摇晃着——猛然间，他像受伤的雄狮一样

咆哮起来："弟兄们，没啥！20 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终于，那些跟随任炜章征战多年又一起投向光明的军官们，怀着万分的痛苦和不尽的迷惘，硬起心肠把他们的师长砸成了一团肉酱。

任炜章临死前的遗言没有能够实现，不仅 20 年后未能重新成为一条好汉，没有能重新戴上红星帽。相反，在他死后长达 50 年的时间里，就因为他在被大军阀杨森招编之前与一帮绿林好汉穷苦兄弟曾啸聚山林，一顶"土匪头子"的黑帽，压着他的英灵，更压得他的家属、亲戚，连同他战友的家属、亲戚抬不起头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任炜章才得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历史，不仅染着斑斑血痕，还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

对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自己人造成的大劫难，徐向前元帅依然记忆犹新。

"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笔者注：要枪要兵不要官，这在立三路线肆虐时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认识，道理冠冕堂皇：既然当了反动军队的官，尝到了当官的甜头，思想上必然堕落，革命意志必然不坚定。

## 4、"红军之家"的毁灭

红 33 军中的各级指挥员被张主席一锅端，而身任军部特务营营长、三个月前还是名贯苏区的大英雄的任俊卿，自然也就难逃一死了。

任俊卿不仅是英雄，而且还是当时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中的一个成员。

在这个家庭中，有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 3 姐妹，和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 6 人参加了红军。

如果依照后来很在中国时兴了一些年头的的"血统论"来划分，他们这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是没有参军资格的。

他们的亲叔叔，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维舟。

任俊卿的妻子是王家的老四王心雪。

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将军王新兰，她参加红军时，只有 9 岁。

有人或许会表示怀疑，9 岁的小娃娃，还尿床哩，红军正规部队又不是儿童团，怎么会收她？

但事实上，清溪场的王新兰就破例当上了红军。为啥破例？原因有二，一者她当的是文艺兵，一入伍，就成了红 4 方面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里最小的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住“特招入伍的童星”吧；二者，她虽然出身富户，却是满门忠烈，如此可树典型，为扩红起到很好的影响。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王家的姐妹，一个个都长得乖俊可爱，身段儿柳秀，皮肤也好，像大巴山上刚成熟的白花桃，雪白里透着一点儿红润水灵。特别是王新国，在前进剧团里是众口公认的大美人，脸蛋、肤色、眉眼、身段，叫人怎么看怎么好，再挑剔的人也很难找出一点点毛病来。她是前进剧团里当之无愧的“头牌红星”，她唱的巴山民歌，清甜亮丽，悦耳动听，是每场演出中最受战士欢迎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姐姐新国，也厚爱妹妹小新兰，一见这一对姐妹登台，就高兴得乱吼。那时候不时兴鼓掌，红军战士们高兴了就跺脚，就大声吼。

王家满门参加红军，当时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连省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川北穷人》，也发表过介绍他们的文章。可是，这 6 口人中的 4 口人成为革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全是被自己人杀掉的。

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一个在北京当高干，一个在大巴山上当农民。

“红军之家”第一个被杀掉的，就是王新兰的四姐夫任俊卿。

红 33 军的干部遭到大清洗，任俊卿也被抓起来关进了牢中。

罪名是他参加红军前当过清溪乡的团总——那是党组织派他以反动面目去为共产党抓枪杆子的——而在他当团总时与他交往密切的不少地方头面人物后来都成为了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白扇会”、“盖天党”分子，在政治保卫局的审讯人员面前，他即便浑身是嘴也没法说清楚自己和那些反动朋友之间的关系。

1933 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已经被毒打折磨了几天的任俊卿被反捆双手，押上了落叶潇潇的峰城山。他身上的灰军装褴褛不堪，糊满干涸的血斑，脸色蜡黄，行走困难。他的红五星、红领章早已被摘去了。

几名红军战士把他推到一个土坑前，坑很大，里面裸露着骷髅、白骨、被狼和野狗撕碎的灰色布条，以及许多新鲜残缺的尸体。

他心里非常清楚，马上，自己也会被杀死后扔进坑里，尸体一样地会被狼撕狗啃。

他并不怕死，所以并无畏惧感，那么多老战友都被杀掉了，到了眼前这步田地，他倒真地希望能痛快地死去，人一死，精神与肉体都再也不会遭受折磨了……

壅塞在胸中的是迷惑与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他感到很冤，他实在不明白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出生入死地为共产党打天下，共产党的大领袖张国焘却要杀他，杀死他们 33 军中的那么多指挥员？

站在他身后的几名红军战士兵手里都提着雪亮的大片刀，但他们却不动手杀他。他们推出一个犯人，要犯人当刽子手。这个犯人不愿意，哀求着拼命往后退缩。于是，红军战士就用刀背砍他，有个当官的还很威严地喝斥他："这是给你个机会，看你能不能够和你的反革命姐夫划清界限，能不能接受革命的考验！"

应该指出，担任行刑任务的红军官兵的行为无可指责，他们这么做，也的的确确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出于对反革命分子的深仇大恨。而悲剧在于，他们完全不可能理解，这些一批批被他们砍掉脑袋推进坑里的"反革命分子"，其实是和他们一样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

那一刻，任俊卿闻声猛地回过头去。他看清楚了，被强迫着当刽子手的，竟然是王新敏，他妻子王新雪的亲弟弟！

目睹红军战士毒打威逼新敏，要他来杀自己，愤怒、悲痛、同情多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强烈地封住了他的嗓门，使他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

半晌后，任俊卿怆然喊道："来吧，新敏，你不砍我，他们也会动手的，哥不会怨你。"

这是奇迹，即将被杀的人居然给杀自己的人打气壮胆。

王新敏被推到了他的姐夫身边。他的脑壳里变成一团白蒙蒙热腾腾的浆糊，他想不透是咋回事，仅仅几个月前，他的姐夫还是名震苏区的大英雄，是他全家人的骄傲，怎么眨个眼睛就变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了？他双手握着大片刀，满眼流露着惊恐。在战场上与敌人肉搏时从不知道畏怯的英勇壮汉，此时此刻竟然瑟缩颤抖得像狂风中的一棵小草。

任俊卿也哭了，大滴大滴的泪珠滚下地，说道："新敏，好兄弟！我死后，你姐……还有你的两个亲外侄，都拜托给你们了。来吧，莫怕，动作麻利点。"说罢，他猛地扭过头去。

王新敏脸上，泪水汹涌。

"任哥……任哥，我下手啦！"新敏大吼一声，紧跟着，刀，劈了下去。

可是，他心中的障碍妨碍了他的力量的爆发。那刀，仅在任俊卿的脖子上划开了一条像小娃娃嘴巴大的口子，人头并未落地，亮旺旺的血，"咕嘟咕嘟"地从口子里喷涌而出。

任俊卿陡然伸长脖子，举目向天，痛苦地狂叫道："狗日的新敏，展劲砍！老子……痛得恼火！"

王新敏这才明白"手下留情"是多么的愚蠢。他用力甩开膀子，大刀在空中划出一道优

美耀眼的弧线，带着亲人的至爱真情有力地劈向了姐夫的脖子。脑袋“咚”地落地，一腔热血，喷出好远……

即便是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王新敏也未能逃过一死。任俊卿死后仅一个月，同为93师战士的王新敏、王新正兄弟俩也要被保卫局处决了。

临刑前，满腔悲愤的兄弟俩提出，要和自己的师长见一面，告个别。

王波师长和士兵站在了一起。

师长爱他的士兵，士兵也爱他们的师长，可在这最后分手的时刻，却只能无言对无言，青山向青山。

士兵眼中，泪花滚滚，他们无权在被处死之前申辩，却有权流泪。

而师长的眼泪，却只能往心底里流淌……

王波后来在一次老同志聚会时发言说：“5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两双泪汪汪的眼睛，像灯一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亮着。”

王波还说，解放后，他碰到王新雪，从不谈任俊卿被杀的事，也从不谈他和新敏、新正最后分手时候的情景。

北京的王新兰则对通江去看望她的人说：“其实，任俊卿刚死，我四姐就知道了，在峰城山杀任俊卿那天，有个认识他的农民躲在岩包后面看见了，马上跑到清溪场给我四姐报了信。四姐赶拢已经是半夜了，她摸着黑从死人堆里认出了丈夫，把他背回长田湾，悄悄挖个坑埋了，还请石匠打了块碑，立在坟头上。后来红军撤走后，还乡团回来把坟挖了，把碑也砸了。”

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则是在炉霍被处死的。

那时前进剧团和中央党校、红军大学都住在炉霍城里的一座大寺庙里。

一天深夜，小新兰和姐姐新国睡在一起。白天外出打粮太辛苦了，一躺下，姐妹俩就睡得像死人一样。不知啥时候，小新兰被惊醒了。她睁眼一看，姐姐已经被几名战士拖了起来，正在用绳子反捆双臂。

姐姐惊慌地嚷：“哎呀，我干啥子了哟？你们为啥要抓我呀？”

战士们不解释，捆好，就推着她往外走。

小新兰吓坏了，一下子扑上去，双手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杆，拼命哭喊：“我姐姐是好人，你们不要抓紧她呀！”

新兰那时虽然才 12 岁，可一看这肃杀的气氛，就明白大祸临头了。

新兰眼睁睁地看着姐姐被带进沉沉的黑夜里，再也没有回来……

对新国的死，王新兰一直挂在心里，许多年后，她才通过丈夫肖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杀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这位领导前一点说得没错，王新国的确是出自非劳动人民家庭。但后一点却大错特错了，不少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恰恰是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主动放弃了了比普通农民好得多的生活，抱着明确的政治信念真心实意参加革命的，而不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那时候混进去，除了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脑壳耍脱，有啥子利益可图哟？

新兰的五姐王新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长征时背着个奶娃娃跟不上队伍，在夹金山脚下被组织上动员离开部队。她一路乞讨，才回到了故乡清溪场，从此一辈子在大巴山上当农民。

这样一个"红军之家"，就被曾经在党内占有统治地位的极左思潮给毁灭掉了。

而在这样一场屠杀中，后来当上将军的王新兰却无法认定真正的凶手是谁。执行的士兵当然不是，他们全都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甚至连下令杀人的张国焘、陈昌浩，在肃反运动中具体执行杀人命令，杀了许许多多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赤色群众的周纯全、袁克服、曾传六等等也不是凶手。因为，王新兰不能否认，换成自己也一定会那样做……因为主观上，他们同样是为了"纯结革命队伍"、同样是为了"把红军的事情搞好"啊！

袒露结疤的伤口，乃是为了汲取流血的教训……而这浸透着血与泪的悲剧，无疑是这个革命家庭献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王家满门 6 红军，就小新兰的命好。

姐姐死后，王新兰更把部队剧团当成了自己的家，大哥哥大姐姐们也都拿她当亲妹妹照顾，教她学会了唱歌、跳舞、吹笛、打洋鼓。部队过草地时，王新兰不知得了啥病，头发眉毛一根根往下掉，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人事不省。在处置伤病员时，有人提出把她也留到老乡家养病。政治部主任洪学智说："这个女娃娃演得不错，是个好苗子，再困难也要把她带上。"

看来年轻时候的洪学智也是个追星族，要不是他一句话，王新兰的命运恐怕就和五姐一样了。

几年后，已经入了党的王新兰和几名女战士奉命到抗大学习，经过设在云阳镇的八路军总部时，因公路被暴雨冲断，就在滞留八路军总部期间，在陈赓的热心撮合下，她和年轻的指挥员肖华由彼此产生好感到最后成为了恋人。

再后来，八路军 115 师组织挺进纵队，由肖华出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在冀鲁边区与日

本鬼子和国民党、汉奸作战。

1939 年，王新兰从通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新华总社新闻台当报务员。

1940 年伊始，肖华升任为 115 师政治部主任不久，经党组织批准，24 岁的肖华与 16 岁的王新兰，终于在抗日战火中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 第八章 刺杀张国焘

刘湘悬赏 10 万大洋购买张国焘的脑袋，张国焘的安危……虽然作了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四名杀手混入绥定“洪祥戏班”进入了通江……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红军大劈贺朝正，让早巳失业的前朝刽子手出了一回风头。

### 1、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1933 年 10 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 10 万大洋购买张国焘的脑袋。

剿匪军总司令部赏格：

张匪国焘，共党巨头，窜入川境，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罪恶弥天，人神共愤。兹者，倭敌寻衅，国家有难，张国焘本应激发天良，共御其侮。乃竟敢抗拒政府，驱人民于水火，作泄愤之私图。吾民何辜，屡遭戕害！与国何仇，甘作孤注。此等元恶凶顽，若不及早翦除，将何以拯吾民而救吾国？兹特悬赏拘捕，无论军民，如能各本义愤，将祸首张国焘死毙者，赏洋 5 万元，生擒者赏洋 10 万元。储款以待，仰即同知。

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张主席的案件。

一起是张主席前往巴中检查工作时，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小场双鸡岭时，被埋伏在旅栈中的杀手从楼上扔手榴弹伏击。卫士胡学柱，倪锐锋牺牲。幸张主席无羔。

一次是杀手装扮成送菜农民混进通江公园，藏于黄桷树上，深夜潜至张主席所住木楼，

幸被起床上厕所的参谋周世岳撞见叫喊起来，被火药枪击中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妄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

张主席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刚接替周纯全（周调 4 军任政治委员）担任总部保卫局局长的曾传六 4 位首长外，就是总部警卫排排长我、分局警卫团团长皮信义、总部特务营营长徐泽明。

曾传六局长就前一段时间里连续破获的两桩谋杀张国焘案件的经过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何畏的 9 军中抽调一个团分散驻扎在通江县城里的天主教教堂、列宁小学、考棚、禹王宫等处。白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文庙与中山公园，共设置了 3 道防线，将张主席所住的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我们警卫排组成。

但是，虽然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主席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那是 1934 年 12 月 11 日，4 名刺客在通江城中大庭广众之下向张主席开了枪。张主席虽然大难不死，但枪声一响，可把我们这帮警卫吓掉了魂！

事后得知，谋杀张主席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贺朝正在巴蜀武林中不是一个无名之辈。24 岁那年，他曾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首届“全川国术擂台赛”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中败给荣昌县人蓝伯兮，夺得了一枚银章。此后 20 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监，出狱后先给熊克武当卫士，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率 3 万川军子弟长征上万里前往广东，却被蒋介石、汪精卫等设鸿门宴囚禁于虎门炮台。川军被打散后，贺朝正逃回四川，又被刘湘聘去担任 21 军军官教导团的武术教官。

这次贺朝正率队潜入苏区，是因为悬赏公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听到前去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十中有九未能生还，不禁起了冒死一搏的念头，既贪图那白花花的 10 万大洋，也想在刘湘面前露上一手。

贺朝正主动向刘湘请缨，刘自然同意。贺朝正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断难成此大事，遂将 3 名过去的弟兄，已“嗨”了浑水袍哥至今仍在血盆里捞钱的妄命之徒招来，组成一个小组，前往苏区。这 3 名弟兄也全非等闲之辈，会武功，精射击，胆大心狠，得着这样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欣然随贺前往。

2、金童儿夜访龙头大爷

1934 年底，红 4 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 6 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今达县市），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12 月 11 日，川陕省第 3 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里的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 1500 多人。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

洪祥班班主金泰合，工须生，是个鸦片烟鬼。儿子金宝林艺名金童儿，工武丑，名声比他老汉还响亮，最拿手的是《皮金滚灯》、《三叉口》。

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前往通江时，却有 4 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

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 3 个兄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制下的南充进入红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时人多，枪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 1000 大洋。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

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的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答应帮忙。

12 月 10 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

红军通知金泰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

夜里，贺朝正与 3 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

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

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长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就往张国隆家中赶去。

这时大约是 10 点来钟，通江城里，家家关门闭户，一派寂静。

街道上，每隔 50 丈左右才有一盏路灯，闪闪烁烁，半明半暗。

金童儿乘坐的轿子刚走到街口，就被一队巡街的红军挡了道。为首的军官喝道："干啥子的？"

金童儿赶紧下轿，抖抖衣袖答道："鄙人是绥定城洪祥班的少班主金童儿，是被请来为

你们红军大会演出的，下午刚到，现在想去拜望个朋友。”边说，边递过一张自己的片子。

红军军官接过片子，却不看，问：“你的朋友是哪个？”

金童儿答道：“贵码头上的张国隆张大爷，他也是帮你们红军做事的。”

那红军军官显然也知道张国隆这个名字，客气地说了声：“走好。”就算放行了。

张国隆，绰号“莽脑壳”，长得膀大腰圆，横眉粗如扫帚。此人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小性情暴躁、豪强霸道，话不投机便要拔刀拼命。在大河湾煤矿当拉煤工时，矿工们都很怕他。

一次，他惹恼了矿主邱登云，被邱百般欺凌一顿后，遂出了煤窑。张国隆咽不下这口气，当天夜里就带上几个和他磕过头喝过血酒的弟兄，冲进镇上的妓院，将正在床上颠鸾倒凤寻欢作乐的窑主的独生儿子邱昌林拉了“肥猪”，带到山上后，张国隆派一弟兄给邱登云带去口信，要他在 3 日之内送 5 支快枪、500 发子弹来山上领人，到时不来就"撕票"。而这 3 天时间里，张国隆逼着邱昌林身穿从妓院里弄来的花红衣裤，头戴金银首饰，耳挂玉坠，唇抹朱砂，打扮成女人模样。他喝酒时，就让这个假女人在一旁执壶斟酒、敬烟奉茶。时不时还揪他脸蛋，摸他屁股，想尽办法侮辱折磨这个公子哥儿，发泄胸中恶气。直到邱登云在规定的期限内老老实实地把枪弹送来，还恭恭敬敬地给张国隆赔了不是，才让他把儿子领走。

此后，张国隆便领着这帮兄弟，专事拦路搂抢，打家劫舍等各式“文”抢武掠，并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各地土匪，势力渐渐坐大。

辛亥革命时，张国隆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 400 多人枪，也顺应潮流，参加了由袍哥组成的“同志军”，向清王朝政权进攻。

通江的国民政府刚一成立，张国隆就被任命为分管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张国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头戴博士呢帽，腰挂德国左轮，上穿墨青大褂，下着紧口缎裤，带着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

上任第一天，他把全体弟兄集中起来，恶狠狠地训了一通话。

这一段正史野史中均难看到的特殊的土匪训辞，现在的人一定会颇感新鲜。

“哥儿一杆子张耳闭嘴，你我前有缘后有故，落在一窝草边，现时我等过了灰沟，进了广圈，莫比一般生毛子，哥儿一杆子千万要整住！摆了渡，过了河，要给老子留个粉壳壳，二天再莫打门神，再莫烧窑子，再莫拿梁子，设若醒二活三，我老子认得圆的认不得扁的，老子不毛你是虾的！”

这一段绿林暗语、土匪黑话，乍听着着实稀罕，翻译出来倒也不奇：“弟兄伙计们仔细听着，你我前世有缘，今生有故，落草在一个哨棚里。如今我们爬山越岭，涉水过河，开进了大码头，再也比不得一般土里土气的乡巴佬了，弟兄们一定要听招呼。从今以后，我就是台面上的人了，你们得给我争气，给我留点面子，今后再也不准越墙打洞，不准绑票拉肥猪，不准烧人家的房子，不准砍人家的脑壳了。假如再要胡作非为，我对事不对人，老子不严厉

惩罚你就是从屁眼里屙出来的!”

进城后，张国隆为了故作姿态炫耀体面，居然包了城里最大的饭馆“宝丰园”大摆酒席，宴请当地机关法团、士绅阔佬，为其捧场张目。在一番不伦不类的“就职”致词中，也充斥着连篇的黑话：

“在下张国隆，今请列位将就喝黄汤、捧莲花、拈滑溜、造粉子，兄弟我是识相的，抬头有玉帝皇天，埋头有土地老倌，在下先给列位丢个拐子（袍哥的见面礼节），烧香点蜡朝贡献茶，邀拜列官列员，绅粮伙举哟!”

这一番黑话的意思是:“本人张国隆，今天请来各位光临，只不过喝杯水酒、拈点大肉、吃顿便饭。兄弟我也是懂点规矩的，面对青天黄土，鄙人这里先向各位行个礼表示敬意，求神不如求人，往后还要请各位官员、各位绅粮大力支持哟!”

张国隆此后又出任了通江袍哥舵把子的角色，在官匪之间，红黑两道上左右逢缘。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却跑也不行,不跑也不行。因为，他和巴山地区的浑水袍哥的总舵把子王三春结下了“大梁子”(深仇大恨)。3 年前，他运往重庆的两船鸦片在居然被土匪劫了道，探人四处打听，才弄清楚是王三春手下所为。所以，田颂尧派大军围剿王三春时，他也带着手下进山去帮清剿军敲过边鼓。双方的仇恨，也就越结越深。没想这次红军一来，田颂尧看重王三春手中的 3000 多条人枪，居然封了他一个“巴山游击司令”的官儿，把王三春招了安。如此一来，就把张国隆的后路断了。以他手下这点兵力，又不是王三春的对手，张国隆思想后，索性就豁出去投了红军。

在刀尖上闯荡多年的张国隆胆子毕竟非寻常百姓能比，听说红军杀气腾腾打来，许多人都吓得扯伸脚杆跑，他不仅不跑，红军进城后，他竟然设下宴席，邀请张国焘等首长赴宴。张国隆向张国焘丢了个“拐子”，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说:“红军主席你看，这通江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全跑了，就我留了下来。为啥？就因为你我都姓张。字牌也都一样,主席你叫张国焘，哥子我叫张国隆，只可惜不是一个妈屙出来的亲亲两兄弟。你说，我两个拜个把子好不好？”

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竟然提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磕头烧香同结金兰之交，弄得陪同张国焘前去赴宴的黄超、傅钟、周纯全等首长，以及我们几名卫士，在一旁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金童儿眼下去找张国隆，是因为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典型的川戏迷，尤其喜欢看金童儿主演的《皮金滚灯》。

金童儿到了张公馆门前，吩咐轿夫等着，上前叩响门环。门上一看是金童儿前来拜访，无须通报，就让他径自前往客厅。

客厅里，灯火辉煌，火盆里板炭燃得正旺，满屋暖意融融。张国隆正在和通江城里的几位商绅打麻将。见是金童儿，张国隆无暇分身陪他，欠欠身子，让他坐在一张凳子上，一边继续打牌，一边和他说话。

金童儿当然不敢把贺朝正等人混进他的戏班进入通江准备谋事的内幕向他透露半分，他只是说他这次来通江为红军演出之前，母亲突患重病，他心里放心不下，请张大爷帮忙给他在通江河边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连夜顺江而下，赶回绥定。

这等小事还不容易，张国隆动动嘴皮子，吩咐手下的红旗管事一声，就算成了。

3、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

第二天晚上演戏的地点是在列宁小学的操场上。把坝子边一个校长用来训话的土台子临时加宽加长，就作了舞台。

晚饭后，张主席由黄超、倪志亮、傅钟、李特等首长陪着，在我们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从总部出发前往列宁小学。沿途，特务营的战士在街道两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警戒线一直布到了列宁小学门口。

冬日里，黑得快，西北风呜呜地刮着，像刀子一样割脸。我们到时，代表们已经坐了一坝子。学校的板凳不够用，后面的代表们就坐在课桌上。最前面空着 3 排长凳，那是特意为首长们留下的位置。那土台子经戏班的人用花花绿绿的围罩、幕布装扮起来，倒还蛮像个样子。戏班自己带来的两盏煤气灯，把整个舞台、坝子照得光亮堂堂。

直到张主席等领导进场，金氏父子这才猛然悟道，贺朝正等人是来刺杀红军首脑人物的。悟到这一点，父子俩三魂丢了两魄，可事到如今，他们也只能为自己寻条脱身之计了。

开戏前，我布置了 4 名卫士把守大门，20 名卫士在学校四周作流动哨，其余的分散到坝子四周担任警戒。我和内卫尹中富则坐在张主席身后，与他寸步不离。

那晚洪祥班演的是大戏《白蛇传》，刺客们本来打算演到"水漫金山寺"，锣鼓齐鸣，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的时候，4 名身穿戏装的刺客便拥上台去，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开枪，然后击灭煤气灯，在黑暗中乘乱逃出。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张国焘的忙，让刺客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泡了汤。

看过川戏《白蛇传》的人都知道，全戏要演近 3 个钟头，到“水漫金山寺”时，已经是要结束的时候了。

而那晚开戏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裳，加之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我把预先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撑开，替张主席遮雨，张主席马上回过头叫我把伞收了，还低声说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太懂。”

我见他头发全淋湿了，有些着急，说：“要走现在就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张主席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大约又过了 10 来分钟，首长们都起身离去，我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紧紧跟上。刚出人群，我又把伞撑开，罩在张主席头上。

就在这时候，只听“砰砰”几声枪响，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小田一下子倒了下去。

原来，身着戏装画上脸谱的 4 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突然起身离去，一时没了主意。

为首的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他掏出手枪，一把撩开耳幕，对准红油纸伞下便打。

枪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跟着，两盏煤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坝子上黑影憧憧，板凳踢倒了，桌子掀翻了。

离我们不远的卫士像闪电一样窜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长簇拥在中间。所有的卫士都将手枪提在手中，大机头打开，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一声：“有刺客！”然后将伞扔掉，抽出手枪，拉着张国焘的手急步向大门口疾跑。

我心里非常清楚，子弹是冲着张主席打来的，抓刺客有其他的战士去，我惟一的任务是保护张主席尽快脱离险境，回到总部。

黑地里，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值勤的战士发现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枪，便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戏班子的人全成了红军射杀的目标。

我们簇拥着张主席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也都跑拢了。一看见张主席活着走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枪战的最后结果是，4 名刺客当场被击毙 3 名，贺朝正正欲开枪自杀时，枪中巳无子弹。洪祥班 36 人，除金氏父子在开戏前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离开学校逃脱外，当场被打死 26 人，剩下 8 人，也全部被抓获。

天还未亮，保卫总局便来电话向张主席报告，金泰合父子均巳抓到。

原来金氏父子借故离开学校后，马上去江边上了小船。谁知船到小庙沱一带，却被红军的巡江船挡获。巡江的红军怀疑二人是敌军探子，就把他们弄到岸上审问。开初金氏父子嘴巴很硬，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说，到了下半夜，金泰合的烟瘾发了，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军就把在船上缴获的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上，还故意烧了颗烟泡子，让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一会儿，金泰合为了抽烟，就啥都吐了。

那一晚，张主席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他不睡，我们谁也不敢闭眼。

得到贺朝正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着话筒对担任主审工作的曾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劈！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4、红军大劈贺朝正

既然张主席明确指示"押赴市曹，公开大劈"，贺朝正的脑壳这下就绝对保不住了。

砍个人的脑壳很容易，可是，要"杀出红军的威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因为在民国以前，犯了死罪的人一律都是当街砍脑壳，那是专业的杀人派头，有捧刀手，有刽子手，有装运犯人的站笼，还有骑着高头大马手捧令札的监斩官和提着红黑棍与大刀长茅的护卫队。直到民国后，才改为了用枪打后脑壳，一枪毙命，平淡无奇。中年以上的老百姓过去对砍脑壳的场面见多了，难免就有个比较，你红军这回要搞"大劈"，要"杀出威风"，心中既感到新奇，又有些犯疑，你红军能够杀出威风么？砍脑壳，那可是个技术活儿。

为追求这威风，保卫局确实也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像翻老古董一样，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前朝时候在通江县衙门里一个专门砍了 20 年人脑壳的职业刽子手至今还活在人世，不仅活在人世，而且如今仍住在通江城里！

这人叫袁占山，虽已近花甲之年，却天生一副出色的身架、出色的脸膛子，和一大把堪与关公媲美的长胡子。他长得奇高奇宽奇厚，而绝不让人觉着他皮泡肉松。那脸膛，以前当职业刽子手时长年用紫云参擦抹，早已失去本色，勃放出红通通豪光来。两只不大的眼睛，虽无"丹凤"模样，倘一鼓眼，也凛然生出神威。尤其是那一大把油润黑亮，全无一根杂毛的美髯，在胸前拂摇飘洒，更活脱脱地显出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气。

袁占山在县衙门专司砍脑壳的活儿时，还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肖国明，一个叫韦中英，民国以后实施新政，不用砍脑壳了，所以就被砸了饭碗，去通江河边的河街上开了一家茶馆，笑迎八方客，求个肚儿圆。肖国明回到老家万源开了家木器行，后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牺牲了。韦中英则在通江南门口开了家肉铺，由杀人为业改成了杀猪谋生。

我师兄黎清财那时已在保卫局当上了局机关保卫连连长，一大早，他亲自到河街去把袁占山请到保卫局。保卫局设在如今的通江中学，气势十分地吓人，大门两侧不论白天黑夜分立着 4 名背着枪的彪形壮汉，更让人望而生畏的是大门上交叉悬挂着两把亮铮铮的鬼头刀，老百姓大都不敢从门前走过，即便有事也都绕道而行。黎清财把袁占山带进大门，由首长向他交待任务，讲定酬金。袁占山脚杆还没跨出保卫局大门，红军保卫局的勾红布告已经上了街。

布告一上街，已经沉寂了 20 来年的袁占山重新又成为了通江城里的头号新闻人物。

且说袁占山从红军保卫局回到茶馆，立即把他徒弟韦中英叫来吩咐，马上去找一吊铜钱，顺便去米市街面馆预订 30 个馒头备用。之后，袁占山叫堂倌白老幺打开铺板，自己泡了一壶浓茶，在堂口正中那张桌子的上八位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对白老幺发话道："老幺，明天要出大缺（砍脑壳），哥子我要做个大活路。你马上帮哥子我放出话去，明天要砍那贺朝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过去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打个银章的，还当过熊大将军（克武）的卫士，再不济也算得条好汉哩。就说我袁占山要卖这好汉的人血钱和人血馒头，血钱半块洋钱一个，血馒头两角生洋一个，要买带趁早，这贺朝正是真资格的对红心，血钱镇邪除怪，灵验得很，血馒头医五痨七伤，药到病除，要买的要带的明天法场上来现钱现货，事完之后，哥子我赏你一块大洋作酒钱。"

白老幺连忙作揖说："兄弟谢了，跑腿算我的。"

太阳还不到一竿子高，袁家茶馆里，早巳茶客爆满，与其说大家是来喝茶，不如说是前来听袁占山大讲特讲"砍头经"的。

一个老汉给袁占山捧场说："你老弟这么多年没过瘾了，明天一定要露露真功夫，来个'带把儿'的，给如今的年轻人开开眼。!"

袁占山故意做出副谦虚的样儿说："这么多年没练了，手艺丢生了，莫说'带把儿'，就是能咔嚓一声，刀起头落也不简单哩。"随后，袁占山就矜持地说起他过去的行道来，什么学砍脑壳要先学磨鬼头刀，把刀口磨薄，用指头一弹都要发出脆生生的响声啦，以及练刀法要先用芭蕉头弹好墨线放在板凳上，一刀一刀照着墨线砍，线如何由稀到密，直练到齐线削直芭蕉头不倒啦，最后还要练在夜间砍明火香头，也要练到砍下香头香不倒才算出师等等……

听得一帮茶客，耳朵直扇。

有人又问："这么说，'带把儿'就更不简单罗？"

"那还消说!"袁占山得意洋洋道，"百闻不如一见，明天各位到法场上来看就晓得了。"他边说边比划，"这挥刀、落刀、拍颈、踢脚、'忍刀'，都极有讲究的，这'把儿'宽过了两寸就算不得上乘功夫了。"

"这回'带把儿'，袁大爷不晓得要得好多财喜呵？"有人又问。

"屁！这回是红军长官交办的公事，我能厚起脸皮去讲价钱么？长官开口给 5 块，我就收 5 块……当然，要是尸亲找我的话，那就不同了。"他把巴掌举起翻了两翻，"少说也是这个数!"

第二天上午，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把通往通江河边的几条街都扎断了，由我师兄黎清财率领的红军警卫队、监斩官、从前进剧团调来的 4 名号手以及用木板车临时赶做的一辆站笼早巳在保卫局院内的坝子上列队站好。

袁占山也带着挎着装上铜钱和馒头的大口袋的徒弟韦中英早早地赶来候差。两人均从衣

箱底翻拣出当年作职业刽子手时的装束，全身披挂，看上去与旧戏舞台上的刽子手一般无二。

那一天张国焘并未露面，我们一帮不当值的警卫都出了中山公园，聚在下河坝的街口等着看稀奇。

不到 10 点钟，满城百姓忽听得保卫局方向吹起了长声吆吆的军音号，犹似有人在喊"挨刀——！""挨刀——！"号声由远而近，前面两名红军战士各举一块从前朝县衙里找出来的高脚牌子，一块上写着"贺匪朝正"，一块写着"如此下场"。高脚牌后面四名战士手持军号，不断吹奏出凄厉的声音，再后又是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中间的站笼里则是赤裸上身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的贺朝正，笼车后面就是挺脑凸肚，大摇大摆迈着步子的袁占山。他头上缠着青丝帕包头，左耳边吊起"指天恨地"的包头尾子，身披黑红色磊氅，上穿密门对襟紧身，下穿蓝色兜裆裤子，脚缠裹腿，足蹬满耳红花草鞋。身后，则是双手捧着拐子刀的徒弟韦中英。后面又是一排持枪士兵，最后还有个骑马的监斩官，一路缓缓而来。

押解红差的队伍后面，看热闹的老百姓牵起线线一浪一浪地往前涌。

贺朝正也真是不怕死，露在站笼顶部一个窟窿上面的脑壳左顾右盼，从容高喊："仁义各堂哥弟道谢了，20 年后，我姓贺的又是一条好汉！"

沿河滩的住户临时做了一笔生意，收一角钱，让到楼上去居高临下看独立杀人，直挤得楼板吱吱嘎嘎乱响。

这时，河滩上的法场上早巳布满武装士兵，将闲人驱散。

队伍终于顺着陡峭的石阶下了河坎，来到了法场上。在河边铺上了一块红毡。这时，只听骑在马上的监斩官一声令下："成散兵线散开！"随队伍下到河滩上的士兵便齐铺铺地散开像梅花桩一样站起，端着步枪警戒，法场上顿时杀气腾腾。

两名士兵上前打开站笼，将贺朝正挟持着走到红毡中间，贺朝正背靠通江河，面朝万人涌动的河岸，大模大样地盘腿坐下。士兵抽掉了他背上的斩标，那贺朝正竟冲着袁占山咧嘴一笑，说道；"大哥落教些，兄弟决不拉稀摆带，只求你给我做利索点。"说罢，伸直脖子，等着吃刀。

袁占山点了点头，一个箭步上前站在贺朝正身后，左手掌一拍贺朝正后颈窝，说声："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的。"

话音未落，右手一拐子刀"嗖"地过去，只见贺朝正脑壳向前一耷，巳经挂在了胸。好个袁占山，左脚尖向前蹬贺朝正背心，用劲向右一踢，尸体竟翻面倒在右边，颈上红光一下喷起老高。这套动作一气呵成，不过两三秒钟工夫，可要知道，袁占山如不用这一蹬一踢，那尸身必然向后倒转来，血就要喷在他自己身上。好像是贺朝正临死还要考考袁占山的手艺，袁占山也冲他是个好汉，卖个人情不叫贺朝正人头啃沙。

血从颈腔汩汩涌出后，韦中英赶紧把散穿起的铜钱在血滩里几丢几滚便糊满了鲜血，然后把馒头往血滩里一倒一铺就全成了人血馒头。

当警戒撤除后，河坎上的老百姓犹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向河滩，有看热闹的，有恭维袁占山的，也有不少人围着韦中英抢购血钱和血馒头，一会儿工夫，便一抢而光……

## 第九章 袍界英烈

死去52年后，一位大巴山中的袍哥舵把子被追认为革命英烈……遵照张国焘的指示，张小川与敌为伍，在率部围剿刘子才的同时，却暗中帮助红军……因叛徒出卖，刘子才与张小川双双蒙难巴中城。

### 1、留过洋的“袍哥大爷”

提到张国隆，就不能不进一步谈谈张国焘与四川袍哥的关系了。

众所周知，旧中国的青红帮、哥老会，是任何统治者也不容忽视的一支政治力量。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哥老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四川则是袍哥，泸州一带大名鼎鼎的袍哥舵把子佘竟成，就曾经被孙中山高度器重，特地派人持他的亲笔信赶赴泸州邀请佘竟成东渡日本，与之长谈，并介绍佘加入同盟会。佘竟成回国时，已由一个血性刚烈、闯荡江湖的袍哥龙头大爷，变成了孙中山任命的西南大都督，并派熊克武、谢奉琦与他一起回川筹划，举事光复四川。后来佘竟成被斩，孙中山于民国创建后，下令追授佘竟成为陆军中将，并在泸州忠山脚下树碑纪念。

四川保路运动，被史学家们称为“武昌起义的先声”，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中，冲锋陷阵唱主角的，正是铺天盖地的袍哥。连首任民国四川大都督尹昌衡，也曾出任过四川袍哥的总舵把子。

张国焘是个大政治家，他当然懂得如何利用川北的袍哥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所以红军进入川北后，轰轰烈烈地搞了肃反，搞了禁烟禁赌禁嫖禁娼，镇压反动会道门组织“盖天党”、“白扇会”，却惟独对袍哥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不仅不限制打击袍哥，相反，张国焘对川北各县的袍哥舵把子还故意施与恩宠，视他们为地方名流，优礼有加。

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确实给红军带来了诸多好处。在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时，这些舵把子通过各自在江湖上的渠道，把红军缴获的大量鸦片，运往成都、重庆、宜昌销售，再为红军买回枪支弹药、药品、布匹，并为红军聘请医生、修枪工匠等有实用技术的人才。

对处在众多敌人层层包围之中的红军来说，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部队的生存更重要的了。鸦片现在全世界都认定它是毒品，这当然对。但从中国的历史看，鸦片在旧中国流毒极广，早已成为公开的生意。尤其是在军阀统治的地盘上，鸦片交易是完全合法的。就拿通江来说，小小一座县城，红军进入之前就有13家鸦片烟馆。而且通南巴广种鸦片，至少已有六七十

年的历史。在所有人的观念中，它是和黄金一样的硬通货，比银元还要值价得多，苏区白区满中国都能用。而钱，就走不出苏区的地盘。国民党政府的钱我们不准它在苏区流通，它要涌进来苏区的经济就会被搞垮。所以苏维埃政府就用自己的钱来做交易。我们的钱可能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因为苏区金属、纸张奇缺，我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的钱，是用布来做的。有一串（相当于一串铜钱）。两串，三串的，最大的币值是一元。上面印得有镰刀、斧头、红星和拳头等图案标志，还有川陕苏维埃政府的印章。这些年有不少成都重庆的文物贩子跑到大巴山来收购，一张布条条钱卖到了几百块钱。我们的布条条钱进入不了白区，买枪买子弹买药品，就必须拿鸦片去换。

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是总部的后勤部经理处。大量作战急需的军需物资都是这些同志通过袍哥大爷们拿鸦片到重庆、成都、宜昌那样的大码头换回来的。

红军的侦察员也经常化装成袍哥，和他们一起外出，伺机搜集情报。

当然，袍哥并无政治信仰，所以反复无常者有之，暗中通敌者有之，红军势大时，他们主动接近红军，甚至争先恐后地为红军做事，而红军势弱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又会反戈一击，配合进剿川军向红军进攻。

我中有敌，敌中有我，当时复杂激烈的斗争形势就是如此。

我这里要讲的是袍哥中的一个英雄。这个英雄绝对是货真价实的，不仅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心中拿他当个英雄看待，组织上也最终认定他是个真英雄，1987 年 4 月 21 日，他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追认为革命烈士。

此人姓张，名小川，在红军进入川北之前，他便早已是名震大巴山地区的一个大名人了。

张小川生长在巴中与南江两县交界的光雾山中。他父亲有田有树有房子，家里还长年雇着几个扛活的黄泥巴脚杆，在当地也算得个殷实户。光雾山方圆数百里，山峦起伏，峰岚层叠，自古是土匪猖獗之地。因防匪患，本地人几乎家家习武。张小川自小就与村里几个半大孩童伙在一起使枪玩刀，舞拳弄棍。稍大一点，就常和朋友们背上猎枪，唤上撵山狗，去深山老林里十天半月地泡着，无数的野物死在他那管越练越精的枪口下，可他也几次差点被野物撕碎。

1917 年春月里，张小川在家里举办完了 18 岁的生日酒，又和两个要好的伙伴进了林子。岂料光雾山匪中枭首黄大爷率领匪众，下山抢掠，将村子里的男人杀尽，牲畜、女人、财物、粮食一并掳走，还点起火来，将满村夷为一片平地。张小川的老娘和妹子，也被掠上了匪巢朝天寨。

待三位汉子数日后归来，村子早已是惨切切冷清清一片废墟。嗷嗷一通大哭，草葬了亲人后，三位汉子探明缘由，恨得眼洞子冒血，发誓要报这血海深仇。

那日破晓前，三人三枪三把刀，趁着浓浓山雾向朝天寨摸去。行至半道，忽闻山道上蹄声密脆，张小川三人立即隐入路边芭茅丛中，待三骑匪近身，突然蹿出杀了三匪，得了枪马，剩下一个年轻匪娃跪地求饶，从他口中得知大部土匪已下山抢掠，只有匪首黄大爷和四五亲

信留在寨内。问及老娘妹子，方知已被土匪轮奸至死。张小川一声惨叫，抽刀猛劈，将匪娃一分为二。随后，变得如野兽般凶狂的张小川率领两位弟兄，乘快马旋风般冲进寨子，将措手不及的几名守寨土匪射杀，然后手刃黄大爷，将几具尸体全数斩为碎块，扔进老林子让鹰叼兽啃。

消息传开，张小川立即成了当地山民景仰的英雄人物，众人纷纷携上刀枪前来归附，拥戴他组织了山民自卫武装。巴山各县的袍哥，也都派人来邀他加入公口。张小川入得袍哥，声威更甚，赓即率兵出战，再袭朝天寨，将数十名土匪全部斩杀，得枪 30 余支。人多枪多，张小川的名声也日益远播。

不料，这竟引起附近士绅民团的嫉恨，纷纷造出谣言，诬陷他聚众造反，并频频上书巴中县长何维野，恳请急速派兵剿灭。城里商界财团，也一并出动，推波助澜。

何县长曾留学日本，是个不满 25 岁的新派人物，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对光雾山情况也有所了解，惜乎顶不住地方上倾巢而来的巨大压力，只好改剿为抚，期为做做样子。

谁知差官并不听他招呼，上了朝天寨，仗势欺人，向张小川要枪要马，并追缴杀匪所获财物。

官府不能剿匪保民，山民自己奋起将土匪消灭，反倒有罪，这是什么天理王法？张小川一条铁打汉子，怎能咽下这口恶气？据理力争，无奈差官飞扬骄横，盛气凌人，一怒之下，张小川将差官割去双耳，撵下山去，索性反了他娘的。

何县长招抚不成，只好派兵征剿，300 官兵在民团配合下，围打了 3 天 3 夜，才攻破朝天寨。张小川被活捉，余下山民，非死即伤，仅有少数落荒逃散。

张小川被押解到巴中县城，关进了县衙死牢，时过数月，不仅迟迟未被推向市曹开刀，反而被款之以好酒好肉相待。

原来，这个中缘故，就在何县长身上。

何维野敬重张小川是条好汉，又无法贸然放他。正在这时候，英国人在重庆招募华工前往欧洲作战勤人员的消息传到巴中，何县长顿时心生一计。待一切安排妥当，那日三更时分，何县长差两位心腹径直往死牢中，将张小川带至巴中河边。

张小川双手被反缚，见状自忖必死无疑。岂料，何授一两位心腹将他手上绳索解去，送他上了一条早巳备好的篷船，竟伴他放舟南去，直抵达县。途中，这两人才把实情向他和盘托出。此系何县长精心安排，让他漂泊海外，逃出一条性命。然后再以看守不慎，被张小川越狱逃跑为由，搪塞地方。

听罢，张小川心中恰似倾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麻一起翻腾。两个心腹把早巳办好的招募合同与预付的三月薪金交与他，等船到达县码头，两人才与他告辞，赶回巴中复命……

1916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也宣布参加英、法等国组成的“协约国”（美国在

中国之后才对“同盟国”宣战）一方，向德、保、匈等“同盟国”集团作战。由于国力羸弱，武器窳败，并未派出一兵一卒。但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却仍然被西方列强当作了战争资源，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了前线。“协约国”商议决定，由英国与俄国出资，招募中国劳工到欧战西线与东线作战地后勤人员，主要承担运伤员、挖战壕、搬运粮秣弹药等事。

张小川被招募到了西线。与他同行的总共有 15 万同胞，他们先被集中到威海卫，进行训练、编队、装备，然后分期分批登海轮经日本大孤，再渡过太平洋、经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进入大西洋，到达英国的利物浦，再跨越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比利时战线。

虽然合同上明确规定华工以及与华工有着共同命运的印度锡克族人、安（越）南人、埃塞俄比亚人同为“非战斗人员”，这些来自各国的劳工的待遇也比士兵相差甚远，可是在法国、比利时、伊拉克的无数条战线上与士兵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这些劳工们在战线一旦被德国人突破的时候，却不得不拿起武器投入到战斗中。

张小川福大命大，那么多华工死在了西线上，他在枪林弹雨的生死场中闯荡了将近两年，不仅没死，还由于表现勇敢，具有号召力，被英国人提拔为“四道”（即营长。华工在威海卫训练时即被废去姓名，每人手腕上用机器套上一个钢箍，上面编有号码，彼此皆以号码相称。然后被编为 15 人一篷——一座帐篷住 15 人——三篷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篷、排、连、营长手分别发给印有一、二、三、四道黄杠的红布条，戴在袖口上），在战斗中数次受伤，却终于活了下来。1918 年“同盟国”投降后，他才作为国家的有功之臣重返祖国，衣锦还乡。不仅用大把的英镑在巴中城里置房买屋，而且让人感到稀奇的是，他还学会了一口洋腔，能和天主教堂的英国牧师阿伦“叽哩咕噜”地摆龙门阵。继何维野之后上任的县长在大街上见了他，也都笑脸相迎，赶着和他握手。

稍后，张小川前往重庆创办盐号。继而创办钱庄、火柴厂和玻璃厂，随后又在自贡创办盐业。

1928 年，张小川当上了巴中袍哥“义字”公口上的龙头大爷。

## 2、双雄之死

红军进入川北之际，巴中县城里的不少大户绅粮纷纷逃往重庆、成都，达县躲避。妻兄劝张小川携家眷暂往重庆避难。小川慨然道：“跑的人作恶多端，害怕红军来了收拾他们，所以不跑不行。我们为啥子要跑？张家自发达以来，多年修桥铺路，造福桑梓，扶贫怜弱，行善积德，从未欺压过邻里百姓，有的做生意，有的办教育，没有一人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里当官，红军不会难为我们的。”

果然，红军占领巴中后，不仅从未收拾他，反而对他优礼有加，待若上宾。红军先后驻巴中的最高军事首脑如邝继勋，如许世友，均成了他的好朋友。

张小川此人之了不起，并不在于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过去，而在于红 4 方面军撤离川北以后。

红 4 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之前，总部机关集体搬迁到了旺苍老城。张主席把张小川请到旺苍他住的观音阁，设宴款待他。并要他在红军撤离后，以反动面目出现，首先在反共阵营中站住脚根，然后相机帮助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张明恩领导巴山游击队。

张小川慨然应允，而且果真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红军一走，各路川军以及胡宗南、萧之楚、孙蔚如的蒋氏嫡系部队疯狂涌入大巴山，大肆围剿追杀刘子才部，随国民党军队回来的还乡团，杀未随大部队撤走的苏维埃干部、赤卫队员、伤病红军以及红属更是杀红了眼。加之我们在撤离之前大搞“左”的一套，极大地伤害了苏区群众的感情，过去一些曾经拥护红军的群众也都站到了反动军队一边。

可怜刘子才那 1000 多兵马，哪儿能抵挡得住？接连遭到重创后，只得远避深山，以求先将队伍保住以后再谋发展。

在游击队最困难的时候，张小川遵照张主席的指示，与敌为伍，而且多次率领民团，配合川军对游击队的围剿行动。但是，在围剿中，他却经常派人给刘子才通风报信，并为其密送弹药等。

而刘子才派出与张小川秘密联络的，就是他手下的侦察大队大队长管青山。

1935 年冬天，刘子才部 400 来人被围困在九子岭上，此时山中已是冰天雪地，游击队弹尽粮绝。张小川借围剿为名，多次派亲信将枪弹藏于山上，并组织亲信，将粮食与盐巴装在楠竹筒中，为游击队送去。

这年的 11 月 27 日，在川军与民团的合力进攻下，红军游击队终于被击溃，刘子才与管青山等 7 人突出重围，逃到箐箕湾红属蒋炳全家中。刘子才全然不知，他最信任的管青山已经在外出侦察时落入川军旅长杨猷轩手中，并已叛变，被杨猷轩派回游击队中作内应。

当此游击队全军覆没之际，却被管青山当作了他向杨猷轩邀功请赏的最好机会。

当夜，他策动了 3 名游击队员叛变，并借口查哨将一名忠于刘子才的队员用短刀杀死。可这名队员被杀时却大声吼叫起来，惊动了刘子才，其余叛变队员一拥而上，用锄头将另一名忠于刘子才的队员以及房东蒋炳全一家全部挖死，然后将刘子才五花大绑，连夜送给杨猷轩邀功。

由于管青山叛变，张小川也落入了杨猷轩手中，张只求速死，对自己帮助红军游击队之事和盘托出。杨猷轩顾忌张小川在袍界中的地位和威望，对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以图让他在报上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曾“误入歧途，为虎作帐，现迷途知返”等等。

通、南、巴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则关于杨猷轩威逼张小川的民间故事：

张小川被押出大牢，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在牢中得知，自他被抓后，杨猷轩已经抄了他的全部家产，自己的宅院已经成了杨猷轩的参谋长、也是刚刚上任的国民党巴中县长饶兴

文的衙门兼公馆。自己满门老幼，也被关进了大牢。

走进厅堂，张小川看到一张红木嵌大理石面的圆桌上摆满了美味珍馐。主人是饶兴文，陪客只有一位，就是川军 21 军少将旅长、北路“剿匪军”总指挥杨猷轩。

下人端上一只瓷盆，饶兴文站起将盆盖揭开，只见一只硕壮的金色乌龟静卧清汤之中，8 只雪白的花球在四围绽放。

饶兴文得意地说道：“小川兄知道的，旅座恐怕就没有品尝过了。这道‘霸王别姬’，是我巴中第一名菜。霸王者，乃产于巴河之金龟也。这龟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八只花球，全是鸡肉做的。这鸡，也非一般家养，而是大巴山中老林子里的锦毛青杠鸡，其味鲜美滑爽，也是一绝。来，请尝尝，请尝尝。”说着，边殷勤地给杨猷轩、张小川布菜。

这“霸王别姬”果然鲜美可口，杨猷轩边吃边夸赞，张小川也挟了两筷子。

此时，张小川置身于自己昔日家中的客厅里，睹物思亲，触景生情，真个是百感交织，心潮难平。他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小川老弟，”杨猷轩说道，“你这一辈子，漂洋过海，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才创下了这样一份家业，赤匪是干啥的？就是专门杀你这样的有钱人，共你的产，拿给干人享受，我硬是搞不明白，你怎么也会和共产党搅到了一起？”

张小川道：“我和红军相处两年有余，他们对得起我，我也不能做忘恩负义之徒。”

“中毒太深，中毒太深！你看看通江的王平阶那帮绅粮，过去对赤匪巴心巴肠，还把自己的祖屋都捐献给红军办医院，可最后咋样？张国焘逃跑之前，还不是下令把他们全都给弄死了。赤匪没有下你的黑手，不过是为了利用你罢了。”

张小川道：“立身世间，各人有各人的情份，各人也有各人的仇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杨旅长，人各有志，不能强勉……”

饶兴文赶忙抓起酒壶，给杨、张二人斟酒，口中连连道：“喝酒，喝酒，我们边喝边谈。”

蓦地，后院里传来一声凄厉悠长的惨叫。

“嗒”的一声脆响，张小川酒杯坠地，跌得粉碎。

两双眼睛立即落到他脸上。

杨猷轩笑道：“老弟也算是漂洋过海出生入死的好汉了，怎么竟让一女子叫声吓成这样……哈哈，饶县长，后院里是怎么一回事啊？”

“嘿嘿，旅座，我的一个小妾，因昨夜里犯了过失，我手下正在教训她。”

“哦，小妾夜犯过失，是不是犯了红杏出墙之过？”

饶兴文故意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道：

“惭愧，惭愧。”

杨猷轩大笑道：“怎么？还真让我瞎猜到了？”

张小川听他二人对话，双眼发直。

窗外，女子的惨叫之声持续不断。

杨猷轩不悦地说：“这种贱货，杀掉算了，还教训个啥？”

饶兴文偷瞥一眼张小川，将脸移向杨猷轩说道：“昨天深夜，小妾在她房中与一野汉子幽会，被我手下发现。这贱货色胆包天，竟敢在我府中干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我当然不能容她。不过，一刀杀掉，那就未免太便宜她了。我已下令手下将她拴在毛竹梢上，悬空吊她个十天半月，让蚊叮虫咬，日晒雨淋，将她慢慢变成一具枯骨。”

张小川倒抽一口冷气，紧咬牙关，额上冷汗直冒。

杨猷轩看在眼中，却佯装不觉，对张小川道：“如此新鲜别致，饶老弟，我们倒可要饱一饱眼福啊。”

饶兴文愕然道：“旅座!”

杨猷轩率先起身：“看看无妨，看看无妨。你说呢？小川老弟。”

张小川木然站起：“啊……啊啊。”

后院里，其情惨烈。

几名警丁将两株碗口粗的毛竹强压下来，两名警丁正将一年轻女人的双臂牢牢地捆缚在两株毛竹梢上。

女人看见走近的张小川，尖厉地哭喊起来：“丧尽天良的饶兴文！你杀了我，让我死个痛快!”

饶兴文快步走到女人跟前，阴毒地笑道：“死，没那么舒服。我要把你吊在天上，看着你如花似玉的身子慢慢变以一具白骨。放!”

警丁们猛然松手，那两株毛竹带着巨大的反弹力“嗖”地一声将女人拔地而起，直上云天。

“啊——！”女人骤发一腔撕肝裂肺的惨叫。

张小川冲杨猷轩吼道：“杨猷轩，你他妈的好歹毒……”

杨猷轩忽地沉下脸喝道：“姓张的，我好言好语地劝了你这么久，你还是四季豆不进油盐，今日这样让你父女见面，我也知道歹毒了一些。不过，我现在只要你一句话，你把屁股坐到我们一边，我马上把你的一家老小全放了，要再执迷不悟，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张小川不顾一切地对着杨猷轩、饶兴文喊道：“你们快把她放下来，要杀要剐，你们冲我来，由我一人承担！”

即便如此，张小川依旧不答应投降。

这段故事，是经过民间演绎的，具体情节不一定真是这样。但张小川宁死不屈，则肯定是千真万确的

12 月 5 日，张小川与被俘后“十次苦刑犹骂贼”的刘子才，被杨猷轩下令用爪钩钉在木板上，开膛破肚，掏心挖肝，死得极为惨烈。

解放后，刘子才被第一批确定为革命烈士，而与他同时遇难的张小川则是在他死后的 52 个年头后，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

## 第十章 结婚进行曲

刘湘请出刘神仙，欲以神仙法力来击败“真命天子”张国焘手中的“神兵”……“刘神仙竟负‘剿匪’全责，并屡发滑稽可笑怪诞不经之命令，使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大胜之后，红军未婚指挥员成了“抢手货”……张国焘情人杨岳卿之死。

### 1、“神仙”挂帅

红军越战越强，不仅严重地震撼了四川军阀的统治，也使正在亲自挂帅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心惊胆颤，又于 7 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督办”，拨给他军费 200 万元，万余枪支和 500 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北红军的“围剿”。

而此时的刘湘，正与他的叔叔刘文辉争夺主川大权。他坚持“剿赤必先安川”，百般推诿，迟迟不肯就职，蒋介石除了干瞪眼，也真拿他没有办法。

直到九月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见“安川”目的已经实现，这才以四川军政大权集于一

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政令”的高调，在成都就任“剿匪督办”。在就职仪式上，蒋介石特派何成浚前来监督。刘湘在就职通电中宣称：“赤匪犯川，时逾半载，征讨久稽，至令凶焰重张，通南再陷。今幸内争敉平，各军咸归，谨拜新命，择日前驱，誓扫赤氛，用奠邦国。”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向红 4 方面军大举进攻。

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 6 路，10 月 15 日，他发表邓锡侯为四川“剿匪”军第 1 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 2 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 3 路总指挥；杨森为第 4 路总指挥；王陵基为第 5 路总指挥；刘存厚为第 6 路总指挥，纠集全川大小军阀兵马，分 6 路向川北杀来。

6 路围攻阵线，西起广元、经蓬安、岳池，东迄城口，长逾千里，使用了 20 余万兵马，另外还出动了拥有 5 架飞机的飞行队助战。依刘湘看来，满以为稳操胜券，不料各路纵队各怀鬼胎，步调不齐，行动参差，红军抓住这一契机，突然于 10 月 19、20 两日攻占宣汉、达县，顿使刘湘慌了手脚，立即飞往重庆为参战部队打气。

自 6 路围攻开始以来，非刘湘直系部队，大多不愿硬拼，希图避免牺牲，保存实力。

1934 年 5 月 13 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时，为了想使各军尽皆听命，决定在南充设立“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示意各路总、副指挥公推刘湘的神仙军师刘崇云为委员长，指挥前方一应作战事宜。

刘崇云赓即于同月 25 日在成都宣布就职，6 月初即穿上道袍，手执拂尘，坐上八乘大轿，前往南充军前赴任。

统率 20 万大军的最高前敌指挥，居然是一位连枪也不曾放过的江湖术士，现在的人听起来可能会难以置信，可是，事实确是如此。

这位刘崇云，是四川威远县人，本务农，后习星相之术，颇能观风望色，口滔滔若悬河，早年在乡间测字算命，于 1920 年左右创立了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两年后，竟发展道徒上万，分布于威远、荣县、富顺、内江等地，一时名声大震。甚至还有许多中上层人物，也主动地投到他的门下，其势力发展到成都、重庆、万县，四川军阀也多被网罗。

稍后，刘崇云由威远来到重庆大码头，设馆于两路口，弟子环侍左右，听其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俨然是太白星君降临凡间。生意鼎盛，问津者须先挂号，挨号而入。

那时刘湘不过还是个团长，闻知异人莅临重庆,也前来为自己的前程算上一卦。

刘崇云见他相貌堂堂，然容色郁郁，知有未尽如意之事梗于胸中，矍然起立，叫刘湘转过身去，为他摸骨，摸了半天后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

刘湘心中暗喜，却装着不解说：“请仙师明白指点。”

刘崇云知此人已入彀中，遂屏退弟子，延入内室，答以；“不出三年，巴山蜀水，均为阁下管领，但一遇草头，（暗指蒋字），届时调虎离山，必失所得。愿好自为之。”

刘湘双手抱拳，深深作了一个揖，说道："日后若有寸进，决不忘先生今日所教。"

此后三年，果然如刘崇云所言，刘湘仕途顺达，因军功屡得升迁，当上了 21 军军长，驻防重庆。为回报刘崇云，刘湘在市区江家巷购得一富家巨宅，修葺一新，延请神仙迁入，并正式加入了"孔孟道"，得刘崇云赐道名玉宪。上行下效，刘湘手下的一帮将领也由刘湘介绍入加，如潘文华赐名玉羽，唐式遵赐名玉美，王陵基赐名玉豹，王缵绪赐名玉道，范绍增赐名玉泉。刘湘部营长以上军官，约有百分之九十皆为道徒。其他各军首脑，也多拜刘崇云为师，如邓赐侯赐玉齐，刘文辉赐名玉猷，杨森赐名玉勇，还有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谢德堪等，无一不是刘崇云膝下弟子。

那一年川东久旱，田土龟裂，百姓苦不堪言。刘湘遂向刘崇云商求雨之策。

刘崇云道；"这有何难，只要我登坛作法，三日之内，必将普降甘霖。"

其实他心中何尝有数，既然豁出去了，只能任造化的安排，冒险一试了。遂在朝天门设坛布罡，作法焚表，在万众围观中手挥拂尘，口中念念有词，到了第三日的夜晚，刘崇云跪在蒲团上不起，前来关心的刘湘见天上疏星点点，银月高悬，毫无下雨的迹像，不由有些着急，悄悄问他有无把握。

刘崇云道："天道不负至诚，我福薄，不能感动上苍，要是将军也能跪蒲团一宿，定能成功。"

于是，刘湘也伴着刘崇云在蒲团上跪下了。

岂料到了凌晨时分，乌云疾走，狂风怒号，稍顷，果真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老百姓夺门而出，尽呼"神仙下凡"。

刘湘也认定恩师绝非凡人，将他请到身边，参予军机大事。

刘崇云过去从未读过兵书，上任后临时抱佛脚，每日细读《孙子兵法》13 篇，一年以后，也能初解。被众军帅视为刘伯温一类异人。

刘湘那时虽据有巴渝之地，却怀有吞并全川的野心，而他的叔叔刘文辉时任 24 军军长，坐镇成都，控制着富绕的西川小天府。

刘湘觊觎西川已久，遂与田颂尧、邓锡侯分道进攻，战线长达 900 余里。用刘崇云之计，三军沿成渝大道北上，围而不打，俟其师老而后突击。刘文辉主力驻扎毗河，与省垣成倚角之势，兵精粮足，以逸待劳，胜券可操，以为刘湘远来，利在速决，没想到刘湘联军围城三月，并不急着进攻。自己的大批川土无法运出川境，导致饷源发生问题。而执掌刘文辉军需者又恰是刘湘之妻弟周成虎。大战在即，官兵战场拼命，却拿不到兵饷，愤懑之气，充塞兵营。

刘崇云此时又对刘湘献上一计："今日之事，须厚托大舅暗中使力，不妨三复《孙子-

用间篇》而后熟筹之，则破省城犹如破瓜一般，一月之内，便可拿下。”

刘湘遂派高参魏伯炎装扮成上海某土行巨商，混入城中，将 30 根金条送给周成虎。周则暗将刘文辉部兵力分布图回报刘湘。刘、邓、田联军以精锐猛攻成都，不费吹灰之力，便将成都夺占，刘文辉则率残部败逃西康。

此次大胜，刘崇云功不可没，更为刘湘所倚重。全军上下也对他顶礼膜拜。刘崇云之能深得人心，除了享有“活神仙”之佛光遮体，他个人也有不俗操守，一是不贪财，二是善体众，三是能礼人，故虽不居实职而握有实权。

刘湘对刘崇云执礼甚恭，见面必叩拜，尊之为军师，言听计从，刘崇云俨然成为川中最高权势人物。军政界中人为求达而奔走其门者，为数不可胜计。当年省外报纸曾责刺刘湘是“以神治军，以军干政，以政扰民”，实属公允之论。刘湘成立模范师，名义上由刘湘兼任师长，而实际则归刘崇云负责统率，故一般都称该师为“神兵”。于是人皆讥讽刘湘拥有陆、海、空、神 4 大兵种。这次刘湘用刘崇云来指挥军事，原以为各军首脑当惟师命是从，自能收统一步调配合作战之效，必然大功告成。不料神仙出台，不仅未能挽回危局，反而导致崩溃，这是刘湘始料不及的。

刘湘果真是完全相信刘神仙吗？事实也不尽然。刘湘的师长许绍宗解放后这样叙述的：

“刘神仙欺骗奸诈，以迷信蛊惑人心，如说刘湘迷信神仙，不如说刘湘需要神仙。他对刘崇云执弟子礼甚恭，神仙赐道名为玉宪，他还把所属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叫去拜老师。当时我赐名玉英。这种强迫相信，不少军官甚为不满。唐式遵就在刘神仙被授与指挥全军大权时公开提出：‘各将领仍愿意直接受总司令指挥（其意即是不愿受刘崇云指挥）。’刘湘说：‘你不相信，你就自己把脑壳上的帽子揭下来。’刘湘对刘崇云的态度如此，他的部属谁敢道半个不字？就是非 21 军的各路总指挥，你借神仙打整我们，他们也借神仙对付你，以诈对诈，大家都一窝蜂拜倒在刘神仙门下。如杨森为了迎合刘湘，特地做了一乘黄缎轿子来迎接刘神仙到南充上任。刘湘原想以上下隶属再加师徒关系促使各路协同作战，共同对付红军。但这仅仅是他的幻想。刘神仙对军事一窍不通，在指挥作战时闹出不少笑话……”

王陵基在前线与红军作战，刘神仙夜观星相，以此决定行军路线，王陵基依命行事，不料刘神仙指定给他的路线沿途皆是悬崖绝壁，一怒之下，遂抗命不遵。刘神仙鉴于王陵基曾当过刘湘的老师，只好向远在成都的刘湘告状。刘湘接信给王陵基发了十几个电报，要他遵照刘神仙的命令办事。王陵基也接连回了刘湘十几个电报叫苦，并言：“刘妖之命，誓死反对！”为了维护刘神仙的权威，刘湘不得已竟然将王陵基的 5 路总指挥撤了。

严啸虎反刘神仙则更为激烈。严向刘湘上书请杀妖人刘崇云，书中有：“……妖人之用心，如邓、田、杨、李等不听他的话，则挟你以制他们，你不听他们话，即挟他们而制你。此种阴谋，实足以误川亡军而有余。闻其最近致各将领信之电，率多‘已令甫澄照办’之语。……请杀妖人以谢 21 军，否则四川将来之糜烂，将百倍于今日”等类语句。此信送到总司令部，见者无不大吃一惊，因为其时刘神仙气焰正炽，连王陵基不听招呼都被罢了官。大家都认为严啸虎不识时务，恐将招致不测之祸，可是严啸虎不仅未获罪，上书不及一月，刘湘竟将他调升为“剿匪”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谋处长。

通过此事，可见刘湘心中自有分寸，说他真信神仙，尚无定论，说他玩弄神仙，以神治

军，则近似之。

如此一个只会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怎是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军指挥员的对手。

面对三倍于我之强敌，红军仍然采取了“收缩阵地，保存军力，创造机会，待机歼敌”的战略思想。

战斗从 1933 年 12 月中旬刘湘发起第一期总攻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年的 6 月，红军才在万源县的大面山最终与敌血战 70 余日，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然后，集中兵力发起全面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 6 路军阀，刘湘在一败涂地之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声称这次围攻：“耗资 1900 万，官损 500，兵折 8 万，此后难复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本兼各职。”

9 月 2 日，住在庐山上的蒋介石复电慰勉刘湘，盼即复职，电文中说道：“兄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矣。日前丙乙、真吾（即邱甲、傅常，为刘湘派驻武汉、南京全权代表）到牯晤谈，关于购置生银及发给准运无烟火药护照诸端，均已具体解决。……然战线过长，部队复杂，自属事实难踄，中正年来赣、鄂督师，实有同感。故兄之痛苦，亦惟中正知之最深。除电令川中各路将领恳切告诫，责以此后务须禀承兄之命令，协同动作，不得再存观望，盼兄即行照常视事外，并电复成都诸名宿，川军‘剿匪’失利，中正正统筹挽救中。”

7 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谓：“宣、达吃紧，三、四两路纵队复连电告急，百孔千疮，补苴无术。湘 10 日决驰赴前方视察整顿，期能暂时稳定，以待中央处理。”

13 日，刘湘亲赴开江，当即轮番召集将领及各级军官训话，分别加以慰勉、鼓励。此后前线便完全转为守势。

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公报》对此次失败之由，有如下一段报导：

“此次川中各军失利，‘匪’势坐大之主因，实由于不知军事而妄为计划、胡乱指挥之刘神仙（崇云）致误。刘原属巫教，籍四川威远县人，尝为人算命看相，刘湘极信奉之，以其为军师，并兼领三旅之众（模范师）。无论内战、‘剿匪’，靡不由刘崇云观天星、卜吉凶。近年崇云竟轰动全川，虽妇孺亦莫不知有刘神仙其人。至今夏初，竟公然充当‘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剿匪’全责，并屡发滑稽可笑怪诞不经之命令，故迭攻万源不克，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

当前方败绩传到成都以时，成都方面的官绅们紧急召开会议，筹商挽救危局之计。会上，很多人对刘崇云大加指责，要求以总司令部名义致电刘神仙，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前方各部也纷纷抨击刘崇云毫不知兵，指挥不当，以致全军溃败。还有众多军官联名电请刘湘杀刘崇云以安军心。刘神仙本人已是威风扫地，夹着尾巴逃回了成都。

这时，刘湘的 21 军参谋长郭昌明自渝来蓉晋见刘湘，谈到刘崇云的问题时，竟当面与

刘湘争执起来，气得刘湘掀翻了茶几，拂袖回家，次日即出走重庆。临行之前刘湘亲笔给刘神仙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我没有把四川的事情办好，业已离开成都，我和你它日远道相见吧。"信未封口，叫副官长蒋捷先亲自送去。

为此善后督办公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经郭昌明、严啸虎等人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认定：这是因为刘湘过去曾拜刘神仙为师，不好意思直接叫他滚蛋，所以才离开成都，以便假手我们将他赶走。于是就命人前去正告刘崇云，限令立即出境。刘崇云见众怨交集，刘湘又故意远避，自知难以立足，也就只好悄悄地溜回了老家荣县。

2、大舞台上的"三花脸"

红军与刘湘在大巴山上打得炮火连天，如同在天地之间搭起了一个硕大无朋气势恢宏的大舞台，在密锣紧鼓连天炮火声中敌我双方的统帅将军兵兵卒卒逐一登台亮相，

在这场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大戏中还有一个唱三花脸的角色不能把他漏过不提——这就是在前面已经几次晃了几下脸儿却没来得及细讲的王三春。

王三春出生在陕西省镇巴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巴山人，不单活在世上时把坏事做绝，连人，从娘身上一落下来就是个稀罕怪物。那模样，人见人怕，脑壳像根两头小中间大的棒棰，眉浓如漆，豹眼如铃，眼睛一鼓，恰似阎王殿中的门神恶鬼。王三春父亲早亡，母亲杨氏是个跛子。由于母亲身残，管教无方，乡邻又多因其长得丑陋凶恶而对他多有歧视，造成他心理变态，所以从一开始拉竿子绑肥猪，他的个性就十分地怪僻凶暴，以下手狠毒而远近闻名。只要落到他手里，就只盼着快些死。家道稍为殷实点的人家，一提到他的名就变脸变色，心子"咚咚"跳。因为巴山人都晓得，王三春发明了一种能把人整得痛苦不堪生不如死的方法，那就是"步步高升"。

所谓"步步高升"，就是把酒杯粗的青杠树一头削尖，一头栽进地里，一排由低到高栽上七八根，然后把绑来后舍不得出血的"肥猪"拖上来，三扒两爪剐个精光，让手下架起，肛门首先对准满尺长的一根桩子用力往下压。使木桩插进人的五脏六腑。这还是最短的一根，余下的，则"步步高升"，最末一根，已经快有人的脖子高了。王三春并不让人马上"高升"，而是以燃香定时，一炷香燃完，再接着往上"升"。那种惨景，那种惨叫，能把第一次见识这场面的人吓得昏死过去。再啬吝的人，升不到第三根桩子，就算是王三春开口要自家婆娘，也巴心不得马上乖乖献上。而实在无钱的，那就只有"步步高升"下去，直到被整得血古淋当，一命归阴。

王三春心狠手辣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一个赶场天的上午，王三春请专门为他跑成都重庆等大码头卖鸦片买军火的红旗管事蓝兮贞在南华宫饭庄喝酒，突发奇想，问蓝兮贞："这辈子老子啥子酒都吃过，你见过砍人脑壳来下酒的么？"

蓝兮贞道：“这种事我没见过。莫非大哥你见过？”

王三春说：“我也没见过。妈哟，我们今天就来玩回胖格，砍个人脑壳喝一满杯酒，看要砍多少个脑壳才把我两兄弟放得翻？”

王三春一声令下，保镖们提起手枪冲出饭馆，把大街两头扎断，片刻工夫就抓来百十号人，关在大堂里候斩。

两个土匪头子兴致大发，划拳打码，哪个输了就提起大片刀离桌，逮到脑壳就砍。砍完了又坐下碰杯喝酒，哭喊声惨叫声和哈哈大笑声中，20 颗人脑壳骨碌碌滚到了地上，一直喝到二人头重脚轻，挪不动步了才罢休。

二十年代末，王三春成立了“巴山哥老会”，自称总舵爷，尔后逐渐将川陕鄂十余个县的浑水袍哥舵把子收入门下，成为众匪之首。1929 年，刘存厚曾派一个师去剿他，反倒被打了个落花流水，从此威名更是广传川陕鄂三省几十个县市。他在老巢镇巴城里自设制币厂，自设铜元局，分别印有“陕西镇巴县”与“四川巴山”字样。钱物从不上交，财政独立，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成为陕西、四川两省政府之心腹大患。

红 4 方面军进入大巴山前夕，王三春时来运转成了香饽饽，陕西杨虎城为拉拢他，任命他为“川陕边游击司令”，四川田颂尧也收买他，委任他为“镇巴游击司令”，王三春来者不拒，摇身一变成了双料“司令”，两边的军饷照收不误。但这山大王从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他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抛出“受招不受编”。只要陕西四川两省政府准时把钱给他送来就高兴，钱没到手，干脆不理，仍依靠自己的袍哥队伍，经济上自立，军事上独立，政治上不讲体统。王三春特重江湖义气，他的口号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不抢穷，抢远不抢近，兔子不吃窝边草。”

1933 年 7 月，王三春向田颂尧提出，我都已经是你手下的司令了，光给军饷不行，还要给武器弹药。田颂尧回他，要武器可以，我这里多的是。不过，你得首先到红军手里去抢，抢了多少条枪，我再按数奖给你多少条枪，照实算。王三春清楚自己虽说号称有一万兵马，却大都是使刀弄棒之徒，上得了阵的长枪说起来有千把条，也不过是些破旧的汉阳造和“川麻杆”。土匪都喜欢手枪，数量不少，可手枪射程短，火力弱，吓唬地主老财和保安团可以，和正二巴经的红军拉开架式打硬仗，那就是找死。

王三春明知田颂尧是逼他去老虎头上捉虱子。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道上的规矩，更经不住枪支弹药的诱惑，只好硬着头皮上。他知道两河口镇上驻扎得有红军，专门派了几名探子去侦察详细情况。某日夜里，王三春亲自挑选出 200 名胆大心狠的弟兄去偷袭红军。另外几百个弟兄在镇外的山头上接应。王三春知道机关枪这玩意儿打起仗来最顶用，所以红军的机枪连成了第一个偷袭目标。机枪连住在徐家酒坊里，土匪们凌晨 4 点钟摸进镇子，先用短刀放翻了红军哨兵，溜进了徐家酒坊。进屋时，红军睡得正死。可先摸进屋子的几个土匪不晓得机枪咋个使，抓起脚架就往外拖。红军被惊醒过来，有的抓枪，有的赤手空拳就和土匪干了起来。红军的机枪一响，土匪们就只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了两条腿，镇街上河滩上“哗啦啦”倒下了一大坝。埋伏在山上接应的土匪见势不妙，怕做了枪下之鬼，也转身跑了。红军乘势猛追，从两河口追到简池、三元、镇巴，一直把王三春扑爬跟斗地撵到了湖北地界才停。

亲自和红军交手，这是王三春吃的第一回大亏。可他没有汲取血的教训，反而咬牙切齿地发誓要为被红军打死的弟兄们报仇。田颂尧发兵攻打万源时，他又带了 3000 人赶去助战。这回表现不错，田颂尧奖励他 500 支步枪，50 支手枪和 1 挺捷克式轻机关枪。尝到了甜头，王三春心气陡涨，居然在冉家坝拉开架式和红军大打了一仗。就在自己快顶不住时,派去催救兵的手下惊惊慌慌赶回来报告,说田颂尧的部队已于头一天夜里悄悄溜了,丢下他和红军单挑.王三春气得吐血,这下才明白田颂尧是想借红军之手除掉自己，赶紧下令跑他娘的！一天一夜跑了 200 里,一呼隆缩回了镇巴老巢.

此后为贪图军饷，也不把事情向田颂尧挑明，故意装憨得宝，吞猪吃像。田颂尧派人来催他出兵作战,他头上包块帕子,装出副病萎萎的模样起不了床.实在是逼急了,也就派几支散眼子队伍到火线上去朝天乱放几枪,只要红军一露脸儿,几爷子扯伸脚杆就跑.

正在这时候，张国焘乘机派人来作王三春的工作，还送来大批酒肉、斗笠等.王三春马上回赠了 20 支驳壳枪和 1 万发子弹.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红军只打川军不打王三春,王三春则保证在红军与川军作战时保持”假打”态势。王三春毕竟在黑道上闯荡了半辈子，说话也还算数,不仅再没有找过红军的麻烦，相反还帮过红军的忙。

同年 9 月，王三春让田颂尧逼得莫法,带着 2000 兵马到指定给他的作战地点黑虎山去挖壕布设阵地,准备装模做样地堵截红军.红军前锋刚一出现,王三春和弟兄们马上挥手叫红军快些走,使红军前锋和后面的大部队得以顺利东进,攻占了宣汉县城,出其不意地狠狠杀了刘存厚一腰枪.

这一仗,田颂尧最终被红军大败,王三春一边庆幸自己聪明了一回，上岸得早，没有跟到田颂尧一起翻船。一边趁火打劫，不惜和田颂尧撕破脸皮，把大竹县城从田颂尧的驻军手中夺了过来。

等到刘湘指挥 6 路大军卷土重来,王三春原本想呆在大竹城里坐山观虎斗。没想刘湘此次发了狠，不但要剿“赤匪”，也顺带把这个祸害地方多年的心腹大患除了。

王三春这下毛了，一发“公片宝札”，川陕鄂边境十余县的浑水袍哥舵把子一齐响应，在各地召开声势浩大的“反蒋讨刘大会”，吼声震天动地，比正在全力反 6 路围剿的红军还搞得雷火震仗。此后也真刀真枪地和刘湘的清剿军过了几回招，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打得这帮乌合之众树倒猢狲散。王三春一看不妙，赶紧扔下大竹县城逃回了镇巴老巢。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得知大巴山出了这么个无法无天杀人如麻的恶魔,给正率参谋团在川督战的贺国光下了一道手谕，命他务必将此人拿下。

贺国光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康泽，康泽带领一支精锐的别动队随贺国光进入四川，主要是从事特务活动，既侦察四川军阀的政治态度与动向，也潜入川陕苏区搞情报。康泽先后派出几批特务潜入镇巴县城，几乎是有去无回，大都被王三春砍了脑壳.其中有两个聪明能干的好不容易才打进王三春的总部，最后仍然被查了出来。

王三春来到坝子上，欣赏这两个来取他性命的家伙如何尝尝他发明的“步步高升”的滋味。当木桩穿进两人的肛门时，王三春大笑道：“老蒋的手谕，在老子的地盘上买不到几根

红苕！”

然而，狡猾过人的王三春也有漏蹄之时。他有 7 个老婆，全都是他抢来的。五姨太邱秀云最漂亮，也最受他宠爱。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乖俊柔弱的女人，最终会要了他的老命。

邱秀云当初被抢来时，男人一家被王三春斩尽杀绝，那时她就存了杀王之心，决意舍命为夫家满门报仇雪恨。奈何她一个弱女子呆在这虎狼窝里，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这女人虽手无缚鸡之力脑壳却是精灵，终于让她谋出了一招借刀杀人之策。她原本有几分姿色，向王三春最为倚重的红旗管事蓝兮贞飞上几个媚眼，就弄得那家伙意马心猿不能自禁。王三春不在的时候，也就敢凑到邱秀云身边摸下她的屁股，捏把她的奶子，过过手瘾而已，宽衣上床，他暂时还没那胆子。

邱秀云身陷虎穴数年，好不容易才逮着这个最有可能帮她报仇的角色，自不会就此罢休。几番主动进攻，终于激得蓝兮贞宽衣脱裤，乖乖入彀，发誓要“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邱秀云当然不会说她杀王三春是要为夫家报仇，而是说王三春丑如恶鬼，奴家好生可怜，此生若是能嫁给蓝兮贞这样相貌堂堂的英雄好汉，即便死了也不冤枉。

蓝兮贞隔三岔五地让这漂亮女人恭维着、撺掇着，果真也就死心塌地地上了邱秀云这条船，绞尽脑汁要除掉王三春。他长期在江湖上跑，脑壳机灵，深知要在王三春的老巢除掉他，那是百死一生的事……很快，便让他想出一个绝好的主意来。

不久，王三春又让蓝兮贞弄几十担鸦片到成都去卖，然后买批军火回来。蓝兮贞到了成都，却悄悄投了刘湘，并向刘湘献上一着生擒王三春的妙计。

此时刚巧蒋委员长从重庆飞到成都，与刘湘商议派遣川军出川抗战事宜。刘湘知道老蒋曾下令贺国光缉拿王三春这件陈年旧事，贺未完成，如今这功劳落到自己头上，自然雄心勃勃，不惜血本要把这事做成。对蓝兮贞庄重承诺：只要这回能彻底放翻王三春，死的奖 2000 大洋，活的奖 5000。

1939 年 4 月 4 日，蓝兮贞派人报告王三春，说这次买的武器太多，叫他赶快率弟兄们前来剑门关接应。王三春心下欢喜，带了一个团的弟兄赶到剑门关接武器。

想那剑门关，是何等凶险的地方？山脉东西横亘 200 余里，72 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直插霄汉。连山绝险，独路如门，素有“剑门天下雄”之说。进入关内长约千米的幽深峡谷之中，可见前人留下的“天下雄关”、“第一关”、“剑阁七十二峰”等碑刻。剑门关楼，翘角飞檐，雄踞关隘，气势恢宏。

而刘湘派出一个精锐师，早已借夜色掩护秘密进入关前的山头林莽之中，将剑门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

王三春哪知是计，12 月 28 日下午带着弟兄们风尘仆仆赶到，穿行在幽深峡谷之中，抬头已能看见那屹立于片片浮云之上的巍巍关楼，忽闻两侧枪声震耳，满山林丛中陡响起一片

喊杀之声。

王三春心中明白过来，大叫一声“老子载了!”

31 日，王三春被押到成都。刘湘赶紧打电话向下榻在北校场军校行营里的蒋委员长报喜，没想老蒋让他把王三春带过去，他要亲眼看看这个杀人恶魔究竟长了副啥模样？这着实让刘湘动了一番脑筋，他知道王三春这种连天王老子也不怕的惯匪，自知必死，说不定会当面弄出点让老蒋不愉快的事来，岂不让自己在委员长面前下不了台？遂招来几名手下紧急一番商量后，决定借鉴古代刑罚拶子的原理，用楠竹块做一副“围脖”，缠绕在王三春颈子上，只要他一张嘴巴，架住他左右两臂的卫士立即收紧攥在手中的绳头，让他发不出声来。一切办妥，刘湘才亲自率人把王三春送到行营。

蒋介石也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了，可一待王三春出现在他眼前，还是惊了一下，对身边的张群、贺国光等人说道：“这家伙是人吗？人怎么会长出这样一副厉鬼的模样？”

老蒋把王三春痛斥一番后，喝令立即处决。

一代枭雄，就在成都北校场墙根下饮弹毙命。

3、红军未婚指挥员成了“抢手货”

粉碎刘湘 6 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 4 方面军兵强马壮，根据地也扩展到 22 个县，成为川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却出现了新问题，许多从老苏区入川的红军干部，想趁战事稍停时成个家。各部队在男女问题上违规犯纪的现像也时有发生。

在此之前，红军中采取的都是“严堵”的态度，抓住了，惩罚得相当厉害，还有少数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栽了大跟斗。

红军打了大胜仗，这种事情逐渐多了起来，虽然采取了撤职、关押、枪毙等手段，也未能完全禁绝。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红军以万人之旅，连战连捷，战无不胜，仅一年多时间，便打下了一大块地盘，，兵多将广，粮弹充足，在广大苏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像。另一方面，在有着浓厚封建迷信思想的老百姓看来，凡人的军队要取得这样了不起的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神的角度去找答案，张国焘不是经神仙点化后脱胎换骨回来的“真命天子”吗，那么，“真命天子”麾下的兵马，自然就是一支“神兵”了。

这样的传说肯定也让同样是一脑壳封建迷信的军阀们深信不疑，倍感恐慌，要不，这次刘湘咋会不惜重金从成都请来人称“活神仙”的刘崇云，羽扇纶巾，坐着大轿用他的神力来退张国焘的“神兵”？最终，连“活神仙”也被“真命天子”张国焘的“神兵”打得落花流水。由此一来，老百姓对红军官兵，也就不仅仅是热爱，而且是实心实肠地仰慕、敬畏、视

若神明了。

正因为如此，当时被查处的一些包括恋爱在内的“桃色案件”，大都是女方或是其父母居于主动地位。

当然，我这里说的红军都是军官，而且是级别不低的军官。普通士兵，是绝对不允许谈情说爱的。前进剧团有个成都来的男娃娃，吹拉弹唱啥子都来，能干得很，人也长得很精神，就是因为控制不住情绪和团里一个女娃娃悄悄好上了，还把女娃娃肚子弄大了。那时正逢大肃反，两个人晚上都被弄出去砍了脑壳。

红军军官想结婚，就非得往有女人的地方凑才行。红军里只有妇女独立团，一千多号全是清一色的女人，而且平均年龄还不到 18 岁。连营级以上的干部，在这些小姑娘眼睛里都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早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而 4 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更成为她们青睐的对像。

由此一来，妇女团一天到晚就门庭若市，执闹非凡。

那时张琴秋刚从总医院调到妇女团当政委，妇女团属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张琴秋和团长曾广澜常常要去向总指挥徐向前汇报工作。

一天向徐总汇报工作时，两人就把这事也一并汇报了。

曾广澜说：“徐总，还有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有些干部一天没事总爱往我们妇女团跑，分明想是找老婆哩。”

徐总当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少人都晓得他妻子在鄂豫皖大肃反时被抓了，如今死活不知，徐总是孓然一身，有的女干部借汇报工作，总喜欢在徐总面前多呆一会儿，说几句工作之外的话。可徐总为人严谨，总板着一张青瘦的脸，只谈工作，不听闲话。让那些“图谋不轨”的女干部们只好悻悻而去。

徐总问两位女军官怎么办？

张琴秋手一摊，满脸无奈地说：“我和广澜有啥办法，婚姻自由嘛！”

徐总一听急了：“没办法？你那妇女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

徐向前接连说出几个“不准”。但张琴秋却不怕这位女干部敬而远之的总指挥，与他辩论起来，说革命包括妇女彻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就是婚姻自由，不准结婚可以说，不准谈情说爱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违反人的本性。

徐向前说军人与老百姓、与地方工作的妇女不同，哪有那么多的自由。必须从严治军，部队才有战斗力。

张琴秋提出，士兵不准结婚这条严格执行，干部结婚可以加以年龄限制，大龄的可以，年龄小的不行。

曾广澜补充说：“除了琴秋谈的年龄，还可以订出许多条件来限制嘛。要一律不准谈情说爱结婚成家，红军队伍里不全是和尚尼姑了？今后扩红，还有哪个愿意来当红军？”

两位女官敢在徐总面前坚持己见，竟然对政策的制定起了作用。

鉴于胜利后出现的这一特殊情况，总部为了淡化老红军的思乡情绪，稳定部队，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红军的形像，索性变“堵”为“疏”，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增进军民间的感情，遂下发了允许红军指挥员与当地群众结婚的文件。并在年龄、军龄、职务上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

这个文件一下达，顿时在军队和地方上同时掀起了一股结婚的高潮。红军中的年轻未婚军官们一下子成了“枪手货”，地方上的姑娘都以自己能成为一名红军家属而自豪。

一种新的倾向，马上又掩盖了旧的倾向。

总部群工部、妇女独立团、各级苏维埃政府中的妇委会，成了最忙碌的部门。为红军指挥员介绍配偶，是他们最迫切、最中心的工作。

红军中具备结婚条件的军官大都行动起来了，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很快就有了结果。

在这样一股热潮的冲击下，总部原来作出的有关规定有时也被突破。一些接近条件边缘的同志也不失时机“蠢蠢欲动”，等到生米成了熟饭，上级部门制止也不太得力。

但有一点控制得很严，对红军家属实行的是供给制，合乎条件的同志结婚后，家属由苏维埃政府逐月按定量发给粮食保证生活，而接近条件的同志结婚后，就非得等到达到条件后家属才能享受供给。

我手下有个班长叫洪安清，在通江大比武时夺了个第一名，是全军有名的神枪手，30出头了，还是条光棍。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公园林子里，说：“排长，我也想结婚。”

我有点吃惊，说：“结婚？总部有规定呐。”

他说：“规定我晓得的，虽说我级别差得远，可我年龄超出一长截，军龄也差不太多，扯长补短，也说得过去的。排长，我知道你在黄秘书长面前说得起话，求求你，帮我这个大忙吧。”

我想了想，估计没啥大问题，便笑着在他胸膛上擂了一拳，问他女方是谁。

洪安清咧着嘴唇笑了，既高兴又有点害臊地说：“嘿嘿，我一说你就晓得了，就是经常

给总部伙房送菜的张大爷的女儿。”

这女人我当然认识，她叫张昭容，就住在公园后门外面的炮台山下。红军来之前，她男人在茶馆里赌钱同人打架，让人用板凳砸死了。孤儿寡母，只好回到娘家，和她爹种菜为生。这女人配洪安清确实相当，二十四五岁，脸上有几颗不碍事的白麻子，模样不丑，人也勤快。

我给黄超说了，黄超没反对，这样，洪安清才和张昭容结了婚。

洪安清后来是在杂谷脑被飞机炸死的。张昭容命长，解放后被政府安排到供销社的饭馆里当服务员，活到 1987 年才过世。她享受到了“烈属”待遇。我落难时，有次还到她家里去看过她。她没嫌弃我，悄悄把我带到她家里去，煮了块腊肉，杀了只鸡招待我。我跟她讲了洪安清是咋个死的，她一边听，一边伤伤心心地哭。

4、雷明珍与许世友

雷明珍也是在这一年的春天里和许世友结婚的。

张琴秋从王坪总医院调到城里任妇女独立团政委，就把雷明珍也带了过来。

而那时的许世友已经是红 4 方面军中赫赫有名的战将，尤其是在保卫万源的至关重要的一仗八面山大血战中，他这副军长率领 25 师打出了大威风。张主席对他极为器重，打了胜仗后，不但把他提升为红 4 军军长，而且在红 4 方面军发布了禁酒令的前提下，特许嗜酒如命的许世友可以喝酒。

而这时的许世友，正沉浸在丧妻之痛里。

许世友的第一次婚姻是在新集之战威名远播之后。刚刚升任营长的许世友率一个由 12 名战士组成的手枪班回到了阔别 3 年的故乡许家奞。

这一年，许世友 25 岁了，对于一个终生保持着农民本色的将军，在 70 年前即使有一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欣喜之情，也是极为自然的。此番回家，许世友仅住了 4 天，在母亲的主持下，他与 3 年前便已订下婚约的朱家湾姑娘朱锡明成了亲。迎娶新娘的场面不仅热闹，而且别开生面。吹鼓手在前引导，新郎许世友穿长衫，戴礼帽，胸前红绸披挂，骑一匹高头大马，满脸喜气洋洋，抬花轿的是红军士兵，两旁前后还有全副武装的红军士兵护卫开道。

4 天后，许世友离开了许家奞归队，直至 1985 年逝世后，遗体才重回故里入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有人在报纸上见到了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名字。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许家奞，许世友的母亲和他那从未见过面，已经 19 岁的儿子许光高兴得快发疯了。

几天后，许母托人给许世友写了一封信，让许光揣着，千里迢迢去济南城里寻找亲生父亲许世友。

父子俩的见面是极富戏剧色彩的。

1950 年的三月，一身粗布衣衫的许光终于来到了陌生的济南城，一路打听，到了军区大院门前。

就在卫兵询问情况时，一辆轿车从外面缓缓驶进了大院。

轿车停下，从车上下来了许世友。

值班军官赶紧上前："报告司令员，河南新集来了一个年轻人，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许世友一听从家乡来的，大步向许光走去。

"小伙子，我就是河南新集的许世友，你找我有什么事？"

小伙子愣愣地瞪着他，仿佛不相信似地问："你真的是新集许家洼的许世友？"

许世友听他说到许家洼，也有些吃惊了。

"这还能有假？"

小伙子喜泪汪汪地叫了起来："你要真是许家洼的许世友，就是俺的亲爹！"

许世友浑身一震："你……你有何凭证？"

"有，俺有奶奶写给你的信。"说罢，许光急忙从怀中掏出奶奶托人写的信，交给了许世友。

许世友看罢信，泪如泉涌："儿啊，俺就是你爹，俺就是你亲爹啊！"

许光就这样走进了父亲的家庭。

令他感到吃惊的是，父亲的家中有他不认识的一位"母亲"和几位"弟弟妹妹"（那是许世友的第三位妻子田普与田普所生的儿女）。

正因为第一次走出大别山的许光对此不能理解，故而，在父亲急急地向他询问亲人情况时，他有意隐瞒了母亲早已改嫁的情况，说她早就死了。

跟着，许世友安排儿子参军后，又派人去新集接来了他的老母亲。

从母亲口中，他才知道了结发妻子还活着，只不过早已做了他人之妻。

许光后来从海军部队回到新集县武装部工作，除了替父亲侍奉过不惯城市生活坚持回老家的奶奶，同时，也有照顾他母亲的意思。

自红 4 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后，徐海东的 25 军奉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但因敌众我寡而无法坚守，许多在战斗中被打散了的战士也辗转来到了川北。从他们的口中，许世友得知自己的家已被还乡团烧毁，母亲妻子也遭杀害。许世友痛不欲生，跪地遥拜。后来，在妇女独立团团长曾广澜的热心帮助下，许世友才决定和雷明珍重新组织家庭。

这一年，新郎许世友 28 岁，新娘雷明珍刚满 17 岁。

我也随张国焘前去，“旁观”了这次婚礼。

这天晚上的新郎倌有两位，何畏与许世友，新娘则是与蔡贵芬与雷明珍。地点在通江县城的天主教堂，那地方当时是红 4 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

陈再道、陈锡联几位师长故意和许世友开玩笑，说：“你这和尚能讨老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为啥不能？”

许世友笑呵呵大声说：“老子这个军长是打出来的，谁叫你几个龟儿子不好好打仗，打到我这个位置上，不就可以结婚了吗？”

长征路上，许世友带兵打仗，雷明珍与总部机关一道行军，两人虽然不在一起，雷明珍对许世友仍然体贴入微。在甘孜，为对付德格土司和军事涅巴夏克刀登的骑兵武装，张国焘任命许世友担任了红军骑兵司令，许征收了大批牛羊供部队食用。雷明珍便将羊毛收集起来，抓紧点滴时间搓成毛线，为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5、杨岳卿之死

张主席没有在川北结婚，因为他在上海已经有了老婆杨子烈与儿子张海鹰。但是，很快他也有了一个相好。

为张主席找相好的，就是后来以托派罪名被王明下令枪毙了的黄超。

黄超总管此事，群工部周成云部长负责找人，我则负责对外保密。我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直到后来杨岳卿牺牲，除了张主席身边的人，外面、下边的人几乎没人知道“杨秘书”和张国焘的关系。

有一天，黄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布置了用他的话来说是“特殊而光荣的任务”。

我记得黄超当时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张主席日理万机，非常劳累辛苦，需要一位

温柔体贴的女同志来给予主席特殊照顾，这是革命的需要等等。

黄超给周成云定下的标准很明确，年轻、漂亮、丰满型的、皮肤要白净，个子要高。因为张主席身高体胖，皮肤又白，如果找个矮小的，皮肤不好的配不上。政治上绝对可靠，有文化最好，没文化只要前面几项条件合格也可以。

周成云找人找得很辛苦，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从南江城里找到了一个在达县师范学校读过书的姑娘。

这人的名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惜我不会形容……套用一句戏里的词，倾国倾城、国色天香。她叫杨岳卿，16 岁。只有一点不理想，政治上不能保证完全可靠，她父亲是南江城里一个开百货店的老板，属于非无产阶级。但黄超见了人觉得十分满意，表态说，政治上可以慢慢培养嘛，进了革命熔炉，生铁也能炼成钢。

杨岳卿马上剪了辨子，穿上军装，，安排到黄超手下当秘书。没过多久，政治上培养得差不多了，黄超和我还介绍她入了党。

杨岳卿白天在在黄超手下当秘书，晚上则和张主席在一起。时间一长，在总部机关的上层小圈子里已经不是秘密。

杨岳卿是个大好人，没一点坏脾气，见人就是一张笑脸，说话像小乌儿唱歌一样好听。张主席非常宠爱她，我们对她的印像也很好。

最让我们这帮卫士难忘的是，杨岳卿没来之前，每天清晨当班的内卫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儿，就是给张主席倒尿罐。从我们住的木楼到旁边的公共厕所，大约有 100 多米的距离。这个活儿虽然算不得啥，但毕竟一个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战士一手提尿罐，一手握涮把，一路上碰见机关里其他的同志，总有些不太好意思。杨岳卿一来，就把这活儿揽了过去，把我们 4 名内卫彻底“解放”了。

不仅如此，张主席的饮食起居，也基本上由杨岳卿承担起来。

张主席的生活是相当有规律的，在通江公园里那两年时间里，他每天 6 点钟准时起床，洗漱后，吃两个荷包蛋，然后在公园和文庙之间跑步 10 来分钟，上楼办公。到 8 点钟，再吃早饭，一般是稀饭下包子馒头，喜欢用泡嫩姜芽子、霉豆腐做菜，或者干脆就吃一大碗泡蛋面条。中、晚两餐，一荤一素再加个汤，不是川汤肉就是丸子汤。张国焘牙不好，喜欢吃肥肉，荤菜离不开烧白、红烧肉，烧蹄膀，粉蒸肉，一样样换着上。素菜多系黄豆芽、豆腐和各种时鲜青叶菜。每顿 3 小碗饭。陪同进餐的有杨岳卿，或是来总部开会、或是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一些高级首长。张主席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上午九十点钟时喝牛奶一杯，晚上十时吃银耳羹一小碗（通江盛产银耳，算是相当普通的东西）。

当然，这是专门给张主席开的小灶，所有生活必需品后勤部经理处是给予充分保证的。

在红 4 方面军中，伙食是有区别的。总部就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一般干部吃大灶，机关里的负责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吃中灶，而少数几位高级首长则享受小灶。当然也有例外，

像过草地、翻雪山时，就官兵一致，全部吃干粮了。

我现在要郑重地强调一个问题，张国焘后来背叛了革命，从政治上理应受到共产党的唾弃。但在当时，他并不是像现在某些文章里所写的那样，生活作风一团糟糕，三天两头地叫卫士把红军剧团里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喊到他卧室里左拥右抱。他的卫士就归我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红军铁的纪律根本不允许。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正二巴经的中国工农红军。不能因为张国焘在政治上走到了对立面，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进行妖魔化。这样做，只能表明写作人的心态不健康！而且这不仅仅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对我们红 4 方面军众多的女战士更是一种污蔑和侮辱！如果我们脱离当时处于残酷的战争生活中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一定要用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要求张国焘的生活作风的话，那顶多就是他已结了婚，就不该再有杨岳卿！

大撤离时，有的相好跟着红军走了，有的相好留了下来。留下来的相好虽然不多，解放后却给地方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她们三个五个邀邀约约地跑到北京城里找家旅馆泡着，不见上一面就不回通、南、巴。后来政府一律让她们享受“红属”待遇，才把她们安抚下来。

杨岳卿是跟着大部队走的，但她的命运却非常悲惨。

1935 年 5 月底，北撤途中，为迎接中央红军，总部离开刚打下不久的北川县城，移驻理县杂谷脑镇（今理县县政府所在地）。机关全住在一个土司家的两进大院子里。院坝上的几根大树子长得郁郁葱葱，把太阳差不多都遮完了。房子的四面墙壁全是用疙丁暴鼓的毛石头砌成的，檐板上画得花花绿绿的，都是佛教故事里的人物。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方面军指挥所则设在离杂谷脑 20 多里的家山寨。

就在到达杂谷脑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的中午，我正到驻地外面检查警卫，突然听到天上有嗡嗡的声响，心里猛地一震，立即大喊：“快跑，快疏散！敌机来啦！”

我一边喊，一边往张主席的住处飞奔而去。

对于敌机空袭，我们在江油地区就领教过几次，幸亏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而对我们搞警卫工作的同志来说，地面上的敌人尚不可怕，怕的就是这让我们没办法防的东西。

这时总部院子里一片混乱，不少人提着枪，抱着文件冲出门，却呆呆地望着天上，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电台的蔡威副主任冲着我嚷：“何排长，我跑了，电台怎么办？”

蔡威是福建省宁德县蕉城镇人，也是我们红 4 方面军中一个极难得的宝贝，所以历史应当为他写上一笔。1924 年，蔡威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同济大学一边学习无线电技术一边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后来被吸收进了中共中央特科无线电小组。

蔡威和我们在一栋楼上相处好几年，一口福建话说起来仍让我们连蒙带猜。但业务上绝对是电台的顶梁柱，他不仅能装电台，修电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更是他最擅长的本领。田颂尧纠集 6 万兵马向我们发起“3 路围攻”时，蔡威破译了田部的密电，在空山

坝战役中，一举歼敌 13 个团。战后，蔡威受到总部特别嘉奖。在粉碎刘湘“6 路围剿”的作战中，蔡威不但破译了四川军阀的密电，而且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电报，使红 4 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宣达、笔架山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3 年 1 月，担任红 4 方面军总部第 2 电台台长的蔡威开始对敌电台进行技术侦察工作，是年 2 月，破译敌军密码获得成功。1935 年，红 1 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为了把截获破译的敌军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蔡威总是每天傍晚就守在电台旁，戴上耳机开始呼叫，经常是叫到第二天凌晨才能和中央红军联系上，发出电文后又收拾电台开始行军。毛泽东在延安曾说：“红 4 方面军电台有功劳，在我们得不到情报的时候，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云、贵、川、湘一带遇到困难时，他们及时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蔡威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做出了特殊贡献。1934 年 8 月，总部再次授予他特别奖。正因为蔡威的突出贡献，所以深受张国焘器重。在通江时，电台那帮人只有他和宋侃夫在生活上享受特殊优待，和我们一起吃中灶。其他的电台人员，就只能每日三餐敲着饭盅子上食堂吃大灶去。

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冲着他就是火爆爆一嗓子：“想死你就不要跑！”

殊不知我这一吼惹恼了他，他果真不跑了，回到屋子里把同志们的被子抱来，一层一层地搭盖在电台上，自己则坐在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副视死如归，与电台共存亡的样子。多亏敌机没往他头上下个蛋，让他后来有机会在我们面前拍着胸口吹大牛：“啥叫大将风度？你们学学我，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我敢说关公、赵子龙转世也做不到。”可惜这位有趣的人物仍旧没能活下来，第二年春天我们滞留西康高原时，他不幸也染上了伤寒。病重期间，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都守在他身边。傅连璋和苏井观两位红军中最有名的医生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可没有药品，最终还是被伤寒夺去了生命。死时，他才 29 岁。

我刚跑到后院张主席住所门前，看见苟贵德、洪安清等一大帮警卫员已经簇拥着张主席出来了。

张主席没戴军帽，神色有些慌张。

我急坏了，冲警卫员们大喊：“冯吉升，苟贵德，你们快保护张主席从后门上山，躲到林子里去。这里交给我！”

这时候，敌机已经到了头顶上了，一共 4 架，声音响得吓人，不断往下丢炸弹，还在天上绕着圈圈用机关枪往下面扫射。四处爆炸声、枪声不断。镇子上好多地方已经起了火。

张主席已经到了后门处，又忽地扭过头来冲我焦急地喊：“小卿呢？杨岳卿到哪里去了？何福圣，你马上去找到她，一定要把她保护好！”

我突然想起，刚才我出去检查警卫时，看见杨岳卿端着装有衣服的木盆到河边去了，还和她打了招呼的。

我马上回答：“张主席，她到河边洗衣服去了，我马上去河边找她，一定把杨秘书保护好！”

冯吉升他们簇拥着张主席出去了，这时，院子里已经空无一人。敌人的炸弹丢得更凶了，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爆炸，一道道烟柱像大树一样立了起来，热浪打在脸上发烫。飞机像大乌一样在低空肆无忌惮地乱蹿，用机关枪向地面目标疯狂扫射。

我啥也顾不得了，杨岳卿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张主席交差？我冲出院门，冲向笼罩在浓烟烈火中的小街，飞踏踏地向河边跑去。

等我跑出镇子，敌机已经飞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射击声全都没有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短暂的恶梦！天空蓝得耀眼，阳光分外灿烂，清凌凌的梭磨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可是镇子在燃烧，河滩上响着阵阵撕肝裂肺的惨叫和嚎哭。

我看见河滩上到处是受伤的人和死去的人，有红军，也有汉藏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没想反倒成了敌机驾驶员的活靶子。

我突地感到一阵心悸，立即冲下河滩，鼓着眼睛四下看，扯开嗓子大喊："杨秘书！杨岳卿——你在哪里？"

"排长，杨秘书……她死啦！"警卫员陆本奎在水边哭着向我叫道。

我赶紧冲过去，看见地上躺着两具血糊糊的尸体，女的是杨岳卿，男的是洪安清。

那一刻，我感到我的脑袋像颗地雷一样"轰"地炸开了……

"排长，我们刚刚跑出总部，张主席就叫我和洪安清到河边来找杨秘书……人倒是找到了，可他两个……都挨机枪打死了。"陆本奎说着就大哭起来。

我也难受得哭了……死人的事，天天都有，我们不怕，可死的不应该是杨岳卿，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待人又那么好。

最难受的，当然是张主席了。埋杨岳卿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张主席哭了。在杂谷脑逗留期间，张主席为杨岳卿写了很多的诗和词，后来在总部撤离杂谷脑时，他带着我们去梭磨河边与杨岳卿告别。

那一天下着小雨，警卫员们远远地站着，就只有我为张主席撑着伞。

那是一个小小的没有墓碑的黄土堆（因怕追敌掘坟毁尸）。尹中富和苟贵德还去四周采来野花，扎了一个小花圈，摆在坟头上。张主席泪水涟涟，向着坟堆深情地说道："小卿，你安息吧，等到革命胜利以后，我一定会来杂谷脑看你的。"然后，他把他为杨岳卿写的诗词拿出来，用火柴点燃，一页一页地全烧了……

张主席是真心喜欢杨岳卿的，杨岳卿要不死，说不定以后真地会成为张主席的夫人哩。后来在延安时，杨子烈从上海带着海威来了。我心里就常常暗地里想起杨岳卿，说实话，两人真没法比。

6、贡品与婚事

我在通江一共呆了将近两年时间，亲闻、亲历、亲见的事不少，但记得清楚的却不是很多。因为警卫员的工作，不像作战部队，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事，几乎就没有我们的份。

不过，有两件事，我至今还忘不了。

一是吃贡品。

1933 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也就是川北苏区到处盛伟张主席是“真命天子”下凡的那一时期——通江南门外突然响起了锣鼓唢呐声，鞭炮也放得来雷翻阵仗。城中百姓听见，纷纷涌出门去看稀奇。只见这帮由二三十人组成的队伍之前，拉着一块很大的红布条，上面写着 8 个大字，“拥护红军，敬献贡品”，后面，两名汉子抬着一只似猪非猪，浑身雪白的小东西，那东西被绳子捆着，身上裹着一张写有“贡品”两字的黄缎，在两根长竹杆上一上一落，闪闪悠悠，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呜呜噜噜”的声音。小东西后面，则是一身穿团花绸衫，须发皆白的古稀老翁，高踞在滑竿上，嘴里叼着个黄铜水烟枪，满脸洋溢着喜气。

队伍让众百姓簇拥着，径向文庙大门口而来。

原来，这位老翁姓祝名庆笙，祖籍通江洛垭口，是前朝时候蜀中一位有名的人物，系前清特科拔贡，民国后又任过两年四川省咨议员，后因配合杨度等人鼓吹帝制，被逐出政坛，遂看破红尘，回故里深居简出，每日对着前朝皇帝灵位三拜九叩，余暇时光，便研究经史吟诗作赋，曾自费将诗集刊行于世，自娱自乐，颐养天年。

祝庆笙今日进城，是特地来向张国焘敬献贡品的。张国焘是“真命天子”这一流言传到洛垭口后，此翁比一般人更加笃信不疑。恰在此时，他的下人猎得一只竹溜，祝庆笙深知此物稀罕，自己舍不得吃，便扯旗放炮地送到通江城中，敬献给“真命天子”张国焘享用。

那天张主席正在木楼上主持召开一个高级干部会议，闻知此事后，担心给红军造成不良影响，没有接见祝庆笙，仅叫黄超秘书长去和他见了一面，收下了贡品，代表张国焘对他嘉奖了几句。

祝庆笙虽然未能亲睹“龙颜”，心中颇有一些遗憾，但仍然当着无数百姓的面，做出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样子，向着文庙大门恭敬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才坐上滑竿，返回洛垭口。

那似猪非猪的小东西被拴在伙房旁边的一根梧桐树下，绕着树子乱窜乱蹦。我们一帮卫士与参谋都不知这究竟是个啥东西。那一天正好省苏主席熊国炳也来总部开会，他过去是大巴山中有名的猎户，当然算得内行。散会后，他听见嘈嚷声过来一看，就笑呵呵说：“这东西叫竹溜，专吃楠竹笋子，只要它们一钻进楠竹林子，楠竹就会一片一片地发黄枯死。”

听了熊国炳的介绍，我们才知道，竹溜虽是害兽，味道却非常鲜美。大巴山自古便有“天

上的斑鸠，地上的竹溜”之说法。在封建时代，它是巴山官员向朝庭进献的贡品。竹溜浑身雪白，形状如出生月余的小猪，一般重约 10 余斤，像眼前这个上了 20 斤的，就更算是奇珍中的精品了。此物不但肉极细嫩鲜美，而且是大补之物，据说只要吃上两三片，浑身便会马上发热。

熊国炳还说，竹溜这东西很不好打，它的洞打得很深，俗话说“狡兔三窟”，竹溜之刁不亚于狡兔，它们的洞口通常有五六个之多。猎竹溜必须仔细地将洞口全部找到，否则，一洞之漏便会前功尽弃。

如何烹竹溜，难坏了张主席的厨师吴国荣。吴国荣原是郑州城中大餐馆“玉楼春”的大厨师，后被岳维峻聘为私人厨师，双桥镇战役，岳维峻被俘，吴国荣也落入了红军之手。因他系非军事人员，手艺又好，就安排他专门做小灶和中灶，每月发给 10 块银元做工资。

吴国荣那一年已经四十五六岁，虽然见多识广，生平却从未烹制过竹溜。为了把这道菜做好，他到通江城里的宝丰园等几家饭馆向厨师请教，后来决定分做两道菜，一是清蒸，二是红烧。

那天晚上，陈昌浩、徐向前也被张主席留下来共享美味。我作为警卫排长，也有幸分得一杯羹。那肉，雪白晶莹，拈在筷子上闪咚闪咚的，嫩得像豆腐一般，的确是我一生中忘不掉的一道美味。

卫士们无缘口福，于是便说，别人能打竹溜，我们为何不能？缠着我要抽个时间上山去打它几只竹溜回来。我也心有此愿，便带着不当班的卫士进了一趟山。我们 20 来个人钻进一片遮天蔽日的楠竹林，便根据熊国炳那日的指点，小心翼翼将洞口全部找到后，便迅速用茅草和泥土把洞口封堵严实，仅留一个比较好挖的洞来挖。锄头挖洞的声音惊得竹溜在洞内四处乱窜，它一会儿奔往这个洞口，一会儿又奔往那个洞口，直到几个洞口都奔完，知道无路可逃后，不肯坐以待毙，凭着一双利爪，满嘴利齿去拼命挖掘新洞图逃。于是乎，地面地下，人和竹溜展开了速度的较量，我们的锄头飞快地直往洞的深处挖去，一直见到洞内出现新土，洞口转向，就更加兴奋地往前挖。不久，便会听见洞里“噗噗”的掘土声。这时，我们迅即丢开锄头，拿起随身携带的一根轻便木棒，站在洞口之上，木棒高举，瞄准洞口，双脚猛踏地面，地洞被震得“唰唰”地直掉土，里面的竹溜便停止打洞，转身朝洞口奔来，原想趁它刚一露头，便一闷棒打下，不料竹溜矫灵异常，木棒还未落下，它巳飞窜而去，消失在丛林之中。卫士们心痛得直跺脚，说要能开枪，它就肯定逃不掉了。辛苦一天，我们连一只竹溜也没能打着。

第二件事，就是我在通江结了婚。

这里，我得先谈谈我们这个总部警卫排。

这个排一共 40 个人，全都是从作战部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都很能干，有的还有绝活。这 40 个人，实际上就是张主席的卫队。人人有坐骑，个个身挎 20 响的盒子枪，另配 4 挺捷克式轻机关枪。而张主席的贴身警卫，我们叫做内卫的，川北以及长征时期则只有 4 个人，除我以外，还有冯吉升，绰号“光棍儿”；尹中富，绰号“四根毛”；和绰号“幺妹子”的苟贵德。

我当时正好是新“官”上任，两月前原来的警卫排长叶南生调到余天云、李先念的红30军当团长后，我就接替了他的职务。

按照当时的实际对待，总部特务营的级别比野战部队高一级，而警卫排却没个一定之规，像叶南生，在张主席身边是个排长，一外放就当了个团长。

在扩红运动中，总政治部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使人民群众懂得了“翻身变乾坤，定要靠红军”的道理，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参军高潮。像苍溪县王渡桂花村一个组，当时 19 户，75 口人，参加红军的就有 32 人。像著名的三川区革命老妈妈孙佩兰，她动员丈夫、儿子、媳妇、女儿、全家 7 口人参加了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失去了丈夫、儿子、媳妇和两个女儿。就在这个时候，她成立了被服厂，把自己的被盖、衣服都损献出来，在她的带动组织下，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给三川区的 2000 多套红军服装。苍溪一县，有 3 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全国解放后，幸存下来的苍溪籍老红军只有 5000 人，其中在1965 年以前被授予军衔的苍溪籍将军，就有 8 位，他们是伍国仲、任荣、李明、李开湘、杨大易、吴忠、赵承丰、樊学文。

当然，扩红人数最多的还是通江。红 4 方面军进入川北后，置赤北、赤江、红江三个县和苦草坝、洪口两个特区。通江县城诺江镇成为了川陕苏区的“红色首都”。既然成了首都，各项工作就必须走在前面了。当时全县仅有 23 万人口，就有 5 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到全国解放时，仅幸存 600 多人。通江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傅崇碧、何正文、陈彬、吴仕宏、张显杨、张荣森、张荣政、朱仕焕、陈福章、邓仕俊等担任过全国各大军区、省军区主要领导的将军，都是在通江出生，从通江走上革命征途的。

在这股轰轰烈烈的扩红热潮中，我的老婆熊顺芝也参加了红军。那时她还差 20 多天满17 岁，在妇女独立团里当战士。她参加红军时，对革命还没有认识，一是图新鲜，因为自古以来通江这地盘上还从来没有女人背枪当兵的；二是找个能端饭碗的地方。自古军队大都是不要女兵的，可红军不同，专门成立了“娘子军”，大收女兵，穷山沟里的女娃娃也能像男人一样背枪吃粮，那可是从糠箢跳进了米箩里！

其实这也是通南巴地区特殊的情况造成的，因为这地方广种鸦片，鸦片既是商品也是货币，还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小娃娃头痛发烧，用鸦片熏一熏，马上就好了。所以男人普遍抽大烟，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也差不多全是烟灰，弄到部队里来第一件事不是训练而是要花许多工夫帮他们戒烟。所以当时的“双枪兵”，不单川军里多的是，我们红军里也有，不过要少得多，算个别现像。因为参加红军必须接受强制手段戒烟，参加川军则随便抽，只要荷包头有钱。而当地的女人大都不抽烟，而且平时在生活中承担着比男人更重更苦的体力劳动，所以一进部队就比抽烟的男人还利落，也好使得多。

洪安清和张昭容结婚没多久，我也动了心，以前一上床倒头便睡，现在夜夜做梦。有事无事地常往钟鼓楼妇女独立团团部跑，朝团长曾广澜大姐身边靠。没多久就被曾大姐看出来了。要认真论条件，我也不够，不过我是张主席身边的大红人，问题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解决。

曾大姐是个热心人，对我的事更是上心，很快就让我和熊顺芝见了一次面。地点是在钟

鼓楼妇女独立团团部曾大姐的寝室兼办公室里。曾大姐把我带进屋，双方简单介绍了一下，给我们倒上两杯水，冲我眨了个眼，就把我们丢在她屋里不管了。我见她长得高高挑挑，细眉秀眼的，心里乐意，她见我长得不难看，又很精神，就这样定了下来，而且认识两个多月后我们就结了婚。

更让我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的是，我结婚那天，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黄超、傅钟、曾传六都到警卫排来了。这么多大首长驾到，弄得我老婆和她特意从竹峪关赶来的父母兄弟诚惶诚恐，连手脚都找不到放处了。

## 第十一章 撤出通、南、巴

红 4 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是严格依照中央电令采取的行动，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最伤脑筋的是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旺苍县城的红军福利院里，至今还生活着一位苏联老太太……坚壁清野严重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王波师长痛苦不堪，只好设法欺骗上级。

### 1、放弃川陕根据地

反“6 路围剿”从 1933 年 12 月一直打到第二年 9 月，我军最后分别在东线的万源和西线的黄猫垭两大歼灭战中，毙伤敌 6 万多余人，俘敌官兵两万余人，缴枪 3 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 1 架，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刚刚粉碎了“6 路围剿“，兵强马壮的红 4 方面军却主动放弃了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川陕根据地，再一次踏上了长途征战之路。

为什么会这样？

中央过去的结论是“张国焘同志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发展为左倾即逃跑路线……。张国焘同志违背中央命令，不顾广大指战员的反对，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

这样的指责，显然悖离了历史的真实。

而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一，“6 路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并没有死心。又紧锣密鼓地部署对川陕苏区的新围攻“川陕会剿”。为彻底汾碎敌人即将发动的“川陕会剿”，红 4 方面军分别在毛浴镇和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 6 路围攻和地方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

为实施“川陕甘计划”，川陕苏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及工厂，陆续开始迁往旺苍坝（今旺苍县城老城区）。

第二个原因是：1935 年 1 月 22 日，刚刚经蔡威修好的一部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新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给红 4 方面军的一封电报，这份电报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后才得以解密。电报明确指示：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决定我野战军（即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 2 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联系。为使 4 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和川敌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不利。西线则田（颂尧）部内讧，邓（锡候）部将向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力单薄，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接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的进攻……”

正是这份电报，才使红 4 方面军的领导们得知江西红军和中央巳经脱离瑞金根据地，正向西行动。

这一消息令总部首长们大为震动，立即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应对措施。由于首长们认定中央苏区的丧失是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的表现，是红军的惨败，所以红 4 方面军刚刚取得的这一场大胜利也难以使首长们的心情振奋起来。

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责怪中央的情绪很大。陈昌浩就在会上气愤地吼道：“博古这家伙，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们打一个就跑了？”

张国焘建议检讨红 4 方面军今后的方针，他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的条件要求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苏区丧失后，川北红军即成众矢之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四川军阀肯定会联合起来，向川北进攻，以红 4 方面军目前的力量，是保不住苏区的。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遵照中央指示，主动向嘉陵江以西发起进攻，西出接应中央红军，与之汇合。

而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也与红 4 方面军巳经开始实施的“川陕甘计划”不谋而合。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川陕会剿”计划巳着手执行，先前入川的参谋团巳经进一步充实了力量，加强了对川军将领的监督。参予协调并参予指挥川军进剿。蒋还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陕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陕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会后，总部各部门便开始为撤离作准备。总部要求对中央红军失利以及中央苏区巳经丧失等消息严格封锁，强调中央红军是远比川北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为寻求更大的胜利，正

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红 4 方面军必须采取主动进攻行动接应中央红军，川北苏区可能暂时会忍受敌人的骚扰。

张国焘是大胜之师，而中央红军是大败之师，大胜之师不惜放弃地盘转战千里去驰援中央红军，张国焘可以在会上举出若干条冠冕堂皇令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且他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可是，我从张主席离开川北急于与中央红军汇合的表现，却隐隐地产生一种感觉：张主席当初是以戴罪之身到鄂豫皖走马上任的，最终鄂豫皖根据地却丢失在他手里，红军主力也丧失过半，他当然不好向中央交待。到了川北后，却连战皆捷，红军变得来兵强马壮，根据地飞速发展，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中央红军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离开了根据地，有着强烈领袖欲的张主席此时率领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去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汇合，既可表现“勤王”之意，又可以救世主的身份入主中枢，以军队作后盾加强他在中央的分量，提高他的地位。以张主席的个性和思想，以及他在党内的资历，他是不会甘心于独处一隅，拥兵自重的。

当然，张主席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明确地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在后面所要涉及到的种种表现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

红 4 方面军中的下层官兵和苏区群众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他们更多地宁愿把领袖人物想像成神而不愿把他们当成人。而在我这样的警卫员眼中，特别是高级首长的内卫心目中，这些领袖人物既伟大，也平凡，人所共有的优缺点他们也都有，只不过凡人百姓的优缺点不碍大事，而领袖人物的优点与权力一旦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魁力无穷，缺点一旦沾惹上权力，也容易造成一场灾难，有时甚至是大灾难。

比如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毛主席明明已经知道极左路线弄得全国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极左路线祸害无穷，下决心把文武百官召到庐山来纠“左”。可彭德怀一纸“万言书”让他勃然大怒，纠“左”马上变成反“彭黄张周”等人的“右”，毛主席的一口恶气虽是出了，可执政党也就因此错过了一次改正自己错误的历史机遇，还造成全国人口总数也大幅度减少。这样的事情让后人总结起来，就尤觉痛心！

所以我历来相信“英雄创造历史”这句话，虽然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大都出于谦逊和政治策略而不乐意承认这一事实。

如果我的感觉毫无道理，又怎样解释张主席后来与中央的分裂？难道他万里迢迢带着 8 万大军两万苏维埃干部和力夫找到党中央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毛泽东吵上几架，然后又带着这 10 来万人回头便跑？

应该承认，张国焘的神经还是正常的。

1934 年 12 月 27 日深夜，总部机关撤出了通江县城诺江镇，向着西北方向的旺苍坝而去。当我随着首长们回首那一片鳞鳞黑瓦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长达两年的时间。这块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鲜血，也留下了我们无尽的思恋……

2、在古城旺苍的日子

总部机关转移到旺苍坝之前，方面军总指挥部、方面军总政治部、西北军区政治部、川陕省委、省苏政府、还有大大小小的后勤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以及红军总医院都已经从通江和巴中搬迁到了这里。此后的陕南战役、广昭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也都是在旺苍坝指挥的。

那时的旺苍坝还仅仅是广元治下的一个小镇，一座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的古城，一下子涌进 40 多个军地领导机关，15 个红军团队，总数高达两万多人，旺苍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红军城。人多市面就热闹，街上十几家大大小小的饭馆面馆从天没亮到半夜一直开着门，上门照顾生意的大都是红军官兵和随部队转移的苏维埃干部，还有花钱招募来的大量随军力夫。

总政治部下了一个文件，废旧名旺苍，改称“列宁市”。但老百姓不习惯，你要说你是列宁市的人，连亲戚朋友都搞不清楚“列宁市”是个啥地方。绝大多数红军也是穿上军装的川北老百姓，所以这名称没能叫开。

人数比较多的彭杨军政学校，3 个月以前就搬到了这里。军校不在城里，要过河，在离城两三里路远近的灵溪寺。那是一个庙宇式的几进大院子，门口还立得有两尊石狮子。院子里的柱头很粗，气派得很。当时因何畏身体不好，为更好地照顾他，张主席就让他随总部医院一起行动，军校的校长由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代理。

张主席、陈昌浩、徐向前等首长经常去灵溪寺给学员们讲课。灵溪寺旁边的山腰上还有座建在山壁上的小庙，周围翠竹青青，环境十分优美，张主席和陈昌浩、徐向前有时讲完课就住在这座小庙里。还在这座小庙里召开过好几次高级军事会议。也让一些整天在前线忙于指挥打仗的高级干部在这里休息两三天。

总部机关在旺苍停留的时间很长，从 1934 年年底一直到第二年的 4 月。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旺苍留给我的印像十分深刻。

旺苍坝是座有着 1580 年历史的古城，宽街窄巷，胡乱缠连，房子古朴，庙宇祠堂也很多。4 年前我还和周明均、赵丰乐两个原 4 方面军的老家伙结伴去重游了一回故地。现在的旺苍城以东河为界，河西高楼林立，一派现代新气像，河东当年红军驻扎的老城好像早已被世人遗忘了。还是当初那样古旧邋遢，原汤原汁。我们沿着两边尽是老式铺面的狭窄小街穿行，先后寻访了沿王庙街、文昌街设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区政治部、4 方面军总指挥部、4 方面军总政治部、4 方面军总医院、31 军军部、川陕省革命委员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旧址。这些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地方除了门上钉有一块标识牌外，其它的若说有变化，那就是比我们驻扎在这里时更陈旧、更破烂，更不堪入目。一问为何如此，当地领导和管文物的同志异口同声叫苦连天，埋怨上面没拨款下来，他们也是手长衣袖短，许多事情是想得到做不到。还请求我们打出老红军的招牌，去上面想办法帮他们搞点钱下来。

现在的文昌街 168 号，那时候就是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此处地处老城区的北头，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陈昌浩和徐向前住一个四合院，院里有一个一二十平方米的天井。朝东一排青瓦粉墙的房子，窗户低矮。两位军事首脑就是在这排小瓦房里运筹

帷幄，指指着手下的千军万马与敌人作战。

这所宅院我陪张国焘来过不下 20 次，还算是老城中相当精致的房子，天井上摆着几个青葱斑斓的盆景。而现在看上去就让我们伤心了，粉墙到处都剥落了，檐板和椽子很多早巳腐朽，连陈昌浩、徐向前当年的卧室墙壁上，因为漏雨，也长满了一块块霉斑。

张国焘不住在老城里，他住的地方很不错，就是离老城千米开外的观音阁。那地方当初我们住进去时就应当算是文物了，现在就更应该是增添了另一层意义的文物。

观音阁在南峰山半壁上，飞檐翘角穿斗架拱的庙堂依山而建，悬于半空，站在庙堂前的坝子上，全城风光，尽收眼底。阁内 4 根大柱子上，还刻着黄超秘书长当年写下的 4 句诗：

旺苍两面河，圣贤观音陀；

红军到此地，川陕变苏俄。

阁外翠竹绿树掩映，站在阁前石栏环绕的平台上凌风眺望，地阔天高，山河大地一览无余，让人心胸倏然一爽。

总部的电台也架设在这里。电台一天 24 小时开通，“吱吱吱吱”的叫声片刻不断。管电台和电话的通讯员工作很辛苦，责任也非常重大。张国焘对通讯员不错，犯点小过失也就是批评几句，黄超秘书长态度不好，谁出错砍谁的脑壳，不过他是嘴巴上吼得凶，真把人推出去砍了的事还没发生过。被他撤职、弄到随军“劳改队”去罚做苦力的就多了。

在旺苍的驻军中，人数最庞大的一支部队就是妇女独立师。妇女团扩编为师，就是在旺苍老城完成的。全师只有第 1 团和第 2 团，共计 2000 多人，小的十二三岁，还没有步枪高，体重才五六十斤，典型的黄毛丫头。大的也不过二十多岁，全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有的女娃娃甚至是哭着跪着苦苦哀求才被批准入伍的。白天她们像真正的战士一样训练，晚上轮流站岗，在桐油灯下学文化。战时抬伤员，送粮食，帮助伤员洗衣服。张琴秋是个文艺活跃分子，她一来，妇女师就生动活泼了许多，唱歌跳舞，还编快板。与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相比，她们是业余的，但业余的里面也冒出个史琼英，成了打金钱板的明星。有一段史琼英唱出了名的金钱板，我至今还记得：“王老五，苦不苦？黄连加上苦瓜煮，今天你到哪里去，投奔红军打官府。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打倒官府干啥子？夺得江山人民坐。”

史琼英的扩红效果最好，她每天都能带几个青年回来参加红军，从不打空。上级还奖励她笔记本、铅笔、毛巾等奖品，把她的事迹登在《战士报》上，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1935 年 2 月初，正当陕南战役打得正激烈时，陈昌浩与徐向前为即将进行的强渡嘉陵江做准备，从彭杨军政学校、30 军、31 军中抽调了 250 名身强体壮，有一定浮水、划船基础的官兵，组建了红军中第一支“水兵连”。

训练基地就在老城北头的长滩坝古渡口。2 月的川北，天寒地冻，朔风刺骨，河面上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但只要一声令下，“水兵连”的战士立即扑向河中。每天从早到晚，滔滔东河里涌动着无数“浪里白条”，练习浮水、划船、架桥的本领。天气实在太冷了，有两

名战士被先后被冻死在了水中。这支被突击训练出来的“水兵连”，在强渡嘉陵江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机关迁到旺苍坝时，都像农村人搬家一样，坛坛罐罐啥都舍不得丢，把能搬的全搬来了。后撤离旺苍之前，总部下命令轻装上路，不是非要不可的全扔掉。造币厂（全名叫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和兵工厂扔掉的东西最多，凡是不便长途搬运的笨重机器，都弄去沉到东河边亭子沱和马家渡口的深潭中，只带走了几套新式的印钞套板，以便在途中印制纸币。兵工厂的机器太贵重，舍不得沉潭，就挖深坑埋了，上面还栽了竹子和树子。最伤脑筋的是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一部分是缴获过来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兵工厂生产的。尤其是自己生产的地瓜形麻辫子手榴弹，堆得像几座山包一样。这东西是工程师何伯阳研制出来的，在战场上管用得很，威力比川军使用的木柄手榴弹还大，燃线时间也掐得很准，不容易造成自伤。这些宝贝疙瘩大家舍不得丢，可又没力量全带走。那时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后正从前线撤下来，一天 24 小时石板路上都在过队伍，一个军就要过好几天。后来总部就组织力夫把步枪和手榴弹弄到大路边堆起，鼓励路过的战士们尽量多拿。就这样，到最后还是埋了 2000 多条枪，其余的都弄到东河边，全丢进了亭子沱深潭里。

### 3、红军院里的苏联老太婆

赵清彦就是总部机关驻扎在旺苍坝时参加的红军。

赵清彦是旺苍的一个农民娃娃，因为穷，就当了红军。后来又跟着张国焘三过草地，在大雪山上爬过来爬过去，再后来到了延安。这和其他红军战士的经历差不多。不算奇。奇的是，他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后来居然跑到苏联去娶了个苏联老婆，还千里万里地把这个苏联老婆带回了旺苍坝。至今，这位苏联老太婆还生活在旺苍县的红军福利院里。

赵清彦到延安不久，红军改成了八路军，他所在 129 师由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领，开到了太行山，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起了仗。

赵清彦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资格，打起仗来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是点子多，到太行山不到一年，就大仗连小仗地和日本人干了好几回。他也当上了一连之长。

1939 年冬末，鬼子和伪军开始了大扫荡。老百姓拖儿带女，潮水般地拉着毛驴直奔山沟里跑。鬼子的飞机在天上乱扔炸弹，用机关枪泼水一样往下扫，炸死打死了许多村民和牛羊。公路上的军车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日本鬼子所到之处，不是烧、就是抢，抓住活的就用绳子捆起来作苦工，为他们的大卡车抢修公路。

赵清彦的连队在突围时和大部队被冲散了。他们在山沟里昼伏偏夜行地转了两三天，和国军一支同样是被打散的小部队碰在了一起，加起来有 200 来人。当天夜里宿营时，尾追上来的鬼子和伪军悄悄把他们围住了。打得正激烈时，也不晓得是国军还是八路军的人叛变了。最后赵清彦等 50 多人落到了鬼子手里。鬼子用绳子把他们的双手捆住，然后派出一个小队，押着他们一直往山外走。走了六七十里路。天黑后到了一个镇子，把他们关进一间破房子里，和从其他地方抓来的俘虏和老百姓挤在一起。他们挨饿受冻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不亮又被赶

出来。被日本鬼子赶上了一辆辆大卡车。车上罩着篷布，谁也不晓得往哪里开。车队时开时停，夜里就被赶下车来，挤成堆堆睡，鬼子拿枪在四周守着。过了两三天，才晓得到了天津塘沽码头。被抓的中国人多得很，从服装上看，国军的兵最多，除了就是八路军和青壮老百姓。全都被鬼子赶上了挂着太阳旗的大军舰，几百上千号人挤在一个大统舱里，就朝海里开。也不晓得过了多久，就到了大连码头。鬼子和满洲国的靖安军把俘虏们分散带走，仍然被装上用篷布罩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又上了路。最后，赵清彦到了离乌苏里江不远的一个大煤矿，在矿上当苦力。每天在刺刀、皮鞭、棍棒的威逼下挖煤伐树。最狠的是“二鬼子”，他们为了在鬼子面前表忠心，对俘虏们最下得手。把人打死了，饿死了，就用马车拖到乌苏里江边，扔下河喂鱼。赵清彦在矿上认识了不少国军俘虏，那时也不分啥子国民党共产党了，只要是敢和鬼子干的中国人，就是自家亲兄弟。

其中有个李祖海，重庆人，在湖南常德被俘时是个营长，和赵清彦特别亲切。因为他是杨森手下的兵，在川北参加过围剿红 4 方面军，两人就成了不打不亲热的朋友。后来李祖海又被杨森带去参加上海保卫战。李祖海说，杨森打红军是花拳绣腿，搞“假打”。打日本人硬是拼了老命。有次还亲自跑到前线阵地训话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战是保土为国，流血牺牲，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绝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李祖海又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兵，那真是叫打仗啊！死的四川兵堆得满大街都是，鬼子的大炮炸得凶，没法往下拉，又怕传染瘟疫，就泼上汽油烧。

就是这个李祖海，暗中组织起十几个国民党的俘虏冒死逃跑。因为赵清彦和他关系好，所以让赵清彦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某天，一百来个俘虏被一个小队的“二鬼子”押着去伐树。李祖海他们早就打听到这片树林离乌苏里江不过一二十里地，不消一个小时就能跑拢。河对岸，就是苏联人的地界了。

这次行动最终成功地逃出来 5 个人，其他的人不是被打死，就是逃进了深山老林里。

这 5 个人中就有李祖海和赵清彦。只有赵清彦一个人是共产党的兵。

他们浮过乌苏里江，进入了苏联境内。这片地区密林遮天蔽日，荒原辽阔，人少得可怜。三四天后，就在他们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里不少苏联人都会说东北话，得知他们是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中国战俘，对他们很热情，租了一大片土地给他们种，还为他们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用具。5 个俘虏就以种菜、卖菜开始了在异国它乡的新生活。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对生活倍加珍惜，干活卖力，人又老实本分，很快就取得了苏联人的信任。第一季菜刚种出来，苏德战争爆发，农庄里的青壮男人大都被征召上了前线，土地大片撂荒。5 个中国男人就分别创建了自己的农庄，先后和苏联女人结了婚，安心地定居下来。

4 个国民党的兵娶的都是村里的女人，只有嫁给赵清彦的列里敏-尼柯娃-瓦丽娅，是从叶尼塞河河畔的工业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疏散到远东来的。美丽的瓦丽娅曾拥有幸福的家庭和慈爱的双亲，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入侵摧毁了一切，父亲战死于卫国战争的沙场后，母亲悲痛交加跟着病逝，年仅 17 岁的她为了抚养弟弟妹妹，到一家兵工厂当了女工。后来又带着弟弟妹妹随这家兵工厂迁到了远东。她一个人的收入要几个人吃，生活很困窘，瓦丽娅常

常为买菜发愁。而善良的赵大哥总是非常慷慨，时常半卖半送些新鲜的蔬菜给她，让她十分感动，后来接触多了，他们互相关心，彼此照应，好心地赵大哥又让瓦丽娅的弟弟妹妹利用假期到他的农庄里去帮着干活，以此来减轻了瓦丽娅的负担，后来又听了赵大哥传奇的经历，苏联红军的女儿瓦丽娅就认定了勇敢、善良的中国红军赵大哥是自己一辈子要跟定的人。他们结婚了，开始了甜蜜幸福的生活。随着战争的结束和苏联的快速强盛，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瓦丽娅生了两个女儿，他们有了自己的拖拉机、带花园的别墅。节假闲暇的日子，5位中国人的家庭常在一起聚会，大家尽情地唱歌跳舞，畅饮伏特加酒，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5 位中国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李祖海等 4 名国民党的老兵哀声叹气。只有赵清彦高兴万分。也就从这时候开始，赵清彦想家、想旺苍坝的亲人了。

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取得了天下，作为曾为她的发展壮大打过仗流过血的一名红军战士，他太想回到国内亲眼看看她胜利的风采，期待为她的繁荣富强添上一块砖，加上一片瓦。

赵清彦开始给亲人写信了，可每一次都像石沉大海。一直写到 1956 年，不死心的赵清彦灵机一动，改变了策略，他直接给旺苍县人民政府写信，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家乡的政府，请政府帮助他寻找亲人。

这一招果然有效，1957 年的一天，他终于盼来了第一封家书。从此他这个幸福小家庭的生活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瓦丽娅理解丈夫的心情，可是她不愿意去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国家生活。而且，她从报纸上知道中国和苏联比起来，还很穷，许多方面还靠苏联政府援助。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瓦丽娅看到丈夫的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终于决定遂丈夫的心愿，同意带着年幼的女儿去丈夫的老家。

我们 3 个老战友去旺苍之前并不知道赵清彦这个人，更不知道旺苍城里还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婆。我们是听文管所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后，才决定登门去看望一下瓦丽娅的。文管所的同志带着我们来到了旺苍红军福利院，在一套窗明几净的套房里见到了已经 70 多岁的瓦丽娅。当年的姑娘已经变成了一个满头银发头发的老太婆，脸上荡漾着从容而又慈祥的笑容。

一进门，最先进入眼帘的就是墙上挂着的两张照片，一张是赵清彦的像，镜框上镶着黑边，1995 年，他因心脏病发作和瓦丽娅阴阳两隔。另一张是年轻时候的赵清彦和瓦丽娅紧紧相偎在一起照的“排排相”。瓦丽娅告诉我们，那是她随丈夫刚回国时照的。

我们看到，年轻时候的赵清彦模样端正，西装革履，年轻时候的瓦丽娅秀美而丰满。

1959 年 1 月，赵清彦处理了他在苏联的全部家产，带着瓦丽娅和女儿踏上了归国之程。明知很穷，赵清彦依然义无反顾地回来了。因为中国是他的祖国，这是一个久居异国的老红军战士的爱国情。

瓦丽娅虽然思想上早做了准备，可旺苍的偏远，交通的极度不便，当地生活的贫困、落后，还是令她感到大吃了一惊！赵清彦的家，山高路陡，人烟稀少，她吃不惯清汤寡水的稀饭，烧不来满屋熏烟的柴火。大巴山夏天的山蚊虫，冬天的虱子，疙蚤，咬得她体无完肤，浑身都是疙瘩。实在是呆不下去了啊，她想回苏联，每夜里偷着流泪。

可丈夫却不同，真应了四川人的一句俗话，“金窝银窝，当不了自己的穷窝”，一回到山区农村的老家，赵清彦就如同倦鸟飞回了老巢，精神陡地舒爽了许多。由于赵清彦长期失去组织关系，政府没有给他红军待遇，安排他到县城里的五金商店当了个营业员。赵清彦却像当上了省长那样高兴，和瓦丽娅母女来到县城，安下家来。

瓦丽娅知道，要让丈夫跟她回苏联，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只好死了这条心，安安心心地相夫教女。政府也没有给她安排工作，瓦丽娅在中国半个世纪，一直是家庭妇女。

很快，随着“人祸天灾”，中国老百姓度过了三年极为困难的日子。两个儿子的相继出生，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到了死亡边缘，刚来时总是嚷着要回苏联的瓦丽娅反倒不说走的话了。她像所有善良、无私的中国母亲和妻子一样，倾尽心力，照顾有病的丈夫，精心养育儿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她们那个犹如狂风暴雨中的破船一样的小家庭，终于度过了惊涛骇浪，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赵清彦的红军身分被确认后，老俩口的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牛奶厂坚持给他们一个月送几次牛奶，瓦里娅喜欢冬瓜、丝瓜、苦瓜这些俄罗斯没有的蔬菜,学会了做腊肉、香肠和中国菜，但至今也不敢吃四川人最爱吃的辣椒、花椒。他们的儿女被政府安排在最好的企业工作，赵清彦逝世后，民政局把瓦里娅安排进了条件很好的福利院，每月还发给她 1170 元的生活费。有时她也会轮流去儿女们家里住上一段时间。每当节假日和纪念日，县委、政府、人武部、民政局等单位领导都会去看望她，县医院还会定期为她检查身体。

几十年来，瓦里娅平静地生活在旺苍这块并不富饶却充满人间温情的红色土地上。她说，她喜欢山清水秀的旺苍，更喜欢这里纯朴善良的人民。她也关心自己的祖国，她把自己的心劈成了两半，一半献给了身边的丈夫和儿女，另一半深情地守望着故乡。

## 4、强渡嘉陵江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红 4 方面军总指挥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方面积极投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敌人为阻止红军西渡，以 53 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北起广元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约 600 公里长的嘉陵江西岸广大地区，纵深直至涪江沿岸。江上船只，全被敌人掠往西岸，并强迫老百姓在沿江重要滩头阵地修筑碉堡、炮台，挖掘陷阱，埋设竹桩，布置障碍，妄图把红军先堵在江东，再进一步包围消灭。

为了迅速贯彻党中央“渡江西进”的战略方针，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和王维舟带着参谋人员翻山越岭，亲临江防前线，沿嘉陵江东岸跋涉三四百里，观察敌情，寻找渡河地点。最后选定苍溪东南约 4 公里的塔子山河滩为强渡嘉陵江的主渡口，同时，为转移敌人注意，分散其兵力，还在沿江组织多路强渡。

塔子山山高林密，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强渡时可以充分发挥我军火力优势；后山低缓，叶茂林深，强渡前可以隐蔽千军万马。并且这一带滩头平坦、开阔，水流较慢，而敌兵力亦

较弱，是最理想的强渡地点。

强渡嘉陵江战役，规模浩大，各地苏维埃政府组织起担架队、运粮队、运盐队。嘉陵江东岸地区，群峰耸立，山路崎岖，不少地方人迹罕至，大量军用物资，全靠广大群众肩挑背驮，粮食、弹药、布匹、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均由人力运输队运往前线。渡江战役发起之前，造船厂设在王渡。当地木匠陈安海、朱大祥、宋二，铁工张贵武、杨如意、李清元等 150 多名造船工人，日夜在密林中赶造出战船。在原料不足的紧要关头，巴中红色袍哥舵把子张小川组织人马送来一部分，当地农民李在安、罗正荣、阎思堂、罗正文等献出大柏树 110 根，铁 500 斤，桐油 400 多斤，竹绒 500 余斤，保证了造船用材的需求，受到余天云、李先念、熊国炳等首长的表扬。

红 4 方面军克服重重困难，依靠苏区群众，动员一切力量，白手起家，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赶造出 75 只渡江船只。同时部队还完成了划船、泅水等渡江作战训练。

1935 年 3 月 28 日，张国焘也带着我们亲临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设在塔子山反背的渡江前线指挥部谭家院子指挥作战。

晚上 9 时正，指挥部发出“急袭渡江”的战斗命令，渡江红军秘密将几十只木船从塔子山后面经火头垭（现名“红号垭”）抬到江边，轻轻推入江中。30 军 88 师 263 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的指战员们，以熟练的动作，以瓢代桨，奋力划船，向西岸猛扑过去。

第一批突击队员们借夜幕和流水声掩护，偷袭成功，登岸后，一股作气冲到敌人的第 3 道工事园堰梁碉堡附近，才被敌人哨兵发现，丢魂丧魄地大叫起来。我突击队员立即开火。霎时，敌人沿江防线射出密集炮火，奇袭马上转为强渡。我军塔子山上的 20 门迫击炮和几十挺重机关枪一齐怒吼，将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我突击队员舍生忘死，冒着枪林弹雨奋力划船，向西岸敌人的阵地飞速冲去。船一抵岸，便狂呼怒吼着涌上敌人的滩头阵地。当夜，连克赵家山、杨家坝（敌旅部）据点。

29 日，30 军 88 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赓即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所在地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

与此同时，31 军一部在鸳溪口、石锣湾强渡成功，从侧右向北进击，9 军主力在苍、阆交界处涧溪口强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 29 日中午，红 4 方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至此，国民党军阀惨淡经营 3 个多月的 600 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红军彻底突破了！

红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一天就向敌纵深挺进近百里，红 4 方面军由此挥师北上，踏上了万里征程。

建国后，塔子山下的渡口被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事，1980 年 7 月 7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 年，苍溪人民在塔子山上重竖丰碑，永昭后人，由巳 83 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亲书“红军渡”碑名。

5、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主席命令3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从恩阳的千佛岩到威州170余里的民房都被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

这一决策上的重大的失误，也导致了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支持，轻易地被敌人斩尽杀绝。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大巴山人民多年来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的自己的子弟兵——过去的川东游击军，现在的33军。

军长是大肃反官复原职的王维舟。

（红33军军长王维舟）

身为一军之长，王维舟接到这样的命令时也曾震骇不已，也曾冒死向张主席建议取消这样的命令。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川陕苏区，张主席金口玉牙，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天条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地。

王维舟太了解张国焘的为人了——为了这，他已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双河场惨案发生之前，他因为不同意张主席的某些作法，已经被撤掉了33军军长的职务，把他调到通江的彭杨军政学校高级班学习。

令王维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到军政学校报到，就从他的老部下，时任川陕省委副主席的余洪远口中听说，他眼下的上级、前不久带着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们来到苏区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居然也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监狱.

所谓国家保卫局，实际上就是川陕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虽然名义上冠着“国家”的名义，实际上还得接受川陕省委和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的双重领导。

余洪远告诉他，国家保卫局里关押的千余名犯人中只有两人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一个是罗世文，另一个则是“何旅华”（廖承志），据说罪名是“反对张主席的肃反政策”。他俩白天被警卫押着出去干活，晚上则被押回到单独的牢房里睡觉。

王维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中极为不安。当即要余洪远为他安排，他要去监狱中探望罗世文。余洪远很担心，说：“你现在都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了，要让张主席晓得了，恐怕会

惹火烧身。”

王维舟慨然道：“张主席不分清红皂白弄出了那么多反革命，杀的杀，关的关，我就不相信我们革命队伍里有那么多的坏人！我不了解其他的人，还能不了解世文？这些年来，我不但是川东游击军的总指挥，头上不还戴着顶四川省委领导下的川东军委书记的帽子么？世文要是反革命，这世间恐怕就再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你只管安排，天大的祸事我顶着！”。

国家保卫局设在通江县城中的川主庙内，进得大门头顶上便是万年戏台，戏台前面一个宽敞的麻石板铺就的大坝子，坝子尽头是正殿，两侧厢房顶上，还有供人看戏的敞式木楼。里面除了关押着千余名犯人，还有百来名工作人员和一个独立营的武装力量，有 400 人枪，营长刘汉成，是宣汉人，也是王维舟、余洪远的老部下。

几天后的夜里，余洪远得知刘汉成已经安排好一切，就到街上买了两瓶包谷酒，两只卤鸭子，把王维舟带到国家保卫局的一间屋子里，马上叫刘汉成去把罗世文带来。

罗世文一进屋子立时便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情景下见到自己的两位老战友，愕然道：“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王维舟赶紧起身相邀：“坐，世文同志，坐下再慢慢说。”

罗世文虽然身上穿的是蓝色的红军军装，头上戴的也是红军帽，但是，领口上没有领章，军帽上也没有红五星。他那原本颀长的身躯显得瘦弱单薄，厚厚的镜片后面，目光也显得迷惘。

王维舟将这些年来川东游击军的情况简单地给罗世文汇报了一下。

罗世文见了两位老部下，既激动，又高兴，但又不便将自己受到的委屈向二人倾吐。待酒过三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其中的一页，让二人一观。

那是一首言志七律《过通江城》。诗云：

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河愁不晏清，

肺石光照日月明，

熊熊烈火炼忠贞。

巴山气爽艳阳天，

跋涉蚕丛已十年，

味胆铭心期报效，

同袍虽勉著先鞭。

二人看后，面面相觑，知他心有苦楚，因诗中影射张主席拒纳忠言，又不便深问。

已经将矛盾与张主席公开化了的罗世文却没有这么多顾忌，他悲痛地向二人谈到他带来的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已经有 200 多人被张国焘当作“特务”、“反革命”给处决了，甚至连中央派来川陕根据地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由他组织力量，一环一环地护卫接送，并由自己亲自陪同到通江，因为表明了自己与张主席不同的意见，另外还有当初参加护送廖承志到川北苏区的四川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被污陷后，为保命胡咬乱扯，往廖承志身上泼污水，所以张国焘下令把廖承志也抓了起来。

罗世文悲愤地说道：“很明显，在张主席的脑海中已牢牢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谁反对他的意见，谁就是异己分子，谁就是‘改组派’、‘AB 团’，在他的深深的潜意识里，好像其他的人都值得怀疑，只有他自己才是最革命的。”

王维舟也忧心忡忡地说道：“我刚到通江，但听得的情况，也足以令我心惊肉跳。保卫局认为谁是反革命，根本不许本人申辩，即予处决。而且又轻信口供，按敌俘或是被抓的所谓反革命提供的线索继续捕人，由于这些并没有什么证据，只能根据口供，所以保卫局即实行逼、供、信的方针，采取种种酷刑审讯，结果造成被捕者屈打成招，乱编供词。肃反人员不经调查、甄别，便以此作为定罪和继续捕人的依据。这样罗织株连，所谓的‘改组派’、“AB”团分子多得难以令人置信。我看照眼前这样搞下去，不知会有多少红军官兵和苏维埃干部成为屈死的冤魂。”

余洪远气愤地叫了起来：“张主席是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啊，他怎么能这样乱搞？这到底是中央的精神，还是他个人的意志？”

罗世文赶紧用手指头点了点他，示意他说话声小一点，随即又悲苦地摇了摇头：“看来这不可能是个人意志的问题，我听说他在鄂豫皖时就搞过一次大肃反，把苏区杀了个天昏地暗，路断人稀，还叫保卫局长周纯全把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抓起来突审，想搞向前的材料，可程训宣被整得死去活来也没有提供出他们满意的材料，最后给杀掉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向中央告张主席的状，可中央却下了一个文件，不单明确地支持张主席搞肃反，而且还把他搞的这一套肃反经验推广到了江西和洪湖苏区。”说到此，他顿了顿时，声音愈发沉重地感叹道：“我们都懂得，革命是阵痛，是流血，对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是正义之剑的切割，可是，对蒙冤而死的自己人，则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啊！”

临别时，罗世文长叹一声，语重心长地说道："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在内部杀来杀去，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总是时时刻刻警惕不要把敌人错误地当成同志，却很少警惕把我们的同志错误地当成敌人？"

没有谁能回答他提出的这一沉重的问题……

听到这些让人惊心动魄的消息，王维舟的心情复杂万分。可更让他悲痛欲绝的是，张国焘挥舞起的大肃反屠刀，紧跟着就落到了他手下众多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多年来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头上。

他强忍着心中的隐痛，为了顾全大局，一如既往地带兵打仗……

巍巍的大巴山是他和战友、部下们的家乡，他们已经在家乡的莽林深涧里和敌人战斗了9个年头，可呆在旺苍南峰山上的张国焘一纸命令，无数战士流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白白断送了。久经考验的33军，难道就这样听任张国焘的摆布？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华胜利的使命，难道就这样被张国焘所左右？带着团团疑虑，王维舟不得不率军撤离这血肉相连的红土地，广大的指战员同他一样，也是一步一回头，抽泣声此起彼伏……

33 军为全军殿后，可令王维舟愤怒与尴尬的是，张国焘把烧毁民房的任务交给他的部队来完成。

张国焘不会不清楚，33 军是巴山人民的子弟兵啊，他们面对多年来舍死忘生支持自己的父老乡亲，怎么下得了手？

可是，军令如山倒，作为下级，别无选择。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93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密密麻麻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师长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再也忍受不了，脚一跺，跑到副军长罗南辉面前诉苦："日妈哟，烧，烧，烧，烧个锤子！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

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大肆宣传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

罗南辉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主席说了，可结果反倒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王波说："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上面啊。"

"咋个对付？"

"反正张主席他们已经走得老远了，我们一路上只烧些草堆堆，掩人耳目，能向上面交差就行了。"

罗南辉完全同意，而且说他和王维舟都是坚决反对张主席的杀人放火政策的，只不过处在他俩的位置上，提提意见可以，不敢不执行命令。他还说："张主席一直对我们 33 军有偏见，军长和我在很多事情上也只有委屈求全。"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

还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

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主席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悄悄脱光衣服，用裤腰带一头拴住生殖器，一头拴在床上，双脚抵住床边猛力一蹬，两颗睾丸像子弹一样飞出。他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

## 第十二章 红星上的裂痕

如今被宣传得像人间仙境般的九寨沟，就离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远……杂谷脑会议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在右路军指挥部，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

### 1、谁是毛泽东

1935 年 3 月底，红 4 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一月之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桐、青川、江油、北川等地，打通了西行的道路。

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无日不战。5 月中旬，红 4 方面军解放了羌族同胞聚居的茂县、汶川地区，还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个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机构。

尚在江油时，张国焘就以中央红军已遭惨重失败，存亡未定，中央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领导职权和能力为由，提出：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取代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职责。

在汶川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的这一意见被一致通过。

5 月 18 日，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布成立，由红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出任主席，并且制定了政府纲领，布告各地。30 日，张国焘又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宣言》。

这件事，很快给张国焘带来了麻烦，也成为后来他与中央分裂的一个重要发端。

这时，总部和西北联邦政府均已移到了北川县城，在这里住了 10 来天。

这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川北本就算得是个荒凉闭塞的地方了，可通南巴和北川比起来，就如同天堂一样。这里满眼都是长满树木的大山，人烟稀少，而且是藏、汉、羌等多民族混居区。藏族占一半以上，当时称他们为“藩族”，能说汉话，生活已趋于汉化的，被称作“熟藩”，保持着原有部落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则被称为“生藩”。“生藩”大都散居在高寒山区。北川境内，山势险要，雪山林立，道路多是顺着山壁的走向凿石而成，蜿蜒奇险，行军时常有战马掉入谷底摔死。这一带地处高寒，稻谷和罂粟的生产都不适宜，只产青稞和包谷。

我们到了北川，犹如到了外国，生活很不习惯。尤其是红 4 方面军绝大多数官兵吃惯了大米，现在改为吃糌粑，都感到头痛。

曾传六、傅钟领导的政治部赶紧在全体红军中展开了教育活动，要求战士们严守纪律，不许擅杀牛羊，务必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与他们和睦相处，争取他们不与红军为敌。而教会战士如何吃糌粑也成为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陈昌浩就多次亲自向战士们示范。

有个问题始终没有搞清楚，红 4 方面军西征时到底有多少人？有的考证说有 10 万，有的则说 10 万是号称，是故意虚张声势用来吓唬国民党的，实际上只有 8 万人。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具体。但我晓得在北川，红 4 方面军把所有随部队西征的苏级埃干部和出征前招募来的力夫，还有由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编成的，归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的 4 个独立师，全部编入了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我们有 5 个整装满员的军，足足 8 万人，再加上北川新编入的至少 3 万人，总数绝对在 11 万以上。新编入的这 3 万，质量也都不错，苏维埃干部原来就和红军没啥区别，大家都穿一样的军装，都配武器，撤出来的呢？

也都是骨干。还有不少原本就是从作战部队里派到苏维埃政府去工作的，这次不过算是归队。力夫都是精精壮壮的棒小伙子，一身贼力气，拿起枪就是个好兵。而成建制的 4 个独立师，就更不消说了。

5 月底，张主席接到了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成功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率 30 军西进迎接。总部也离开北川县城，前移到杂谷脑（今理县政府所在地）。

1935 年 6 月 14 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红 4 方面军的 30 军，在夹金山下与红 1 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余天云和李先念等四方面军的指挥员。

驻地一片欢腾，30 军的各支部队陆续送来了早巳准备好的慰问品，除了大批的粮食与牛羊，还送枪支弹药。

当天，中央纵队在余天云、李先念的安排下，吃了一顿可口的会师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洋芋片，饭是青稞、包谷面疙瘩。这是难得的美餐，中央领导和机关的官兵们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忘记了翻越大雪山的疲劳。

同日，余天云、李先念电告红 4 方面军总部，他们巳经在达维和红 1 方面军会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巳经到了达维。

李先念和余天云看到红 1 方面军损失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俩的想像，许多部队甚至打得来成了“空壳壳”，两人便商量从自己军中拨一个整团，连人带枪 1500 余人全部送给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

带兵打仗的人都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发展壮大起来的部队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哪有父亲把儿子拿去送人的？但李先念和余天云却硬是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想背着张主席，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当天晚上，两军在达维村的坝子上召开了会师联欢大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指战员的脸膛。大家同声欢唱着红 4 方面军前进剧团为专为两军会师而创作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汇合了，

欢迎一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嗳，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嗳，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歌声震荡，掌声雷动。

张主席接到余天云李先念的电报后，当即在杂谷脑召开了一个只有10几名高级首长参加的会议，统一了向中央报告的口径。然后由黄超起草，张主席致电中央，对两军会师表示祝贺，报告了当前敌情和所属各部队位置，提出了两军会师后红军应向西或向南发展。并表示，红4方面军全体官兵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但是，张主席的主张被否定了。

第三天，中央即回电张主席，明确指出：

“今后我1、4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3省”，提出了向东向北与张国焘的想法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

这种最初在军事行动方向上的分歧，延安批张时被中央认为是张国焘与中央分裂的前奏，“看起来表现在战略进攻方向的分歧上，而骨子里则是争夺红军指挥大权的初步试探。”

17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再次强调：“我意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亦可向南进攻。”

18日和20日，中央两次电告张国焘，要他放弃西移和南下的意见，和中央保持一致，合兵北上，力攻平武、松潘。

21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仍然坚持南下。

最后，中央通知张国焘，要他立即赶往懋功的两河口，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商决一切。电报发出后，中央即离开达维，移往两河口。

6月22日一大早，随张主席前往两河口的是黄超秘书长和几名参谋，一名藏族通司。我率警卫排随侍左右。

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我们的马队足足跑了两天多，沿途虽大都是对红军怀有敌意的藏民散居区，但4方面军早已将这一带地区控制，并不担心会遭到袭击。

这一带山势奇险，断层岩很多，梭磨河上不时出现大大小小的瀑布，景像十分壮观。竹索桥、溜索和偶尔可见的皮筏子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

从地图上看，杂谷脑到两河口并不很远，但有时为了能寻找到一处马匹能涉水过河的地方，不得不跑上半天冤枉路。旅途上到处都是阴暗茂密的原始森林，空气潮湿，还散发着腐叶的臭味。莽莽苍苍的老林子里，当地人叫做海子的湖泊多极了，湖水瓦蓝瓦蓝的。飞禽走兽也不少。

我们当时只看到了它的原始、蛮荒、落后，根本就感觉不到它的美，更没有心情去欣赏这种美。谁知半个世纪后，那地方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如今被宣传得像人间仙境般的九寨沟，就离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远。

马队白天赶路，晚上则借住在藏民家中。藏民的住处，多是石块砌成的楼屋。底层喂牛羊，屎尿遍地，黑暗又不通风。二层住人，也没窗户，下面的臭味冲上来，让人难以忍受。第三层最干净，却不是人住的的地方，正中供着佛像，两壁挂着经幡，香案上摆放着祭神用的各种器具和经卷。红军有纪律，知道这佛堂是藏民家中最神圣最庄重的地方，都不敢去上面睡觉。连张主席、黄超秘书长也只好和卫士们一起，呆在二层屋里让臭味熏。

24 日下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经过长途跋涉的马队突然看到一大群骑着马的红军向我们迎面奔来。等到近了，才看清是彭杨军政学校校长何畏，30 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9 军军长王宏坤、政委詹才芳，4 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人与卫士们。他们是特地赶来迎接张主席的。

随他们而来的，还有 3 位穿灰色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位矮个头的年轻人。听介绍后方知，叫凯丰（何克全），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与一方面军来欢迎张国焘的。

快到两河口时，我们看见路边冒雨站着数百名红军官兵，高举着庆祝两军会师的标语牌。路边还立着一个搭着油布的雨棚。看见马队走近，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雨棚里这时也走出了一群红军，大约有二、三十人，有的戴着军帽，有的光着脑袋，显出很随便的样子。他们加快步伐，向着马队迎了上来。还有人大声叫着张主席的名字。

张主席在欢呼声中蹁腿下马，跑步向前，和从雨棚里走出来的那群领导模样的人握手、拥抱、招呼，双方都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这帮随从人员虽然过去也听说过“朱、毛”，也知道朱德和毛泽东都是中央主要领导，可就是分不出谁是谁来，赶紧向何畏、余天云等四方面军首长们的警卫员悄悄打听，才弄清了谁是张闻天，谁是毛泽东、朱德，谁是周恩来、博古、刘伯承、邓发等中央领导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他没戴军帽，露着很长的头发，身材比张主席要稍矮一点，瘦一点，脸色也有些苍白。张主席方脸阔腮，浓眉大眼，由于几天没刮胡子，下巴上镶上了一道黑边。毛主席面孔椭圆，眉清目秀，显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而且毛的穿着也显得宽衣大袖，很随和的样子。

毛主席随即站到从雨棚里抬出来的一张桌子上，代表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向张主席和红4方面军致欢迎辞，并感谢红4方面军给予红1方面军的友弟般的支持。张主席也登上桌子致答辞，代表红4方面军向中央致敬，对中央红军表示慰问。仪式俭朴而充满情谊。听着两位领袖的致辞，我们当警卫员的也和在场的首长一样，感动得鼻梁发酸，满眼泪水。

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和张主席下了桌子，冒着霏霏细雨，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起向两河口走去。

就在一大群人向场上走去时，我听见了走在我前面的张主席和周恩来的一段对话。

张："恩来同志，有一点我至今还不太清楚，你们这一路上打过来，伤亡惨重啊，不知道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人？"

周："我们现在是不能和你比呀，你现在是兵多将广，人强马壮。"

张："四方面军现在有10来万人，你们呢？再怎么也不会少于5万吧？"

周："哪里呀，我掌握的准确数字，也就3万人吧。"

张："噢，就只剩下3万人了。"

周："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嘛，不然，我们怎么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和你会师。"

张沉默。

周："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多兵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坚持什么路线。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路线，毛泽东……"

"纠正什么？"张主席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两河口处在小金川上游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故名两河口。镇子不大，只有百十户人家，藏汉杂居。镇子里最气派的建筑是关帝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就住在这庙里。

中央机关塞满了两河口，全身戎装的张主席在宽衣大袖不修边幅的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陪同下一走进小街，许多官兵都拥挤在街道的两边鼓掌欢迎。张主席神彩飞扬，微笑着不断地向他们鼓掌致意。

我还注意到，那些操江西、湖北、湖南口音的一方面军的官兵，激动之情也不压于我们。

中央首长们的一大帮警卫员陪着我们。毛主席的警卫班长吴吉清，成了我的新朋友，一路上不断地给我介绍他们如何从贵州打过来的情况。

我完全能够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红 1 方面军的战士对我们红 4 方面军的感情是非常强烈和真挚的。谁也不难想像，对于一支从敌人的包围圈中一路血战冲杀出来，损兵折将，疲惫不堪，几乎是弹尽粮绝的军队来说，突然和一支拥有 10 万之众，枪弹充足的兄弟部队汇合。那种喜悦和振奋，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

在关帝庙前，我看见张主席亲切地和一位身材高挑瘦弱的年轻女红军握手。吴吉清告诉我，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叫贺子珍，在贵州时遭遇敌机轰炸，受了点轻伤，还流了产。

2、彻夜长谈

可是，这种会师形成的欢乐，很快便消失了。就在两河口召开的这次为期 3 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刚才还亲热得像两兄弟的毛主席和张主席产生了分歧。

会议是在关帝庙正殿旁边毛主席的房间里召开的。吴吉清，朱总司令的卫士白全宗，还有其他首长的几十个警卫员和我们一起在正殿里闲聊。卫士们在外面谈得亲切融洽，旁边房间里的声音却渐渐地高了起来。

张主席力主两军会师后队伍应立即向南或向西发展。毛主席则坚持迅速执行中央的“北进计划”。南辕北辙，两人各持己见。

张主席指出北进的诸多不利，大西北人烟稀少，不仅不利于增强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反而会因为地域的阻隔，削弱党和红军的影响力。他提出了南下川康的计划。在论述中，他还引用了诸葛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名言。

毛主席提出的“北进计划”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就在中央红军反 5 次围剿失败，匆忙撤出瑞金之际，共产国际急电指示，如果红军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相机给予支援。

中央正是根据这一分电报指示的精神，制订出了“北进计划”。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等十几位中央领导和红一方面军指挥员的支持。

张国焘孤掌难鸣。

博古、张闻天、凯丰等人相继发言支技中央的“北进计划”。

其实在中央领导之间产生分歧，进行争论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是，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们似乎大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长于辩论，辩论起来总想急于用自己的观点去驳倒对方的观点，喜欢引经据典，言辞也很犀利。原来 4 方面军中的沈泽民就是个典型。自己并无恶意，也无私心杂念，却总是事倍功半，让人难以接受不说，还容易使对方产生反感。几名党的理论家

轮番上阵，不免会使张主席产生受到围攻的感觉。让他觉得这帮从莫斯科回来的小青年对自己显失尊重。想当初，自己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副团长，三天两头给他们发指示、上党课。而现在他们把离开瑞金时的 10 万之众，搞得来几乎全军覆没，还有什么资格来对我指手划脚的？两军会师的振奋喜悦很快消失殆尽，他的情绪已经变得来十分郁闷。

博古还在滔滔不绝。

很快，正处于烦躁之中的张国焘抓住博古发言中的一句话“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这句话，想狠狠地敲打博古一下。他曲起一个指头，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脸上布上一种带有轻蔑的威严神态，斜视着博古，然后冷冷地讥刺道：“博古同志，眼睛长来不完全是用来看别人的，也应该借个镜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红军 10 万雄师，如今还剩下多少人马呀？作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你难道不应当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还振振有辞地来和我谈什么军事？”他笑了一下，又吐出三个字，“你配吗？”

张国焘虽然没有声色俱厉，但是，他这不怒而威的表现，满脸的轻蔑，让会场顿时寂静了下来。在场的人，似乎都猛地意识到了张国焘为何敢于盛气凌人，敢于当着党中央的面对博古冷言羞辱的原因，心中顿时掠上了一丝阴云。

“国焘同志，先不要上火嘛，让博古同志把话说完，你再发表意见，好不好？”毛泽东慢悠悠劝道。

“我刚才得到报告，胡宗南手下的伍诚仁部，正向包座疾进，已经堵住了北进的通道。川敌郭勋棋部、刘文辉部，也正在向北川、茂县一带运动。看来，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已经在扎一个大的口袋，想在川西把我们围而歼之。坐而论道，空发议论，我看只会浪费时间，殆误战机。”

毛泽东的脸沉了下来：“国焘同志，这怎么是坐而论道呢……”

两河口第一天的会议张国焘和中央领导有分歧，也有争论，特别是和博古争论时两人的言语都有些尖刻。但总的气氛并不紧张，也不激烈。毕竟两军的会合让所有的领导，包括张国焘都很高兴。

真正让张国焘火冒三丈的事情并不在政治局会议上，而是在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回到我们的住处以后发生的。

中午散会时，张主席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纷纷从房间里出来。表面上看，会上的争论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一群人说说笑笑地把张主席送到庙门外，毛主席、张闻天等人还和他握手道别。

在住处，我听到张主席对黄超说，他已经在会上毫无保留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对遵义会议只承认中央领导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继续确认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

张主席说：“他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来只剩下万把人，难道这仅仅是

一个军事路线的错误就能够解释的吗？我对老毛、洛甫（张闻天）说，我恰恰认为，造成中央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当前只不过是最直接地反映到军事的失败上。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就是要检讨政治路线，否则就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错误的根源。”

黄超递给张主席一份《布尔什维克》，指着上面一篇文章说：“主席，你看看凯丰写的这篇《列宁论联邦政府》。凯丰在这篇文章里说，列宁曾经反对欧洲联邦，因此你未向中央请示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反列宁主义的，同时也是反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的。在中央红军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打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于公开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企图以西北联邦政府取中央而代之。主席，凯丰敢公开在党的刊物上点名道姓地批评你，而且把西北联邦政府提高到取中央而代之的地步，这让我非常震惊。而且，这是 1 方面军一位不满他们做法的同志悄悄给我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已经接到通知，紧急收回这期刊物。”

张主席匆匆浏览了这篇文章，鼻也哼了两声，一脸不屑地说道：“凯丰算得了什么！一个小小的代理中宣部长，后面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撑着，他敢张口咬我？”

张主席的住处在镇子北端一家卖杂货的店铺里，余天云和李先念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为了不给老板一家增加麻烦，柜台里边是张主席和黄秘书长的住处兼办公处，我和 11 名卫士则睡在柜台外面。我叫卫士找了两张门板给张主席黄秘书长做床，我们则抱了些青稞秆来铺在地上，大家席地而卧。

当天晚上，在关帝庙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双方的首长都云集在大殿里。一大碗一大碗的鸡肉和猪肉、牦牛肉端上了桌，还有红烧的大熊猫肉，当地土酿的一种烈性青稞酒。

张主席带黄秘书长和我去参加。宴会上，领袖们谈笑风生，说话最多的是毛主席。后来为一个玩笑——毛说擅吃辣椒的人最具有革命性，不吃辣椒的博古就和毛主席争吵了起来。双方互不相让，言语尖刻，弄得面红耳赤，博古书生意气很浓，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张主席则一直面带微笑，除了一般性的应酬，很少说话。

宴会结束后，朱总司令来到张主席的住处，和张与黄聊了一个通宵。

我当时并不知道张主席和朱德过去在南昌起义时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交往。朱德是坚定的起义派，而受中央委托前去南昌指导起义的张主席则是坚决的反对起义派。起义失败后，张主席为此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被中央撤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我请老板烧了点热水，用木盆盛上给 3 位首长端去，请他们烫烫脚。然后，我就到外面检查警卫。等我回到屋子里，见首长们谈得投机。不当班的卫士们都已经睡下了。我把木盆端到门外，将水倒了，也回到自己的铺位上。

朱德和张主席黄超的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次日拂晓时分。总司令讲了很多话，时而兴奋，时而沉痛。他说他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第一次看到余天云李先念的 30 军时，这支队伍正浩浩荡荡地从他面前开过，去天全、宝兴一带抵御追击红 1 方面军的敌人。他们全都精神饱满身体强健。他检查了几名战士，每个战士都背有至少 100 发的子弹，部队机关枪也不少，还

有用骡马驮的成箱的机关枪子弹、迫击炮炮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这一切加上战士们的战斗行进队列，都使他深信这是一支训练有素极具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对穿得像火夫头一样的红军总司令严肃的敬礼，热烈的欢呼，而且战士们对红一方面军的战友表现得非常的友好，许多人都主动地把自己的干粮拿出来分给他们。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作为红军总司令，非常非常感动。

作为一名红 4 方面军的战士，听到红军总司令这样夸奖我们，心里也感到很自豪。也觉得应该尽可能地给红 4 方面军弟兄们更多的帮助。

朱总司令对张主席的感谢完全发自内心——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对历史能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会认为张主席对红一方面军做得十分够意思。遗憾的是，许许多多曾经接受过红 4 方面军帮助的老同志，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都把这一点略去不提，好像当初两军会师时根本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也是让许多当初经历了那样的场面，至今仍健在的原红 4 方面军的老战士提起来就摇脑壳的原因。

但是，却有一位地位不低的老人，为历史留下了这不应当被湮没的一笔。

“4 方面军于长征是有特殊贡献的，其一是中途接应。无论是 1 方面军还是 2 方面军，在先后与 4 方面军会合时，都是疲惫不堪之师。1935 五年 5 月，4 方面军派李先念率部接应 1 方面军，会合后提供了大量物资装备，细致到根据作战时炊具容易丢失的经验，还专门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补充到红 1 方面军。最难得的是，考虑到红 1 方面军兵员较少，还调拨 3800 人给红 1 方面军。一年后的 1936 年 4 月，为了策应 2、6 军团（即红 2 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又派此时隶属他指挥的罗炳辉红 32 军迎接。当我们到达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4 方面军立即派数十匹马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送了毛线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如果没有 4 方面军的支持，一二方面军的长征显然更为艰难。其二是巩固了落脚点。属于 4 方面军系统的徐海东所部率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后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这位敢于为我们 4 方面军说公道话的老人就是建国后屡遭极左路线打击，一路上走得来扑爬跟斗的老将军萧克。当时他是红 2 方面军的副总指挥。

朱总司令说完了对红 4 方面军，对张主席的感谢，转而又谈到了红 1 方面军的现状。他的语气顿时变得沉重起来。他说眼下红 1 方面军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从江西出发时的 10 万人，搞成现在不足万把人。林彪的红 1 军团人数最多，有 3500 人，彭德怀的红 3 军团有 3000 人，董振堂的红 9 军团则已名存实亡，仅剩下几百号人了。而且土城受挫后，把炮都丢到赤水河里才跑了出来，机关枪也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步枪子弹也少得可怜，多者不足 10 发，少者只有 3 发，只能作保枪用了。然后，他又说到了 8 年前南昌爆动后他和张国焘在三河坝分手以后的经历。他说起义失败后，很多人都跑了，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了 28 个人，而且这 28 个人中还有人担心他也会逃跑，把他监视起来。

但是，朱总司令对革命的前途却依然充满了信心。他说红 1 方面军虽然目前处境艰难，好在中央和红 1 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都保存下来了，有这么一大批经过严峻考验的优秀干部，再加上红 4 方面军的 10 万官兵，革命一定会有胜利的一天。

而张主席就在这时候开始对毛主席出言不逊了。

“我听说老毛这个人在江西时总爱和中央表现得格格不入，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筹，不少同志都对他有看法。我不明白，既然如此，你们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又重新把老毛推出来执掌帅印呢？”

朱德听出这话味儿不对，严肃地说：“特立老弟，你可不要听别人乱吹风啊。老毛这个人，想事深，看事准，又不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再加上一张嘴巴太厉害，容易伤害人，有的同志对他有意见，是在所难免的。但事实又往往证明老毛是对的。过去，博古排挤他，把他搞下去了。我们到遵义时，全军差不多快散架了，大家——包括一些过去对他有看法的同志——才认识到老毛军事上确实有人所不及的地方，所以才推他出来负责。老毛挂帅以后，队伍活了，我们才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与你们会师。要还是让博古、李德他们乱搞，我们恐怕早就垮杆罗。”朱德这番话说得非常诚恳。

“玉阶兄，”张主席说，“在我面前，你是老大哥了，我也一直很敬重你。有句话，我不瞒你，我认为老毛这个人有股子霸气。刚才吃饭时，大谈喜吃辣椒者，必是革命派，虽是玩笑，我也觉得不妥，不吃辣椒的博古认了真，起而驳之，让老毛着实挖苦了一顿，气得拂袖而去，我看今后和老毛共事，还得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已近 50 岁的总司令敦厚善良，宽于待人，也不会听不出张主席这话的弦外之音。接下来，他便有意地把谈话更多地转到了党内团结的问题上。他说，这些年来，中央巳因内部斗争而叠遭挫折，老同志巳不可多得，留下来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理应倍加珍惜。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懋功会合，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才是。而且他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完全相信红 4 方面军，并不因为这些同志长期没有和中央在一起而有丝毫的疏远。

然而，总司令的这番劝告对张主席并不起作用。

“我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有意见的。”张主席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决议上只承认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继续确认中央的苏维埃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丢掉了中央苏区，1 一方面军打得来只剩下万把弟兄，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吗？我恰恰认为，造成 1 方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军事上的失败，只不过是这种错误的最直接的显现罢了。所以我进一步认为：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检讨的不是军事，而应该是政治。”

“对，彻底检讨政治路线，才是中央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政治路线解决不好，4 方面军的 10 万官兵，也仍然会被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葬送掉。”黄超激动地附合。

朱德的两道浓眉紧蹙起来：“我并不认为你们的意见没有道理，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正确的军事策略而不是其它。1、4 方面军会合后，下一步该采取什么军事行动？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的前途等政治问题，只能留待以后缓过气来再讨论。”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张主席追着问。

总司令回答他：“不管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我认为这样做对整个红军有好处，也可能是当前惟一明智的选择。”

“不敢苟同，不敢苟同。”张主席摇晃着脑袋说，“玉阶兄，我的认为是，军事不过是皮毛，而政治路线才是根本。”

黄超连连点头：“主席的意见入木三分，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反之，政治路线错了，千军万马也可能毁之一旦，1 方面军的惨败，4 方面军的蓬勃发展，难道不恰好证明了这一道理吗？”

总司令见话不投机，站起身来告辞了。说 9 点钟还要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都得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总司令一走，张主席就对黄超说：“我看朱德是别有用心，他是故意来把中央已经定下的调子透给我，让我先摸准脉，不在会上当反对派。”

6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 1、4 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 1、4 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29 日，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命令 1、4 方面军立即北进。

通过决议时，张国焘也举了手。但是，那是宥于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不得不“少数服从多数”。他清楚地看到了当前问题的严重性，他手中猛将如云，雄兵 10 万，而毛泽东等人兵微将寡，却拥有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手杆，使他成为了痛苦的“少数”。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战略思想无人喝彩。那么，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必须首先改变政治局的结构，让更多的 4 方面军的同志加入进去。

两河口，本是两江会合的地方。谁知，两大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历经千辛万苦刚刚在这里拥抱联欢后，马上又暗涛汹涌，形成了分流之势。

### 3、“杂谷脑黑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像走马灯一样来住所找张国焘谈话。而张国焘和他们一样，也都是高层次的政治家军事家兼思想家，口笔两厉，能言善辩，对自己业已形成的看法，很难轻易被人左右。这种建立在自信上的固执有时很宝贵，有时又很糟糕。

张国焘舌战群儒，和他们除了争吵还是争吵。在我的印象中，前来说服张主席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去的。

第三天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发前往毛尔盖。张主席送他们启程后，即刻动身赶回

杂谷脑。张主席的随行人员加上红 30 军、红 9 军、红 4 军及彭杨军政学校团以上的干部，我们的马队浩浩荡荡，比来时庞大了许多。

回到杂谷脑的第二天，张主席主持召开了一个 4 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他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

他严厉地批评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他说中央领导着 1 方面军长征，一味避敌求存，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不堪”，“每人平均只有 3 颗护枪的子弹，这是朱总司令亲口告诉我的”。他要“4 方面军的干部们，尤其是党员干部，拿出爱党的热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绝望的气象，去挽救兄弟的 1 方面军战友”。他谴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洛甫、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对付 4 方面军。“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急欲控制我 4 方面军”。他攻击中央“不将 4 方面军当作嫡系部队，不视张国焘为自己人”。最后，他要求 4 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也紧接着向大会讲话。他说：“在如此严峻的关头，我认为，我们 4 方面军的广大官兵拿出百倍的责任心来拥护我们的张主席挺身而出，纠正中央的错误，挽救处于危难中的红军，避免中国革命的失败。而现在我们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求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改组无能的中央政治局。”

应该承认，张主席的鼓动能力是相当强的。再加上红 4 方面军发展的历史和长期脱离中央在张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官兵自然而然地将张主席当成了中央的化身。而连番累次地大肃反，差不多已将敢于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即便还剩下几个持不同意见者，也是噤若寒蝉。在广大的红 4 方面军官兵心中，中央只不过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而张主席则是被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且已经被神化了的最高领袖。不少人还多少对他保持着几分“真命天子”的敬畏心理，因此张主席才能够登高一呼，万众响应。

我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后来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杂谷脑黑会”的过程。它只有一天半的时间，而且是抢在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之前紧急召开的。毛泽东等人想必已经考虑到张国焘在两河口期间所暴露出来的危险倾向，和他顽固坚持己见，恃强自重，盛气凌人的态度，所以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周兴组成中央慰问团前往杂谷脑，名义上是代表中央来感谢红 4 方面军对中央及红 1 方面军的支持，而实际上是向红 4 方面军的官兵传达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

刘伯承一到杂谷脑，就迫不急待地就向张主席打听曾中生的情况。

他绝对想不到，就是因为他对老朋友的关心，反而会使老朋友提前遭到了毒手。

刘伯承和曾中生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当时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曾中生在中山大学，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经常在一起参加中国学生的聚会，彼此来往不少。1928 年夏天，他们共同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1930 年夏秋之交，刘伯承归国之际，早在 1928 年冬就已经回国的曾中生刚刚进入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回国后，在上海呆了 1 年多，也于 1932 年 1 月进入中央苏区。算算，两人已

经六七年没有见过面了。

刘伯承只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具体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向张主席打听，张主席很坦然地说：“中生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我留下他养伤，伤好了就回来。”

刘伯承信以为真。

他哪里知道，曾中生当时就被关在离他不远的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此时，曾中生也得知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的消息——四方面军保卫局的陈明义悄悄告诉了他。曾中生兴奋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连夜赶着给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申明自己无罪，要求彻底平反，还列举了张国焘从鄂豫皖到川陕的种种罪行。不幸的是，这封信未写完，就被看守作为翻案罪证缴获了，马上送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又恼又怕。慰问团走了以后，立即把黄超叫来，命令他把曾中生秘密关押，行军时采取措施，绝对不能让 1 方面军的人看见他。不久两军分裂，张国焘率部回到阿坝。既已和中央撕破了脸，索性就来了个快刀斩乱麻，叫黄超把曾中生处死。几天后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驻地附近的一片密林中。没用枪，没用刀，只用了一根棕绳。

张主席已经把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做到了中央慰问团的前面。中央慰问团的同志发现，虽然他们所到之处都有欢迎的笑脸，甚至官兵们敲锣打鼓到离营房老远的地方迎接他们。可是，他们很快便感觉到工作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因为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与张主席意见一致的声音：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与红 1 方面军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央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错误，所以，红 4 方面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改组无能的中央政治局。到后来，他们甚至常常在夜里受到中、低级军官们的纠缠与威胁，甚至有的高级指挥员当面口出狂言，要他们把屁股坐到张主席一边来，否则要撵他们走。有的部队还真地发生了驱逐中央慰问团的事件。很快，中央慰问的同志们便发现他们已经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

这样的情绪很快便在士兵中反映出来，红 4 方面军的战士中出现了对慰问团随从人员不友好的现像，如行军中故意抢道，宿营时争抢驻地，甚至谩骂攻击，有的还发展到拳脚相向……

在“杂谷脑黑会”上，经张主席、陈总政委一煽动，首长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这样的情绪也反过来给张主席壮了胆。会议尚在进行，他就按捺不住地给中央发电，称“我 4 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陈昌浩也迫不急待地以个人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张国焘同志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并给中革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

一日之内 3 个非同寻常的电报到了中央，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至此完全清楚了张国焘的用心何在。

中央立即回电，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这一点，张国焘本人在 1937 年党中央在延安发起的批张运动结束后写给中央政治局的

检讨中就承认道：“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为顾全大局，中央仍作出妥协，于 7 月 18 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周恩来同志红军总政治委员之职务。”

中央考虑到 1、4 两军官兵的矛盾也巳公开，甚至激化，几乎每天都有抢粮、抢枪、打架、武装包围等恶性事件发生。为了尽快消除消除这种极不正常的现像，亦让张国焘能够认识到两河口会议后他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中央政治局于 7 月 21 日至 22 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了紧急扩大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 4 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中央在这样的时候拿出这样的议题，让张国焘颇感诧异！

当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分别就这一议题作完报告后，会议对以上 3 个报告进行了讨论。与会者的发言十分踊跃，他们既对红 4 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但对错误的批评也是毫不客气的。他们严肃指出红 4 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不同意张国焘在报告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 4 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他们认为在粉碎了刘湘“6 路围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批评张国焘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同时，退出川陕苏区时把所有的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游击队统统带出根据地，更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这样不顾事实的批评显然让自恃有功的张国焘怒火万丈，会上双方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两河口会议。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芦花会议上，中央对全军进行了整编：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

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周纯全

总参谋长刘伯承

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参谋长叶剑英

红 1 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

1 军（由 1 军团改编）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3 军（由 3 军团改编）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

5 军（由 5 军团改编）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

32 军（由 9 军团改编）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红 4 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4 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9 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30 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31 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33 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张国焘自然不会满足于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他盯着的是毛泽东的主持军委工作这个不仅可以指挥全军实际上也能左右全党的的位置。但是，毕竟，红军总政委离军委负责人，不过一步之遥了。

于是，张国焘下令拔寨起程，向毛儿盖方向集中。

笔者注：陈明义，河南省商城县人，1955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四川省人大主任等职。陈明义任省人大主任期间，在《华西都市报》上看到连载的本文后（吩咐秘书搜集每一天的连载），给四川日报社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文中存在的不实之处，比如，张国涛并没有派人杀朱德的座骑等。最让笔者欣慰的是，在他亲自关怀下，当时虽然红军身份也得确实，但只享受营级待遇的何福圣，被提升为正师级待遇。遗憾的是两月后，何即辞世。

4、陈昌浩被拒之门外

在移师毛儿盖的路上，张主席不断地召见各军首长，甚至一些主力师的师级领导也奉召前来谈话。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果红 4 方面军和中央的分歧公开化，他们将取何态度？

总部前移到卓克基时，张主席又下令各军按兵不动。他和陈昌浩等人商量后，给已经到达毛儿盖的中央拍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检讨中央的错误。

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张国焘速往毛儿盖参加。

张主席却自作主张，带上陈昌浩，仍由我率警卫排护送，飞骑赶到了毛儿盖。

毛尔盖在松潘县的正西面，北临红原草地，向南则倚打鼓山蜿蜒而去的万千云山。毛儿盖是红原草地的边缘，打鼓山脉的起点，冬日里，山岭上白雪皑皑，冰凌满树，而在这夏日里，山上冰雪消溶，山水便奔流而下，汇聚到平地上来。这样，年复一年，毛儿盖一带便成了令人谈虎色变的泥水草地。当地藏民中流传的一首民歌这样唱道：

格桑花开在山梁上，

寨子里就有了春光，

青鬃马跑在草地上，

牧马人就有了翅膀，

阿妹你要嫁到毛儿盖，

水草地啊可得叫你断肠。

我们到毛儿盖时，正逢初夏，是草地上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眼前展开的，活脱脱就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芳草茵茵，绿色溶溶，一直向前延伸，而远处的地平线上又有银光闪闪的几点雪峰悄然露出，就像撒落在海上的几星珊瑚小岛，薄云舒卷的天穹是深蓝的，绿得耀眼的草地是绚烂的，多登花、茜绕花、金铃子、格桑花，红的像火，黄的如金，白的似雪，色彩斑斓，溢彩流光，也给明净的空气里溶进了淡淡的馨香。在这鲜花如云的原野上，或信马由缰，或策马飞奔，确实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

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其实并未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准确的地点是在沙窝，离毛儿盖将近 20 里的一座喇嘛庙里。

张主席一行在毛儿盖的 9 军军部吃过晚饭，然后驱马前往沙窝。到达喇嘛庙前的山口时，天已经黑了，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稍顷，张闻天迎了上来。当他看到陈昌浩和张主席站在一起，不由皱了下眉头，直截了当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张主席生气地说道：“昌浩同志是候补中委、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根本不予采纳，“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

这样一来，反倒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

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里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想到老同学张闻天对自己如此严厉，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

应当说，他和张闻天交情不浅，他俩都同属党内闻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9月，20岁的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当他进入“中大”时，张闻天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已经毕业留校任教，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比陈昌浩年长6岁，他的身世阅历、渊博学识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都为陈昌浩所羡慕和敬佩。两人之间，与其说是同学关系，不如说是师生关系更为确切一些，而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各自都把对方称为“同志”。

1930年10月，陈昌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于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大年初一，张闻天、杨尚昆乘轮船由大连抵达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馆。说来也巧，第三天，正苦于与组织联系不上的张、杨，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陈昌浩。相逢之后，陈昌浩即将张、杨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转告给中央机关。当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馆，看望了张闻天和杨尚昆。1931年4月，陈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离开上海以后，他跟张闻天四五年不曾相见。直至长征中1、4四方面军会师时，二人才得以重逢。这时，陈昌浩担任红4方面军政治委员已有4年之久。西征转战入川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他为候补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张国焘的4方面军中的第2号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两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这一场路线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

张主席只带我一人，随张闻天徒步进入山沟。

会议是在喇嘛庙外面一座亭子里召开的。会上依然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争论不休，而且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政治局委员们举手表决。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而且更令他恼火的是虽经他拼命反对，《中共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仍然被通过了。中央同时决定：1、4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1方面军1军团、3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4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以4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和1方面军的5军团、9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兼总指挥，张国焘兼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到下半夜，会议才散。张主席冷淡地和各位参会者握了握手，由我和另一位负责会议保卫的同志陪着，步出沙窝山口。

陈昌浩一见张主席走出山口，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前问：“主席，怎么样？”

张主席阴沉着脸说：“他们以多打少，还能怎么样。”他脚不停步，径直往前走去，警卫们赶紧牵上坐骑，默默地跟在他和陈昌浩后面，往毛儿盖方向走去。

陈昌浩听张主席给他讲了会议的经过后，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中央会这样顽固地冷淡4方面军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的态度再强硬再严厉再激烈一些，是不是会迫使中央让步？”

张主席说："昌浩，你不要沉不住气，我心中有数。让他们表演，只要军队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老毛他们闹得再凶，也是虚张声势而巳。"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东方发白，走回了毛儿盖。露水，把我们的军装，马匹都濡湿了。

毛儿盖会议一共开了 3 天，这是第一次会议的情况。张主席没日没夜地两头忙，一边要赶到沙窝会上和毛泽东等人争吵，回来又连夜赶晚地与等候在 9 军军部的陈昌浩、何畏、黄超、李特等十几位 4 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商量，然后再把商量的意见拿到会议上去。他在这 3 天时间里几乎没有脱衣上过床，困了，随便歪在哪个角落里打个盹就算睡过了。我自从给张主席当警卫员后，每天就雷打不动地要为张主席做一次按摩，一般在睡前，时间二三十分钟。可这些天里，连做按摩的工夫也没有了。卫士们可以轮着值班，可我这警卫排长丝毫不敢偷懒，只能跟着张主席受累。

当时中央领导虽然在北上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对于张国焘这些年来领导 4 方面军的工作，评价却不尽相同。毛泽东认为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是正确的，退出川陕苏区是错误的。周恩来则说张国焘撤出鄂豫皖苏区是错误的，而撤出川陕苏区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前两天和张国焘干了一仗的博古这次却对张国焘给予了肯定，说张国焘执行了中央苏区 4 次反围剿后的党的正确路线，领导 4 方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发展。

所有人都能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明里表扬张国焘，暗里却是以此来证明当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是正确的。

在沙窝会议的最后一天，张主席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由，突然拿出一分名单，提出增加 9 名 4 方面军的干部进入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共才只有 8 人(张国焘是其中之一)，怎么可能同意让张国焘一呼隆搞成"张家店"？会议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一建议。但为了团结，双方通过协商，最终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

但中央此后对这一次人员调整从来不予承认。

张主席无疑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重大挫折，一觉醒来后，又迫不急待地前去拜望住在这毛儿盖的王稼祥，还特地吩咐我准备礼物：几大块牛肉干巴、两条烟卷、一包川土。

张主席带着我进去时，王稼祥正躺在床上抽鸦片。他在突破湘江时被敌机炸弹的碎片炸穿了大肠，经过傅琏璋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大小便。他是躺在担架上走完长征路的。由于药品奇缺，一直靠抽鸦片减轻痛苦，久之成瘾。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因为有伤，持续 3 天的沙窝会议他没有参加。张主席和他曾在莫斯科一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算是老朋友，见了面，都很亲切。

张主席先关心他的伤势病情，然后向王稼祥介绍了沙窝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厌其烦地谈到了他和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国焘同志，你是打算让我扮演战国时的鲁仲连这角色吧？"王稼祥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张主席说："是的，我听朱德告诉我，你在遵义会议上帮了老毛的大忙。我想现在只有请你出面，老毛才可能听得进去几句。我跟他没法谈，认识相去太远，这几天在沙窝，我们吵得比在两河口、黑水还要厉害，我是个犟脾气，他又是头湖南骡子，都很倔，都拍了桌子。我看，老毛这人对我成见很深。"

"不，国焘同志，"王稼祥恳切地说，"我虽然一直躺在担架上，对你的情况，对会议的情况，我还是很关注的。你今天请我扮演鲁仲连，我很愿意。不过，我要劝的不是老毛，而是你。我确实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他，但这绝对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经过比较才认识到，目前只有老毛才有可能挽救红军。我现在仍然支持他，是因为他进入军事指挥小组以来所做的一切，也确实令大家心服口服。现在的情况你都看见了，遵义会议决定由老毛、恩来和我组成 3 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我一直离不开担架，恩来这段时间也病得恼火，实际的军事工作全由老毛一个人在顶着干。你认为毛主席对你有成见，这其实是你的错觉。"

接着，王秀稼祥坦诚地批评张主席："在两军会师之前，整个中央，包括老毛本人，对你都是很赞赏的。没有你的大力支持，我们可能跨不不过这道难关。这些，大家都是记在心上的。可会师以来，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再三坚持要中央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作全面的检讨，难道你就不能也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坚决认为，在当前，最重要的、事关全体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是党内的高度团结与统一，二是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任何有悖于这两个大原则的，我都不会赞成。国焘同志，你是长期肩负重任的老布尔什维克了，忠言虽然逆耳，我想你还不至于反感吧？"

张主席满怀希望而来，没想反倒被王稼祥说服开导了一通，只得心不在焉地摆了一会，悻悻告辞。

就在张主席停留毛儿盖期间，又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4 方面军几位高级将领群起围攻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

事情的开端是，陈昌浩将 4 方面军驻扎在毛儿盖的几位首长召到右路军指挥部，商量好以后，然后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他反映。

张闻天来后，陈昌浩以强硬的口气"劝告"张闻天，要他拿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人认真听取采纳 4 方面军的意见。

张闻天见他出言不逊，身边还有一大帮将领们助威，心中虽是愤怒，但为了维护团结，依然压着火气，向陈昌浩耐心解释、劝告。

不料，何畏按捺不住，"啪" 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向着张闻天大吼道："党中央一错再错，到现在还根本不认错，我这个老共产党员，从此以后再也不信任中央了！"

何畏一发难，其余的将领们也全都一轰而上，赤膊上阵，对张闻天展开了围攻。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为什么中央对 4 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指使凯丰在《布尔什维克》上公开发表攻击张国焘的文章？随后又偷偷摸摸地收回？还专门打招呼不能让 4 方面军的

同志看到。为什么中央红军遭到这样惨重的失败不对自己进行全面检讨，反而要对 4 方面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清算？这样的行为，能算光明正大吗？他们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的，张国焘领导 4 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爱戴，如果中央继续忽视张国焘同志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 10 万官兵的重大反感。

大家七嘴八舌，围着张闻天吵个不休。

这时，何畏用剩下的一只手臂气势汹汹地指着张闻天大骂道："你像个什么党中央总负责人？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在党内以脾气温和著称的张闻天此时再也无法容忍，勃然大怒，瞪着端坐在一旁的陈昌浩大声说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 4 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党的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洛甫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

"我明白了，昌浩同志，这件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今天这件事，我会郑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的。"丢下这句话，张闻天拂袖而去。

陈昌浩在他身后飞出一腔："请便吧，我希望那不是你现在惟一能做的事。"

平时寡言少语遇事沉得住气的徐向前看不过去了，忍不住站起来，用竹子烟杆在桌上"梆梆"猛敲，冲大家嚷："都在干什么啊？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那些事不该我们管，我们也管不了！现在部队已在这里停留 40 多天，郑义斋（时任总供给部部长）天天跑来向我诉苦，说这些日子战士们吃黄麻把嘴都吃肿了，已经快饿死人了！我们得赶快走，等到了有粮食的地方，你们吃饱了再吵！"

这就是"毛儿盖兵谏"的全部过程。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也愈发恶化了 1、4 两方面军官兵的关系。

不过，毛儿盖却成了廖承志的福地。有一天，他和"劳改队"的成员一起被押着外出打粮。走到一个叫州西的小村子，一彪人马飞驶而来，为首一人，居然是周恩来！

"那时我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同志，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

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5、杀机毕现

在沙窝会议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 1、4 两军的混编工作。这时候，陈昌浩和徐向前已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

张国焘仍住在红 9 军军部里。此时的红 9 军军长由孙玉清接任，政委是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是陈伯君。

每天都有将领们到红 9 军军部来，有的是张国焘召来的，有的则是是自己主动来的。以红 4 方面军的为多，也有红 1 方面军的。红 4 方面军的人围绕着军队实权这一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害怕的就是被中央先分割削弱，再被挤垮、吃掉。自从中央决定两军混编以来，在他们不少人的思想中便产生了很大的疑虑。过于敏感地认为“张主席功高震主，遭人所嫉”，产生了“中央不相信 4 方面军”的念头。他们认为张主席代表红 4 方面军提出的一些意见没有得到中央的尊重，说了等于白说，相反还受到某些意见相左的领导人的讥讽揶揄，认为是被中央“瞧不起”。一种由于气愤而导致的怨忿情绪，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红 1 方面军前来接近张国焘的将领则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有意见，认为张国焘把红 4 方面军壮大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眼下只有他才能代表党内的正确路线，所以偷偷摸摸地前来表明对他的支持。

有一天晚上，9 军军部里大约来了七八位指挥员，又在七嘴八舌地议论沙窝会议。何畏说着说着上了火，当着张主席的面就破口大骂起来：“什么中央？事情做得真他妈太损了！没有这帮烂秀才瞎搅和，我们照样能够把红旗打到底！”还带着一种揪心的痛苦和担忧对张国焘说，“主席，你总是在会上一让再让，我怕你让了第一步，他们后面还会来第二步、第三步啊！”

张主席环视了一下在座者，像很快意识到什么，对何畏瞪了一眼，斥责道：“你现在已经是候补委员了，说话要注意分寸，像你这样整天不分场合的大呼小叫，容易坏大事的。我参加的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赞成北上，那我就只能够放弃我的意见嘛。”

在场的，还有两位 1 方面军的同志。

就在张国焘呆在毛儿盖期间，不祥之兆接踵而来……

两军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地漫延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剑拔弩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如弟兄，现在却恶语相讥。红 4 方面军的官兵糟踏红 1 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红 1 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红 4 方面军是军阀部队，政治落后，作风恶劣，是“军阀走狗”、“四川跑出来的土匪”。谩骂、抢粮、抢枪等恶性事件一日数起。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像。虽然红军组织了

联合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主席的警卫工作巳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主席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主席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毛泽东也没有掉以轻心，同样是调兵遗将，暗做准备。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 4 人。我则搬进张主席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主席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主席谈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主席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

只有林彪，张主席对他印象很好，说他像 4 方面军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主席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张主席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骑兵时，把这匹马送给了 4 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 1 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就说道：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主席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巳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巳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巳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情，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 2 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任何事件的发生以至结果，都有着内在的缘由。回首毛儿盖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我这

个身处特殊位置的老兵个人的思考和看法，我认为张国焘最后走向反面是有阶段性的。他在两军会师以前的表现还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不惜放弃正在蓬勃发展的川陕苏区，去与中央红军会师，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在红 4 方面军本身供给也很困难的情况下——据我所之，当时总部下了道死命令，必须至少拿出一半的物资粮秣来支援远道而来的红 1 方面军——尽最大努力帮助红 1 方面军。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万把号人，而且衣着破烂、面带菜色、缺枪少弹，认为他们已经垮掉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必须由他和红 4 方面军来完成，于是开始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而且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恐怕也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自不量力”、“图谋不轨”。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和力量的，中央带着红 1 方面军连吃败仗，到头来连安身立脚的地盘都弄丢了，让敌人追得来扑爬跟斗满世界跑，而自己指挥红 4 方面军连战皆捷，手下兵强马壮，猛将如云。再加上他在党内的资格很老，一大就是主持人，如今能升上来与他“坐而论道”的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等一帮小青年，当时还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学生辈，恭恭敬敬地聆听过他的教诲，见了面还得向他鞠躬问好。没想自己回国后，却一直受到压制，心里积着怨气，出生入死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才拉起一支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的军队，总该轮到自己扬眉吐气一回了吧，没想仍然要受毛泽东和莫斯科回来的这帮小青年指挥——而且这帮嘴上无毛的小青年刚刚把中央苏区指挥丢了。他心中自然会有想法。这是张国焘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中央与红 1 方面军那时处于绝对弱势，意识上都对枪杆子重视到了极其敏感的地步，对张国焘也的确有猜疑防范之心，总想把他的傲气打掉，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听命于中央，每当发生争论时，言语之间对张国焘也多有不恭之意，这就更让张国焘愤懑不平，愈发增强了他的分裂之心。一直处于高度警惕之中的毛泽东一看事情不妙，担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动杀机，赶紧带起部队来了个胜利大逃亡。客观上更让红 4 方面军的官兵感到自己在毛泽东和中央的眼里是支杂牌军。两位领袖严重的互不信任，造成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分裂，铸成中共历史上的一次悲剧。过了六七十年再来冷静地反思、检讨，我认为把责任张国焘身上一推固然省事，但历史恐怕就有了残缺。当然，后来张国焘一意孤行另立中央，这一下就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再后来又隐居山林，把路弄得越来越窄，发展到逃离延安投靠蒋介石，走向了对立面，就更酿成了他自己终生的悲剧。

## 第十三章 军旗下的阴谋

藏族通司同意带路，但不走路，要红军抬着他们上路……我最初也有一瞬间的闪念：对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动粗，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李特的举动，提防他掏出左轮手枪，向毛主席射击……

### 1、葛曲河边

1935 年 8 月中旬，中央命令会师后混编成的左右两路军同时分兵北上，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然后两军在巴西会合。

中央机关偕右路军向草地开拔后，张主席与中央派到左路军来的朱德、刘伯承一起返回

卓克基，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率左路军从卓克基、马塘一带出发，准备穿越草地，经阿坝向巴西前进。

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兼左路军总指挥，但左路军的指挥大权实际上完全落在了已是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手中。而刚刚在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受挫回来的张国焘，此时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了。

毛主席在随右路军北上的途中不断发来电报，催促张主席加快行军速度，早日与右路军在巴西会合，可张主席却变换着招数，一再抗命，使左路军走走停停，行动迟缓。

8月下旬，中央和右路军走出草地，已经按预定计划抵达班佑，左路军才刚刚离开阿坝，踏上西草地的边缘。

我们最初看到那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的大草地时，还觉得新奇、壮观，可一走进去，便深深地感觉到了它的凶险。草地是一片茫茫无边的荒原，四处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置身其间，让人辩不出东南西北。草丛下面沟汊交错，积水泛滥，简直无法找出路来。

当地的藏族牧民大都听信了反动宣传逃走了，我们好不容易花高价请到的几个通司，条件也苛刻得很。他们同意带路，但不走路，要红军抬着他们上路。

我们只好跟着抬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密集的地方，一个一个首尾相连，艰难地前进。

越走进草地深处，困难越是严重，天气变幻莫测，时晴时雨，忽儿艳阳高照，忽儿大雪纷飞，忽儿冰雹骤降，特别是到了深夜，更是冷不可挡。我们全都是穿着夏衣进来的，只好找一块稍高的地方，大家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最糟糕的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积水盈尺，我们只好站在水中、风雨中站着等候天亮。

9月1日，陈昌浩给张主席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右路军向甘南行进途中，在包座将一个团的守敌和增援的一个敌师悉数歼灭的喜讯。

包座是红军北出四川，向甘南前进的必经之地，胡宗南手下的伍诚仁早也派有一个团扼守在这里。随着红军日夜逼进，驻在松潘的伍诚仁又倾巢出动，火速赶往包座增援，企图给从草地挣扎出来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一个迎头痛击。

包座守敌只有一个团，而增援敌军则是一个师的大部，因此陈昌浩、徐向前决定采用“围点打援”，集中强大兵力先吃掉伍诚仁，再回头消灭包座之敌。

投入包座战役的是编入右路军中的程世才、李先念的红30军，和许世友、王建安的红4军。这两个军都是红4方面军中的王牌部队。

战斗打响后，进行到次日天亮，增援之敌被截成一段一段吃掉，伍诚仁跳河自溺，该部12000人全部被歼。这边战斗打响不久，包围包座的红军王钧部也发起攻击，将守敌悉数歼灭。王钧师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包座战役是 1、4 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

可是，就因这一仗是被编入右路军中 4 方面军部队打的，张国焘竟把这一胜利当做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

接到陈昌浩徐向前联袂发来的电报，张主席大喜过望，当着参谋、卫士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和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送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的 4 方面军！"

此后，张主席一路上更是磨磨蹭蹭。9 月 3 日，才走到葛曲河边。

其时葛曲河水陡涨，担任前卫的部队被挡在了河边上。张主席、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只见白浪滔滔，水流湍急，河宽逾百米。

总司令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是四川万县人，会水，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主席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总司令没有回答，忙着向藏族通司了解情况。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结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能退下去。

问明情况后，总司令对张主席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它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我不能当败家子。"张主席一句话就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后，我们已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而且，在葛曲河边还发生了一桩极为凄惨的事情。就在张主席下达了回师阿坝的命令后，禁烟局的一位女同志生下了一个孩子。那一刻，河滩上密密麻麻地站着许多战士，四周毫无遮掩，许多女战士惊惊慌慌地跑上前去，用身体围住了产妇。婴儿的啼哭声一响起，刚才还在嘈嘈杂杂的声响一下不见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满河滩的红军官兵一瞬间变成了泥塑木雕。

这孩子生不逢时，部队马上要出发，连大人也受不了，小娃娃咋个带得走？最后，母亲咬着牙，把刚刚生下的孩子，亲手扔进了葛曲河里。

这件事，亲眼目睹的人不下几千人，却只有廖承志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把这件事记下来了："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太强烈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作一幅画，把当时的情景真实地留给历

史，留给后人，让人们知道，长征有多么的艰难！可是，每一次我提起画笔，一想到那铭心刻骨的情景，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心颤，手抖、泪流，无法下笔……终究未能画下来。”

2、黑夜笼罩着喇嘛庙

张主席不顾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紧跟着他又口授电文，以“部队极显疲乏，疾病增加，亟需短期休整”为由，叫黄秘书长拿去拍发，抗拒执行中央命令。

但是，这还不够，他已经打定主意，要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来拔除总司令、总参谋长这两颗“眼中钉”了。

在这片大草地上，每隔两三百里就有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户喇嘛住宅和少数民房、商店，形成了一个以神权为中心的村镇。

大约三天后的一个傍晚，总司令部在折返阿坝的途中住进了一座这样的寺庙里。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也重要的角色。

那天深夜，张主席命令我和特务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的卫队以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控制起来。

任务是张主席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秘书长作了补充和具休的布署。

这样做的目的是敲山镇虎，因为朱德和刘伯承老是在 4 方面军官兵中宣传中央北上的精神，这让张主席非常气恼。

我不知道徐泽明刚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一瞬间的闪念：对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动粗，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

可这样的顾虑仅是一闪即逝，而且丝毫不敢流露半分。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充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

而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经预感到张主席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出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 4 方面军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 1 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

这些首长在被张主席召见时我全都在场。当时 4 方面军官兵普遍对毛主席突率 1 方面军

不辞而别情绪很大，他们也不例外。后来，写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传记文章我看了觉得哭笑不得！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对张主席忠诚，就是对党忠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红 4 方面军中，确实是只知道有张主席，而不知道有什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样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秘书长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制订行动计划，决定夜里两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小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 70 多人，真要打草惊蛇也会有麻烦，所以要求行动一定要快，要突然。我率警卫排缴朱德、刘伯承两人的警卫员的枪。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如果遇眼反抗，则坚决消灭。对朱德、刘伯承则不能伤一根毫毛。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又马上赶回张主席屋子里向他汇报。张听完后，点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卫士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巳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马上开始行动。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墙壁上挂满经幡，旁边靠着一长排转经筒的廊道向前奔去。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 50 米，眨眼之间便巳到了门前。

这时，外面巳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巳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大声喊道：“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主席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主席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首长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我能肯定这些写文章的老首长当时都不在现场，他们大都是事后，特别是在延安公开批判张国焘的运动中听人揭发的。虽然主要事实走展不大，但细节却很不真实。

比方说，有位老首长写张国焘当时“暴跳如雷”、“气极败坏”；还有位老首长写道：“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你！’等等，都是一种简单的、想当然的、脸谱化的描写。根本就没这回事！

作为大政治家，张国焘哪会这么简单？要说他阴险、毒辣，他敢于在杂谷脑时指使 4 方面军官兵将中央派来协调两军关系的代表团撵走；他敢于一再违抗北上决议甚至率部悍然南下；他敢于对朱德、刘伯承搞突然袭击，就足以证明。一旦他把两位首长控制在手中，他对他们仍然表现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能体现出他的“伟人风范”又企图达到感化对方为他所用的目的，因为张主席不会不清楚，对朱德、刘伯承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来说，动动怒，拍拍桌子，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这种“伟人风范”不单对张国焘非常重要，凡能坐到他那个位置的人，大都把形像看得来比自己的命还重。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四方面军官兵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也把他们当做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主席所渴望利用的。

所以，当我把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请”进张主席屋子后，张主席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作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总参谋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总司令说了一句很让张主席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3、改变历史的一刻

即使如此尖锐，张主席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主席费尽口舌，得到的却是总司令粗粗的一嗓子：“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主席退而求其次，要朱、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总司令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主席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的威胁。

总司令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砍随便你，不过，我是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主席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已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主席解除了朱、刘首长的手下后，紧跟着就发生了至今仍云山雾罩，没人能说得清楚的"密电事件"。

过去众多的权威性党史资料与事件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告诉我——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遭致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曾经几十年不容置疑的说法是：

9 月 9 日，张主席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正在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

"吕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

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

“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仍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

他走进会场时，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

吕黎平走上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

叶剑英一听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来，把电报递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先看一看。

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汗。

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处，把电报给毛看。

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主席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抵达巴西后，立刻派 11 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每天都呆在毛泽东身边。

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已经看过电报。

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主席先下手为强，将右路军中的原 4 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当人质。

"这是下策。"毛主席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 7000 多人，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

毛主席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

毛主席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

毛主席当即赶到右路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

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主席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4、毛主席被困巴西

毛主席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 3 军的驻地巴西会合。然后，他也和彭德怀一起出发了。

巴西离班佑 30 余里，同样不安全。

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 1 方面军的 1、3 军以及中央机关共 7000 多人，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

毛泽东担心，陈昌浩的人马占压倒优势，如果知道中央继续坚持北上，很可能会以武力迫使中央就范。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已决定南下，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都要到地里去收割青稞。否则 1 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

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带出来，最好把地图也偷出来。

为了不致打草惊蛇，杨尚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

出发的命令是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杨尚昆遇到一个个人问题，李伯昭不在班佑，她正巧带着红军剧团的人到 30 军去教战士唱歌去了。为了不至于使计划暴露，他只好忍痛丢下了妻子。

凌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来，夹在叶剑英的行李里带了出来。

他俩走出营房，让警卫员牵着马先把行李驮走，他们再去将政治部和二局的人带出来。

这天夜里，比被迫丢下李伯昭的杨尚昆更不幸的是王首道。两军分裂只不过使杨尚昆和李伯昭分别了一年多，却使王首道和爱妻王泉媛本当白头皆老的婚姻，化为了充满苦涩凄凉的半世情缘。

王首道是在蔡畅、金维映、曾志、邓六金、刘英等几位姐妹的热心撮合下，才与王泉媛喜结连理的。那时刚刚开过遵义会议。一个秀丽端庄的姑娘进入了他的眼帘。姑娘叫王泉媛，是刚从干部休养连调到地方工作部的。他俩在瑞金时就认识了，没想现在又分在了一个部门工作。大姑娘小伙子，很快便成为姐妹们拿来开心的对像。而这种开心常常是直奔主题，目的明确。姐妹们一个个心直口快，残酷的生存状态又不容人说话迂回曲折，所以当起红娘来既热情似火又直来直去。彼此有意的青年男女中间也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纸，有这么多姐妹争着抢着把纸捅破，事情也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新婚之夜，新郎送给新娘的，是用红绸包着的一支精致的袖珍小手枪和八粒子弹。而新娘却拿不出礼物来送给新郎。新娘答应按照家乡的风俗送新郎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因为据说男人穿上这样的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妻子的身边。但在当时的恶劣条件下，新娘送出的只是一句口头承诺，也是向新郎表示出一种心愿。而新郎也不真需要她这双鞋，有这句话，他就很满足了。

但是，新娘却坚决地说："不，我一定要送你一双千层底鞋！"

新娘当时绝对不会想到，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她才兑现了自己庄重许下的诺言。

按照当时处于连续行军打仗状态下的红军的规定，夫妻是不允许住在一起的。1935 年 6 月 26 日晚上，王首道派自己的警卫员找到了王泉媛，叫他马上到王首道的住地去一趟。半轮银月高挂天上，夜色朦胧，这原本应当是一个温馨浪漫的夜晚。他们是真正的夫妻，也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过了度过了他们共同拥有的最后一夜。这一对夫妻天一亮就要分手。王首道跟上了毛泽东，王泉媛则跟上了张国焘。等到两军一分裂，他们夫妻二人也就各奔南北了。这一别，从此了断情缘，天各一方。等到他俩再一次见面，当初的新郎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新娘则成了一个受尽磨难的普通农妇。1996 年 9 月 24 四晚，离京数千里之外的王泉媛在电视上看到王首道逝世的消息，顿时伤心得晕厥过去……

天快亮时，右路军指挥部的电话暴响不停。陈昌浩、徐向前这时才知道毛泽东带着 1 方面军的人马一夜之间全都跑光了，指挥部唯一的军用挂图也不翼而飞。陈昌浩和徐向前面面相觑，觉得脑壳轰地炸了！

许世友、程世才、孙玉清等先后来电话，说 1 方面军已经不吭声不出气地跑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

陈昌浩急红眼了，问徐向前："打不打？"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许久说不出话来。此时他觉得大受刺激，心里闷得慌，脑袋麻木得厉害。

他痛苦地呻吟道："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呀？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关键时刻，陈昌浩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最后拍板的权力——这能够改变历史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陈昌浩还是在他那个位置上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 4 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的部分学员，飞马赶到巴西，力劝毛主席回来。

李特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人年轻资格老，平时出言不逊，脾气很大。他率一队骑兵赶到巴西后，毛主席尚未离开。而此时，3 军凌晨两点便已经向俄界开拔了。

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

李特率人拥进寺庙，狂呼乱叫要面见毛泽东。喊了一阵，出来见他们的却是彭德怀。

李特上前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明确表示拒绝。

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

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上。

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说道："红军战士们，事实将会证明，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

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十名学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担心酿出大乱，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冷静。

彭德怀也密切注视着情绪十分激动的李特的举动，提防他陡地掏出左轮手枪，向毛泽东射击。

好在并没有他所担心的情况出现。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道："红军南下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待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分歧，要不了多久，大家还是会统一思想，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吼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承认错误！他们丢掉了中央根据地，把 10 万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 1 万多人。看看我们 4 方面军，到川北时只有 1 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10 万雄师，谁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已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碧眼金发的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已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伸出双手从后面紧紧抱住他。

李特用力地挣扎了几下，没能从李德那铁钳般的双臂里挣脱出来。

将近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 1927 年秋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毛泽东上路了，在警卫员和周恩来、彭德怀的陪同下，他拄着一根竹棍从喇嘛庙出来，顺山坡而下，从一座木板桥上越过巴西河，过河后，他快步登上一座小山岭，向着俄界飘然而去……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这一次才真地是暴跳如雷，气极败坏。

陈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 1、3 军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

又称："毛泽东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不知道究竟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也不清楚毛泽东为何要带着中央和 1 方面军绝尘而去。甚至后来到了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大会小会挨了那么多的批斗，他也始终没有真正弄明白。

## 5、黄袍加身

9 月 11 日，已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 1 军会合后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

可是，此时的张主席已是怒火如焚，反正脸皮已经撕破，索性就按照自己的南下方针放手大干起来。他不仅对中央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驶。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 4 方面军的 4 军和 30 军以及原 1 方面军的 5 军从巴西、包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

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同样深感气愤的陈昌浩与徐向前接到张主席的命令后，立即执行。3 万多名不久前刚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糊里糊涂地重新踏上了充满凶险与

死亡的道路。

阿坝有上、中、下三个镇子，分布于若河、阿河岸边，是川西北较为繁华的地区，河岸和树林郁郁葱葱，一座大喇嘛寺相当壮观，在它的两侧，还有几个小一点的喇嘛庙。四周有上千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的城镇。在它的附近，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着广阔的草原。

张主席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又一次向不与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

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支持北上，还是支持南下？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的人，则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

随后在前往卓克基的路上，张主席下令勒死了自西征以来一直随军关押的曾中生。过去曾担任过川陕省省委书记，西征后任川陕苏维埃独立师师长的袁克服，也被送进了随军“劳改队”。

那是在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所有人都表了态，只有张袁克服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袁克服。”张主席点名问他：“不要装哑巴，现在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把你的态席也亮出来!”

袁克服站起身说道：“报告张主席，我带着独立师刚从茂县赶过来，还不了解中央和 4 方面军产生分歧的情况，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张主席鼻孔一哼：“既然这样，那你就换个地方，安下心来慢慢考虑吧。”

张主席当场撤掉了他独立师师长的职务，一禅仗把他打进了“劳改队”去抬担架。

“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是被张主席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行军时，有红军战士押送，“重犯”手腕上还捆着麻绳，而且任何苦累的活儿都得他们干。那一段时间，“劳改队”随苏井观领导的红军总医院一起行动，负责抬担架。

这支特殊的队伍里，我先后见到过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廖承志，他当时的化名是何旅华，担任过 4 方面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后来在毛儿盖被放了出来。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歌乐山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多了。

9 月 15 日，张主席通知四方面军总部和红 9 军、31 军、33 军党员干部近千人在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红军中党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

会场上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

上午，下午都是张主席一个人讲。他把 4 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对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

张主席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痛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主席所言——而且当时 1 方面军连遭重创，4 方面军蓬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已让指挥员们深信张主席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毛泽东，是党中央。加之毛泽东率 1 方面军不辞而去。更给了他们强烈的刺激，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愈加反感。

会场上充斥着一片激愤与迷茫的议论声。

“中央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说走就走呢？”

“哼，不讲信义！这是什么中央？！”

“中央连夜秘密出走，是十足的右倾逃跑主义！”

“…………”

张主席的声音在寺庙上空回荡。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 4 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 10 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 4 方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

应该承认，张主席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坟，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主席才敢公开和中央对着干。

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拥护张主席领导的口号。

“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

“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央背信弃义！”

“制造分裂没有好下场！”

“要清算血债!”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坚决跟着张主席南下!”

张主席接着又煽动说:“什么党中央，屁！他们悄悄逃跑的时候，毛泽东下令把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地图,把我们4方面军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悄悄都偷跑了,带不起的就烧掉，还有我们4方面军的一些伤员，也都被他们放火烧死了!”

官兵们愤怒地呼喊起来:“打倒毛泽东！我们要向毛泽东讨还血债!”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中央红军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弥天大谎!。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泽东，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泽东和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主席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说道:“朱德同志，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我这里有情报，有根有据!”

张主席还利用众多川籍军官依恋家乡不愿出川的心理，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的许诺。使会场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指挥员们欢呼雀跃，大受鼓舞。

第二天，张主席又特意安排前进剧团为大会演出活报剧，在剧中对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竭力丑化。

已经担任了“野菜委员会”主任的朱德这两天没带着人满山遍坡去挖野菜，他被拉来参加了两天的干部大会，并被“请”到台与与张主席、陈昌浩等人“平起平坐”。

张主席还想继续利用朱德的崇高威望,表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红军总司令支持的。

在会中，张主席请朱德总司令也讲上几句。谁知朱德当场拒绝，弄得张主席下不了台。

这时，喜欢表现自己坚定斗争性的黄超秘书长陡地站起，指着朱德喝斥道:“朱德，你这个老右倾，你今天必须当着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态，你到底是支持张主席，还是站在老毛一边？”

“啪”地一声，朱德用力一拍桌子，震翻了桌上的几只茶杯。他双眉倒竖，怒色满脸地喝道:“你黄超算个什么东西！闭上你的臭嘴!”

总司令的威风，镇得黄超瞠目结舌。

朱德压下了黄超的气焰，接着又声若洪钟地对干部们讲道，“同志们，我们的红军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哪个都晓得朱、毛，要硬逼着我朱德反对毛泽东，是不得行的哟！我承认中央红军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错，而是过去负责军事的几位同志的责任。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已经把这些错误纠正了过来。在这样的时候，就更加需要党内的团结，红军弟兄们的团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力量渡过难关，战胜敌人，搞分裂，只能两败俱伤，南下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什么？你竟敢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这完全是公然反对张主席的军事路线！”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挥动着拳头高声喝道。

“只有跟着张主席南下作战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台下有人喊起了口号。

这时候竟然窜上来几个人，把总司令的两支胳膊拧在了身后，如对待犯人一般把总司令的头向下按，边按还边喊叫：“你要向张主席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会场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刘伯承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喝道：“搞些啥子名堂！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是开党的会议，你们这样对待红军总司令，还有资格说自己是红军吗？”

整个会场出现瞬间的“休克”状态。

朱德和刘伯承的表现终于激怒了张主席。会后，他授意一帮亲信军官，数次三番去纠缠骚扰朱、刘二位首长，迫使他们听一听“广大官兵的呼声”。紧跟着，就发生了两桩事件，一个是上门围攻朱德，一个是朱德的坐骑被杀。

一天上午，一群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地吼着“拥护张主席，打倒毛泽东党”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涌到朱德的驻地，在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坐骑。有的人还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朱德这时候的几名“警卫”都是我派去的人，当然不会出面制止，呆在一旁隔岸观火。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康克清压住心里的火气，对闹事的伤病员们说，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献，这马当初是你们 4 方面军的首长送给我的，现在就送给你们 4 方面军的伤病员骑吧！说来奇怪，吵吵嚷嚷的伤病员们听了这话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会儿，就默默地走开了。

总司令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慑服了所有不明真相的闹事者，平息了这场小风波。

坐骑被杀的事，却要曲折得多。

总司令的马，是红 4 方面军 9 军政治委员陈海松送给他的。两军会师时，红 4 方面军人数众多，掌握的物资也比红 1 方面军要多得多，不仅以部队的名义送物资给处于困难中的兄弟部队，红 4 方面军的指挥员以个人的名义赠送东西给相熟的红 1 方面军的指挥员，也成了一种风气，太普遍不过。比如李先念送坐骑给聂荣臻；傅钟送坐骑给邓小平；余洪远送坐骑和驮马给毛泽东。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的坐骑也是余洪远送的。除了送行军最需要的坐骑驮马，不少老朋友老战友老乡之间还送各种吃的穿的。连张主席还特意叫黄超秘书长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巴、几十斤大米和 200 块银元。可等到延安批张时，这些个人之间的

馈赠行为都成了张国焘妄图收买1方面高级干部，扩大反中央军事力量的卑劣手段。人之常情，还是卑劣手段，恐怕只有天晓得！

有的当初接受过馈赠的首长还在发言检举时斥责张国焘仗着自己供给充足，把中央和1方面军当做“化缘的叫花子”、“穷亲戚”，随便打发。两军亲密时，你好我好，一团和气，这些都是人之常情，谁要拿这种事做文章，肯定会被当做神经病。可一旦两军分裂，这样的小事也就被上纲上线变成了大事，甚至成了立场问题、原则问题。

年轻的陈海松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红军的一名指挥员送匹马给红军总司令，会给自己带来一场大麻烦！

陈海松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17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9军政委。当军政委这一年，他才21岁。两军会师后，陈海松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总司令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心爱的大青马送给了朱德。

9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和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他比陈海松大5岁，但由于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反而位居陈海松之下。谢富治常常流露出愤愤不平的情绪，两位老乡的关系也就弄得来很不融洽。过去，谢富治就多次在张主席面前诋毁陈海松，以图取而代之。张主席统领千军万马，对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见惯不惊，未放在心上。这一次谢富治得知陈海松把自己的坐骑送给朱德后，认为是整陈海松的好机会，赶紧向张主席打小报告。张主席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等到大队人马从噶曲河返回阿坝后，就把陈海松叫来“面训”了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是在哪口锅里舀饭吃？我警告你，你的军政委正有人想干呢！”

这番训斥的意思明明白白，警告陈海松不要靠错了门枋端错了碗。

陈海松虽然官至军政委，可毕竟还是个20岁刚出头的毛头小子，打听到这次又是被谢富治告了黑状，沉不住气，回到军部后即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年轻人火气旺，26岁的谢富治也不是省油的灯，攒拳挽袖地和军政委干了起来。要不是警卫参谋们拉着，两位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还差点血溅军部，上演一出全武行。

张主席“面训”了陈海松，还把这事拿到会上当作反面例子，要大家引以为鉴。在张主席的威望占有绝对优势的红4方面军指挥员中，陈海松这样的行为被军长师长们讥为“吃里扒外”，遭到冷嘲热讽，甚而遭到众人围攻。陈海松太年轻，年轻上阵打仗是优势，可在政治场中年轻就成了弱点。经不住如此上压下哄，陈海松最后竟想出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幼稚举动，决定把送出去的大青马偷回来，以此向张主席证明自己的“政治清白”，以平息这场风波，

这事是陈海松的几名警卫员去干的，偷回来后藏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主席过目。

可做了这样的亏心事，陈海松又觉得实在是对不起总司令，第二天出门，他恰好与总司令辟面相遇，陈海松“做贼心虚”，离着总司令老远，心儿乱蹦，脸膛唰地红了，想避开也来不及了。总司令怎么也不会怀疑到陈海松会把马偷回去，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实在是可惜呀！”

长这么大从来还没有撒过谎的陈海松听总司令这么一说，犹如辟面挨了两耳光，两片脸颊红得像灌了血的猪肺，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了几下口，终于鼓足勇气，结结巴巴地说道：“总司令……对不起的是我。你的大青马，我已经查清楚了，是我下面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叫他们给你牵回来。”

总司令一听喜出望外，说：“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部队出发时再给我送回来也行。”

“不，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陈海松的举动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优柔寡断，胆子太小。

奇怪的是，没过几天，刚刚回到总司令身边的大青马又再次“丢”了。两天后，找到的是大青马的马皮。而且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的。

这样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在延安批张时成了加在张国焘头上的一条罪状。

前几年呢？不少当事人咽气之前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件事，有说张国焘干的，有说谢富治干的，还有人言辞凿凿地说是王树声干的，说他手下的兵饿得受不了，半夜出去弄吃的，撞着朱德的马，就偷来杀了，吃了。弄到最后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拿不出定论。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匹马，居然也弄成了中共党史上一个永难解开的历史之谜。

这件事，我当时就听说了，“谢杀说”、“王杀说”，我没有证据，不能乱加评判。但有一点我有必要说明一下，张国焘如果起心杀朱德的坐骑，以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绝对不会半夜三更像个小偷似地去干。要杀，他只消给身边的人打个招呼就行。而要干这样的事情，除了派我这个警卫排长去，他还会派谁？而且我也绝定会不打折扣地去完成。我现在要对已经死去和不久也将死去的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强调的是：张国焘从来没有让我去偷、或是让我去杀朱总司令的马！

就在阿坝喇嘛庙召开的这次大会上，张主席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了大举南下的“政治保障计划”和南进命令，率左路军全部和已经穿越草地，在下壤口、黑水一带集结的右路军中的 4 军、30 军、仅剩下 600 多人的五军，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推进。

两路红军分别沿大渡河上游的阿柯河、足木足河南下，9 月底会合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10月5日，3000余名红军干部和士兵代表肃立在松岗卓木碉一户土司大门外的空地上，气氛沉闷而紧张。每一个到会者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这个大会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所以心情万难轻松。

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决定：

张国焘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

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大会通过了以“新中央”的名义向“旧中央”发出的电文。其电文如下：

“一、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布文件。二、你们应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中央名义。三、4 面军名义已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好大的口气！此时的张主席正如朱德曾讥讽他的一样，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 第十四章 张国焘兵败百丈关

许世友兵败峡口，张主席败走天、芦……就在夹金山脚下，1000 多名好弟兄被张主席下令丢下了……那一刻，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的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张主席的轿夫头建国后当上了边防团长，竟然把敌指挥官的未婚妻弄过来当了自己的老婆。

### 1、百丈关成了张国焘的滑铁卢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中革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已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各部队组织练唱《南下歌》：“红军向南行，一定打到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毛周张博不见了。嗨哟哟………”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南下战斗动员到白热化程度，指战员们群情激昂，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10 下旬，10 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党岭

山，攀援已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 11 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主席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绕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在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欢畅之中。

谁知好梦不长，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主席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团结起来，死心塌地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34 年 10 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

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

刘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说：“蒋介石会对你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

刘湘说：“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已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10 月 21 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 10 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由贵州逼近四川，刘湘急派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率兵布防于宜宾至江津之间的长江南岸，做出一副全力抗击红军的样子。

潘文华离开成都之前，刘湘早已叮嘱他：“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而在于跟在红军后面的中央军，他们要入川，我们提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我们同红军固然是水火不相容，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像，只不过眼下红军是更主要的对像而已。因此，我们要留有余地，这是过去对张主席的川北红军作战的不同之处。我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得远远的，而不要带到四川来。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政

权生命，我们就与之虚与周旋，保存实力，决不与之对抗；如果真要深入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死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11 月中旬，当南下红军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路，一个险要的隘口百丈关，继而向成都边缘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时，遭到了川军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

红 4 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我前面已经谈到，杨森为图自保，第一次与张国焘秘密合作，没想被张国焘出尔反尔小耍了，气得差点吐血，一怒之下把最精锐的独立旅派上火线，准备拿言而无信的红军出出胸中恶气，不料独立师又被任炜章带着来了个火线反戈。杨森虽然对张国焘含血喷天，可他毕竟是个久历沙场的大军头，懂得感情终需服从于理智，部队是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命根子，牙齿被打掉了也得含血往肚皮里吞。就在自己的独立师投红没多久，他又派密使给张国焘送来亲笔信，表示不记前嫌，要与红军重开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暗中互助协议。

张主席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位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刘湘和田颂尧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主席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参谋主任担任谈判代表，次日前去谈判。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叙永，对川北的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主席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主席说：“那就派他出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派不动，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次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主席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傅钟一个建议，竟然救了一条人命。这位叫吴尚德的团干部当时才 18 岁，后来改名吴

瑞林，当过志愿军军长，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55 年授衔中将。

第二天，叶南生排长带领 10 名警卫，护送傅钟、舒玉章、还有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吴瑞林，骑马赶往前线。

谈判地点在巴中至仪陇之间一家地主的大宅院里。

一张方桌，面对面 4 把太师椅，一面坐着杨参谋长和何副官长，后面是两位参谋；这一边前排坐着傅钟和舒玉章，后面是吴瑞林和叶南生。

双方见面都互相拱手致礼，然后各自落座。

对方杨参谋长首先发言，表示他们这次来谈判是有诚意的，但杨森部受四川其他军阀压迫，四川 200 多个县，杨森只占有 5 个山区县和 1 个平原县的防区，西面是田颂尧，东面是刘存厚，南面是刘湘，都虎视眈眈地想吃掉他们。杨森被挤在一个穷困狭小的区域内，故而难以给予红军大的帮助，要求红军理解和原谅。

红军代表傅钟，首先向对方讲明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着重指出："红军是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情况下，为继续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推进革命进程而组建起来的一支新型军队，反对蒋介石集团，但并不与川军为敌，这次我军入川是为战略需要借境过路，略事休整。此事早巳公告于川内各军。但是，蒋介石却命令四川各军对我仁义之师进行围剿，红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打垮了田颂尧，而眼下刘湘又纠集四川各路军阀前来向我苏区围攻。目前，我军正准备消灭一切胆敢向苏区进攻攻的军队。请两位代表回去转告杨惠公（杨森字子惠），不要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贵军既然心诚意真，却在表示与我军谈判之后，整整拖延了八天，不知二位代表对此作何解释？"

傅钟同志这一席话，有理有节，软中带硬，说得两位杨部代表面红耳臊，尴尬万状。

杨参谋长说："我军本不想参与对贵军的围剿，但实属受蒋介石之严令，不得不违心参战，实在是对不起贵军。至于我们送给贵军两份地图，便足可证明我军愿与共军暗中修好的诚意。"

这时，何副官长也做出一副真诚之态说："贵军这次过江进攻田军，我军一定大力协助，如果还需要追击炮弹、子弹等物资，我军随时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

舒玉章说："贵部送来的地图，以及送给我们首长的土产山珍，我们代表工农红军收下，并请二位向杨森将军表示谢意。至于贵军所谈支援我军弹药之事，心意我们领受，就目前我军而言，弹药绰绰有余，加上前次战役中所缴获的田军弹药，估计足可使用两年以上，今后如我军真再需要时，再向贵军求助吧。"

我当时听了舒玉章这席话，觉得他真有水平。其实，我很清楚，红军正准备反围攻作战，当然需要炮弹子弹，但要与不要间，就有个利害大小的问题。舒玉章一番话，吓得杨森再不敢和红军打阴阳拳，比收他点弹药，作用大得多。

我知道舒玉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早期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加入共产党，是中央派到红 4 方面军中搞军事工作的。可惜的是，这么一位难得的将才，却在这次谈判后不久，就被张主席以“托派”的罪名给枪毙了。

谈判结束后，对方一个参谋骑马越过火线，很快，就率领一支上百人的民夫队伍过来了。他们全都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装的是白糖、盐巴，和熏得亮旺旺的腊猪脑壳、腊猪蹄子。

而在与杨森暗中修好之后不久，陕军孙蔚如部、赵寿成部，也秘密与红军签订了互不攻击协议。

以上均可说明，张主席一意孤行的结果，实际上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为，受到强烈生存威胁的川军，这一次是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与红军作战。

就在张主席站在百丈关上，从望远镜中得意洋洋地遥望成都市内皇城的飞檐翘角时，脚下的百丈关，却最终成了张主席的“滑铁卢”。

11 月 10 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你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茸城垣，以便危急时凭恃环城碉堡城垣，保卫成都。”

随后，刘湘亲往邛崃督师，火速调集的 50 个旅，总兵力 25 万人也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作为军事院校的传统教材，称为“百丈关大捷”。

19 日，川军以 10 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21 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 30 军、9 军、31 军相继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 3 道封锁线，越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发起了反扑。战至 23 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主席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主席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 5 军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 24 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已岌岌可危。

25 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主席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多年后，许世友如此说道：

“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 1 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这一仗薛岳来了 7 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 5 个团，陈昌浩只同意放 1 个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已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败仗，陈昌浩要负责。”

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 5 个团而不是 1 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果真就会保住峡口不失，甚而对整个百丈关会战能够力挽狂澜起死回生么？

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局部地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 1 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 9 个团，红 35 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脚大乱。

此役红军虽歼敌上近两万，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之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主席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主席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其激战，不敌。1936 年 2 月 15 日，薛岳一股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16 日，又打下了宝兴。

张主席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 100 天。

2、流泪的夹金山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主席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

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力获知 4 方面军和 1 方面军以及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1000 多名好弟兄被张主席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主席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人。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主席也只派专人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 200 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到："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然过去巳经 70 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没有一个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巳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 9 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巳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

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 5000 公尺，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地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

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在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新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新诗分手的。新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新诗一路乞讨，回到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 12 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员王新兰则是剧团里吹唢喇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新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回报，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

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风凛冽，卷起满天雪末与嚎啕。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主席、陈昌浩、黄超、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

### 3、崽哥的美满姻缘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张主席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

因为，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闪闪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里开阔，

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 4 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

而分到我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主席与杨岳卿的，则是 16 名来自通江县刘记轿行的轿夫。

轿夫头叫刘汉章。儿子因今犹健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姑且以他当时的小名崽哥称之。

这 16 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就累得趴下了。

我和这帮轿夫在通江时就非常熟悉了，因为刘记轿行就在文庙大门左侧几步路远近。红军一进通江城，刘记轿行就就蚂蝗一样叮着挣我们红军的大洋。我和后勤部经理处的郑义斋处长，经常给他们送活儿。后来大家就处得很熟了，轿夫们见了我都点头哈腰地和我打招呼。我还知道，红军反“3 路进攻”、”6 路围剿”时，他们还不顾死活地往火线上送过弹药，送过粮食。伙计们死了两人，伤了 3 人，事前有口头约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死了伤了红军是不负责赔偿的。当然，冒着枪林弹雨往战场上送给养，郑义斋给的力资也就比平日要多出许多。

红军一来就呼呐呐地搞扩红，扩红宣传队逢上赶场天就在文庙大门外的坝子上唱歌跳舞，鼓动老百姓参加红军。老百姓担心这些水上浮萍似的外省老乡打不过川军，打败了自己又不能扔下家口扯起脚板跟着外省老乡跑，所以不管扩红宣传队的人在街上喊破了喉咙，也没多少人愿意当红军。

刘记轿行里每天泡着十几号青壮男人，全都是上好的当兵的料，扩红宣传队的人就三天两头进屋去动员。刘汉章请红军抽烟请红军喝茶还帮着红军敲边鼓说热烙话儿，可红军一出门槛，他就黑下脸打招呼，要想当兵吃粮的，宁愿去刘存厚手下当兵，也不准参加红军，谁参加红军他就打断谁的狗腿。伙计们都知道刘老板年轻时在刘存厚的巡防营里当过兵，那时刘存厚还是前清时候的标统，一女不嫁二夫，一仆不侍二主，轿行大堂上供着千里走单骑的关云长的画像，画像下面的香炉里还袅袅地燃着三柱香，每天刘老板带着轿夫们对着关公磕头时他心里还存着份恋主之情。

后来刘汉章跟着红军踏上了西征之路，并不是出自他对革命有了认识，而是因为后勤经理处还欠着他轿行一笔钱。郑义斋说了，你要帮我们抬东西我就一分不少地给你，不愿抬，我就不认帐了。刘汉章当然舍不掉丢掉那笔钱，只好带着轿夫班子跟着红军上了路。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 10 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 80 块银元，按每个轿夫 5 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从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主席、杨岳卿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他们经常打平伙，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 16 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节约归己。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们抬张主席、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杨岳卿被炸死，刘汉章也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我当时见刘汉章受伤不轻，提议把他留在杂谷脑。可崽哥坚决不同意，硬是用滑竿抬着他老汉随军长征，到阿坝，过大小金川，翻雪山，过草地，可是最终却在夹金山下，儿子被迫把老子扔给了敌人。

崽哥跪在父亲面前嚎啕大哭，其余的 14 名轿夫也都跪下，和他们的轿夫头作最后的告别。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威望。那一年他才 18 岁，已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可他人小脾气却不小，谁要惹恼了他，他红眉毛绿眼睛张口就是一顿臭骂，有时还动武。挨了骂挨了打的轿夫谁也不敢吭声还嘴，都害怕他。

当时有一个现像很令我惊奇，这帮下力汉子平时语言极其粗鲁，谈起女人来口无遮拦，更是津津有味，可是他们在杨岳卿面前却一反常态，一个个表现得规规矩矩，尤其是出口成“脏”的崽哥，言语谨慎，比在张主席面前还要小心。这显然不是对权力的敬畏，而是一种美丽的震慑力所至。

崽哥也是这 15 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红 4 方面军到北川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仍照样经常打骂轿夫，却已经是红军的班长。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主席一直抬到了保安。

中央整编时，三路红军中所有染有鸦片嗜好的官兵全部被集中隔离进行强制性戒烟，崽哥的轿夫们自然也不例外。

等到崽哥把烟瘾彻底戒掉，抗日战争已经爆发，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崽哥和他的弟兄们全部编入了以原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129师，跟着刘伯承、徐向前去了太行山。

在129师，崽哥开始仍当班长，先打日本鬼子，再打国民党，打到解放前夕，他已经出息成了陈赓将军手下的一位骁勇善战的团长。

崽哥跟着陈赓，从中原大地打到了两广，又从两广打到了昆明，一直打到了滇缅边境。

在边境线上的畹町，崽哥的部队痛歼了驻在这里的国民党军余程万的一个团。敌团长带着残部逃掉了，他的老婆却落到了崽哥手中。

崽哥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女人，既给他带来了家庭的幸福，又给他造成了终生的不幸。

审问时崽哥感到十分惊奇，这女人的美貌堪称万里挑一，在他的印像中，大概只有早巳死去的杨岳卿才能和她媲美。

更巧的是，她是成都人，与崽哥是同乡，毕业于华西大学。熟悉的乡音与可人的容貌使崽哥削弱了对她的敌意，甚至还对她隐隐地产生了一点怜悯之情。

他感到惋惜的是，这种美丽的女人绝对不应该嫁给国民党的军官为妻。

但是，现在的崽哥巳绝不是过去的轿夫头，作为一外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崽哥对这美丽年轻的女人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念。

第二天，他即派出部队，将战俘和各种战利品，当然也包括这位女人，一并送到了后方移交。

不知是情缘还是孽缘，不久，全国解放，大局初定，崽哥接到上级通知，叫他马上赶到昆明巫家坝机场原国民党空军招待所，参加为期一月的军官集训。

崽哥赶到集训队报到后，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这个特殊的军官集训队里并非全是军官，还有一个女学员队。

女学员中，有一人居然就是他在畹町抓获的那位漂亮女俘！

这次集训的目的大家很快便弄明白了。

原来，这是上级首长考虑到部队中一些指挥员长年忙于带兵打仗，无暇也无条件顾及个人问题。值此江山初定，就创造出这么个机会，让大龄指挥员们和女同志接触，彼此有意者则支持他们喜结连理。

集训队的主要活动是就是学文化、看电影、举办舞会，让指挥员们在座谈会上讲自己的战斗经历，以及隔三岔五地外出野餐。

是组织上营造出的这种特殊的氛围，也是出自人的本能，指挥员们都渴望着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那是一个极端崇拜英雄的年代。

在这所有的活动中，崽哥并不是一个容易崭露头角的人物。他不善言辞，缺乏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的智慧、幽默与勇气。他不会跳舞，更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曾经给张主席当过轿夫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那样的经历无疑会被人视为奇耻大辱。

但是，每次舞会崽哥都自始至终地在旁边正襟危坐。奉命前来教指挥员们跳舞的文工团女演员们主动热情地上前邀请他，他也坚决不下舞池，害得女演员们挨领导“刮胡子”。此后，无论她们绞尽脑汁采用任何方式也都徒劳无功，崽哥依旧岿然不动。

崽哥参加舞会的目的既单纯又明确，他就是想认认真真地看看那位惟一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成都女人。

而和水泥墩子一样的崽哥截然相反的是，成都女人却是女学员中最为出色的人才之一。她长得清丽文静，舞跳得好，口才也好，而且，她还能讲英语，或用英语唱歌。这是女学员中惟一的。

有的指挥员捷足先登，想和成都女人攀缘。崽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拙于言辞不善表达感情却不乏进攻精神，后来居上，鼓足勇气直接找到集训队的领导直抒胸臆。集训队领导的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成人之美，他们认为崽哥的理由比其他的同志更加充分，于是态度鲜明地予以支持。

一个月集训期满后，崽哥春风得意马蹄疾，带着已经成为他的合法妻子的成都女人回到了边境上的驻地。

新婚燕尔那年，崽哥 34 岁，妻子比他小 11 岁，刚满 23。

两人结合后，崽哥才进一步了解到，妻子是成都一个开银行的大资本家的女儿，而她过去的丈夫，是她高中时的同校同学，比她高两个年级，也是她家的邻居。1943 年抗日战争时期，高中刚一毕业就参加青年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抗战胜利后驻扎在越南的海防市。

崽哥了解这段经历后从此再不提及。无论怎样，过去的一切皆已成为历史，她现在已经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妻子。

而且，崽哥是真心真意地爱她。妻子不仅漂亮、年轻，而且懂得怎样体贴关心自己的丈夫。最令崽哥骄傲的是，妻子还能做一手受到众多战友大加称赞的川菜。

此后 10 年中，妻子给崽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边境上虽也有零星的战斗，但崽哥觉得这 10 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温馨，也是最充实的时候。

4、崽哥犯下了严重错误

转眼到了 1960 年，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利用大陆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电令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残部，频频越境向我骚扰，并以物质笼络边民。气焰嚣张时，一度将西盟、沧源、耿马等县城夺占。我军奉命予以反击，边境上一时战火不断。

在一次战斗中，崽哥指挥的部队（已于 1955 年改编为边防团）击溃了蒋军秘密潜入我境内的一支特遣队，并抓获了一名指挥官。

崽哥连夜将他带回驻地关押，准备第二天再移送后方。

不想就在这天深夜里，却有人悄悄打开牢门，把敌指挥官放跑了。

就在他们越墙而出的时候，被哨兵发现，立即鸣枪报警。

崽哥亲率保卫连追击。

眼看就要追上了，溶溶月光下，就在快到接近边境线的地方，出现了令崽哥终生难忘的情景。

一个身影突然转身跪下，凄厉地向他喊道："刘某某，我求求你，不要开枪，饶他一条活命吧！他向我保证过，再不和共产党打仗了！他是我……过去的丈夫啊！"

听着这声嘶力竭的叫喊，崽哥顿时肝胆俱裂！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亲爱的的妻子啊！

刹那间，空气凝固，战士们也都惊讶得像一群泥塑木雕。

他们全都认识她——自己首长的妻子。

上百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那一对男女。但是，首长不下命令，谁也不敢抠动扳机。

崽哥牙齿咬得"嗒嗒"响，血脉贲张，心涌狂潮，愤怒、屈辱、痛苦交织在一起，使他的身躯颤抖得像狂风暴雨中的一株孤竹。

崽哥不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他亲手杀死的敌人不计其数——毫无疑问，他眼下面对着的同样是两个货真价实的革命的敌人。只要他的枪一响，战士们的子弹就会像疾雨一样向那一对男女扫去……

但是，此时此刻，有着铁石心肠的崽哥却胆怯了。这是因为，浴血沙场多年的崽哥迄今为止从未杀过一个女人——更何况，这跪着对他苦苦哀求的女人，是他真心爱着的妻子，更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啊！

月辉如纱，幽谧的南国之夜到处有不知名的小虫子在草丛里"曲曲"欢叫，然而所有的

人都感到这夜静得让人发虚发怵。

战士们屏息等待着……

崽哥终于开口了："你……回来吧！"

那是乞盼，那是渴求。终于，崽哥的枪口无力地垂了下去。所有的战士都听到了首长发出的这声苍白痛楚，而又是那样震撼心灵的声音。

众战士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就那一刻，他们全都明白首长这下完了……

妻子顿时起身哭泣着大步向崽哥奔去。刚跑了几步，又忽地转过身去，向着呆立在国境线边上的敌指挥官急促地喊道："你还站着干什么？快走呀，他不杀你了！"

但是，敌指挥官并没有立即落荒而去。他面对着钢枪在手虎视眈眈的解放军官兵，深深地鞠了一躬，感动地说道："谢谢……谢谢你们的仁义之举！今生今世，我决不再与贵军为敌，若有机会，我一定……涌泉相报！"

言毕，他转过身，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步向国境线走去……

崽哥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由于他所犯错误的性质极其严重，很快，他便不得不脱下军装，转业到保山地区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妻子则调到该县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英语教师。

"文革"期间，崽哥在长征期间当过大叛徒张主席的轿夫头的经历，和他在当团长时丧失革命立场，私放敌指挥官的严重错误被造反派抖落出来，未审未判，却被升级为罪行，崽哥因此在牢房里度过了整整三个春秋。

妻子所受的打击侮辱，更是难以尽述。

但对夫妇俩最大的打击则是他们惟一的女儿，在一次母亲被批斗时饱受造反派的凌辱而受到过度强烈的刺激，导致神精错乱，毁了一生，至今仍是老俩口的一大心病。

改革开放之初，崽哥恢复工作后，先担任副县长，分管工业与财贸，继后改任县政协主席。仍然对发展县里的工业、乡镇企业倍加关心。

巧的是，第一个到该县来投巨资开办一家颇具规模的茶厂的泰国华侨，竟是那位当年曾发誓要"涌泉相报"他不杀之恩的敌指挥官。

"爱国不分先后"是对台工作的指导方针"叶 9 条"（叶剑英委员长致台湾国民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提出了 9 条关于两岸修好的积极建议，被简称为"叶 9 条"）中的一条重要精神，当年的敌人如今又有实际的爱国行动的泰国华侨自然理应受到政府与人民的欢迎。

而政协主席当然清楚他的最主要的一项本职工作就是为党最大范围的摒弃前嫌，广交朋友。

首次见面时，他们不仅握手而且拥抱，相逢一笑抿恩仇，历尽劫波兄弟在，彼此热情得真好似亲兄弟一般。

然而内心深处，外商受到的礼遇显然使崽哥感情复杂，滋味难言。虽然在欢迎的酒宴上他带头与外商觥筹交错亲切交谈；虽然外商给他、给他的妻子、给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物；他却仍然觉得心里发苦……苦在心底，而又难以言述。

崽哥晚年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则是因为这位外商见到崽哥的女儿神经不正常，主动提出由他资助崽女去日本治疗。崽哥虽有顾虑，但爱女心切，所以应允，崽女万里迢迢飞往日本，母亲当然须得陪同前往照料。

东瀛之行，外商耗费万金，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崽女的病情丝毫未见好转。上级纪检委的同志却上了门，查实外商如此慷慨大方地帮助崽哥，官商之间究竟有何“猫腻”之事。

不料查来查去，竟将崽哥当年在边境线上所犯错误再度旧事重提，而且极快极广泛地流于社会。昔日奇耻大辱事，今日却被“换了脑筋”的人们大肆渲染，交口传诵，当成了一则含情透义的美谈。

可是，倘有谁拿这事来取悦崽哥，崽哥脸一沉，红眉毛绿眼睛地便要开口骂娘。

崽哥离休后，有关部门组织他们这批老干部搞了次钓鱼活动。崽哥手艺孬，头二三名全让别人拿走了。崽哥一言不发，不知去哪儿弄来颗手榴弹，扯了导火绳一声不吭就往塘里扔，“轰”地一响，水花四溅，白花花的鱼肚皮在水面浮了一大片。人们都呆了，不明白崽哥为何如此仇恨鱼儿……

1994 年映山红开满大巴山的季节，崽哥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巴中祭祖扫墓，后来又专门来万源既是看望我，也是重访旧地。

县里有关部门专门邀来健在的老红军，为他举行了座谈会。其他的战友崽哥并不认识，真正亲亲热热有龙门阵摆的，就只有我一人。

如今，崽哥还活着，但已是老态龙钟了。他的妻子也老了，美丽与青春均已不在。

崽哥至今常去国境线，去那熟悉的兵营（现巳是某国营农场的场部）。拄着拐杖的耄耋老翁的身影，被云贵高原的夕阳余晖拖曳出一条淡淡的长影。他凝视着不远处的国境线，眺望着国界那一边的莽莽林海，仿佛是在认真地拾捡他失落在这里的人生的碎片……过去的一切像轻风，像梦幻，像电影，一幕又一幕，从他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偎依在老人身边的，是他的妻子——他们依然深深地相爱着。

## 第十五章 滞留在川康高原上

而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活佛都与红军为敌……在藏民眼中，红军和刘文辉的军队并无二样，甚至更坏……许世友成为红军第一支骑兵师司令……我奉命监视刘伯承，发现了他的秘密……

### 1、雪山脚下的小城

1936 年 2 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部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布沟。

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情，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许多冒着袅袅白汽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告："张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

张主席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肤病的。"

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去了。

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迎上前大声喊道："嗨，嗨，你们女同志不要过来，这边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红军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儿，肚子就饿得越是难受。

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 31 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已被击溃，红军已经攻占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沟汉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2 月 28 日晚上约 11 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

与此同时，红军的各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翦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

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 24 四军 21 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

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康藏宣慰使”的身分，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启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已到雪山那边的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

但是，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群众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主席等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敢死队行至山腰，即与红军相遇，一阵短暂的枪战后，当场被红军击毙 4 人，打伤十余人，其余的喇嘛见势不妙，赶紧逃回了寺庙。

第二天清晨，诺那活佛仍不甘心失败，再次派敢死队冲向后山强夺碉堡，结果又被打死十余人。红军随即包围了灵雀寺，向被围困的喇嘛喊话，反复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要他们交出武器，则咎往不究。

围至 3 月 22 日，诺那活佛仍不投降，红军立即发起强攻，很快将灵雀寺打了下来。

诺那活佛与 500 余名喇嘛钻地道逃到后山密林，径往德格投奔土司泽旺登登去了。

逃到山里的群众被动员回家后，红军发放救济，送给粮食、酥油、衣物等，有的群众病了，红军还主动上门送医送药，政治部组织的一支支宣传队也上山入林，劝告群众返回家园，从而很快解除了群众惧怕红军的顾虑，得到了藏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与红军为敌的相当强大的势力。诺那活佛与泽旺登登，军事涅巴夏克刀登以及寿灵寺、甘孜寺等处的喇嘛，组织起几股飘忽不定的骑兵，不断地袭扰我军。

这一带喇嘛势力特别强大，而黄教喇嘛又最为强盛。我们走在街上、城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红袍子的喇嘛。

听藏民介绍，道孚的灵雀寺是康藏高原上最大的寺庙，有上千名喇嘛。寺庙里有维护纪律的铁棒喇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一听到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

在康藏高原上，喇嘛庙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建筑，金壁辉煌，宏伟精美，喇嘛的住宅也比一般人家要好。喇嘛庙很像一所学校和兵营的混合体，喇嘛们经年累月集中在寺庙里念经，也进行军事训练，喇嘛本身也是一支有组织的的军队，他们大都配有武器，庙里的大喇嘛是当地政教合一的最高首脑，被称为活佛，也是全体藏人心中的至尊之神。而负责军事训练与指挥作战的喇嘛则被称为涅巴，地位仅在活佛之下。

显然，红军要在这样的地方立住脚，首先得争取活佛们的谅解与帮助，而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活佛都与红军为敌。

这不是红军的错，也不能完全怪活佛们。

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藏汉的民族矛盾一直很激烈，从近里说，从大清王朝到民国，统治者传统地歧视藏民。红军开进之前长期控制这一带地区的四川军阀刘文辉千方百计地搜刮藏民的钱财，来此经商的汉人，也多用欺骗手段，深为藏民痛恨。

在藏民眼中，红军和刘文辉的军队并无二样，甚至更坏。

## 2、红军第一支骑兵师

红军攻占道孚以后，诺那活佛率喇嘛武装逃往炉霍，与寿灵寺喇嘛联合起来继续与红军

对抗。

数日后，31 军又打下炉霍，将寿灵寺团团包围。余天云与詹才芳碍于民族政策，不敢下令向寺庙进攻，遂向上级请示。

张主席得到报告后，率领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几位首长和警卫排飞骑赶到寿灵寺，准备以政治手段予以解决，以此作为争取康藏上层人物的一把钥匙。

等我们赶到寿灵寺前，余天云与詹才芳即向张主席汇报，寿灵寺原有喇嘛 400 多人，加上从道孚来的诺那活佛带来的 500 余名喇嘛，共有千人左右。余天云表示，强攻他完全能够拿下来，但红军肯定也会有重大伤亡。

我看到眼前的寿灵寺依山而立，高墙广厦，从山脚到山腰，房重房屋叠屋密密麻麻，犹如一座巨大的迷宫，红军大部队若强攻，兵力难以展开，只能与喇嘛逐屋争夺，进行巷战。

张主席不同意硬攻，他写了一封信，派一名丹巴族通司送进寺庙。

通司不敢去，张主席叫人给了他 10 块银元，通司才拿着信去了。

张主席这封信写得很客气，他并未叫对方投降，而是向他们说明，红军只不过从此地路过，要求他们不要继续与红军为敌，不要再向红军开枪。

大约半个小时后，通司的脑袋被割了下来，用长长的竹竿挑着，从庙门处伸了出来。

余天云大怒，坚决请战，要亲自带领部下进攻。

张主席不允，又派作战部一名姓李的参谋作为他的全权代表，直接进寺庙与诺那活佛谈判。

这位姓李的参谋明知此一去九死一生，仍然向张主席、倪志亮敬了个礼，大步向寺门走去。

没隔多久，这位红军干部的脑袋也被挑在了竹竿上。

余天云的请求被满足了，他坚持要张主席等总部首长离开此地，进入到附近一所相对安全的房子里后，他才组织部队进攻。

枪声非常激烈，红军的冲锋号吹得来激动人心，好像全身的血都发烫了，都快燃了……我们这些警卫员不仅没有机会参加战斗，连这种就在身边进行的战斗，看一眼的资格也没有。

余天云、詹才芳很细心，不断派传令兵来向张主席报告战况。

当然，这样力量悬殊的战斗不会有不利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但是，这场战斗仍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喇嘛们放起火来，将寺庙变成了一片火海，从上午 11 点一直打到了下

午 3 点来钟，枪声才遂渐地稀疏下去。

结果是，毙伤喇嘛 800 多人，红军伤亡 300 人，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

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之手。

4 月 2 日，4 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张主席没有杀掉他，相反对他优礼有加。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诺那本人也以为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后只求速死，决不与共产党、与红军合作。

杀掉诺那活佛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颗子弹。但张主席知道这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效果。

诺那在张主席这里当了十来天的“贵宾”，最后还是被放掉了。

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

自从来到道孚以后，张主席过得极不舒心。

虽然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继攻占道孚之后，31 军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炉霍，进占西康东部重镇甘孜。许世友、王建安的 4 军打下了瞻化（今新龙县）、色达、琅塘等县城；虽然刘文辉和李抱冰的部了被红军重创后逃出了康藏高原，巳无力向红军发动有规模的进攻，只能远远地据山观望。可是，由他率领的这支虽经巨大损失却仍拥有 6 万余众的军队，身处荒凉贫困的康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为吃而奔波，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因粮食而爆发。野菜成为全军主要的充饥之物，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此时也主动请缨出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整天带着傅连璋、苏井观等一大帮人员到野外采集各种野菜试吃，经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各支部队中去……

数月前的威武之师竟然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原本踌躇满怀心比天高的张主席，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

红军要生存，必须要获得粮食。可是，敌人早巳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胁迫群众上山躲避，不准群众卖一粒粮食给红军，不准群众给红军当向导或当通司，严令老百姓以任何方式帮助红军，一经发现，满门抄斩，定杀不赦。

红军只好自己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征粮队势单力薄，下到乡间后，经常成为敌人骑兵的袭击对像。而且敌人极其凶残，对付被俘红军的手段极其毒辣，割头斩肢，剖腹挖心，从不留一个活口。

为了获得粮食，红军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骑兵武装。

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

勇贯三军的虎将许世友临危受命，由 4 军军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师的司令员。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的上午，旭日东升，霞光万道，3000 多名身背钢枪，背插大刀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汇聚在甘孜城外的一块宽阔平坦的大坝子上。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威武雄壮的乐曲。

在隆重举行的红军骑兵师成立大会上，许世友率领他的骑士们，接受张主席、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总部首长的检阅。

张主席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许世友很大的鼓励。同时又对他明确了骑兵师的两大任务：消灭敌人的骑兵；筹集粮食。

许世友向他敬了个礼，大声道："请张主席放心，我骑兵师保证完成任务，党指向哪里，我许世友就打向哪里！"

然后，许世友飞身跃上张主席送他的战马，向着士兵一声令下："上马！前进！"

万马奔腾，大地上顿时激起暴雨般的马蹄声。蓝军装、蓝军帽、红五星、驰骋的战马、辉眼的马刀，构成了一幅振奋人心的画面。整个骑兵师，下辖三个骑兵大队，像三股山涧泻下的激流，冲向往北的山道上……

马蹄踏踏，扰乱了这偌大草原的幽静，惊动了正在吃草的牲畜，牛羊"哞哞"乱叫，四处奔蹿。

牧民们闻声跑出毡房，以惊奇、疑惑、恐惧的目光遥望着从远处滚滚而来，头戴八角帽，身背钢枪和大刀的不速之客。

霎时，平静的乡村草原慌乱起来了，农民们埋好粮食躲进了山里。牧民们则赶着牛羊逃向远方。

红军官兵飞马向前，向着逃跑的人高声喊话：

"赶快回来，我们是北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红军是救国救民的'菩萨军'，帮助穷人当家作主人，反对压迫你们的头人土司！"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快回来吧！"

可是回答他们的，却是充满敌意的目光，有人甚至向他们举起了猎枪……

严重的问题是：虽然红军付钱，甚至宁愿以高出当地的价格来收购粮食和牛羊，老百姓却仍然不愿卖或是不敢卖，而红军为了生存，必须要筹集到粮食和牛羊！

当矛盾无法以和平的手段得到解决时，与民争粮的悲剧便不可避免了。

有了这样一支庞大精锐，快捷如风的武装，征粮工作依然举步维艰，成效甚微。

骑兵师即便可以从汉族农民和藏族游牧民手中买到牛羊、青稞、豌豆、奶茶，但数量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巨大消耗。

而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牛羊与粮食的土司、头人、堪布，宁愿把牛羊赶进河里冲走，把粮食烧掉也不愿卖给红军。

所以总部迫不得已指示许世友：对汉藏农牧民加强宣传工作，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尽量避免发生与民争粮的事情；对反动的上层人物的粮食与牛羊，则施以坚决手段，一律没收。

有此“尚方宝剑”，许世友很快便在尼柯柯河边的金达大获全胜，满载而归。

那天破晓前，许世友率领的第一骑兵大队千余人正在尼柯柯河边的草滩上宿营，突然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枪声。

霎时间，红军与偷袭者接上了火，只听得四处枪声乱响，黑暗中不时有马匹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凄厉的惨叫声不断响起。

偷袭者是金达土司麻倾翁豢养的有着 500 多人马的反动武装，以能骑善射著称。曾经将红军一支征粮队 30 多人全部剖腹挖心，并用大锅煮熟后吃肉喝汤，以壮行色。此后又袭击了仁达、瓦日两个乡的博巴政府（工农苏维埃政权），将政府工作人员斩尽杀绝，被红军视为最凶恶的敌人。

这些日子，许世友率兵来到金达，其主要目的正是寻找这股敌人并予以歼灭，没想今天他们竟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许世友焉能不喜？战士们焉能不勇？

敌人虽然凶悍亡命，但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不懂战术。许世友带着部队第一次冲锋，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天亮时，敌人丢下遍地死尸溃退了。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战士跃上马背，像一片汹涌翻腾的蓝色海浪，向敌人滚滚卷去……

这一仗，不仅歼灭麻倾翁部 300 多人，而且还得到了一次破天荒的大收获！

俘虏为了保命，供出麻倾翁在一个叫做黑尔玛的山沟里，隐藏了大量的牛羊。

许世友立即率领第一大队赶往黑尔玛，果真在这里缴获了 8000 余头牛羊。

当牛羊送到道孚总部时，那不啻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但是，更大的胜利却是在一个月之后，在阿坝县境内的麦加尔康、觉尔黄。

这是许世友的红军骑兵师对地方反动武装的一场决定性的大战。

而这一次大战，却并不像通常所进行的重大战役之前必须有一个精心部署与谋划的过程。

它来得那样突然——由于道孚的诺那活佛、金达的麻倾翁等残存的武装以及因红军广泛建立博巴政府逃出家园的各种反动势力大都投到了德格土司泽旺登登的门下，使泽旺登登的骑兵一下子膨胀到了 5000 多人。而指挥这支庞大的骑兵与许世友的骑兵师作战的人物并不是德格土司泽旺登登，而是军事涅巴夏克刀登。此人少时在拉萨的西藏贵族学校读过近十年的书，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也是红军最大的心腹之患。夏克刀登过去率领队伍在打“冤家”时屡战屡胜，被各地土司头人视为军事上的奇才，威望极高。，所以，在如此危急的关头，泽旺登登就把队伍全部交给夏克刀登指挥。

夏克刀登果真有独到之处，他训练出的藏兵们骁勇善战，枪法极准，骑术极精。他靠啥？靠的就是心狠手辣，夜间射击打香火，三枪打不中，当即剁掉一个指头。而眼下他指挥的这支骑兵部队，行踪飘忽，时聚时散，四处袭扰破坏，有时像一道狂飙黑浪在草原上向红军扑来，有时又像一股清烟转眼间消散在雪山冰峰之间。

为了歼灭这股人数最多，气焰最盛的敌人，许世友将全师攥成了一只铁拳，于 6 月 13 日开到了敌人正在猖狂活动的阿坝一带。

根据藏民提供的情况，许世友派出侦察小分队四处搜寻。两天过去，红军找到了 600 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但未发现夏克刀登和泽旺登登的踪影。

15 日，骑兵师继续向东前进。由于泽旺登登已经知道红军的骑兵部队前来对付他了，他也对红军大搞坚壁清野，一路上的村寨，几乎都空荡荡的，不仅老百姓被统统赶走，连牲畜粮食也全部转移了。

落日西沉后，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前面发现大量敌人。

许世友赶紧带着几名军官前去。他们在一座山坡上趴下了，不用望远镜，便能看见在千米之外，火光星星点点，散开一大片，足有数千之众。夜空中，还不时传来战马的嘶鸣声。其他的侦察小队也纷纷赶回来了，据侦察员报告，眼前正是夏克刀登的人马在这里露营休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夏克刀登和泽旺登登把重兵集中在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正是为了狙击许世友的骑兵队伍。

许世友探明情况，立即和参谋长一起召集 3 个团长研究确定，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机，立即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歼灭敌人。

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大部骑兵集中隐蔽待命，多路突击队迅速地接近敌营，藏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按照预定的时间，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队员们首先将手榴弹冰雹般地掷向火堆，随着爆炸声，藏兵与燃烧的柴火腾空而起，火焰直冲天穹。敌人的马匹

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狂奔。敌兵们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惊马踩踏得鬼哭狼嚎。

这时，冲锋号惊天动地地响起，红军骑手们挥舞着马刀，如同无数道铁流从山沟里奔腾而出，冲进敌人的营地，左砍右劈，将敌人大部歼灭。

夏克刀登左腿被手榴弹炸伤坠马遭擒，泽旺登登和诺那活佛在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企图潜回老巢德格，路经马尔康时，与当地博巴政府的赤卫队遭遇，泽旺登登被乱枪击毙，诺那活佛也坠马身亡。

麦加尔康一仗，歼灭敌人 2000 多人，俘获 1300 多人，缴获战马 2000 多匹，并将泽旺登登藏匿在各地的大批牛羊，大量粮食及弹药缴获。被俘的夏克刀登，许世友派出一个连的骑兵，将他押送回了道孚红军总部。

这是红军骑兵师组建以来打的最大一仗，也是最顺利的一仗。

3、“软套套”套牢了夏克刀登

杀死无数红军战士的大屠夫夏克刀登成为红军的阶下之囚，让驻扎在道孚的红军总部和各机关的指战员们大快人心，都盼着快一点把这个家伙押上刑场，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

可张主席一听夏克刀登被押进了道孚，竟然和朱德等首脑亲往总部大门外迎接。犹如诸葛亮当年七擒孟获一样，吩咐押送官兵立即为夏克刀登松绑，恭恭敬敬地把他请进总部，待杀人如麻的大屠夫如同贵宾。

朱德看见夏克刀登腿部伤口已经溃烂，马上派人请来苏井观院长亲自为他治疗包扎。

当晚，张主席、朱德专门设宴为夏克刀登压惊，驻道孚的红军首脑王树声、倪志亮、何畏、黄超等悉数出席作陪。

可是，自忖必死的夏克刀登却一点也不领情，用汉话狂呼大叫着要张主席马上将他处死！干干脆脆，莫白费工夫要这些软套套！无论众人如何好言劝导，他依然坚信红军会在宴后杀掉他。

最终，他酒未喝一杯，菜未动一著，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但是，红军并未杀他。而且还找来了藏民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每顿饭有肉有奶，伙食开得比张主席的还好。

苏井观每天来给他量体温，检查伤口的治疗情况。

三天过去，“软套套”果真起了作用，夏克刀登派藏仆来请张主席和朱总司令过去说话。

待两位红军领袖一进屋，他便说道："我看出来了，你们红军和刘文辉的 24 军不是一样的汉人。请明说，要我夏克刀登帮你们做啥子？"

朱德嗬嗬大笑，说道："没有啥子需要你帮忙的，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晓得你是康区的头号大英雄，无非是和你交个朋友罢了。"

张主席也说："你要不愿意和汉人交朋友，我们也不勉强，过两天等你伤养好了，你愿意到哪里，一切悉听尊便。"

夏克刀登听张主席这样一说，也有心试试红军是否真有诚意，就说："泽旺登登巳经被你们打死了，我想派人给新选出的德格土司送封信回去，告诉他们，红军没有杀我，让他知道，夏克刀登还活着。"

张主席说："我刚才说过，一切悉听尊便。你现在就可以给德格土司写信。"

德格土司接到夏克刀登的信，不相信杀了这么多红军官兵的夏克刀登落到了红军手里竟然还有可能生还，就派了一个"邓果"（小头人）乌金泽登来道孚看看夏克刀登是否真地还活着。

乌金泽登是夏克刀登的老部下，他不仅看到夏克刀登还活着，而且还看到红军给夏克刀登生活上的种种优待，以及精心给他治疗伤口的情形。

夏克刀登要他回去转告德格土司和自己手下的藏兵："红军待我很好，等过些日子把伤养好了，我就马上回去。"

乌金泽登离开道孚时，张主席和朱德会见了夏克刀登与乌金泽登。

张主席说："你来道孚这些天都看见了，我们不仅没有杀害夏克刀登，也没有杀害任何一个与红军友好相处的藏族同胞。请你回去转告德格土司和藏胞们，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不是刘文辉的军队诬称的土匪。夏克刀登的伤一好，我们就送他回去。

朱德也庄重地对他俩说："红军的目的是要解放全国的穷苦百姓，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久留。我们的任务是北上打日本鬼子，10 到 15 年后，我们还会回来，那时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建设美丽的康区。"

此后，夏克刀登继续留在道孚养伤，不久红军总部转往甘孜，夏克刀登也随总部到了甘孜。在这些日子里，张主席、朱德、和前些时候巳担任民众义勇军总指挥的王维舟多次到医院看望他，给他讲述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政治主张，同他拉家常，讲形势，使夏克刀登的认识逐步提高，态度有所转变，由敌视、怀疑红军到信服、支持红军。

1936 年 7 月 15 日，在各县巳经成立了基层政权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博巴政府。

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县孔萨大楼，党的领导人是李国荣，主席为格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就是成为红军俘虏后宁死不屈，最后却被"软套套"套牢了的夏克刀登。

新上任夏克刀登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红军北上，除了协助安置 200 多名伤病员外，还亲自去玉隆赶来 400 多头牦牛、200 匹马送给红军，受到朱德总司令的嘉奖。群众中广传“夏克刀登和张主席、朱总司令是好朋友”，使他的名声比以前更加响亮。

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回到了川康高原。许多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物遭到了杀害，有人胆怯了，把红军伤员交了出来。可是，夏克刀登却顶住了压力，完好地将他负责接收的 200 多名红军伤员保存了下来。

1949 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的消息传来。夏克刀登闻讯后主动派出使者去迎接解放军。

夏克刀登得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立即派出 3 名代表，带着哈达、信函到北京去见朱德总司令，转达他拥护解放军解放康区的心愿。3 位代表绕道阿坝进入甘肃，彭德怀副总司令用专机将他们送到北京，住进北京饭店。朱德总司令亲自到饭店看望了他们，一边拉家常，一边询问康区的政治、军事、民心等情况，赞扬夏克刀登、格达活佛是卓有远见的进步人士，并要代表们转告夏克刀登等人：当年的红军回来了，红军不会忘记老朋友。还希望他们在解放康区、解放西藏的事业中作更多的工作。

1950 年初，康区获得解放，夏克刀登在康定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庆祝会。在 3 月 27 日成立的“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上，夏克刀登被安排为副主任。不久，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又邀请夏克刀登、格达活佛等康区进步上层到重庆，听取他们对建设康区，支援解放西藏等方面的意见，还任命夏克刀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 年 7 月，夏克刀登当选为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任；11 月，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又推举夏克刀登为西康藏族自治区副主席。以后，夏克刀登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担任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务。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使夏克刀登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彻底变化，他全力投入维护康区稳定和支援 18 军解放西藏的工作，并积极协助解放军做其它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的土司头人的工作。

新的政治环境激发起夏克刀登的工作热情，在解放西藏的日子中，夏克刀登基本上都奔忙于组织牦牛队和转运军需的繁重工作，他组织起上万头牦牛队，保障了从马尼干戈到昌都一线的军需供给。他从玉隆抽调 5000 头牦牛参加抢运昌都补给，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德格牦牛队的运输任务更加繁重。1951 年底，夏克刀登再次在玉隆、石渠、邓柯等地组织起一万头牦牛，由侄儿夏克郎加多吉负责押运，抢运一批急用军需到拉萨，及时缓解了刚刚进入拉萨的解放军部队的困难。有人说“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这话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也反映了藏族人民对解放西藏的态度。一些当事人回忆到：“夏克刀登等一批进步上层人士的热心支持，对康北的稳定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0 年初，夏克刀登不幸患上急性黄色肝萎缩症，政府当即将他送入四川省人民医院抢救，经多方努力但仍无效，4 月 2 日下午 7 时 15 分，他病逝于省人民医院的病床上。

4 月 6 日，四川省党政领导廖志高、天宝、华尔切臣列、阿旺嘉措等在成都殡仪馆参加了夏克刀登的追悼会。

5 月 9 日，夏克刀登的骨灰运回康定，康定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张主席当然明白，对于夏克刀登、诺那活佛这样有影响的上层头面人物来说，征服他们的精神远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为重要。

4、刘伯承和汪荣华

鱼儿离开了水，便无法生存，在人烟稀少，荒凉辽阔的康藏高原上，红军官兵们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以争取汉藏群众的支持。他们英勇地肃清了与红军为敌的一支又一支封建反动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穷苦的汉藏农牧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翻了身的穷人对红军发自内心在热爱，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各级博巴政府，并且拿起枪来，参加博巴赤卫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努力，红军终于有了一块喘息之地。

在我们滞留川康高原半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偶而发生的战斗，也仅是在红军与民争食时出现的。

这种暂时的平静，首先得益于天时和地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绵延不绝的大雪山所阻，未能对红军穷追，他们或许认为，红军到了这样荒凉贫瘠、人烟稀少、而且处处充满着敌意与仇恨的地方，不用打，自己也会垮掉。

刘文辉原来散驻在这一带的军队被红军赶走后，如今集结在康定一带，中间隔着折多山，也无力向红军进攻。

而布防在金沙江右岸的的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的藏军，也仅是与红军隔江对峙，红军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在人和方面，红军的愿望却很难达到。

虽然在红军势力范围内已经建立起各级博巴政府，但基本上都是一副空架子。因为由穷苦汉藏老百姓组成的政府在群众中缺乏威信，没有号召力。而被红军用政治手段组织到政府中的少数上层人物，又不能像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和阵前遭擒后化敌为友的夏克刀登那样真心实意地同红军合作。

再有一点，这一带粮食奇缺，红军与民争粮的行为，又常常将政工干部们的努力化为泡影。

藏胞们对红军始终不能理解，刘文辉的军队撤离前散布谣言，说红军是青面獠牙的吃人魔鬼，反动封建势力也推波助澜。可藏胞们一经和红军接触，却发现他们不仅不是青面獠牙，也不吃人，而且对待他们亲切和蔼。这一点，增加了他们对红军的好感。可是，他们不能原

谅的是，这些红军又需要他们的粮食牛羊，甚至动武开白条强买他们的粮食牛羊。

的确如此，红军开始时有银元的时候还给钱，后来没银元了就开条子，条子上盖着方面军政治部的大印，写着：买到某某粮食多少斤，革命胜利后再按价偿还。甚至有的干部还许诺加倍偿还——前些年间，康区还真有人把已经发黄的欠条拿了出，人民政府没有赖帐，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上利息，如数归还。此类事情，报纸上登了好几桩——可是，藏胞们不晓得革命是啥，也不知道革命啥时候能胜利。他们只晓得没钱，能活；没粮食，则活不下去。

而严重的问题是，没粮食，6 万名红军官兵同样活不下去。

人多粮少，矛盾便不可避免了。

我曾亲耳听到中央博巴政府年轻的主席格达活佛——他是甘孜藏胞心中的神，也是与红军肝胆相照的朋友——这样对张主席说过："如果你们红军处境好一些，肯定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现在没有粮食，搜刮已经超过了刘文辉。"

到达道孚一月后，张主席叫我恢复了朱德、刘伯承的参谋、卫士的自由，但叮嘱我要随时注意这帮人的动向。当时我的确也安排了好几名警卫监视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危险动向，却发现了刘伯承个人的一个小秘密。

总参谋长在讲恋爱！而且他的恋爱对像就是我们总部的人都很熟悉的汪荣华。

我赶紧把这一情况向张主席汇报。张主席听后却对黄超说："伯承还对我有意见，荣华是我们总部的一支花，他能跑来把这支花摘走，还得好好感谢我这个月佬嘛。"

18 岁的汪荣华，已经是 4 方面军中的一个老兵，她出生在安徽六安县郝家集一个普通农家。

汪荣华参加红军时，才 14 岁。她先是被分配到 12 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女先锋队工作，后又调往英山区少共妇女部工作。1932 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进行第 4 次"围剿"。反"围剿"失败后，汪荣华又跟随大部队一路征战，来到了川陕苏区。很快，她便当上了省苏维埃邮电局的副局长。

刘伯承与汪荣华是在两军会师时相识的。

1、4 方面军会师数天后，中央为感谢 4 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和宣传两河口会议精神，派出好几个慰问团代分赴 4 方面军各部慰问。

前往 4 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的中央慰问团，由林伯渠和刘伯承率领。

一大早，驻杂谷脑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战士就整队前往镇口外，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戴着眼镜、颇有儒雅气质的指挥员引起了汪荣华的注意，她急

忙问站在身边的总指挥部参谋陈明义："喂，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呀？"

陈明义大指头一竖："嘿，你连他都不认识啊！他就是刘伯承，我们红军大名鼎鼎的总参谋长!"

这样的介绍、加之陈参谋提到"刘伯承"三个字时满脸的崇敬，自然会给她留下深刻的印像。

不久，汪荣华从川陕省委调到总部4局工作，这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刘伯承接触。这时候，两军已经分裂，再一次与朱德一起来到4方面军中的刘伯承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的4局，管理也是重要的工作内容，既要安排机关部队的生活，又要关心照顾好首长的生活。汪荣华知道，刘伯承眼睛不好，而且又受到张国焘的排斥和打击，因此她更加同情和关心刘伯承的生活和健康。每当部队到达一处宿营地，她总是和大家一道，为刘伯承找一间明亮的房子。

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逐渐加深了了解。

民国元年，刘伯承弃笔从戎，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做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1 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为了孝敬母亲，便把母亲和妻子从开县老家接到奉节同住。但由于操劳一生的母亲过不惯远离故土、养尊处优的日子，没多久便又带着儿媳回到了开县的乡下家中。1924 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等革命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

汪荣华也时常听到红军指战员们赞扬刘伯承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特别是她调到总部4局以后，通过多次接触，她感到刘伯承平易近人，诚实质朴，办事严谨，品德高尚。在万里征途中，能遇上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

刘伯承常常在繁忙的军务之后，教汪荣华学政治、学文化，给她讲历史，在行军过程中鼓励她前进。虽然当时刘伯承正受到张国焘的压制，但他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刘伯承的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使汪荣华更加敬重他，并由此产生了感情。几个月后，两人虽然谁也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思，但都已是心照不宣。

一天晚上部队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墨，提起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叫通讯员当面交给汪荣华。

汪荣华看过信后，又是激动，又是害羞。与刘伯承相识后，她的确钦佩刘伯承的才华学识和高尚品德，在万里征途中，能有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14 岁就当了红军。参加红军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的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因此，他俩第一次相约在河边散步时，她把心里话掏了出来。

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着说："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贫穷农民，祖父还当过

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了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头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

从河边散步回来时，汪荣华对刘伯承关切地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认真喽！”

1936 年中秋前后，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之中。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沅河的甘南小镇上，刘伯承和汪荣华结成了终生伴侣，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更没有红烛新房，但他们却感到是那样的幸福。

陈昌浩和张琴秋是总部驻扎在道孚时结的婚。当时像他俩这样的大首长结婚，也简单得很，买点糖块，称点茶叶就行了。总部机关和各路大军的首长们赶来贺喜，也不兴送礼。那晚上陈昌浩和张琴秋还站起来唱了两首苏联歌曲，用俄语唱的，“叽哩咕噜”响，一句我也没听懂，可大家全鼓掌，图的就是个热闹劲儿。

## 第十六章 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战争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原本就应当让女人走开。因为，战场上的女人会让男人变得更丑陋，更疯狂……

### 1、谁逼死了余天云军长

在当时两军交恶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

我帮了朱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

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身体十分憔悴。

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

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主席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

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 4 方面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读完全部课程后毕业的惟一的中共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主席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主席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伯承心存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四百名学员，都是 4 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有少数军级指挥员，31 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

在学员中，他年龄小，职务高，聪敏倔强，作战勇敢，深受张主席器重。他当上一军之长时，才刚刚满 20 岁。少年得志，目不识丁，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听的恭维话多了，也就染上了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自然不会放在眼里。他入校后，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军事学术争鸣，倒也罢了，更多的则是出于个人意气和政治背景。

一次上课时，他又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

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

余天云恼羞成怒，蓦地拔出手枪，对准刘伯承便要开火，幸被其他学员上前拉住。

何畏见余天云闹得太过分了，喝令卫兵下了余天云的枪。

张主席得报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伯承，则好言慰勉了一番。

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

没过几天，军校随总部转移。余天云因仍处在禁闭期间，和其他违纪士兵扛着粮袋行军。路经大金川激流之上的悬桥时，他突然冲出队列，跳进激流之中自杀身亡。

对这一重大事件，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主席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他多次在会上说到："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从中汲取教训，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22 年后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毛主席在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对刘伯承主持的军队学院工作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严厉批评道："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又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主席说的"他们"，就是"刘伯承们"。

最后，毛主席意犹未尽，言辞尖厉地对刘伯承作了一些十分不公允的评价。

毛主席把眼睛盯住了建国后一直埋头于军事教学上的刘伯承，是有缘由的。有人曾向他打小报告："军队再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有人更是故作惊人之语："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登上神坛的毛主席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

这场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的结果，是揪出了以萧克、李达、郭天民为首的一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集团"。他们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大校忍无可忍，据理力争，发言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劳改。到"文革"时期，又把坚持不承认错误的蔡铁根押上刑场公开枪毙。而年近古稀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则成了这个"反党宗派集团"的后台，颤颤微微地被人搀扶到怀仁堂的讲台前，当着毛主席和 1000 多张军人神情严峻的脸膛沉痛宣读自己的深刻检讨，为了减轻萧克、李达、郭天民等人的罪过，违着良心尽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

毛主席对刘伯承态度明朗，林彪等人也赶紧发言表态，来了个墙倒众人推。

而最令刘伯承难受的是彭德怀的发言。彭德怀一如他平时的为人，直来直去，不留面子。他声色俱厉地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也有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口中被逼死的"革命同志"，指的就是余天云。

从此后，刘伯承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仅仅隔了一年，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刘伯承看到厄运又降临到了彭德怀头上，而且结果比他还惨。

1975 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刘伯承遗言”在北京官场坊间不翼而飞，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已经在病床上度过了许多个年头的刘伯承说：“我死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是人民敬仰“刘邓”的威名，希望寄神机妙算的刘帅之口，来表达自己对再次打倒邓小平的强烈不满，以及只有邓小平才能救中国的意愿。

但是，据后来公开的资料看，这则消息并不是政治谣言。日本学者竹内实撰文写到：“刘伯承对前去看望他的华国锋说：‘我死之后只向中央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2、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总部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 7000 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 2000 多。她们中至少有 9 成是通江女人。

四川女人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男战士差。

红 4 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既勤劳又能吃苦还能上阵杀敌的四川女人组成的。妇女独立师的前身妇女独立营最初成立于 1933 年 3 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 200 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300 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 3 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教导员。营部设在钟鼓楼。

到 5 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儿。

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秣。

一天半夜，她们运粮末经过通江北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原地休息”，便迫不急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雾，大过其瘾。

忽然枪声一响，全营女战士一跃而出，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众战士手执大刀、梭标，扁担，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吓得这帮早巳是惊弓之鸟的“双枪兵”

魂飞魄散，以为遭到了红军主力的袭击，纷纷举手投降。还未等到他们清醒过来，所有的武器已经落入女红军之手，只有少数几个家伙狡猾地伏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趁红军命令俘虏集合时，飞快地往山下逃去了。

就这样，妇女独立营没损一兵一卒，就解决了田颂尧的一个营。

不少党史资料上都记载了这场“500 农妇歼敌 1 个营”的战斗，而且众口一词都说是张琴秋指挥的。这不对，打这一仗时张琴秋还在王坪红军总医院当政治部主任。她是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团后，才调来担任团政委的。不能因为张琴秋当时的职务高，影响大，后来的命运又令人同情，就把其他人的功劳也加在她头上。

红 4 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妇女独立营，此后，又在此基础上扩编为妇女独立团，由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

总部机关滞留旺苍坝期间，从边沿区奉命撤出来的妇女干部们，连同原来的妇女独立团，则被合编为妇女独立师，辖第 1、第 2 两个团，2200 余人，仍由曾广澜任师长，张琴秋任政委。

西征开始后，妇女独立师直属红 4 方面军总部。1 团为总部机动团，战斗力较强，他们全都是十六、七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女青年，不蓄头发，全身戎装，赤脚穿草鞋，腿上打绑带，英姿飒爽，俨如男兵。每人还发给一支上着三棱刺刀的三尺半汉阳造小马枪，10 板子弹和 5 枚手榴弹。2 团的力量要稍弱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女娃娃，大都被编入这个团里。

总部在党坝停留时，离镇数里的大山中有一座喇嘛庙，藏族群众要按时往庙里送粮、纳税，为他们出“乌拉”（服劳役）。去送粮、纳税的群众离庙三里以外就得下跪膝行，无论是酷暑严冬还是大雨滂沱，他们背上背着粮食，或把钱袋吊在脖子上，往前爬几步磕几个头，常有年老体弱者累死在途中。

妇女独立师的战士到庙外的野地上采集野菜时，庙里时常有冷枪射出。

据调查，得知里面有一股 500 多人的喇嘛武装，红军前卫部队路过时，他们龟缩在庙里，未敢轻举妄动。红军碍于宗教政策，也未解决他们。谁知喇嘛们竟以为红军软弱可欺，便主动开始寻衅了。

妇女师坚决请战，经总部批准，同意该师 1 团前去解除这帮喇嘛的武装。

当这千余名女兵“雌”赳赳气昂昂地出发时，很多机关的同志都站在路两边为她们送行。

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打仗应当是男人的事，现在倒好，男人看家，女人反倒去打仗。

可当时的情况是作战部队都布署在总部机关的前后左右，离着老长一段距离，总部机关里最庞大的武装力量，就得算她们妇女独立师，这仗不打则罢，打，还真的非她们 1 团莫属。

我当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曾广澜和张琴秋说：“两位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

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都没得地方放喽。”

曾广澜笑呵呵地说：“你这小何，都算个老革命了，咋个还一脑壳的封建残余！”

张琴秋笑嗬嗬地鼓起眼睛冲我吼：“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我叫帮大姑娘把你扔到河里去！”

妇女独立师果真不辱使命，上去第二天就把喇嘛庙打下来了。曾广澜张琴秋还派人给总部送信，叫火速派人到庙里去搬运粮食。

黄超组织了几百人由他亲自带去。下午，他们就和妇女独立师一起回来了。张主席亲自带着人到镇子外面去迎接。

那次真叫是满载而归啊，缴了 600 多支枪，粮食 10 万斤以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盐巴、牛、马、羊 300 多头，差不多够总部人员一月之敷了。

那一仗，死了 40 多个女红军，喇嘛被打死了百把人，俘虏一个没要，经教育后全放了。

曾广澜张琴秋几位指挥员来给张主席汇报时，我才知道了这一仗“娘子军”们是怎样打的。

她们上去后，根据敌情和喇嘛庙的地形，决定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对敌人聚而歼之。

当晚，女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开始了坑道作业，将一条条堑壕挖到了喇嘛庙跟前。

天亮后，红军战士从堑壕隐蔽前进，抵近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和选择突破口。只见庙门紧闭，鸦雀无声，显然，敌人企图凭险据守。

等到太阳升起来后，一部分女红军由曾广澜指挥从堑壕运动到正面，向喇嘛庙发起佯攻，敌人则从围墙眼里向外射击。打了十多分钟后，敌人突然打开庙门冲了出来。女红军们火力远近配合，远的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近的用手榴弹猛炸，打退了敌人的突围。

不久，敌人再次集中力量向外猛冲。就在庙门口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曾广澜打出一颗信号弹，早已由张琴秋人不知鬼不觉带到喇嘛庙背后山上茂密树林里隐蔽起来的女红军一见信号，立即冲出树林，居高临下从背后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到处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正面进攻的女红军也趁敌人慌乱攻进了大门，敌人放火烧庙，准备火中突围，女红军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不到两个钟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张主席对妇女独立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可惜的是，这 2000 多名女战士，后来全部被毁掉了。她们奉命加入了西路军，在和马家军的连番血战中，大部阵亡，剩下的被俘，被俘的女战士的遭遇不忍述说。

后来陈昌浩孤身一人跑到延安来找张主席时，我才从他的口中知道了妇女独立师许多领

导人的遭遇。连他的妻子张琴秋也成了马家军的俘虏。而当时听说曾广澜师长则牺牲得非常壮烈，连头都被马家军割下来示众。陈昌浩讲的时候，张主席和我都掉了眼泪。

但全国解放后我才晓得，这个消息有误。

经过十多天的血战，妇女独立师终于被打散了。曾广澜与 1 团团长王泉媛等 3 名女战士带着 6 名孤儿（曾广澜的女儿蔡萍迹也在其中）躲进了祁连山中。20 来天后的一个凌晨，当她们在一座破窑洞里醒来时，马家军的刺刀已经架在了她们脖子上。敌人把她们和 100 多名被俘的女红军关进了永昌城西的一座大庙里。

“七-七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协议，曾广澜母女获释。她带着女儿沿途乞讨，终于来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办事处人员对被俘女红军的冷漠态度让她寒心气愤，她忍不住顶撞了几句，结果被遣回原籍。

曾广澜虽然满腹怨气，但千里迢迢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吉安后，仍然去参加了活动在当地的新四军，被安排在通讯处工作。

1940 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12 月 12 日，曾广澜回家与女儿一起过年，国民党特务撞上门来将她逮捕，关进马家洲监狱，受了长达 5 年多的牢狱之苦。两根肋骨被打断，双脚被敌人用钉子钉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签订了和平协议，曾广澜再次得已跨出牢门。才 40 多岁的人，已是骨瘦如柴，满头白发，连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都认不出这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吉安解放不久，曾广澜找到地委要求工作。地委安排她下乡搞土改，承认蔡申熙女儿蔡萍迹的革命烈士子女身分，并根据蔡萍迹意愿，安排她到北京地质学院读书。

土改结束后，地委安排曾广澜担任吉安地区妇联副主任，随后又被调任吉安检察院副检察长，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56 年退休后，移往北京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女儿共同生活。

这是曾广澜一生中度过的最幸福最安定的 10 年。等到“文革”风暴袭来，曾广澜突然被捕，从此后杳无音信。第一次被抓，落在了马家军手里；第二次被捕，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可这一次却不同——谁抓的？为什么要抓她？蔡萍迹一概不知；母亲是死是活？至到今天，她也无法搞清楚。按照中国人的风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她奔波多年，连母亲的骨灰也没见着……

一代巾帼英雄，恍若一缕轻烟随风而逝！

1937 年元旦前几天，西路军经连日血战本已率残部突出马家军重围，可中革军委来电要陈昌浩、徐向前继续完成打通国际通道的既定任务，他俩只好率领西路军掉头再打回去和马家军血战。当时董振堂的 5 军（原 1 方面军 5 军团）减员严重，陈昌浩就派曾广澜率领她的战斗力最强的 1 团增援董振堂去了。

元旦那天，妇 1 团与 5 军又一举攻下了高台，守敌保安团、民团共 14000 余人投降，立

即被改编为红军，投入战斗。

不久，马步芳、马步青部 5 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及炮兵团、民团二万余人由总指挥甘南警备骑兵旅旅长马元海率领，蜂拥向红军扑来。他们以大部兵力围攻高台。5 军与妇 1 团在高台城外抗击数日，支持不住，被迫全部退守城内，又坚守了半月余。

1 月 20 日，敌人倾全力攻城，先以炮火猛轰，城内已成火海，城墙多处被打塌打缺，敌人不顾死活从缺口突入。5 军与妇 1 团全体人员，包括炊事兵、机关后勤人员，全部到城墙上投入了战斗。为节省弹药，女战士们用瓦罐装石灰，泥沙，和大小石头、砖块，像冰雹似地向拥到城墙下的敌人脑壳上砸去。夜里，则用袋子装满泥土，填补城墙缺口，再浇上水，第二天凝结成冰，和原来的城墙一样坚固。

但是，在敌人的重炮轰击下，缺口越来越大，敌人从缺口拥进城来，和红军展开了白刃搏斗。女战士们十分英勇，刺刀、大刀缺了就用石头砸，甚至和敌人扭在一起，用拳打，用牙咬，直到最后扭住敌人一起滚下城墙同归于尽。

在最危急的时候，收编的保安团叛变了，打开城门让敌人冲了进来。混乱中红军被里应外合的敌人打散了，打懵了。有的人趁乱冲了出去，曾广澜和王泉媛也带着 6 个烈士孤儿突出了包围。没能出城的战士则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同归于尽的拼杀。骑匪们挥着雪亮的马刀在街上狂奔乱蹿，疯狂地砍杀红军，女战士们有的拉响了手榴弹同敌人拼命，有的撞墙牺牲。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即从张国焘屠刀下逃脱的原 4 方面军 33 军政委），与几名参谋、卫士被包围在一间屋子里。激战数小时，杨克明中弹牺牲，卫士们也非死即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董振堂宁死不当俘虏，撞墙而亡。

满城都是血啊，连厚厚的白雪也变得红通通的了。

### 3、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在千余名女俘虏里，唯有已经由妇女独立师政委调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的张琴秋是幸运的。

张琴秋的幸运是指当俘虏的结局而言，作为当俘虏的过程，她和她的战士一样吃了太多的苦头，甚而更多。

那是个狂风卷着雪花飞舞呼啸的傍晚，暮云四合，到处是枪声和尸体。部队被打散了。一群男女混杂的红军好不容易才从马家军的铁蹄下逃脱出来，一个个踉踉跄跄，累饿交加，已经迈不动步了。

这时，骑在马上的张琴秋突然痛苦地叫着从马上翻滚下来。女警卫员赶紧上前把她搀扶到旁边的一道垫着厚厚积雪的地沟里。战士们也都原地坐下了。片刻后，一声婴儿的啼哭冲天而起。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为这个不合时宜到来的小生命增加了几分担心。

已经为人母的蔡元祯赶紧循着啼哭声急步奔了过去。她看到刚刚产下孩子的张琴秋头发眉毛上挂着霜花，冻得全身缩成一团，落地的孩子一会儿就冻僵死去了。蔡元桢赶紧用刺刀割断了脐带，帮张琴秋穿好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裤子。

偏偏这时候又传来命令：起立，行军！

蔡元桢焦急万分地盯着张琴秋……天呐，大姐都这副样子了，还怎么走哟？

张琴秋喘息着扬扬下巴："走不动……也得走……不能掉队……"

蔡元桢和警卫员流着眼泪，把张琴秋架出了地沟。

张琴秋磕碰着牙齿，打着抖，被搀扶上马，鲜血立刻染红了马鞍……

张琴秋沦为女俘后，在被押解途中，她身体极度虚弱，面黄肌瘦，常常遭到敌人的辱骂、鞭打。从张掖出发，一路上敌人不知道更名为"苟秀英"的张琴秋是西路军的领导人。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衣衫，蓬头散发，满脸污垢，以避人耳目。她在俘虏营中仍然进行着斗争，尽管她最后还是被叛徒出卖被敌人认出了身份，但她并不为此而感到害怕，相反倒可以用公开的身份来进行抗争。马步芳抓住她后，很快用飞机把她送到南京蒋介石面前邀功。

后来国共合作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才把她救回了延安。她应该是幸运的，因为更多的战友却是在血淋淋的屠刀和阴森森的白色恐怖下挣扎……

在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生离死别后，她们中间仅有少部分人默默无闻地活了下来。当年参军时她们抱定了"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做共产党的鬼"的决心。可是命运却偏偏让她们做了俘虏，又给了她们中的一些人生的可能。被残杀的人英勇不屈,活着的也并非苟延残喘，而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在死神的魔爪下坚强不屈地活下来。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更何况她们中不少人还是些十三四岁的小娃娃。大的也不过 20 出头，这样的年龄在今天和平的环境里被人称作花季少女，该是多么甜蜜多么温馨。可是，这些穿上蓝军装戴上红星帽的女娃娃呢？，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跟着张国焘反反复复地来回折腾了多次，经历了人世间最为残酷的腥风血雨。

战斗中牺牲了的战士解放后被认定为英雄，而被俘的女红军却受到了非人的摧残。她们或是被活埋荒野，或是被残杀街头，或是在斗争与屈辱中悲惨地活了下来。有人说，胜利的历史是露出地面的丰碑，为人们瞻仰、赞颂。失败的历史则是深埋地底的基石，它默默地负载着高大的建筑，却不为人所见。

可是没有基石，哪来的丰碑？！

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麾下的妇女独立师的女战士们也同样蹈入苦海，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人备受摧残乃至死于非命。被俘的女战士们比被俘的男战士更惨，她们遭受了三重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而饱受歧视；与此同时，她们还遭受组织和世人封建主义陈腐的女子"贞节观"的折磨——我们这些理应被

她们视为同志的人，不但拒绝给予这些受苦受难的姐妹们救治，反而往她们血淋淋的伤口上洒盐。

战争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原本就应当让女人走开。因为，战场上的女人会让男人变得更丑陋，更疯狂！

满地都是血，都是残缺的尸体啊……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孙玉清、董振堂和杨克明等军首长惨遭杀害后，头颅还被马家军砍下来巡回示众，拍成照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被俘的女红军更惨，没有人能逃过被如狼似虎的马家军蹂躏的命运。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人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对最终能从惨绝人寰的地狱中逃脱出来的女红军，我们活着的人对她们的“失节”是应该满怀同情，还是做出一副圣人模样，道貌岸然地去斥责她们的不贞？

看看我们的好姐妹是怎样“失节”的吧：

1936 年 12 月 5 日，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即原红 4 方面军前进剧团）奉命去 9 军慰问演出，路上突遭马家军包围。经激战子弹打光，演员们四下逃散，最终全部落入敌人手中。

陈淑娥、党文秀、黄光秀、王定国 4 名女演员是在一户回民家中被俘的。一帮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马家军破门而入，缴了女红军们的枪，恶狠狠地瞪着她们，把一个红布包袱丢在桌上。然后解开包袱，扯着嗓子喊叫着：“这是你们赤匪头子的脑袋！谁再敢反抗，就是这样的下场——砍头！”他们逼着女俘去看。

陈淑娥看清了，那是她的男友、年轻的孙玉清军长的头颅啊！死去的军长怒目圆睁，舌头已被自己咬得来欲连欲断，成了一段血肉模糊的烂肉。泪水哗地滚下眼窝。陈淑娥悲愤地吼道：“让我们看个啥子？——你们那么凶，就把我们也一起杀了嘛！”

马步芳下了道命令，对红军剧团的人不准杀害，他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剧团，并派他的参谋主任赵仰天去当新剧团团长。对被俘的红军战士，马步芳的原则是女俘嫁人，男俘补兵。新剧团的女演员们也大都成了军官们的小妾。

党文秀被分配给马步芳的卫士官为妻，她冒死逃跑被抓回，马家军将其轮奸后再把她杀害了。

黄光秀被挑去做了马步芳的小妾，她利用受马步芳宠信的特殊条件，竭力营救张琴秋，事情败露后，被马步芳下令枪杀。

陈淑娥当时已经怀有身孕，她是红 4 方面军前进剧团里长得最漂亮的姑娘之一。长征途中，前进剧团常常下部队慰问演出，27 岁的 9 军军长孙玉清喜欢上了她，两人很快就相爱了。部队过黄河后，陈淑娥发现自己怀孕了，问孙玉清怎么办？恰逢孙玉清在古浪打了败仗，就安慰陈淑娥说，别怕，等我打了胜仗，咱俩就结婚，可没过多久，孙玉清牺牲了，陈淑娥也落入了马家军手中。前进剧团押到西宁后，陈淑娥被马家军总指挥马元海一眼相中，挑去

做了小妾。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陈淑娥不遗余力，帮助了许许多多沦为俘虏的战友。她和孙玉清的儿子出生以后，马元海不愿看到这个“赤匪”崽子出现在自己眼皮底下，把他寄养到一户老百姓的家里。陈淑娥想念儿子时，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去看一看。

后来国共合作，新剧团解散，王定国和战友到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经组织安排，王定国嫁给了当时共产党在兰州的最高负责人谢觉哉，她也成为所有西路军女战士中最幸运的一人。许多年后，流散的西路军官兵能重新得到组织上承认，身居高位的王定国功不可没。

最苦的要算陈淑娥了，1949 年，马元海一大家子逃往台湾，她却被扔下了，和已经 13 岁的儿子相依为命，过着贫苦交加的生活。西宁解放了，可是，新政权却在很长时期里无法判定陈淑娥的身份，究竟是大军阀马元海的姨太太，还是红军英烈孙玉清的遗孀？所以没人敢给她任何一点帮助。一直到八十年代，在王定国等人的奔走呼吁下，人民政府终于承认儿子是革命烈士孙玉清的遗孤，但母亲陈淑娥的身分仍未得到承认。原因只有一个，她被俘后丧失革命气节，做了大军阀马元海的小老婆。

如今，已经年过九旬的陈淑娥与儿子住在兰州城里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就这么一间六七十个平米的小屋子，还是徐向前在世时亲笔给甘肃省委的领导写了信，才照顾给她的。在她的家的正墙上，郑重地挂着孙玉清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但这张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印的证书与陈淑娥毫无关系，直至今日，虽然她早已领到了一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但仍然是一个不被承认的烈士遗孀。

记者采访时，一辈子历尽人间苦难的陈淑娥一声长叹：“苦，苦啊，他（孙玉清）也死得苦，我们娘儿俩也活得苦。好在政府现在承认了我红军老战士的身分，晚年也不焦心吃穿病痛了，唉，都活到这把年纪了，我也再没有其他想头了。这都是命，命啊……”

死去的女俘虏，变成了一粒尘土，随风而逝。忍辱负重活到国共合作时期的，冒死跑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归队，却往往被我们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拒之门外。即使她们跪地磕头，苦苦哀求，我们的人依然无动于衷，使得她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4、两位革命老人的半世情缘

组建西路军时才被任命为妇女独立师 1 团团长的王泉媛生命力无比坚韧，当初做了马家军俘虏能死去活来，建国后身处劣境几十年居然也能熬到现在，前些时候才被人当做古文物似地挖掘出来到处展览。

她回忆说：“走进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我还满心以为是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自己的党组织里来了，有保障了，我的生命也有保障了，我的政治身份也有保障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不要我！就像一个炸炸雷打在脑壳上，我脑壳都晕了！办事处接待的同志是这样对我说的，一年之内的接收，两年之内的考察，超过三年的一律不要。因为我被敌人抓到以后，没办法逃出来，已经超过三年了。我一再苦苦要求，说组织不要我，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向他们发血誓保证我从没做过一丁点对不起共产党的事。结果接待我的同志说，没有办法，这是政策。当时给了我 5 块纸洋，说你就自己谋生吧，我们很同情你，可不能违犯政策。

我拿着 5 块纸洋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脚杆打闪闪，脑壳里好像不停地打炸炸雷，哭得死去活来!”

王泉媛还说：“挨敌人拿枪托打，拿刺刀戳都不算痛，最痛的就是组织不要我的那个时候啊！敌人再咋个收拾我，我没有哭过，我不伤心。伤心的就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母亲，可母亲再也不要我了，还要把自己的女儿推出门去。我不走啊，守着他们哭，哭得都快背气了……呃，那时候啊，我真想一脑壳撞死在他们面前算喽！"

像王泉媛一样有幸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被俘女红军，长期遭受社会的歧视，不少人在屈辱中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仅存的极少数早已佝了背，白了头，掉了牙的女红军，才终于领到了一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晚年的生活也总算有了保障。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些颤颤微微离死不远的老太婆被青春靓丽的主持人请到金碧辉煌的演播大厅里，对着雪亮的灯光和镜头紧张得手脚找不到放处，满是皱皱的老脸上笑得比哭还难看，点头哈腰一迭声感激这个感激那个时，我这个老战士的眼中，就会泪水长淌——因为，我会想到没有能够活到这一天的我的那么多的女战友，好姐妹！我就会忍不住问：“战争有啥子道德可言？凭什么要用‘失节’来歧视冷落她们？她们虽然身体遭到了敌人的蹂躏，但是，她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丧失革命信仰，并没有出卖同志，而且还竭尽所能地给与境况比自己更糟糕的战友以帮助。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还能要求她们怎么样？难道要她们全都为了保住所谓的‘贞节’全体跳进黄河喂大鲤鱼，我们才会给她们每人立一座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真想一脑壳撞死在他们面前算喽”的王泉媛当时的激愤态度肯定不会令办事处的同志心情愉快。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回到延安后，把她当成个刺儿头当做龙门阵摆，说她发誓再不当红军，还交给“八办”一封信，表示要与王首道一刀两断等等。

而此时的王泉媛，依然还抱着重当红军的希望。1939 年夏，她第二次来到兰州找“八办”，可这里也是人去楼空。绝望之际，她只好千里迢迢回到了老家。从此，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处，又增添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

解放后，她找到有关部门，但最终的结果是，她的革命经历得不到承认，党籍也得不到恢复。

1962 年，时来运转，王泉媛人在家中坐，喜事从天降。先是县区领导们带着匠人像救火似地跑到她家里来，到处稀牙漏缝的破墙用紫泥补了，还用石灰粉涮了一遍，弄得来四壁雪白。地面上疙丁暴鼓踩得来像煤球般的千脚泥也认认真真地铲了，整得来平平展展。还给一无所有的家中搬来了几样一般农民家庭看着都羡慕的必备家俱。王泉媛过去让县区领导冷落惯了，现在让这些领导突入其来的热情关怀照顾弄得来莫名其妙，十分的不适应，问为何如此？领导三缄其口。直到把活儿干完，才告诉她，有重要首长要下来看望她，并且委婉地暗示，首长来了，哪些话当说，哪些话不当说。

王泉媛几十年前就当过有资格带警卫员的红军首长，知道现在党和政府里的首长多如牛毛，猜不透到底是哪一级的首长，是哪一位重要首长来看望她？问县区领导，原来他们级别太低，同样也不知道马上要下来的重要首长谁？

两天后，重要首长由许多不太重要的首长陪着，前呼后拥地来到了王泉媛焕然一新的家。

王泉媛一见被首长们围在中间的重要首长一下就哭了。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娃娃似地哭着迎上前去，惊天动地地大叫了一声："康大姐……你……你可来呐！"

康大姐就是康克清。她这次和朱德委员长重返当年他们共同战斗生活过的井岗山时，想起了失踪巳经多年的老战友王泉媛就是这井岗山下吉安县的人，便向迎接他们的省市领导打听。省市领导们不知道，答应立即安排人员调查康大姐关心的人。

于是，就有了县区领导们突入其来的热情关怀那一段前奏。

康克一看当年英姿飒爽，手提双枪率领上千"娘子军"冲锋陷阵的红军女团长，变成了一个满面菜色的枯瘦老太婆，不禁抱住她失声痛哭！

姐妹见面，泪水伴随着往事流淌不止。康克清给她谈起了当年在井岗山上反围剿，打张辉赞，谈朱德在井岗山上熬硝盐。王泉媛虽然就在井岗山脚下，参加革命后她的战场却在吉安城里。她是吉安城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共青团干事，还当过少共妇女部部长。只有敌人前来围剿时，她才会和同志们暂时撤上井岗山。王泉媛则给康克清讲她带着一团女红军如何与马家军血战祁连山，如何落到敌人手中，如何被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拒之门外。说到伤心处，她哭，康大姐也陪着她哭。

好在，今天康大姐找上门来了，这不表明党还惦记着我么？党还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么？还要什么呢？康大姐带来了党的信任，这就全够了！

说到高兴处，两位姐妹还唱起了一首当年她们最爱唱的红色歌谣：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道香，

餐餐吃得净打光。

干稻草，软又黄，

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

分手时，王泉媛欲言又止，很想请康大姐帮忙，找组织上把自己的党籍给恢复了。可话到嘴边，终未说出口。她不愿意给一片好心登门来看望自己的康大姐找一丁点麻烦。

再者，虽是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她的传奇般的经历仍然使她多少仍保持着一

些做人的自尊。

但是，毫无人性的“文革”，却让她体会到欲保持做人的自尊，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就像她当年从马步芳的大牢里活了过来一样，这一次，她依然从“文革”的大劫难中熬了过来……

1982 年夏季的一天，已经 68 岁的王泉媛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人活七十古来稀”，她清楚，留给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了。包括早已死去的人。有的家属甚至把平反文件拿到芳草凄凄的坟头上，念给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亲人听，而且还化作一团红通通的火焰，把冤死者最渴望的清白送到了他们手中。

王泉媛没有儿女，却收养了 7 个农村孤儿，除一个因病夭亡外，其他 6 个都已成家立业。如今，她已是儿孙满堂，日子和过去比起来有了天壤之别。她年轻时参加革命的目标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她现在只剩下一个要求，在她闭眼之前，组织上能把党籍给恢复了。下面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她只好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找比她还长 3 岁的康克清帮忙。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也“顺便”也想看看当年的丈夫王首道。

早已赋闲的康大姐亲切地欢迎她的到来。还把曾志、刘英、邓六金等当年和王泉媛一起走完了长征路的老姐妹都邀来了。而且为了让她和王首道见上一面，见面地点选在了中国妇联大楼的会客厅里。

王泉媛和康克清等老姐妹没拉上几句话，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向着她缓缓地走过来了。

客厅很大，金碧辉煌。

……是他，个子还是那样高，但清瘦的面容已经变成了老年人的富态，一头黑发也染上了斑斑银霜，额头上、脸颊上布满了饱经历史沧桑的深沟浅壑，步伐也不再像当年那样轻盈矫健。

“泉媛同志，你还……好吧？”当年的新郎走上前来，向着当年的新娘首先伸出了双手。平静的声调，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激动。

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幻化成了历史。然后在最美好的一瞬间突然凝固为雕像。

一个是来自井岗山老区的普通农妇、几十年前就当过女红军团长却至今还被党组织拒之门外的不幸者，一个是在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报纸上和电视里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幸运者。但是，一切人为形成的权势地位贫富尊卑全成为过烟浮云，对历经沧海的老人来说，充塞心中的，唯有特殊战友之间不掺任何一丝一毫杂质的真挚感情才是人世间的永恒之物！

王泉媛迎上前去，也同样伸出双手，与王首道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酸甜苦辣，倒海翻江。已成垂垂老翁老妪的两位革命人热泪滂沱，被历史的风雨锈蚀的心灵之弦倏然间争琮作

响，奏出一缕金鼓雷鸣之声。

两河口那栋他俩度过最后一夜的木楼，恐怕早已糟朽垮塌了吧？然而，那分手时彼此的最后一瞥，却依然像铬印一样永远地铭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康克清、曾志、刘英、邓六金等老战友也全都泪流满面。

王首道从老战友那里已经听说了王泉媛的遭遇，心中潮涌浪翻，才问了一个“好”字，就鼻梁发酸，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她盼望能见到他，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巨大的问号。这问号自从她被兰州“八办”拒绝后就如同铁钉一样深深地钉在了她的心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当着几位老姐妹的面急切地说道，“有人说我在兰州‘八办’给你留了封信。”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有什么信啊！我在延安一直等了你 3 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脸说不下去了，眼泪从他的手缝里渗了出来。

这一次短暂的会面，总算了却了王泉媛半个世纪的心愿。

1989 年 8 月 26 日，王泉媛苦苦盼了几十年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党组织给她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可让王泉泉媛气愤的是，党龄只从 1949 年算起，享受副地师级待遇。她恨不得把这红头文件几把给撕了，党龄从 1949 年算起，那在井岗山闹革命，以后在红军中的战斗岁月，不就全都不算数了？地师级算个啥？当个老百姓也没关系，只要组织承认自己为革命出生入的那 20 多年的历史。她不断地反映申诉，可迄今仍无结果。

她一个穷老太婆独立抚养 7 个农村孤儿的事迹经媒体披露后，她又成了轰动井岗山地区的新闻人物。老百姓都把这个刚刚恢复党籍的老共产党人，看作是当代的观世音菩萨。

1995 年，王泉媛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活动，并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94 年，为拍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50 周年的电视片，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特地邀请王泉媛等几位西路军老战士前往河西走廊故地重游。

拍摄工作结束后，王泉媛再次来到了北京，她听说王首道病了，立即赶到了医院。

作为一名特殊的探视者，王泉媛来到了王首道的病榻前。

她还给病中的王首道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是她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婚之夜对新郎许下的庄重承诺。

王泉媛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把手伸进鞋里，用手背把

塌下去的鞋面绷了起来，然后郑重地交到了王首道手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都老了，好多事都忘记了，就这双鞋子的事，我忘不了。遵义结婚那晚我对你说过，我要送你的。"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浑浊的老泪立时模糊了双眼。

"哎！"他也重重地叹了口气——一声历史之叹啊！

然后他缓缓说道："泉媛，我今年 88 了，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也该满 80 了吧？见面的日子，恐怕不多了，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王首道在女儿王维滨和王泉媛的搀扶下挪下床来，走到窗前，和王泉媛手挽着手并排站在了一起。

巧！一缕灿艳的阳光斜射进来，像聚光灯一样映照在他俩的脸上。两位老人努力挺直了腰板，早已昏花的老眼中，突然射出一束坚毅的光芒。

已经是武警部队大校的王维滨泪光盈盈，按下快门，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一段旷世情缘，在岁月的风雨中化作绝响！

5、"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

前些年，我们大巴山回来了一个当年西路军的女红军。她的经历被报纸披露以后，让我们这些老东西感慨万端，欲哭无泪。

女红军叫李自珍，是达县（今四川省达州市）碑庙区石庙场人。

1969 年，已经被造反派打得个稀巴烂的四川省，枪炮声总算是停了下来，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始清查阶级队伍。

家住四川省资阳市临江区(现为临江镇)水井大队一生产队的青年农民赖裕良，被党支部书记指定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队员。

不料有一天支部书记严肃地对他说："赖裕良，群众反映，你母亲李自珍来路不明。党支部希望你站稳立场，把你母亲的真实身份查清楚。"

支书这话，有如当头一棒，打得赖裕良脑袋嗡嗡作响。心想假如母亲是暗藏特务或是牛鬼蛇神，问题可就太严重了。他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他也不愿意相信有这种可能！

因为，他最了解自己的母亲。赖裕良的父亲赖发荣，解放前在资阳临江寺"老街子"，现在叫正心街的地方做小买卖。1945 年，赖发荣与 30 岁时逃荒来的李自珍结婚，生了 3 个

儿子，二儿子赖裕良生于 1948 年。解放后的 1952 年，人民政府动员城镇居民下乡，赖发荣便举家搬迁到现在的水井一队当了农民。1957 年，赖发荣不幸病逝，丢下妻子和 3 个年幼的儿子。当时，不少人都劝李自珍改嫁，但李自珍执意不肯。她怕改了嫁后继父对子女不好。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的 1960 年，年仅 6 岁的三儿子被饿死。再后来，长大成人的大儿子结了婚，并分家另立锅灶，李自珍则和二儿子赖裕良相依为命，艰苦度日。

沐浴母爱 20 年的赖裕良，几乎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母亲的慈爱，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更不敢想象母亲可能会成为阶级敌人。但是他又不得不为母亲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因为从他懂事起，他就已经从大人们口中得知，母亲原是逃荒女。逃荒女会不会是潜藏特务，会不会是牛鬼蛇神，如果真是，后果就不堪设想!

下了很大决心要查清母亲身份的赖裕良，在一天半夜时一头跪在母亲脚下，说："娘，你说，你到底是从哪里来，老家有些什么人，你是怎么跟我爹结的婚……"

李自珍惊得差点跳起来……这么多年，儿子从没问起过她的身世，今晚，儿子这般模样探询她，一定是在外边听到了什么风声。于是她问儿子，是不是外边有人在说什么啦?

赖裕良说："娘，有群众说你来路不明，党支部要求查清你的身份，查不清，要把你当特务、牛鬼蛇神对待，把你弄去斗争。"

经历了若干政治斗争的李自珍，听了儿子的话，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看来，不把自己的身世讲清楚，真有可能被弄去斗争，将要像土豪劣绅那样被贫下中农游斗。于是，她从头到尾讲了她的历史。她说，她出生在达县石庙场申家坡 5 保 9 甲(现为碑庙区金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母亲叫李郑氏，母亲一共生育了 6 个子女，李自珍是幺女，在她头上有 3 个哥哥、两个姐姐。1932 年，红 4 方面军在大巴山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大搞扩红，年仅 17 岁的李自珍就参加了红军，与堂侄女李长秀分配到红 4 军三 33 团 3 连 8 排当战士。参军后，李自珍所在的部队两年时间在平昌、巴中、通江、南江、旺苍一带，大大小小打了 100 多仗。李自珍先后 10 多次受伤，浑身留下无数伤疤。在通江县铁佛场的一次战斗中，李自珍所在班的班长不幸牺牲，战斗下来，领导就叫李自珍当了班长。1935 年，红军长征途中，李自珍所在红 4 军进入茂县时，川军孙震 3 个旅前来阻击，土门一战，川军几乎全军覆灭，但红 4 军也伤亡惨重，死了几百个战士。李自珍也在这次战斗中左肩窝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她坚持一边养伤，一边行军，于 6 月间同全军将士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了师。部队在松潘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就过草地，走着走着，部队接到命令，叫往回撤，将士们不晓得是啥子原因，只好往回撤，反反复复走了很多地方，天天行军。红 4 方面军在四川雅安通往成都一个叫百丈关的地方，遭到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杀，伤亡极为惨重。直到 1936 年，才在甘孜与红 2 方面军再次会师，共同北上。在甘肃西渡黄河时，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临时架设的索桥被炸断，李自珍落水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李自珍死里逃生后随一支被打散的红军小队伍往西而行，途中翻过了两座大雪山。因缺少给养，没有弹药，流失将士只能躲进深山老林，过着非人生活。战士们白天分散在深山老林，夜晚设法聚集，在芦山、天全、小金等县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在一次战斗中，李自珍与敌人拼刺刀，左手被刺伤，滚下悬崖。战友们都以为她死了。受了重伤的李自珍，居然大难不死。她被一位姓王的孤寡老太婆救起，将她藏进山里，精心治好了她的刀伤。她不敢暴露自己红军战士的真实身份，又想设法与失散的红军战士取得联系，便在那位王姓老太婆家住了下来，认老太婆为干妈，并改名姓王。不几年，王姓老太婆不幸病死，李自珍无依无靠，决定回到老家达县。她沿途乞讨，于 1945 年步行

到资阳县临江寺，因疾病和饥饿，昏倒在沱江边，被江边洗衣服的一个叫赖素君的大姐救起。并在赖大姐的劝说下，与赖大姐的弟弟赖发荣结了婚。

听了母亲的诉说，赖裕良简直惊得目瞪口呆。他问母亲，为什么她当年不回老家达县，为什么不把她的身份告诉父亲，为什么一二十年都不说出她的真实身份。他一连问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自小受的教育告诉他，红军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平平常常大字不识的母亲，怎么可能是……红军？

李自珍说，当初，她病倒在临江寺，是赖裕良的姑姑赖素君救了她，又是他父亲赖发荣照顾了她。她之所以没有回到老家去，是担心回去后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她在临江寺留了下来，仍然不敢暴露自己红军战士的身份。解放以后，她本来想找政府，讲清自己的身份，可是却听说当初领导他们的张主席早已成了大叛徒。她想到自己当的是张主席的红军而不是毛主席的红军，自己又拥护过张主席，喊过打倒毛主席的口号，现在是毛主席的天下，就不敢讲出自己的历史，怕给家人招来麻烦。

无论是红军战士也好，或是牛鬼蛇神也罢，母亲终于说出了她的出生地，有了出生地，就能查清母亲的真实身份了。赖裕良请求大队开了个介绍信，于1969年12月坐火车经广元，又从广元坐汽车到巴中，再到达县。他先到达县武装部，没有查到李自珍的任何记载。工作人员告诉他，说石庙场属碑庙区，到碑庙区可能知道一些相关情况。于是，赖裕良又赶到碑庙区，区干部说，石庙场现在叫金石公社，党委书记叫李天觉，只有直接到金石公社，查到申家坡原来的5保9甲现在是几大队几小队，这样也许有可能查到李自珍这个人。赖裕良二话没说，迈步就走，一路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步行来到了金石公社。直接闯进了党委书记李天觉的办公室。

李书记看过赖裕良的介绍信以后，上下打量了一下来人，说："李自珍这个红军，我知道，她早就死了。李自珍家里的人全都死光了，一个人都没有了。"

有如兜头一瓢冷水，浇得赖裕良顿时浑身透凉。他想，他母亲可能编了一套谎话，冒充了李自珍。这么一想，赖裕良又气又恨又悲哀，竟无法自控地放声大哭起来。

李书记劝他莫哭，对他说："小兄弟，你既然来了，就把你母亲的情况讲来听听，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万一你要找的李自珍不是我说的那个李自珍呢？如果不是同一人，我们倒可以帮你找一找你母亲李自珍的亲人。

没想等赖裕良把母亲的经历刚一讲完，李书记竟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一把抱住赖裕良，喊道："小表弟，我是你表哥，我就是你大舅李自凡的儿子，你母亲就是我当红军的幺姑李自珍啊!"

闻听这话，赖裕良既惊又喜，想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李书记原来是母亲的亲侄儿！

李天觉告诉赖裕良，人民政府早已追认李自珍为革命烈士，祖母李郑氏(也就是赖裕良的外婆)享受烈属待遇。祖母死后，因为李自珍的大哥身体不好，政府就让其继续享受烈属待遇至今。先前之所以说李自珍死了，亲人也没有了，是害怕赖裕良假冒。因为在通南巴地区假冒红属，骗取政府优抚金的事情多得很。

赖裕良觉得这事离奇得可以，母亲还活鲜鲜的，咋莫明其妙被政府弄成个烈士了？

表哥叫他回家把他母亲及全家迁到达县，迁回他母亲的出生地。赖裕良说他先回家征求母亲的意见，然后就欢天喜地回家去了。

等到过了年，离别家乡已经 38 年的李自珍，在儿子的陪伴下，回到了她几乎已经陌生的故土。

“活着的烈士”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昔日的战友来看望李自珍，问起李自珍的现状，都说李自珍应该找政府，让她享受老红军优抚待遇。达县人民政府得知李自珍还活着，便取消了其亲属的烈属待遇。鉴于李自珍不愿回故乡定居，当地政府便出具了李自珍失散老红军身份的证明，希望李自珍能受到资阳人民政府的特殊照顾，使其享受红军优抚待遇。

然而，谁也没想到，为争取政府优抚，李自珍竟经历了比她当红军还要艰难的漫长历程。

开始，李自珍拿着证明，找到资阳县革委会。没想军代表不仅不给她落实政策，反而还拍着桌子骂李自珍不是正宗的红军，是大叛徒张国焘的反动部队，没把她关起来判刑就算便宜了，还想贪图什么老红军待遇？简直是睁起眼睛说梦话！军代表收去了李自珍的证明，把她训斥了一通，警告她“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以后不准再来找政府的麻烦，再来，就把她关起来！

事情落到这种地步，李自珍也后悔不该找人民政府给自己添堵。她觉得自己以前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毛泽东坐了天下，咋能给张国焘的黑兵好果子吃哩？

几十年勤耙苦做粗茶淡饭都过去了，可偏偏，这回却被儿子逼得露了馅。

就这样，李自珍又沉默了若干年。

1978 年，在平反热潮中，李自珍的心也动了。在儿子陪同下，母子俩又来到资阳城里找民政局。民政局的人都晓得她，态度不错，说这事儿他们管不了，请李自珍去找政府。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政府办公室，这政府里的人又叫她去找民政局。最后是两边态度都好，两边都不管。找的次数多了，接待她的一位办事员终于不耐烦了，还斥责她无理取闹，给政府找麻烦。

那一刻，李自珍压抑了几十年的怒气终于像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出来了。她猛地一掌拍在办公桌上，把办事员的茶水杯子都震翻了，对着吓得来两颗眼珠鼓得像牛卵子一样大的办事员破口大骂：“你们这帮狗日的混帐，敢轰我出门！老娘是哪个，老娘是当年专干杀人放火的红军！为共产党打天下，打得来周身上下没得一块好肉！老娘给你们添啥子麻烦了？我不过要求政府承认我红军的资格，你们凭啥这样白眉白眼地对待我？没得老娘上阵杀敌，你这龟孙子哪有资格坐在这衙门里头耍威风？不给老娘磕头作揖不说，还敢轰我出门。日妈哟，老娘今天就把你这个烂摊子掀了，看你几爷子敢把我咋个办！”说着她就伸手去掀桌子。办事员这下才知道老红军不是可以随便喝斥的，赶紧陪笑脸，说好话，还搪塞她说：“你去找县委信访办吧，像你这种历史问题归信访办管。”

李自珍就到信访办。信访办耐心地给她解释，说她的情况特殊，县里级别低，没资格办，让她去内江找地委。于是，她又来到地委，地委又把她支到地区民政局，民政局说几十年前的事了，要花工夫调查，叫她回家等待消息。李自珍回到家，就耐心地等。等了一年多，没有消息，在儿子陪伴下，她又多次到内江地委询问调查情况，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正在调查”。

后来，赖裕良听说这种事情找下边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有人建议他母子俩去中南海找党中央直接反映。又听说资中县水南街有个姓邓的老头和北京的一位大领导有啥特殊关系，专门替人写“通天材料”向中央反映情况。于是母子俩便又专门跑了一趟资中城，到水南街找到邓老头，写了个“通天材料”寄给了北京中央组织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

邓老头写的“通天材料”果真通了天，1981 年 7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民政部同时致函四川省有关部门，要求调查落实李自珍的问题。

这一次，李自珍抱了极大的希望，心想中央都惊动了、过问了，她的问题一定很快就会落实了。然而她的高兴没能持续多久，等来等去，她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落实，而且一晃又是好多年。

李自珍想，自己恐怕是等不到哪一天了。

就在她再一次绝望的时候，还是川北老苏区的政府对红军有真感情，1987 年开春，达县民政局又给李自珍寄来了失散红军的证明，并请求资阳县政府按有关政策落实李自珍的优抚待遇。1990 年 3 月，资阳县民政局终于发给了李自珍一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并享受每月优抚补助金 25 五元正。

人活 70 古来稀，这一年，李自珍已经 72 岁了。

拿到证，领到钱，李自珍感激得不行，逢领导就点头哈腰地说“伟大”、“英明”，感谢新时代……

## 第十七章 格达活佛之死

张国焘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第一次到甘孜时，亲自登门看望格达活佛……“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红军离开川康高原时，朱德把自己的望远镜送给了格达。而格达送给朱德的，却是一首诗歌……

1、红色活佛

我第一次看到格达活佛，是在甘孜。

来到甘孜的张主席、朱德、陈昌浩、徐向前一同去拜访在白利寺坐床的格达活佛，我带着警卫排随侍。

让我大感意外的是，身披红袍手捻佛珠的活佛，居然是一个 30 岁出头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就从这帮红军首长走进他的寺门的那一天起，开始成为煌煌中国革命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格达活佛原名更嘎益登，法名洛桑丁真-扎巴它耶，1902 年出生于甘孜县森康乡德西村一个贫苦牧民的家里，7 岁时被拣选入白利寺，以第 5 世格达活佛坐床。11 岁时赴拉萨噶丹寺学经，8 年后获“格西”学位（格西，藏语意为“善知识”，是深通经典，经严格考试成绩优异的喇嘛）。

格达活佛不仅对藏传佛教经典有很高的造诣，而且研习藏医，由于他出生低微，深知民间疾苦，乐善好施，扶危济厄，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威望。

红军到来之前，为反动谣言蛊惑的人中，也有格达活佛。

但是，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逃跑，也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的动向。见红军秋毫无犯，保护寺庙，鼓励农商，于是疑虑渐消。

一天，格达活佛在返寺途中，巧遇几位红军，其中一位主动上前与他攀谈。

当格达活佛从这位比他还年轻的红军长官口中听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民族团结，保障宗教自由，现在要北上抗日等情况以后，当即表示：“只要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遵重宗教自由，为穷人办事，我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听红军的话，叫山里藏着的村民回来照常生产。”

不想第二天，来了几名红军战士，在白利寺的大门外贴上了一张公告，上面写着：

来往部队同志们：

白利寺是格达活佛坐床的地方，凡往来部队不要随便进入此寺，更不允许乱翻和毁坏经堂用具。凡寺内一切东西，需要用时必须经过寺内喇嘛的同意才能动用，绝不要强借。

特此要求为荷。

中国工农红军第 30 军军长程世才

政治委员：李先念

这时候，格达活佛才从贴公告的红军战士口中知道，昨天与他谈话的那位年轻长官，就是李先念。

如此一来，格达活佛深受感动，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好感。他马上派喇嘛给红军送去了青稞 130 石，豌豆 22 石。

据解放后先后搜集到的两张当时红军留给白利寺的收据上写到："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青稞 130 石零 8 斗，碗豆 22 石。中国工农红军第 4 方面军 30 军 8 师"（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另一张则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写收条的红军显然由于文化所限，不能准确地表达事情的本意。上面写到："收到白利寺青可（稞）一共豌豆 47 石 9 斗 50 石。6 月 13 日，红军总供给部。"

随后，格达活佛又亲自上山，深入密林沟壑，召回外逃的农牧民，并且还动员群众为红军筹粮。

格达活佛不仅倾白利寺所有，而且还亲自前往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动员两寺堪布出钱出粮支援红军。

格达活佛热忱帮助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各地，也传到了道孚红军总部，张主席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第一次到甘孜时，亲自登门看望格达活佛，对他深表感谢，大加赞扬，鼓励他为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多做工作。

这以后，格达活佛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进步，成为红军首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朋友。

1936 年 4 月 12 日，为了建立稳定的川康革命根据地，筹备博巴人民政府，红军与白利寺、甘孜寺、签订了"互助条约"。

格达活佛与甘孜寺仲萨活佛和红 4 方面军代表陈昌浩签订的"互助条约"（1986 年，在整理格达活佛遗物时，在活佛生前用过的枕头里发现了用汉藏两种文字写成的"互助条约"文献。此文献现存四川省博物馆），实质是甘孜境内僧俗政教势力与红军达成的政治协议，为甘孜境内红军与各阶层的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成立中央博巴政府时，格达活佛担任了主席职务，他切实体会到了红军来到甘孜以后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藏族人民相处如兄弟姐妹，军民情谊犹如鱼水，对比国民党军队敲骨吸髓的掠夺，藏族人民从心里拥护红军，赞叹说："这样的军队从来没有见过"、称红军为"新汉人"。格达活佛为了表达心中的激情，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篇：

幸福的红太阳，

从高山上升起来了；

乌云般的痛苦，

被刮到雪山那边去了。

你不要以为山高，

有翻山的骏马；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同情你，

有搭救我们的亲人来了；

大树的影子遮不住流水，

大山的影子总会消失。

不要以为敌人凶恶，

有打敌人的猎枪在手。

麻里扎身小哩（地名）有丰富的粮食，

就是遭了三年饥荒，

你也不必心焦。

1936 年 7 月初红军北上，临行前，张主席、朱德、贺龙、任弼时专门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告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且托付给格达活佛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要他把已经无法随队伍出发的近 300 名红军伤病员收留下来。

张主席说："红军要北上了，你们要团结起来，继继领导人民，把博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团结好了，才能战胜各种妖魔鬼怪。"

分手时，朱德把自己的一副望远镜送给了格达活佛。而格达活佛送给红军总司令的的，则是一首诗歌：

崎岖的羊肠小道啊，

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

愿救苦救难的"巴武"

（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

顺利到达目的地。

红军走了，

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不心焦，

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

山峰是红军的臂膀，

红军啊，

你给我留下金石的语言，

愿佛祖保佑你，

盼你早日回来！

总司令看完后，感动地向他许诺：

“红军少则 5 年，多则 10 年，一定会回来的！”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部分反动上层，对博巴政府成员以及为红军当过向导、通司，为红军办过事的积极分子，进行血腥屠杀，中央博巴政府的工作人员被杀的就有 45 人。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甘孜县城阻止反动派的暴行。

在正在进行疯狂报复的敌人眼皮底下要保证红军那样多红军伤病员的安全，无疑是一件极其危险而又困难的事情。格达活佛利用自己的威望，组织群众和喇嘛同心协力地来保护，把一部分留在寺内，一部分散安排到附近村寨可靠的群众家中。

而且，格达活佛还给这近 300 名红军伤病员起了藏名。

李立寄是红 2 军团的一位作战参谋，格达给他取藏名卓布仁钦，见他精明能干，待李病好后，格达重用他当上白利寺的管家，给他娶了藏族妻子，从此生活在寺中。

有一位叫杨化成的红军连长，是川北苍溪县人，格达给他取名为扎西罗布，伤愈后又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

有的伤病员恢复健康后想回家乡，格达活佛派出了白利寺的大根巴色波和般根二人，带上他亲笔给沿途寺庙堪布与土司头人的信，将 205 名红军伤病员安全地转送到了内地。

留在甘孜的红军，在格达活佛的庇护和当地群众的照料下，很快学会了藏语，有的学会了泥木、淘金、缝纫等技术，很受藏族群众的喜爱，不少藏族群众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留下的红军战士。

格达活佛怀念北上的红军，他除了竭尽全力收留保护红军伤病员，还精心收藏红军发布的各种文件、布告和博巴政府印章（解放后全部献给了政府，现存四川省博物馆）。他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1937 年，国民党派往康藏的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时，马其武特地带上军统西昌站站长徐远举到白利寺拜会格达活佛。

马其武对格达活佛说："你和夏克刀登都在赤匪胁迫之下为他们办过事，上锋希望你和夏克刀登一起参加国民党，以此来挽回影响，活佛你的意见呢？"

格达活佛说："我是界外之人，对什么党都不会感兴趣的。你们这么做，不太强人所难了么？"

徐远举道："活佛此言恐难以令人信服吧，大家都知道的，你不曾经出任过赤匪搞的博巴政府的主席么？"

格达活佛回道："确有其事。不过，博巴政府不过是一个为老百姓做事的机构，这和佛教中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教旨是并行不悖的。可过去你们在甘孜都干了些什么呢？老百姓又是怎么样看待你们的呢？"

马其武和徐远举只好悻悻离去。

不久，国民党又派人来动员他和夏克刀登担任西康省参议员，同样遭到了他和夏克刀登的拒绝。

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格达活佛于 1937 年以朝佛为名到了西藏拉萨。在拉萨，他仍然关心着红军是否回来。他托到内地的藏商打听红军的消息，一个从西宁归来的藏商带回一册《山西八路军抗战图》，格达活佛看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照片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喜讯时，知悉红军已到抗日前线打了大胜仗，激动得热泪盈眶。

格达活佛在拉萨一住 10 年，与拉扎等上层僧俗代表人物有着不浅的私交，直到 1947 年，格达活佛才返回白利寺。

1949 年，甘肃、青海相继解放，消息传到甘孜，格达活佛与夏克刀登，帮达多吉等原中央博巴政府的领导成员当即商议决定，派柏志、旺杰等 3 人到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达西藏人民渴望早日获得解放的愿望。

1950 年春节后，3 人抵达北京，受到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返回路过重庆时，又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的盛宴款待。

1949 年 12 月，成都、雅安相继解放了，格达活佛万分高兴，逢人就讲：“红军要回来了，张主席、朱总司令要回来了。”

1950 年 4 月 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 55 师到达甘孜，甘孜召开了有 3000 多人参加的大会庆祝解放。

格达活佛在大会上热情讲话，宣传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要大家像帮助红军一样来帮助解放军。

由于交通不便，进藏部队粮食供应困难，格达活佛又到处动员群众把粮食拿出来支援解放军。

西康全省解放后，格达活佛担任了西康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协副主席、康定军管会副主席等职，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中央来电邀请格达活佛到京出席会议。

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马上就可以见到敬爱的毛主席和老朋友朱总司令了。可是，就在格达活佛路经重庆赴京途中，传来了西藏少数上层反动人士妄图把西藏分裂出祖国大家庭，拉萨巳处于动乱之中的消息。

格达活佛毅然向刘伯承、邓小平提出请求，在西藏处于如此关键的时刻，他应该尽快赶到拉萨,利用自己和拉萨上层僧俗的关系，促成西藏的和平解放。

经刘邓首长请示后，中央同意了格达活佛的请求。并于 1950 年 1 月，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严正驳斥了西藏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大搞“独立”的活动。7 月，又宣布派格达活佛赴西藏规劝，促使谈判早日举行，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就这样，格达活佛放弃了北京的盛会，踏上了凶险诡危的西行之路。

2、活佛之死

1951 年 2 月 4 日，一名英国人和两名印度人被押进了重庆市中区李子坝 105 号的西南军区政治部战俘管理所。

早在 1950 年初，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上将王陵基，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中将宋希廉以及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战犯就曾关押在此。这里毗邻基督教临复安息所日会办的武汉疗养院，四周环境十分幽静。

英国人名叫罗伯特-福特，蓝眼睛、高鼻子，一头棕色的卷发乱糟糟的，满脸黑黝黝的胡茬。

他的公开身份是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来青巴”（五品官员），昌都电台台长。

两个印度人，一个是 27 岁的沙奈多吉，印度大吉岭人。一个是 22 岁的邓雨夏巴，印度噶伦堡人。1948 年 8 月，他俩被招进英国办在噶伦堡的一所无线电学校，学习结束后，于 1949 年 4 月 21 日由噶伦堡经锡金入藏，沿途骑骡马，于 5 月 22 日到达拉萨，经英国驻拉萨政治使团拉萨电台台长福克斯谈话后，签订了在西藏工作 3 年的合同，然后被派到福特手下当报务员，

在战俘管理所，福特不仅不坦白自己的罪行，而且还企图与两名印度雇员串供，指使他俩抗审，受到戴械具的惩罚。

为了处理好这个特殊的间谍案，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第四处于炳然处长和西南军区政治部的两位首长特地召见了原国民党保密局拉萨站情报编审朱大望，了解朱大望的藏语水平。

朱大望是 1947 年 7 月 8 日西藏地方噶厦发动“驱汉运动”，下令驱逐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时，带着藏胞妻子从拉萨来到重庆北碚晋云山下的汉藏教理学院任教的。解放后，他巳主动向人民政府自首登记，交待了自己的历史。

第二天，朱大望随西南公安部 4 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李子坝战俘管理所，担任沙奈多吉和邓雨下巴的生活翻译。

经过 3 个多月的教育，这两名印度雇员如实交待清楚了自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

6 月，西南军区军法处依法宣布将沙奈多吉和邓雨夏巴驱逐出境。

西南军区政治部派兰州大学毕业的黄治庵担任福特的生活翻译。

经过耐心的教育，福特终于改变了态度，狱方给他取掉了刑具，洗理了蓬垢的卷发，剃掉了胡茬。于 1951 年 7 月 7 日，将他转移到磁器口松林坡西南公安部第 2 看守所（现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关押。

在新的环境下，福特终于交待了自己的历史和罪行。

罗伯特-福特于 1923 年出生在英格兰斯塔福特郡波尔顿思特城，父亲是工厂里烧锅炉的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靠父亲每月 7 英镑工薪供养全家 5 口人的生活。

1939 年 7 月，福特从 6 年制中学毕业以后，考进皇家空军，受训于林肯郡克兰威尔皇家空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机械，1941 年 6 月结业后到空军站担任飞机内部无线电装备保养工作，任技士班长。1943 年到印度任无线电学校教官。1945 年 5 月，被英国派驻锡金政治使团长官霍浦金森选中，任英国驻拉萨政治使团无线电台台长，11 月任英国驻锡金刚大克政治使团无线电台台长。

1952 年 4 月 11 日，福特作了如下供述：

“1945 年 7 至 10 月，我任英国驻拉萨政治使团无线电台台长，任务是与新德里英印政府处务部电台及英驻锡金刚大克政治使团的电台联络，发出英驻拉萨使团搜集的一切有关西

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情报，取得来自新德里、钢大克两电台对西藏进行侵略的命令、指示，并将具有战略价值的西藏气象，每日由我所管电台，报告到新德里电台转英国所属的印度西部普纳气象局供英国陆空军部门参考。

“1947 年 3 月，我在锡金钢大克英政治使团任电台台长期间，接受了政治使团长官霍浦金森要我打入西藏政府进行间谍活动的任务。1948 年 8 月，我抵拉萨，11 月经英驻拉萨政治使团长官黎吉森布置打入西藏地方政府任拉萨电台台长。从 1949 年 3 月开始，我装置了福克斯使用的拉萨电台，训练了 4 名藏族无线电书记。另组黑河、日喀则、噶大克台。

“1949 年 5 月，我带着 4 名印度电讯人员，两名藏族书记到昌都建立电台。临行时，福克斯指示我，要拉拢西藏地方政治官员，培植亲英势力，怂恿西藏独立；派代表团分赴英、美、印请求支持，帮助西藏地主政府武装，抵抗中共之“入侵”；搜集中共军之动态及边境情况，搜集有关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人员、组织、行政等情况及当地亲英势力、民间舆论、民情风俗等情况；拍摄昌都全景和地区各地照片；阻挠和破坏可能发生的西藏与中共的和平谈判。

“我于 1949 年 7 月抵达昌都，忠实地执行了英国当局和直接领导福克斯给我的任务，以西藏地方政府五品官员、无线电官员的身份，建立电台。并在我的住所经常举办茶会、宴会，互相馈送礼品，译送英、美广播，吹嘘英国生活和社会制度的优良；利用看病、拜访，说‘共产党的统治是恐怖’，拉拢以拉鲁为首的官员，培植他们为亲英分子，控制昌都的政权。早在 1949 年 4 月，在拉萨，我、福克斯和西藏地方当局中的亲英分子察戎、泰林，要西藏地方当局向世界声明独立；派代表分赴英、美、印等国游说支持，以遏止中国政府之‘入侵’；在昌都，我也唆使拉鲁作过同样的事情。1949 年 10 月，在科伦坡召开英联邦会议，我和福克斯等以欧人旅藏者身份致电会议，声称西藏为一独立国，应给予经济援助，以对抗共产主义漫延入藏。1950 年 3 月，西藏地方当局派赴英、美、印等国的代表团在葛伦堡滞留不前时，我曾力促拉鲁敦请西藏地方当局电催代表团火速前往。同时，我经常利用电台向世界报道：西藏是独立国，昌都属西藏版图。

“我将有关昌都地方政府人员、组织，当地民情风俗、亲英势力及舆论；当地有英国货香烟，棉布输入中国内地，中国内地有茶、丝、盐等输入昌都等贸易情况以及拉鲁对我表示如一旦昌都遭受攻击，可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而其他官员则表示怀疑等情况电告福克斯。1949 年 11 月，我摄制昌都全景照片一套寄福克斯；拍摄由拉萨到昌都旅途及昌都各地照片数百张，示及洗印即被解放军缴获。

“1950 年 3 月，我向拉鲁建议，如中共入侵即行抵抗，宜在昌都四周山头布置机枪阵地，藏兵应利用地形地物掩护，不宜直立前进以减少伤亡；并组织 50 至 100 人之小队骑兵迂回共军后方，切断供给。我愿负责训练。我还建议设金沙江、连河溪、洛隆宗河 3 道防线。我对拉鲁说：‘如一旦共军入侵，昌都不可固守，因来自锐勿奇之攻击，易切断昌都去拉萨之退路，昌都政府应至洛隆宗，使拉萨易于增援，必要时英机可助战。’又建议昌都当局检查过往旅客以防奸细。这目的在唆使西藏当局武装抵抗解放军解放西藏。

“1950 年 4 月，我派两名由我训练的印度电讯人员沙奈多吉、邓雨下巴赴接近青海省的邓柯建立电台，搜集解放军的情报。5 月，我从邓柯电台收到‘解放军约 500 人抵邓柯河对岸’的情报，我即电告福克斯。

“1950 年 8 月初，当我知悉格达喇嘛抵昌都的消息时，我向昌都总管拉鲁、财务官和康、总管府秘书楚嘎五等说：‘我坚决反对西藏当局与中共进行谈判。西藏当局与中共谈判，将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决不能让格达喇嘛前去拉萨，应立即阻止，不令前行，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干掉他。’最后，我们决定采用暗杀的方式……”

解放军 18 军政委、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王其梅在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格达被害实情”等报告中，和格达的管家李立寄、随从白嘎和甘孜大金寺喇嘛提供的证言，记述了格达的被害经过：

“1950 年 7 月 10 日，格达活佛一行从甘孜白利寺启程，于 8 月 5 日到达昌都，住在同乡孟嘎家。第二天，会见拉鲁交换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未得要领，决心去拉萨继续谈判，派人去‘西藏边使府’办理护照，也无结果。8 月 10 日，昌都地区下大雷阵雨，拉鲁蛊惑宣称，这是格达代表解放军作怪，只有除掉他。13 日，格达拟发电报和拉萨当局直接商洽，电台台长福特接待了格达、和康、楚嘎五，并一改平时由两名西藏仆人招待的惯例，由尼泊尔厨师献上茶点。格达回到住所后，发寒热，吐黄水。16 日，和康、楚嘎五邀格达到龙王堂福特楼下同住。

21 日，拉鲁派私人医师前往替格达诊病，付药一剂，服后便不能言语。22 日一早，格达管家李立寄急备快马去请拉鲁的私人医师复诊，但这个医师不肯来。当天格达气绝圆寂，时年仅 47 岁。两天后，孟嘎替格达裹尸时发现，格达的脸部和手全呈黑色，鼻孔流血，换寿衣时发现全身皮肤裂口，尸水外流。31 日，格达随行人员遵照当局意见，格达遗体在昌都喇嘛寺后山火葬，其余人员赴拉萨为格达‘主持超度’。”

3、凶手落网

格达活佛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11 月 4 日上午，西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 12 次会议，会上，邓小平副主席首先宣布为格达活佛遇难默哀。会议决定组成了以王维舟副主席为主任委员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拨款 1000 万（旧币）元；责成西康省人民政府办理身后身宜；委任张国华委员为代表致祭。

11 月 25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市中区青年馆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毛主席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来唁电。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送的挽联颂扬格达活佛：

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

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送的挽词写到：

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活佛永垂不朽！

同一天，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西藏一定要解放——悼格达活佛》的社论，和贺龙将军撰写的纪念文章：《悼格达委员》。

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噶厦当局，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调集一半以上的藏军，约 9 个代本（相当于 9 个团）和民兵 3000 余人，布防于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和昌都附近地区，企图扼守天险，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

1950 年 10 月 6 日，按中央军委命令，我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 52 师全部和 53 师、54 师、军直和一部，在青海骑兵支队、云南 126、125 团的直接参加和新疆骑兵先遣连的战略配合下，对昌都实施了大的迂回包围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一举解放昌都，争取了藏军第 9 代本起义，历时 20 天，共歼灭藏军 5700 余人。10 月 19 日，用步枪、轻机枪组织藏民进行武装暴动的罗伯特-福特在昌都近郊被俘获。

1954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1 时，西南军区军事法庭由审判长一人，审判员二人和书记员、翻译各一人组成。依照法律程序，最后审判长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区军事法庭判决书法（54）军庭字第 0049 号》，“被告罗伯特-福特受遣潜伏于我国西藏昌都地区，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窃取情报，杀害我公职人员，挑拨离间我民族团结，破坏我国统一。所有上述罪行，已有缴获特证和其他证据为证，罪行确凿，并且被告均已供认不讳，有案可查。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处罗伯特-福特有期徒刑 10 年……”

福特悲喜交集，悲的是他还得在中国的监狱里呆上六七年，喜的是自己居然还能保住一条性命！

宣判完毕，审判长问道：“被告，刚才的判决书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上面事实与我本人供述的无误，是真实的。”

法庭判决后，一辆囚车将福特送进了监狱。

当福特走进监舍时，看守所所长站在门口突然说道：“福特，你听着，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宣布。”

“啊？”福特愣住了。

“我国政府判处你 10 年徒刑，是根据你的犯罪事实和我国的法令所应予之惩处。但鉴于你在关押期间尚有悔改表现，决定提前释放并驱逐出境。”

福特痴视着所长，他的思维已经跟不上这飞速变化着的现实……

第二天清晨 7 时，两名武装人员押着福特乘飞机向汉口飞去。由汉口再转乘火车到广州。

11 日，福特从罗湖出境……

4、甘海子会师

张国焘兵败百丈关，退走川康，全军嗷嗷待哺，苟延残喘，而与他处境截然相反的是，从中央不断发来的电文中，张国焘得知中央进入陕北后，已与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先期到达陕北的徐海东率领的 4 方面军 25 军，以及高岗、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在陕北高原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这种强烈的反差是心高气傲的张主席很难接受的。尤其令他恼怒的是，自己的老部下徐海东怎么会鬼使神差地跑到毛主席那边去了。

这还不算，就在南下红军翻越雪山，败走西康的途中，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电告张主席"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巳取得伟大的胜利"。并命令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

这在张国焘看来无异于挨了一记更为厉害的闷棍。他眼里可以没有毛泽东，没有党中央，可他不能没有共产国际。他曾担任过中共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太了解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很沮丧，他不敢得罪斯大林；但又怨恨忿怒，决不愿向毛主席认输。

处于沮丧、愤怒、委屈、尴尬之中的张主席把陈昌浩几名高级首长通知来，就如何向共产国际复电商量了一整天，最后决定取避实就虚的手段，用热烈的语言表示对共产国际决定的拥护，对共产国际当前所取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各项政策坚决支持，对共产国际在电报中指出的问题，经认真全面的研究后，逐一加以解决。

这显然是张主席使出的一招缓兵之计。

既不愿北上，又无处可去，队伍就继续留在川康高原上。

吃的问题得不到缓解，穿的问题也跟着来了，部队进去时全都是穿的单军衣，高原地区气候怪得很，夏季白天倒好过，晚上一件单衣也抗不住，而一到冬天，铺天盖地的除了冰就是雪，能把人活活冻死！这地方不产棉花，棉花布匹以前全靠成都运来，国民党几面一封锁，就完全绝迹了。幸亏这地方羊多，羊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处处都堆放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弄得到处都臭哄哄的。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积卖不出去。

红军战士人人动手，加工羊毛，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袜子等。各个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加工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色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毛料"军服颜色不统一也没办法，总部组织人试验了无数回，由于没有必需的化学品，始终解决不了染色的问题。

除了吃、穿，疾病对红军的威胁也相当严重，患各种疾病的人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五、六月间爆发的那场伤寒大流行，夺去了两千多名红军指战员的生命，要没苏井观和傅连璋，死的人会更多。

苏井观和傅连璋在这次预防和医治伤寒病的过程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川康高原地区，空气稀薄，食水达不到一百度，因此不能将水中的细菌杀死。而红军长期喝的就是这种温吞水。他俩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和其它疾病的主要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人煞费苦心，终于搞出了一个好办法：在火炉边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不仅能使食水达到一百度，红军再也不吃夹生饭了。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的蔓延，也减少了其它疾病的流行。

傅连境以前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两军会师以后才分到左路军来的。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整天屁股朝天趴在地上研究牛皮风箱的人，建国后都成了新中国卫生部首届主要领导。

红军没有药品，对各种疾病无能为力，患者只能是听天由命。我的师兄郭清财就是那时死在丹巴的，他已经从保卫局调出来，在许世友的骑兵师里当营长了。

傅连璋原本是西医，却只能采用中医的方法，也救活了不少红军指挥员。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医的缘故，也很爱好此道，跟着傅连境学了不少知识。

这年 4 月底，红军总司令部接到 2、6 军团的电报，称他们已进入滇西，到达了金沙江边上一个叫石鼓的小镇，望红军总司令部速派部队接应。

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率领的 2、6 军团原来活跃在湘鄂川根据地，中央苏区丧失后，国民党加强了对 2、6 军团的进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们也被迫开始了北上长征。

2、6 军团过去只与红军总司令部建立有密码联系，而分裂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又控制在张主席手中，所以 2、6 军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是按照张主席的指示行事。他们并不知道张主席已经另立了中央。

此时总部前移至甘孜，张主席得到 2、6 军团的电报后，立即派出驻道孚的 32 军南下策应 2、6 军团北上。32 军由罗炳辉率领，在雅江击溃敌军两团，到达理塘甲洼，阻止敌李抱冰部南进，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夹击将 2、6 军团消灭在金沙江沿岸的计划。

6 月 3 日，6 军团在甲洼与 32 军会师，受到 32 军战友的热烈欢迎。

7 日，刚刚会师的兄弟部队就联手作战，一鼓作气攻克了李抱冰据守的理塘县城。

此后，6 军团与 32 军分手，向甘孜进发。这一带已便是红军控制地区，一路上，6 军团受到了 4 方面军驻扎部队和当地博巴政府组织的群众的欢迎。30 日，前卫部队到达了甘孜的甘海子。

7 月 1 日，随 2 军团行动的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也率队伍到达甘海子。至此，两军团全部在甘海子与 4 方面军胜利会师。

广大红军官兵并不知晓上面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天下的红军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弟，

亲兄弟见了面，自然万分高兴。甘海子会师两军官兵表现出的欢乐之情，并不压于一年前在懋功达维的会师。

张主席电令 2、6 军团北上到川康高原与他会师，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这两个军团控制在他手中，增强他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抗衡的资本。会师后，他马上派出若干个工作组，渗入到 2、6 军团中，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文件，煽动两军团官兵对中央的不满。

岂料，张主席的作法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统率 2、6 军团的贺龙总指挥一个命令，将张主席派去的若干个工作组全部“礼送”出营。

张主席也采取了他习惯性的做法，不断地召见 2、6 军团的高级指挥员，摸清他们的立场，对他们送枪送马，封官许愿，甚而企图撤换不明确表态与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将领。

就我亲见，张主席至少单独和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贺炳炎、卢东生、甘泗淇、张子意等 10 人以上的高级指挥员谈过话。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态度令张主席满意。这些人都明确地向张主席表示，希望能尽快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戴眼镜留胡子的任弼时和张主席谈话的次数最多，争论最激烈。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 2、6 军团中地位最高，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张主席多少还有点敬畏之心，说话的方式还比较委婉含蓄。他不，他尖锐地批评了张主席另立“中央”的行为，并要张主席对南下红军遭到的重大损失承担责任。他说他和 2、6 军团的领导人到这里听说以上所发生的事情后，心情无比沉痛。他诚恳地向张主席表示：“过去，你是我所敬重的领导，如果你能认真地改正错误，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去，我和贺龙同志以及 2、6 军团的全体官兵，将一如既往地尊重你，并接受你的指挥。”

余下的话，张主席自然明白。

5、被迫北上

7 月上旬，2、6 军团和 4 方面军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甘海子召开了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甘孜会议”。会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和朱德、刘伯承等团结起来，与张主席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争论激烈的时候，贺龙明确表示：

“2、6 军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不是任何个人的武装，它只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如果张总政委不愿北上，那我们 2、6 军团就自己行动。”

贺龙的态度令张主席大为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会后，他当着黄超和 4 方面军的几位将领咬牙切齿地说：“贺龙是个什么东西？我对他清楚得很，南昌起义时我就同他打过交道，过去是个土匪，现在依然满身匪气！”

张主席虽然在甘孜会议上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是，他已经无力回天，连过去许多对他惟命是从的 4 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南下的错误，10 万红军垮到现在的五六万人，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张主席的正确。许多人也表态愿意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

而对张主席刺激最大的，当属陈昌浩对他的“背叛”。这位长时间最坚定支持他的头号爱将，听从了任弼时同志的意见，表示赞成北上。这是张与陈共事多年来，第一次发生尖锐的争论。而且张琴秋等大多数 4 方面军的将领也都表态支持陈昌浩。张主席看到自己已被“自己人”孤立，再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头上，所以情绪异常冲动，他眼泪汪汪地说：“好吧好吧，都要去陕北，那就去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后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4 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你陈昌浩干的。”

朱老总趁热打铁，积极地做他的工作，为了给张主席一个下台楼梯，朱老总提出先取消这边的“党中央”，降格为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与中央红军汇合后再慢慢解决。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主席也接受了。经与中央协商，中央亦表示同意。

7 月 2 日，中央电令，成立第 2 方面军，下辖 2、6 军团，以及罗炳辉的 32 军。

7 月底，中央批准由 2、4 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组成西北局委员会，统一指挥 2、4 方面军。

至此，张主席苦心经营的“第二中央”寿终正寝，全军赓即拔寨起程，重新踏上了北上征途。

## 第十八章 失道寡助

因张国焘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动弹不了的许世友冲着毛主席破口大骂：“姓毛的，你不是好人！”……毛主席最终决定枪下留人……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 1、陈昌浩与徐向前被蒙在鼓里

在 2、4 方面军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 1 方面军会师之后，紧跟着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陈昌浩、徐向前率 4 方面 21800 人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征战中遭致全军覆没的惨剧。

在中国的西北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1936 年冬到 1937 年春，占中国工农红军五分之二强的一支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穿行，它就是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在短短 4 个多月内，这支

21800 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 80 多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 400 余人，最后到达了新疆，在中国红军史上写下了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它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也是一段长期被人为忽悠、遮蔽和扭曲的历史。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1980 年冬天，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奉组织之命，协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开始深入到这段长期无人敢于触及的历史。他万分惊讶地发现，原来，西路军的失败，完全不是过去业巳形成的定论那么简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 4 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西路军是接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对于西路军过黄河，一直到失败，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一分分记载着真实历史的档案，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浮现在朱教授脑海中。过去的宣传从来就认定是陈昌浩、徐向前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执行"国涛路线"，导致致兵败祁连山。所以毛主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国焘路线的破产"。为了搞清楚这段复杂的历史，朱玉花查阅了大量尚未解密的档案，又亲赴河西走廊、青海、甘肃、新疆进行实地走访调查，1980 年 12 月 2 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 1981 年 3 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 4 方面军渡河作战，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重新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不久，随着《西路军疑》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朱玉很快成为党史界、军史界的焦点人物，也由此在党内、军内引发出一场轩然大波。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会师之时，不仅国民党的合围即将形成，而且立足未稳的红军仍然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而过去的宣传，只讲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好像就胜利了，不讲困难，实际上困难特别大，红军集中在荒凉的陕北黄土高原上，赖以生存最基本的粮食根本无法解决，而蒋介石巳经集中了 30 万大军，精心组织第 6 次围剿，企图将会师后立足未稳的红军主力消灭在黄河以东地区。

红军要生存，唯一的策略就是迅速从宁夏和甘西两个方向打开通往苏联的通道。为此，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制订了《宁夏战役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就是夺取并控制宁夏，然后以宁夏为根据地去接收苏联援助的物资。

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宁夏战役计划的进行迫在眉睫。

1936 年 10 月上旬，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秘密通报给了共产党，并提议红军应及早进行宁夏战役计划。依据中革军委制订的《10 月分作战纲领》，曾经三过雪山草地的 4 方面军主力未来得及休整补充，便匆匆沿着西北方向向黄河岸边开进。随着 30 军与 9 军强渡黄河成功，拉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

然而就在这时候，蒋介石的数十万部队正由南向北疯狂扑来，中央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击破南敌上，4 方面军未来得及渡河的 4 军、5 军、31 军按照军委命令，转为担任阻击河东蒋军的任务。在华家岭阻击战中，5 军副军长罗南辉被敌机投下的炸弹炸死。就此，4 方面军被分为了河东部队与河西部队两部分，而已经过河的 30 军与 9 军，只有 21800 人，从此，他们就开始了孤军奋战，踏上了与西北军阀马步芳武装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然而，就在河西部队向河西走廊一路血战之际，中央眼见《宁夏战役计划》已经无法实施，就于 11 月 8 日秘定制订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河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河西部队攻占凉州，待机策应河东部队。毛泽东就这一计划征求了河东部队主要领导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意见，但是没有告诉西路军主要领导人陈昌浩与徐向前。该作战计划中还有一条，河东部队此后改称南路军、北路军，河西部队则改称西路军。

西路军由此得名。

1936 年 11 月 11 日，遵照中央及军委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正式成立，由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任务是以一年为期，打通苏联通道。

时隔半个世纪后，徐向前才从档案中发现了当年中央秘密制订的新的作战计划，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这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变动，而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他和陈昌浩居然事前和事后都一无所知。而正是这份作战新计划，让他和陈昌浩领导的西路军在其后来的西进作战中，承受了他们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牺牲。

当西路军开始在黄河以西的孤军奋战时，在黄河的东面，已经失去了对军队指挥大权的张国焘的双眼睛一直焦灼地注视着这支部队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一支英雄部队，也是 4 方面军中最为精锐的主力。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更加渴盼着他们能够取得胜利，因为这对于他自己和他的 4 方面军有着太重要的意义了。

就在西路军在河西浴血奋战之际，张国焘为了表明自己消除党内歧见的诚意，匆匆赶赴保安，与毛泽东见面。

2、从保安到延安

历史和一年多以前在懋功两河口会师时有相似之处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相似的是中央领导都到保安城外迎接张主席，而且规模比前一次隆重得多，中央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还率领几百名学员在路边列队欢迎。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土台子上，毛主席和张主席都讲了一番“向

前看”的话，对过去的矛盾、斗争一字不提。

截然相反的是，一年多以前的张主席手握重兵，气吞山河，中央红军则人不足万。而现在，中央已在陕北站稳脚跟，军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张主席却是损兵折将，自然感觉到脸上无光。

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空头总政委，他指挥的 4 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带走了两万多人，剩下的 4 军、31 军、5 军，毛泽东以统一指挥权的名义，让他在河连湾交给了前来迎接的周恩来和彭德怀。虽然他还是红军总政委，却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红军实质上的指挥权。

中央机关分给张主席一眼有内外两间的窑洞，我带着人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窑洞隔为内外两间，内间大，外间小，张主席住内间，既是卧室也兼办公室。我住外间。如果黄超在应该是他住的，但黄超已随陈昌浩到西路军去了。

没过多久，中央机关办公室又分了个叫陆煜的秘书来。张主席对他不信任，要我们提防着点。但陆秘书有一样长处却很受张主席欣赏，他的象棋下得很好，所以他的作用也就是偶尔陪张主席下几盘棋而已。

住在旁边的毛主席、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林伯渠有时也来观战，毛主席就笑呵呵地说：“小陆的棋，可以让特立三先。”

保安县城还不及四川的乡场大，房屋也大都破烂不堪，中央领导住的这一排窑洞前原来是一条由商店和民房组成的小街，由于历年战乱，已成废墟，现在种满了各种蔬菜。那时的保安，准确地说已经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

中央首长们的生活也相当糟糕，但中央机关后勤处的叶季壮处长想方设法为首长们准备了一些特供品，一是前方将领送来的战利品，二是通过地下渠道从西安等地买来的。当时驻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已与红军有联系。

有一次，张主席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他的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 4 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何畏把我带进卧室，给我说了一番话，叫我带给张主席，大意是：他现在不便去看望张主席，怕造成 4 方面军干部暗中串联的印像；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枪杆子一丢，啥都丢光了。

我回去对张主席转述后，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原 4 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

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弟相残的北上南下之争中，都曾经站在张国焘一边，公开地有的甚至是气焰嚣张地反对过毛泽东，尤其是那些当初表现得很激进的高级首长，更显得来惶惶不可终日。

那个时代的军人，头脑里封建残余不少。他们总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从古至今皆如此，如今他们反对过的毛泽东占了上风，拥护过的张国焘两手空空，自己当初的行为，会被视为乱臣贼子，犯下了弥天大罪。

在保安，在我印像中最不能忘记的大事，就是“西安事变”对中央的强烈冲击。

那是 1936 年 12 月 12 日的中午，食堂巳经快开饭了。吴吉清突然到张主席的窑洞来，通知张主席马上到毛主席的窑洞里去，有重要事情商量。

通知完后，他实在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泪汪汪地嚷道：“张总政委，天大的喜事啊！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呐！”

张主席目瞪口呆，像救火一样冲出门，向着毛主席的窑洞跑去。

首长们激动如此，我们这些当兵的同样是欣喜万分，我们的头号敌人竟然被抓起来了，还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么！

足足 4 个钟头过去，首长们才从窑洞里出来，我看着张主席跨进门，很想问问详情，纪律又不允许。

幸亏，张闻天和博古紧跟着进来了，他们脸上全都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过，他们余兴未尽，还想找人谈谈。

这样，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张学良发来密电，告知中共中央，他和杨虎城巳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他还希望红军急速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开进，和他与杨虎城的部队衔接，以防御胡宗南部的进攻。

而中央领导人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不能统一，大多数主张当机立断，杀掉为好。最后，大家还是同意向莫斯科请示。

13 日这一天，是最为焦急的。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催中共拿出态度，但既巳向莫斯科请示，那就只能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首长们都显得坐卧不安，相互不断窜门。

朱德总司令是最坚决的“主杀派”，他一走进张主席的窑洞，人未坐下，就大声武气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来它个先斩后奏。我刚才去对润之说了，痛痛快快地告诉张学良，先把蒋介石杀了再说其它。”

张主席问：“润之不会同意你的意见吧？”

“他对我说，这事太重大，必须等莫斯科的指示。”

焦急地等到深夜，莫斯科的回电终于到了。首长们汇集到毛主席的窑洞里通宵开会。

天亮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带着中央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拟定的方案，坐汽车赶往延安，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已于前一天就等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我也知道了莫斯科指示的要点。

大意有三点，一、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旨在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提供任何支援；二、中国急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这一阵线最合适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张学良份量不够；三、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蒋介石释放。

虽然中央领导人对莫斯科的指示不无意见，但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大林咋个说，就只能咋个办。

25 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 日，中央机关即迁往张学良主动让出的延安。

保安自然不能与延安相比，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都比保安多得多，足以容纳中央的众多机关。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威望剧增，延安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流行着一句话“要抗日到延安去”。每天都有许多人涌到延安来，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翻山越岭步行而来。延安很快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像。

待军政大事安排就绪后，中央便着手批判张国焘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了。

### 3、批张序幕徐徐拉开

1937 年 2 月 27 日，西路军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延安发表了长达 3 万多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拉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文章公开指责张国焘是“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退却逃跑路线”。

3 月底，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判。批判会一连开了 5 天，最后由毛泽东作长篇总结，形成决议。决议指出张国焘的 6 宗大罪，除了南下和分裂中央以外，关于西路军，作出如下结论：“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紧随着，一场大规模的批张运动，就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了。

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从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弥漫在广大红军官兵中悲痛欲绝的情绪使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张国焘态度强硬，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且很快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

批判上纲上线，上挂下连，越来越过火，原 4 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不幸也跟着他们前些时候的统帅成为了批判对象和靶子。始而是少数人，继而扩大到绝大多数人。最后由运动形成的严酷气氛，压得原 4 方面军的所有官兵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抬不起头来，造成一大批原 4 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受到严重伤害。而且在党内军内形成了一个武断的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对于西路军是完全不公平的。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尊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行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最后失败了。应该说，党中央在这件事上给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当时的张国焘已经不能影响到西路军的行动。和“张国焘错误路线”没有啥子关系。为党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最后孤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西路军，却从此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使他们和原 4 方面军中的许多人一生坎坷，郁郁而终。

运动的组织者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明显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相的原 4 方面军高中级指挥员们的重大反感。而指挥员们的情绪，也很快在广大士兵中漫延开来。

对如此大举批判张国焘，毛泽东也曾担心会引起原 4 方面军官兵的鼓噪动荡。原 4 方面军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除了已遭全军覆没的西路军，在延安还留有 4 军、5 军、31 军两万多人，力量远远超过 1、2 方面军。毛泽东派罗瑞卿到原 4 方面军部队中调查，结论是“张国焘在原 4 方面军中影响很深，大部分官兵都没能认清国焘路线的错误”。鉴于此，大部分原 4 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被抽调到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不久的校园里学习，目的当然是紧急“洗脑”。

由于批张运动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悍然挥兵南下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原 4 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巳久的风波猝然在抗大校园里爆发了。

当时，原 4 方面军有大约 500 多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作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并且手段极其简单粗暴。

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使原 4 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共识：在毛泽东党中央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会发生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事情？这不明摆着批判张国焘是虚，对原 4 方面军的人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么？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样的运动余悸犹存。

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跑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找张国焘诉说委屈，而张国焘也不断地给他们的激烈情绪火上浇油。

恰恰在这时候，发生了黄克功枪杀女学生刘茜的恶性案件。而中央汲取这场血案的教训，采取防微杜渐的措施，又更加让这帮已成惊弓之鸟的红军将领们感觉到大祸已经临头，于是铤而走险，酿成大错。

国民党的大报小报把黄克功杀人案渲染成一则黄色故事，一窝蜂登了出来。

其实，这是两个青年男女讲恋爱，女主角想分手，男主角一怒之下拔枪把女的给毙了。

女主角叫刘茜，是山西太原一户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年芳二八，刚刚从太原友仁中学毕业，追求进步，就跑到延安来了。

刘茜幼禀庭训，受良好文化氛围的熏陶，有较高的文学修学，小小年纪，便读过了《安娜卡列尼娜》、《夏伯阳》、《铁流》,还喜欢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及巴金的《家》、《春》、《秋》。一到延安，刘茜就被分配到了抗大六大队学习,大队长就是 15 岁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亦步亦趋，一直从井岗山打到延安的黄克功。

刘茜良好的天赋和内秀很快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深得大队长黄克功的喜欢。当时红军男女比例是五比一。由于外来的年轻人都很崇拜长征干部,把他们当作传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战争年代,提倡晚婚,上级规定的条件是“2857 团”,想讨老婆可以,必须年满 28 岁,有 5 年党龄、当兵 7 年、官至正团,具备其中之一者允许结婚。虽说提倡男女平等，但这个规定分明是针对男同志制定的。

黄克功这一年 27 岁,离规定还差了 1 岁。但他的党龄、军龄、级别已具备条件。黄克功主动向刘茜发起了进攻,刘茜虽觉得此人有些粗鲁，文化浅薄，长得不英武年龄悬殊又大。但年轻人受时风熏染，加之又抹不下脸来公开拒绝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就含含糊糊若即若离地和黄克功谈起了恋爱。9 月间,陕北公学成立,6 大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从陕北公学调回抗大工作。刘茜原本对黄克功就不太满意，人一调走，她也就有意地开始疏远黄克功。

黄克功意识到了，着急得慌，又想不出其它的招，主动刘茜送钱赠物,要求马上结婚。刘茜对黄克功说:“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

话说得冠冕堂皇，骨子里就是要“散伙”。

对于刘茜的拒绝,黄克功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他更轻信谗言以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去责备她,同时迫切要求结婚,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也很生气，就故意不给答复。黄克功十分恼怒,陷入恋爱泥坑不能自拔,萌发杀害刘茜的念头。1937 年 10 月 5 日傍晚,黄克功邀刘茜到延河边散步,作最后努力，逼婚不成,随即掏出手枪将刘茜打死在延河边上。

这桩血案，顿时成为轰动延安的惊天大新闻！

因为那时如过江之鲫般从国统区涌向延安的青年，就是冲着这方圣土上“抗日、自由、民主、平等、进步”10 个字而来的。

作案人黄克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红军领导干部。入抗大学习之前，黄克功就已经是一名团政委，有过光荣的斗争历史，为革命建立过功勋。案发后，舆论沸沸扬扬，到底该不该杀黄克功，人们议论纷纷，意见不一。学校的教师和青年学员们大都认为功不抵罪，不论有多大的功劳，触犯刑律，必须一视同仁，不然就无法服众，也等于纵容有功的老干部可以犯法。而与黄克功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老同志大都认为黄克功是个经受过严峻考验的长征老干部，出于一时感情冲动而杀人，事后已经非常懊悔，应该宽囿他，让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这种舆论给黄克功带来一丝求生的希望，他马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免其一死，表示自己宁可拿着机关枪，在执法队监督下，向日寇冲锋陷阵，把一腔热血倾泄在沙场上。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副院长，同时也是黄克功一案的主审法官雷经天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写信给毛主席，征询意见。10 月 10 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致信雷经天。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主席

1937 年 10 月 10 日

黄克功最终被押赴刑场，绳之以法。毛主席致雷经天的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延安地区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使共产党的威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4、许世友大骂毛泽东

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发生后，为防患于末然，莫文骅领导的抗大政治部下令所有在校学员缴出随身携带的武器，由校方集中保管。

可是，原 4 方面军的学员却误以为这是针对他们而采取的措施，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怨忿。

公开表现出这种愤慨情绪是在抗大操场举行的那次大规模的批张会议上。批斗会由林彪校长主持，那情景和文革初期批斗“走资派”没有两样。毛主席和中央在家的领导人全都坐到了主席台上，台下，密密麻麻坐着来自原 3 个方面军的上千名高中级干部。

张主席刚一露面，一帮积极分子就冲上前去，反扭他的胳膊，把他往主席台下拖。

我出于警卫员的职责和积极分子们争吵推搡起来，坝子上坐得密密麻麻的抗大学员们也都出现了混乱，表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批斗会的过程中，火药味一直很浓，张主席的态度也很顽固。

当一位学员在发言中突然脱下鞋子，往张主席脸上猛力扇去时，张捂着脸大叫起来：“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打人的学员立即被罗瑞卿逐出了会场。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惹恼了许世友。他在人丛中霍地站起来，圆睁豹眼，冲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怒吼道：“妈的，你们这是干啥？开的是批判会，还是打人会？这些混帐东西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真话？说我们 4 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俺就不服！哪来这么多主义，打不赢就跑，换个地方再打嘛。你姓毛的要不逃跑主义，咋会从江西跑到这黄土坡坡上来喝小米粥？”

许世友这样的态度，只能激起公愤，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反动军阀许世友”、“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把许世友也拖到主席台下，与张主席并排站在一起。

许世友挣扎着扭过头，向着台上大吼：“姓毛的，你说一句话，俺许世友，是不是土匪？”忽地，一股鲜血从他口中喷出，他訇然倒下了。

许世友病了，原 4 方面军的官兵们视他为敢于仗义直言，惹得“龙颜”大怒的英雄，在抗大“洗脑”的学员们也纷纷到医院看望他，一起发泄对毛和中央的不满。

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 4 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 1937 年 4 月 4 日午夜后举事，杀死毛泽东，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

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 4 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

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詹才芳、刘士模、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朱崇德、吴士安（包括王建安）等30余人一网打尽，投入大牢。

而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在许世友等人被抓后情绪激动，到处公开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表示从此以后再也不相信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并威胁要上书共产国际，控诉毛泽东视友为敌，排除异巳的行为。何畏也因此被抓。

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4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姓毛的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 20 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 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笔者注：引自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长期领导4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等等。其实，这是个冤案。”

作为“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先给他带上脚镣，后来又加上了手铐。

4天后，身陷囹圄的许世友真可谓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雷明珍迫于政治气候的压力，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是应该的，可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左的作法，错误地将原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与张国焘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弄得当时在延安占绝大多数的原4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对批张运动，我们普遍的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这场运动的发起，又恰恰是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我们4方面军两万多官兵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风波爆发后，我们从内心对许世友、洪学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同情和拥戴，觉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许世友被抓后，雷明珍马上跑来找李玉兰，说她也受到了牵连，上级把她的妇女部主任的职务撤了，还逼着她写材料检举许世友的反革命言行。她当时非常恐慌，说许世友这次祸闯大了，肯定要被枪毙。

李玉兰叫上我，两人陪她在延河边上转了一个晚上，想安慰她，又没办法安慰她，因为我和李玉兰也都认为许世友这次肯定没命了。

5、董老仗义直言

谁知雷明珍没能顶住压力，写了一张纸条，叫许世友的警卫员张贤俊送到了牢中。纸条上写着：

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结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你看后马上签字。

党的忠诚战士：雷明珍

许世友看后大怒，立即在纸条上写到："坚决离婚！许世友！"

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张主席为什么会是个坏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他也算得上 4 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

抗大风波引起的连锁反应让毛泽东始料不及，大为震惊，他赶紧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中宣部长凯丰和负责本案审判工作的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老说，他已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 4 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像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 4 方面军官兵更大的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拖枪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布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 4 方面军最精锐的 4 军、5 军、31 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毛泽东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窑洞时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董老回答："36 个，已经全部抓起来了。"

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火了，大声批评凯丰，"我让你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还听说，你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 4 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在甘孜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 1 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普通战士也不放过！你呀，我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不看文件，也不写文章。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

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

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穿过一条小街便是。

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然"哗啦啦"拖着脚镣上去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

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老奸巨猾不是好人！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

## 6、将军与领袖

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没想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

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

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向毛主席报告，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

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

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

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允许他装满子弹。"

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已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有胆量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允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过去，由于他多年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4 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8 万官兵中，唯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

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看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

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称呼，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

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 4 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他搀起，说道："4 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

"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要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

毛泽东倒了一杯水，放在许世友面前，继续说道："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哦。你说是不是？对你这位名贯三军的虎将，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斩你的道理？不过，有些事情啊，也得请你多多理解我，多多理解我身边的同志。

俗话说单枝易折，多枝难断，要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整天四分五裂的，我们还能做成什么大事情啊!”毛泽东还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根源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

许世友的脑筋终于开窍了，他激动地说道：“毛主席，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以前我总是对你不满，总认为过去我们公开反对过你，你在编方设法地报复我们4方面军，听了你讲的道理，我明白其实不是这回事。毛主席，我向你检讨，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真切地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

“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就这样，已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巨手一拨，便将这艘已经偏离航向的大船，又推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

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8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

这下，该轮着雷明珍后悔了。

雷明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王坪医院工作，与许世友结婚后，调到方面军政治部，在傅钟手下做文秘工作。长征途中一直在红军大学教训处工作。和我与李玉兰、王新兰常在一起。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县委担任妇女部部长。

那段时间里，雷明珍常常到凤凰山来找李玉兰、王新兰，有时也找我诉苦。李玉兰在后方政治部徐梦秋手下当秘书，王新兰在通讯学校学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相隔都很近。雷明珍和李玉兰都是通江人，她俩算小老乡，关系最好。王新兰还是个小姑娘，我又是个大男人，所以雷明珍每次来凤凰山主要是找李玉兰摆龙门阵，找我和王新兰的时候少。但有关雷明珍和许世友的事情，雷明珍走后李玉兰都会给我和新兰摆。

雷明珍那时候痛苦到了极点，她原以为许世友真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头子，犯下的是滔天大罪，肯定会被枪毙，没想惊天动地地闹了一场，到头来只不过是个错误，许世友的问题也这么快得到了纠正。她说她内心还是非常喜欢许世友的，她当初写那条子，是让领导逼得没办法。

我们都鼓励她主动写信向许世友承认错误，求得他的谅解，提出复婚。

雷明珍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叫李玉兰和王新兰送去抗大。可许世友连信也不拆。他俩偶尔在街上迎面相遇，许世友也视她为路人，昂昂然大步而行。

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主意，找了个星期天的中午，由李玉兰和王新兰去抗大请许世友过李玉兰的寝室吃饭。

说是请客，其实就是去饭馆里端回几碗油汤面条，买回十几个羊肉煎饼。我们的目的，是想为雷明珍创造一个能和许世友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的机会。

许世友人是来了，可没想到，我们的一片好心，却成了泡影。

那天，许世友笑呵呵地一进门，突然看到雷明珍也坐在窑洞里，那笑马上就凝在了脸上，冲我们吼道："何福圣、李玉兰，你们搞的啥子名堂？"

我壮着胆子道："许军长，坐下说，坐下说。"

而李玉兰和王新兰没想到许世友会大发雷霆，被吓得直哆嗦。

许世友怕吓坏了两个小姑娘，又和缓了语气说："我感谢你们几位的好意。可对雷明珍，我决不能原谅！我是啥？是她男人呐，男人遭了灾，受了屈，她一脚就把自家男人蹬了，还往我心窝上扎刀子。这种女人，能原谅么？我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个样，眼睛里进不得沙子。"说完，他转身便走了。

我们呆呆地望着许的背影，连喊也不敢再喊他一声。

雷明珍"哇"地一声就哭了。

当时，希望他俩破镜重圆的首长很多，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做工作。可许世友毫不动心。

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许世友随朱总司令去了太行山，重新统兵打仗。

雷明珍着急得很，又跑来找李玉兰商量咋办。

李玉兰给她出主意，说："你赶快追到太行山去，要不，隔远了，隔久了，你和许世友的事就真是完了。"

雷明珍打了报告，可领导不批，把报告退给了她。雷明珍也有主意，马上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虽然毛主席没回她的信，可是没过几天，领导主动跑来要她的请调报告，还说："雷明珍呐，你真有能耐，连毛主席都为你去太行山出面打招呼。"

谁知，没过多久，雷明珍又回到了延安。李玉兰后来告诉我，雷明珍到太行山后，首长们都很关心，纷纷找许世友谈话，可全没用，许世友固执得像块石头。陈毅不耐烦了，叫警卫员把许世友和雷明珍锁在一间屋子里，强行要他俩见面、谈话、沟通思想、做夫妻。许世友不领这份情，大声喊开门，大喊不开，他一掌就把门砸烂了，冲陈毅嚷道："捆绑不成夫

妻，我是你的兵，打仗我听你的，这事，不成！”

许的态度伤透了雷明珍的自尊心，她和许的情份，从那以后就彻底地断了。

后来，组织上强迫李玉兰嫁给徐梦秋，李玉兰宁死不干，雷明珍也积极地给她出主意，帮助李玉兰挣脱这根红丝线，可惜未能成功。李玉兰嫁给了徐梦秋以后，王新兰和肖华也结了婚。雷明珍一直到 1941 年，才嫁给了陕北公学的一位教师。

建国后，她随丈夫去了广东，和在通江县民政科工作的李玉兰偶而有信件往来。听李玉兰说雷明珍的爱人是广东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长征牌的老干部。以后，我就再没听说过雷明珍的消息了，她现在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7、将军们的眼泪

毛泽东下令将许世友等被捕的 36 名红军将领全部释放后。紧跟着他又亲往抗大纠偏。他平时宽衣大袖，衣着随便，这天却特意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八角红军帽。

在抗大操场上，毛泽东面对全场肃立却各怀心事的学员，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像春雷一样震撼了人心。

“同志们，中央认为，4 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同志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对待是不公正的！"

这句出自毛泽东之口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异常强烈。站着上千名学员的操场上静得犹如一潭死水。运动的积极分子闻此言呆若木鸡，而来自原 4 方面军的学员们心中顿时涌荡开股股暖流。

数百双饱含着热泪的眼睛仰望着台上那位操着湖南口音，大家久闻其名但还不十分熟悉的伟岸身影。有几声抑止不住的抽泣，打破了这团巨大的宁静。许世友、吴世安、詹才芳在流泪，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也在流泪。所有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红军军官都在流泪，流着热泪聆听这位他们曾跟着张国焘数次公开地反对过，不久前还对他暗暗怀恨的毛泽东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没用讲稿，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朴素而热情生动的语言风格开始了他的报告。他高度地评价了 4 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肯定 4 方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之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惯战的工农红军劲旅，对党忠诚的英雄军队。他重申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清算张国焘背离中央路线，犯下的种种严重错误，而绝非针对广大的 4 方面军广大官兵。他着重指出，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不应当影响削弱 4 方面军的丰功伟绩，任何在这场严肃的批判中表现出的歧视 4 方面军的现像都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情绪在指挥员们的心中急剧地变化，好似温暖的春风消融了梗塞在胸中的冰块。恨意如急流消退，荡然无存，充塞于心的，惟有陡然而至的震撼与陌生的尊敬……

知道毛泽东去抗大作报告后，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他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报告会在原 4 方面军的官兵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批张运动开始之前，张国焘已经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但是，却仍然给他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就在毛泽东去抗大讲话之后的第 4 天，张国焘也急不可待地赶到抗大去作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会由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抗大政治委员何畏给他主持。

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是去“扑火”的，张国焘则是去“放火”的。论口才，张并不在毛之下，但是，台下没有掌声，也没有赞同声、支持声。相反，他的这个报告不时激起了学员们的嘘声、抗议声。令他心惊胆颤的是，反对他的已不仅仅是原 1 方面军的指挥员，他看到的一张张愤怒的脸膛上，有那么多是他长期所熟悉的老部下……

何畏出面维持秩序，才使他勉强作完了报告。张国焘在报告中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他来自哪一个方面军，都应当检讨自己曾有过的错误，任何党员都有权抵制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就有权向上级党委或中央提出意见。如果认为中央不公正，也可以向共产国际控诉。

中央认为这是张国寿在进行公开的煽动，明目张胆地向中央反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于是，对他，以及类似于何畏那样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的斗争加剧了。

而绝大多数的原 4 方面军的官兵在这场巳经转入正轨的运动中解除了压力，认清了是非——他们三过草地，三越雪山，长征途中病、饿、累死的的官兵远比战斗中牺牲的多，原本就是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等错误路线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也纷纷站出来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很快，张国焘便成了孤家寡人。

紧跟着，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张国焘的处境变得来更加不妙。

何畏出狱后，变得异常活跃，到处讲话攻击中央批张是毛泽东翦除政治异己，以报巴西受辱之仇。毛泽东正在逐步控制大权，以图在党中央大搞独裁，中央巳经变质了，并且威胁要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错误，他就要公开退出共产党等等。

中央理所当然地解除了他的抗大政治委员的职务。不料何畏恼羞成怒，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到西安治病，但未获批准。于是他半夜里带着警卫员吴昆水用绳子缒城而出（当时延安县城到晚上要关城门），公开投向了敌人。

何畏投敌，影响恶劣。国民党利用此事大肆宣传。而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也因此事受到了牵连。

有意思的是，一年后张国焘也逃出延安投向敌营，在国民党军统机关里和他的老部下何畏重逢了。在敌人的营垒里，依然是张国焘当头儿，何畏跑腿，两人不余遗力地为戴笠、为蒋介石效劳，竭力想策反我军高级指挥员。据军统大管家沈醉回忆，张国焘何畏出力不小，效果却不佳，日久便受到戴笠冷遇，后来连生活也十分拮据，抗战后期，由张国焘出资，何畏管理，在重庆歌乐山办了一个养鸡场，以此养家糊口。

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何畏被弃之若履，又怕共产党来了找他算帐，一说在南京投江而亡，二说潜回海南老家当农民，三年大饥荒时期被饿死。

而另一件大事，便是周恩来遇刺。

8、谁是谋杀周恩来的策划者

1937 年 4 月 24 日中午过一点。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神色紧张地赶到毛泽东的窑洞，向他报告了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前往西安办事的周恩来、李克农、张云逸、孔石泉等一行人在途中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伤亡惨重，周副主席等首长生死不明。

听到报告，一向在大险面前镇定自若的毛泽东也慌张得趿拉着鞋子，一头冲出窑洞，语气严厉地对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发布命令：“黄霖，你什么也不要管，马上去把周副主席给我找回来！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黄霖立即命令警卫团战士全副武装，准备出发，马匹不够，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首长都纷纷把自己和卫士的坐骑牵了出来。片刻工夫后，黄霖便率领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骑兵部队，一路狂奔，出了延安南门。

中央首长们聚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他们不仅担心着周恩来的安全，同时也在紧张地进行分析，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一针对周恩来的重大谋杀行动？是外部的敌人，国民党武装特务，还是来自内部——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事件就更为严重，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荡。

中央首长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像，自然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张国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张运动中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但许多迹象表明，他是阳奉阴违继续与中央对抗。而这一谋杀行动恰又发生在抗大风波过去后的 21 天，何畏叛逃投敌 5 天以后。出事的地点大劳山，又恰恰在原 4 方面军某部控制区域内。张国焘怎能不被列为重大怀疑对象呢？

周恩来、李克农、张云逸、孔石泉一行是这天上午离开延安前往西安的。

李克农先出发，毛泽东留周恩来多谈了一会儿话，稍后才动的身。首长们除了自己的警卫员，还带有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与周恩来迟一点动身的总共有 60 多人。

途中周恩来坐在驾驶室的右侧，中间是陈有才，左侧是驾驶员。张云逸、孔石泉和战士们全都密密地站着挤在后面的敞篷车厢上。

陈有才是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身材、年龄、脸相都与周恩来很接近。这一天他与周恩来也是一样的打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远一点看上去很难分出谁是谁来。而且一路上他与周恩来总是形影不离。

陈有才被临时调来执行保卫周恩来的特殊任务，是因为前一天邓颖超说了一句担心的话："久洲太小了，一个人怕不行。"

久洲姓刘，是周恩来的卫士，当时才 18 岁，是中央警卫团里有名的神枪手。

正因为邓大姐的担心，保卫部门才特地将陈有才调来担任周恩来的随侍副官。

汽车驰出延安南门，路经原 4 方面军某师师部所在地三十里铺时，大家下车喝了水，解了手，随即又登车前行。不一会儿，便爬上了耸立在三十里铺与甘泉县之间的大劳山。

这大劳山地势险峻，古树参天，自来就是"绿林好汉"啸聚出没之地，过往客商，都不敢独行。

汽车翻过山顶，开始下山。两边林莽如障，光线阴暗。

就在这时，忽地响起"啪"的一声脆响。

"什么声音？这么响？"刘久洲警惕地发出疑问。

话音刚落，周围的枪声便像热锅爆豆子似地响了起来。子弹击在汽车上，"丁当"脆响，四处乱飞。有的战士中弹了，呻吟着倒了下去。而更多的战士则立即掏枪向埋伏在路边树林里的伏击者开枪还击。

张云逸对警卫员叫道："快下车！保护周副主席！"

战士们纷纷跳下车厢，向驾驶室跑去。

而坐在驾驶室里的周恩来则大声命令："全部上车，冲过去！"

战士们愣了愣，又返身往车厢上爬。

此时陈有才和驾驶员均已受伤。驾驶员听到命令，忍住疼痛，加大油门，卡车像一头发狂的公牛迅猛地向前冲去。

可没跑出多远，便一头栽到了伏击者挖断的路沟里。许多战士被摔了出去。

周恩来在卡车栽进路沟的一霎那，敏捷地推开右边的车门，跳出驾驶室，立即转身俯在右前轮胎后面。

此时驾驶员已经牺牲。陈有才钻出驾驶室，立即带伤指挥战士还击，并命令警卫排副排长带人护送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三位首长迅速离开这危险之地。其余卫士，纷纷朝前向卡车冲来的伏击者射击。可惜卫士们大都是短枪，射程短，杀伤力不强，所以难以打退伏击者的冲锋。

张云逸脱离险境后，立即派出两名卫士，奔向三十里铺红军师部报信。然后他和周恩来、孔石泉在十多名战士的护卫下，一路穿林海，攀峭壁，直到深夜，才回到了三十里铺。

留下担任掩护的战士，除子弹打光后钻进深山老林逃回，其余全部战死。

陈有才参谋长死得最为壮烈。因为他弄不明白身着便装的伏击者究竟是国民党特务，还是来自红军内部的敌人。但无论怎样，敌人完全可能是冲着周副主席来的。所以，他在组织力量掩护首长们脱离险境后，为了迷惑敌人，自己故意大声叫喊着指挥战斗，引得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结果，陈有才参谋长身中 6 弹，英勇牺牲。刘久洲腰部中弹，装死瞒过了敌人，后经医治痊愈。

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国焘和我都已经睡下了。突然，有人先敲门，后轻声叫："排长，有情况，快出来一下。"

我听出是内卫尹中富的声音，赶紧起床开门。

尹中富神情紧张地说："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肯定是来抓张主席的。"

我心中猛地一跳，马上随他出门去查看。

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坝上有一间板屋，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已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

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

我又喊道："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低着腰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4 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

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大喊道："陆安奎，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敢往里冲，就给老子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向他报告：“主席，外面已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排战士已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击周恩来的人已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已，并不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却是一场误会。

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烈的。

## 第十九章 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那一刻，再臭再脏的水也是玉液琼浆啊！400 多个从尸山血海中冲杀出来的西路军官兵全拥了上去……张主席和陈昌浩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陆秘书给我们读诗、讲诗的时候，他哭了，我们也哭了。当然，张主席也哭了……陈昌浩虽然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神！

### 1、闲云野鹤

批张运动进入收官阶段，张主席已经在红都延安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安排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但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张主席想管的事管不了，该管的事又不愿管，整日带着我和陆煜骑着马游山玩水。

6 月初一天，天气已经很热了。张主席带我们到延安城西南十几里地的万花山中跑山打猎时，在一大片树林中发现了一座废弃的破庙。庙宇几乎都坍塌了，大殿上的几尊菩萨也都被风雨剥蚀得看不出模样了。但还有几眼窑洞勉强可用。庙宇后面的峭壁上，还挂着一道清亮活泼的山泉。

我们坐在殿前的石阶上吃过午餐，然后，我把一张油布铺在庙门前的一株大树下，让张主席躺在树下休息了一下。没想张主席一觉醒来，突发兴致，吩咐我和陆煜尽快组织人将窑洞整修出来，他要搬到这里来住。

我和陆煜轮流带着警卫排和中央机关办公室派来的人忙了近半个月，将几眼窑洞修补粉刷得焕然一新，新装了门窗，糊上洁白的窗纸。还在庙门外开出了一块菜地，平整出一块土坝子。

很快，张主席便坚持离开中央机关，搬到他的“世外桃园”，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人全都能感觉到，此时的张主席尽量想给人造成一种看破红尘，淡出政治的印象。他不仅闭门谢客，而且中央机关办公室的同志带着人来给他安装电话，也被他坚决制止了。

张主席搬到万花山中后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外出过一次，整日呆在家里看书，写诗填词，和陆秘书下下象棋。在庙里实在呆烦了，就带我们去山中打打猎。中央派人送来的政治局的文件，他从不看，从不签，从不去开会，也从不请假。

听老百姓说，一到春天，万花山上到处开满一种叫做延川红的牡丹花。我们上来的时候是夏天，离开的时候是秋天，所以无缘一见。但关于延川红的传说我们却记在了心里。

当地人都说，万花山上的牡丹，是花木兰征战回来时，从洛阳把牡丹种子带回来播在万花山上的。牡丹花的来历我们无从考证，但巾帼英雄花木兰，却真是延安万花山花原头村人。张主席看了县志后，专门带我们去花家陵，看了花木兰的坟。花木兰的坟在万花山的河对面，为的是木兰一睁眼，就能看到万花山上的牡丹。

过了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原来在鄂豫皖当过省委宣传部长、如今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成仿吾骑着马跑到庙里来，邀请张国焘去给一个高级班的学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主席可能也在庙里呆得太闷，图新鲜，就答应了。

中央党校在延河对岸的清凉山上，每星期去三个上午，由我、陆煜跟着，来回骑马，得花将近两个多小时。

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凯丰也都在中央党校兼有课，张主席常与他们见面。已经落马的张主席在这些人面前也是不卑不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张主席彼此喜欢以字相称，

显出一种带有鸿儒之气的亲切感。张闻天、博古、凯丰这些留过洋的首长，则习惯于互称同志。见了面彼此都客客气气，有说有笑，好像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张主席认认真真地在中央党校当了一两个月的客座教授，直到抗战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团结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之地。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斗争的胜利。

抗战是一束熊熊燃烧的火，烧得延安热气腾腾，城里城外，到处是一派同仇敌忾的气氛。所有的人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在万花山中隐居了几个月的张主席也呆不住了。他虽然仍然坚持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却常常被邀请到延安城内去参加一些有关抗战与当前时局的讲演或是讨论会。

8 月底召开的洛川会议，张主席还是去参加了。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一起来找张主席，动员他出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张主席开初表示拒绝，后来他们谈了一个晚上，张主席才同意了。但他提出仍由林伯渠担任这一职务，他只同意暂时代理一下。

以张主席过去在党内、军内的显赫地位和经历，他自然不会把边区政府主席这样一个像征性的职位放在眼里。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张主席就当着他的几位政府中的新部属发了一通牢骚，说：“原来怎么干今后你们还怎么干，你们都是独挡一面的负责人嘛，把工作抓起来就行了，不要什么事都来找我，找我我也不表态。我这个人已经被打倒了，批臭了，让我来挂挂这个主席，可能在某些人眼里，张国焘这个名字还值几个钱吧。”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他建国后担任过宁夏省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还出任过驻苏联、朝鲜、印度的大使。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他以前是 9 军团的政委，作战时被打断了左臂，建国后贺龙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任副主任，出访苏联时飞机失事遇难了。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头发都白了差不多一半，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积极推广汉字拉丁化。

他们全都经历了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主席虽然已经到边区政府走马上任，可他仍住在“世外桃园”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偶而，也骑上马到林子里或是附近的杜甫川去打打猎。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

俗话说“虎死不倒威”，何况张主席的政治生命那时候并没有“死”。虽然党内斗争上纲

上线，罪名耸人听闻，批张运动进入高潮时几乎到了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但运动过后，具体处理仍然属于内部矛盾，属于好人犯错误。许多人，尤其是原 4 方面的官兵，还是保持着对他的尊重、崇拜，甚至还有同情。他原本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头上又顶着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他依然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直到他叛逃延安的消息传开后，才真正地身败名裂，成为千夫所指的对像。

张主席百事不过问，偏偏对有一项工作很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

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延安，外国记者来延安采访，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接见。

当时在延安上层很活跃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夫人海伦-福斯特，都骑着马专门跑到万花山中来采访过张主席。

来得最多的还是西路军幸存的指挥员，我的印像中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黄火青、苏井观、宋侃夫先后都来过。他们突围后，被陈云和滕代远带领的部队从星星峡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再辗转回到延安来的。

这帮死里逃生的指挥员们见了张主席，都是哭的多，笑的少。

他们告诉张主席，西路军 21800 人，除了牺牲的，被俘的，跑散了的，最后被陈云从星星峡接出去的就剩下了 428 人。而且，要不是苏院长，这 428 人也全完了，他们也就再也来不了延安，见不到张主席了。

我听了大感惊奇，暗暗想，苏院长不就是个医生么？就算有华陀、扁鹊的医术，也不可能救几百号人的命呀？

张主席也觉得不可思议，就问：“井观，怎么回事？”

苏井观说：“他们不是感谢我这个人，是感谢我的马，要没我这匹比人还聪明的马，我们就全都被渴死，晒死在戈壁滩上了。”

原来，石窝会议决定突围时，把西路军剩下的官兵分为 3 路，各自往外冲杀。血战几天几夜，另外两路都被打散了，只有他们这一彪人马在丢下一路尸体后，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冲杀到了疏勒河边。疏勒河河底淤泥不知有多厚，先下水的人马下水后马上陷了进去，越挣扎越往下陷，直至没顶。血染征袍的红军官兵们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没想一条凶险的大河又将他们陷入绝境。在河边奔突了一天，处处凶险如故，江上黄滔一片，所有渡河工具，皆被马家军或集中，或烧毁。毕竟是命不该绝，就在追兵越来越近的危急关头，他们用一块金砖买通了一个走私的回民，把最后剩下的 400 多名官兵从走私者在河底铺就的一条窄窄的石子路上带过了疏勒河。

过了疏勒河，两天后他们进入了一片茫茫数百里的戈壁滩。气候极为干燥，因沿途水井都被马家军投放了毒药，他们已经经两天滴水未进，渴得嗓子像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

也无法下咽。再也迈不动步了，有的“咚”地坐下，有的索性躺在了灼烫的沙地上。就在大家奄奄一息之际，忽然看到前方有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大家惊喜得简直发疯了，用尽最后的力气爬起来，以枪作拐，摇摇晃晃地往前奔去。谁知跑到跟前一看，除了蒸腾缭绕的一缕缕地汽之外，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又是一片碧蓝的湖水，于是以为走错了方向，又转身往回跑，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这才知道眼前出现的即是传说中的“海市唇楼”。两次拼命奔跑，耗尽了大家体内最后的一点水分，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趴在硌人的沙地上，只等着死神降临。就在黄超和李特已经被渴昏过去，有的提议杀马饮血的时候。苏井观的座骑突然“咴咴”叫了两声，撒着欢往前奔去。

苏井观急着去追马，前面出现了一道隆起的沙梁，当他跑上沙梁，眼前的情景令他喜极欲狂，大声哭喊起来“水……同志们……有水啦！”

原来，这匹老马嗅到了水，正把嘴伸进一个水潭里痛饮。这下可不是“海市蜃楼”了，长长的马嘴搅得水面波光闪闪。

所有人都听到了苏院长惊喜得变了调的狂吼声，一个“水”字令垂死者也能活力四射。他们跌跌撞撞地奔上前来。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方圆十几平方米宽的积水潭。水呈黄绿，浓稠如浆，恶臭难闻。水面上绿苔丛生，孑孓与不知名的虫子在水中游动。但那一刻，再臭再脏的水也是玉液琼浆啊！400 多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红军官兵全拥了上去，有的泡进水里，有的趴在潭边，“咕噜咕嘟”，满天下一片嘬水之声……

2、难兄难弟，同病相怜

9 月初头上的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已经和张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来了。

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

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不单是个气宇轩昂的伟丈夫，还是个美男子——我这么给你说吧，香港的大影星周润发要是穿上一身红军的军装，披上将军斗篷，就太像我们年轻时候的陈总政委了，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就像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帅呆啦”！高大英武，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我们 4 方面军中，陈昌浩脾气大得能把人的尿吓出来，连不少军级干部出了差错，也常挨他拿马鞭子教训。

可眼前的陈昌浩却再没有了那分八面威风的大将军的模样，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像腌菜坛子里抓出来的灰单军衣，就像刚从国统区跑过来投奔延安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陈昌浩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倏地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按照内卫纪律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能从西路军一把手的口中听到西路军毁灭的更祥细更权威的经历；我还挂欠着那么多我认识的红军指挥员的命运—

—毕竟，我也是一个 4 方面军的老战士啊!

张主席也陡然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身，冲上前双手紧紧握住陈昌浩的手，使劲摇了摇。好像握手也不能表达彼此心中的感情，他们突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

一直到分开，张主席仍然激动得语无伦次。

“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我又问过向前，他说你生病了，留在老乡家里治病。”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现在没法谈，谈不清楚，我相信以后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向前、树声、先念他们回来，都把情况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原来，突围时，陈昌浩和徐向前几次遭遇马家军的骑兵追杀。他俩和 20 几名卫士边打边走，昼伏夜行。就在这时，陈昌浩生病了，烧得来晕晕糊糊。某日夜里歇脚在一个叫做大马营子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郎中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坚持要徐向前一个人先回到延安，他留在老乡家里养病。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此一别，徐向前给他留下了 3 名卫士和一包银元，带着其余的卫士上了路。徐向前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他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多年生死相依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待到他俩再一次相见时，徐向前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而他还在为中央到底会安排他干什么工作而忐忑不安——这，恐怕是两人在大马营子挥泪而别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天苍苍，野茫茫，曾经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年轻统帅，如今被困在西北荒原上的一个脏不拉叽的小村子里。在病榻上，强烈的自尊心使他改变了主意。他原来是决意回中央讨个说法的。可到了这种孤家寡人地步，他觉得与其狼狈不堪地逃回去，还不如先回鄂豫皖，与留在老苏区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枪，说话才响，到那时再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待到病情稍好，他决定动身了。为了缩小目标，他徐向前给他留下的银元拿出一半来分给 3 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又给了但复 30 块大洋。但复三虽系乡间郎中，却也是条有副侠肝义胆的汉子，见陈昌浩病体未愈执意要走，就提出由他护送陈昌浩回老家。陈昌浩把枪埋了，穿着但复三给他的一身老百姓衣裳，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湖北境内。

但陈昌浩却过家门而不入，直接来到原来红 4 方面军的根据地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

义旗，建立一支武装。但活动一段时间后，情形却不容乐观，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当初大部队撤离时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呆不住，早已带着 26 军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占据苏领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国民党 75 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拉走了 2000 余名家中有人当红军的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卖了。他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已经难以实现，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他给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速来汉口见面。

几天后，陈昌浩在大智路一家旅店里办了一桌酒席，与阔别已逾 10 年的老母亲和结发妻子刘秀贞、才第一次见面的小儿子祖涛，以及汉口的亲友围桌一聚。

陈昌浩 1927 年 9 月首次赴莫斯科时，刘秀贞已经怀胎数月，陈昌浩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大名祖涛，字“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上面有一个哥哥，大名祖泽，字柏生。

陈昌浩的母亲陈吴氏见到分别已久的儿子，悲喜交加。而细心的刘秀贞则似乎从丈夫欲言又止的神态中看出点什么，但碍于传统的妇道，她又不能开口追问，只能愁云满面，默然无语。

这不是刘秀贞多疑，而是出于女人对此类大事理所应当的敏感。

陈昌浩能够在战场上令旗一挥，山摇地动，偏偏面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几次话到嘴边，却终究没有勇气把自己已经和张琴秋结婚的事情说出口。他知道自从自己参加革命后，秀贞带着祖涛祖泽两个孩子，独自挑起了全家人的重担，承受了一个柔弱女人难以承受的生活压力。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有愧于家庭，更不忍心伤害妻子的感情。他的内疚、言谈中的躲躲闪闪欲语还休，怎能不让细心的妻子疑窦丛生？

就在他要与家人再次分别时，刘秀贞再也不愿让陈昌浩丢下自己不管，提出：不管是天涯海角，这次一定要跟着他走！

陈昌浩为难了，虽然他早已把自己在老家有妻子和儿子的事告诉了张琴秋，可现在张琴秋生死未卜，音讯渺无，他要冷不丁地把这一家大小带到延安，要是见了张琴秋彼此怎么相处？

他只好再三向刘秀贞保证，他先去延安，待一切安顿下来，他再马上派人来接他们母子三人。刘秀贞无奈，只好带着祖涛回到汉阳老家，天天盼望着丈夫的消息。

和亲人们见过一面，陈昌浩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风尘仆仆赶赴陕北。

一个星期以前，陈昌浩从武昌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突然见到他，也吃惊得很，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

张主席问他：“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还没有。”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毛可

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是几天前才到延安的。洛甫已经找我谈过话了，态度生硬，语言尖刻。他要我写出全面检讨。我想，他要我检讨的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吧……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嘛，我已经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让我上前线和日本人打仗，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先念从尸山血海里好不容易带了 400 多人逃出来，不也被一捋到底，当了个营教导员吗？我不在乎，只要准我上前线，当小兵我也干。"

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的时间很长，足足谈到第二天天亮陈昌浩才下山。他俩时而抚今追昔，唏嘘感叹。时而说到某些问题时又各持己见，高声大嗓地争执起来。

这样的场面在通江、旺苍我就多次看见过。只有陈昌浩敢和张主席当面争论。张主席也常常让着他几分。

陈昌浩当时冲动的情绪更多的是冲着毛泽东党中央，也冲着他的老搭档徐向前去的。

由于陈昌浩过去在 4 方面军中所处的极高地位，他清楚自己是以待罪之身回到延安负荆请罪，虽然口口声声说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无所谓，"当个小兵也不在乎"，但骨子里自我感觉还是相当不错，而且还顺理成章地以为中央再咋说也得给他安排一个与徐向前差不太多的位置——既然性质与自己差不多的徐向前能得到中央的重用，他陈昌浩自然也应当如此。

但是，回到延安才十来天，他就感到情况远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乐观了。一个是毛泽迟迟没有见他，代表中央出来和他谈话的张闻天对他的态度又是冷淡加严厉，离他想像的差得很远。而且，他回到延安恰逢批张运动已是余音袅袅，从上到下压倒性的意见，已经异口同声地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张国焘、他和徐向前的头上。

所以，陈昌浩愤愤不平地对张主席大声抱怨："我已经看了洛甫给我的文件。我看到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他指出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主义。中央马上要下发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谈到西路军失败问题时，《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国焘同志，西路军是在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行动，我们打了败仗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签字？你怎么能够不顾事实抓起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你这么不负责任地来个破罐子破摔，不把西路军的弟兄们全害了吗？"

张主席苦笑着说："昌浩啊，你真是书生意气。处在你现在这样的境地，我必须郑重其事地提醒你，政治只有利弊得失，从来就不存在正确与错误。尤其是党内政治斗争，它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战场上的敌我矛盾。我们都经历过肃反，也曾领导过肃反，难道还不懂得这里面的奥妙吗？你还怪我软弱，冲我发脾气，我怎么没有斗争？我和他们斗争到了最后一刻，斗争到了山穷水尽！斗争到了他们当着老毛的面公然殴打羞辱我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步！昌浩同志，换做你，你又能怎么样？"

陈昌浩用拳头"咚咚"捶着桌子叫了起来："可是，你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吗？牺牲的弟兄九泉蒙冤，死不瞑目，活下来的弟兄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啊！"

张主席举眼向天，悻悻回道："事已如此，无力回天，那我们就让历史来作结论吧。"

陈昌浩皱着眉头长吁短叹，过了一会儿，带着一豁出去的情绪说："既然这样，那我恐怕也只能按你这样的态度来向中央写报告了。"

张主席点点头说："这才是明智之举，我完全能够理解。我现在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希望你能够尽快过关，重新出来工作。"

陈昌浩还谈到了他和徐向前在延安街头辟面相遇的事。他说，徐向前告诉他，他明天就要随周恩来到太原，要陈昌浩"好好休息，多多保重"。

徐向前参加洛川会议后，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同周恩来一道去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8 月 26 日早饭后，徐向前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竟意外地碰见了刚刚归来的陈昌浩。两位经历生死离别的老战友在此重逢，又惊又喜，激动万分。

陈昌浩对这次短暂的见面却颇有报怨，他对张主席说："我知道向前为人谨言慎行，一向以严守纪律著称。可是，我太想知道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了，再三问他，他却支支吾吾，不肯对我透露只言片语。我知道他在洛川会议上进入了由 11 位同志组成的新一届中革军委，也是我们 4 方面军惟一的军委成员。想当初我和向前出生入死，推心置腹，他现在却对我守口如瓶，实在叫人心寒呐。"

张主席宽慰他说："毕竟西路军遭此惨败，向前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为人又谨言慎行惯了，不便对你多说什么，也是能够理解的。"

张主席紧接着说出的一句话，让陈昌浩愣了好一阵子。

"昌浩，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向前兵败后只身回到延安时，老毛见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前同志，你是 4 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虽然如此，陈昌浩此时对自己还感觉良好，甚至颇为遗憾地对张主席谈到，他运气不好，没有能够赶在洛川会议之前回到延安。如果能够早几天回来赶上洛川会议，就绝对不会落到眼下这种被人晾在岸上的尴尬处境了。

吃罢早饭，陈昌浩告辞了。分手之前，他拿出一首诗送给张主席。

后来，张主席把这首诗交给陆秘书，让他组织警卫排的战士们学习。陆秘书给我们读诗、讲诗的时候，他哭了，我们也哭了。当然，张主席也哭了。这首叫做《兵败抒怀》的诗，我当初还把他抄在了学习本上。诗如下：

壮志匡神州，

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

祁连葬英魂。

全军沉血海，

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

长风万里行。

耿耿怀大义，

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

愿作铺路尘。

悲愤碎肝胆，

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

歌罢泪纷纷。

3、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责任问题”

作为西路军的最高负责人，陈昌浩当然清楚他和徐向前是遵照谁的命令行事。

尤其是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时，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士气空前高涨。与此相反的是，马家军则受到了极大震憾，马步芳一不知蒋介石是否能活着离开西安，二不知局势将向何发展，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向红军进攻。

怎样利用西安事变形成的有利时机，摆脱被动，求得新的发展，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形势瞬息万变，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一会儿一个样，就在西路军决定乘虚西进，完成打通国际通道的目标时，中央突然来电命令西路军掉头东返。既然中央下了东返的命令，陈、徐只能遵命行事，马上开始集结部队向东打。没过几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掉头向西，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陈、徐无奈，立即又转身向西打。

陈昌浩清楚，中央的一切关注点、着力点全都放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大事上，这就需要所有的红军，自然也包括西路军全力予以配合，对此，他能够理解。可严重的问题是，西路军已经远远没有这样大的承受力啊，孤军在外，无日不战，部队伤亡惨重，又无任何后勤支援，此时被包围在永（昌）凉（州）地区，进退维谷。更为严重的是，西路军先是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此后又配合解决西安事变，在永凉地区盘桓了 40 多天，多次失去了了东进或西进，以彻底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机会，如今再以疲弱之师，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路军的前途，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西路军在永昌滞留的时间太长，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消耗，全军已由过河时的 21800 人，减电至 15000 人，战斗力大不如前。但是它沉重的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西岸十几万敌军向西，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无疑是一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当时红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看出滞留永凉是极其不利的，李先念直接找到陈、徐说："我们在永凉地区徘徊不就只有等着挨打吗？部队应该马上走，不管是向东向西，都由我 30 军来打头。"陈昌浩大怒，斥责道："你懂什么？往哪儿打，你说了不算，我和向前说了也不算，只能听中央的！"

西路军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徐向前一直不能理解，直到晚年从档案中看到《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原来当时让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的动机，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即将与西路军在河西汇合的假象，以利于河东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以摆脱蒋介石大军的包围。

1936 年 12 月 31 日，5 军攻克临泽县城，继续向西，元旦这一天，又一举拿下了高台县城。高台一带粮食较多，陈、徐决定部队略作补充休整，然后继续向西打通国际通道，并向中央请求让 4 军、31 军也过河配合完成任务。然而西路军向西打了几天，刚刚进入到临泽、高台一带，5 日，中央又突然来电叫停命令陈、徐放弃西进，就在临泽、高台一带创建根据地。在电报中，中央拒绝了陈、徐要求 4 军、31 军速过黄河配合作战的请求，并命令他们就地站稳脚跟后，迅速向东扩展根据地。

与此同时，陈徐还收到了张国焘本人发来的电报。张电指出，"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作为已经失去军队指挥权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在西路军过河之后，很少以个人的名义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下达指示，对于西路军的一切指令，都是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下达的。就在西路军与中央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张国焘忽然以个人的名义来电，而且提到了过去的政治问题，其分量之重，陈、徐二人自然掂量得出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陈、徐只得放弃个人意见，无条件服从，命令部队就地坚持。

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不动，数万马家军蜂拥而至。由于高台位置孤立突出，驻守该城的 5 军陷入了孤军苦战的境地。经两天两夜激战之后，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和 3000 多名官兵壮烈牺牲。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残忍地割下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泡在酒中，送往西宁马步芳公馆邀功请赏。

就在西路军和马家军激战的时候，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入延安，而蒋介石也平安回到南京，并立即将陪送的张学良关押起来。国民党大军虎视眈眈，西安和陕北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为了配合与南京的谈判，中央遂第 4 次电令西路军东进。可是，马步芳已集中重兵在东面拼命拦击，西路军连日苦战后，最后，剩下的一万余人又被迫后退到了倪家营子。而近 10 万马家军随即将有着大小 40 多个村囤的倪家营子团团包围，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西路军将士以寡敌众，无日不战，顽强据守。血战不分昼夜，持续了一个星期以后，西路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马家军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上来。

为避免全军覆没，心急如焚的陈、徐电告中央，汇报西路军现存力量与所处危急处境，并请求速派 4 军、31 军过河增援。然而，他俩等来的却是中央以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的双重名义，给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电报中还提及了他们过去犯下的政治错误，这给了陈、徐二人当头一棒，但是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就地死守绝无出路，坚守倪家营子 40 余天后，陈、徐只好下令部队杀出倪家营子，向祁连山方向突围。

为了解救西路军，中央考虑了各种方案，甚至决定送钱给马步芳，换来马放弃对西路军的继续追杀，结果劳而无功。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张国焘出面，来教育和影响西路军的领导人，3 月 4 日，中央与张国焘分别给陈、徐发电，严厉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汲取南下教训，以至造成目前危险的处境，并非中央指挥失当，而完全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亲拟的电文中尖锐地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这封电报不啻是兜头给了陈昌浩重重一记闷棍。长征时期，他坚定支持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已经成为他一块沉重的心病。毛泽东一念这道"紧箍咒"，陈昌浩便胆颤心惊，周身发抖。

张国焘也指责陈、徐，要他们认真接受中央的批评，你们来电说西路军所遭受的损失，应当由军委负责是完全错误的，你们要求 4 军、31 军归还建制的观点，更是错上错加错。你们要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等等。

陈、徐接到这两份电报，心情难以言状……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血战 40 余天，被迫向祁连山突围后，马家军骑兵仍然紧追不舍，每一天都有数百士官被砍杀。

1937 年 3 月 14 日，西路军退到甘肃省一座叫石窝的山上，已不足 3000 人，马家军骑兵又随后而来，将其团团包围，已经弹尽粮绝的红军官兵，用石头，刺刀、枪托和追敌展开激战。

当夜，四周喊杀连天，在寒风凛冽，连树也没有一棵的石窝山头上，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将现有兵力编为 3 个支队分头突围，然后

就地坚持打游击；2、陈、徐首长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

就在石窝山上，西路军给中央发出了最后一分电报，内容有二，一是汇报石窝会议作出的两项决定，二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中央和张国焘 3 月 4 日来电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强调西路军一直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没有重复过去南下时所犯的政治错误，是坚决按照中央指示行动的，请求中央重新估计客观事实，对西路军作出正确评价。

朱玉教授在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以后由衷地感叹说："西路军过河以后，在 4 个月时间里，与马家军作战 80 余次，大的战斗就有一条山、古浪、武威、四十里堡、永昌、山丹，再就是高台、临泽、倪家营子、梨园口。从对幸存者的采访和回忆录中反映的情况看，每一仗都是血战，很惨，也很悲壮啊！说实话，也只有共产党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军队，一个班它一个班战斗到底，一个排它一个排战斗到底，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任何成建制投降的，当时除了红军，还有什么军队有这样的精神？尤其让后人感慨不已的是，当广大西路军官兵与敌人以命相搏时，他们的指挥员还三天两头地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这种严厉的批评在此后的岁月里延续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也直接造成了众多西路军幸存官兵的不幸。直到 2002 年 9 月推出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才为西路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2004 年，时任马家军 14 旅参谋长的马尚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战事结束以后，马步芳拿红军不怕死的精神来教育他的部队。他说人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打得那样顽强，你们的条件这样好，还把仗打得如此艰难。红军虽然是我们的敌人，可作为军人，无论官兵，你们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怕死的精神。"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苦战之悲壮与惨烈，让其对手折服，也让西路军的领导人倍感心痛。徐向前把它看作是"红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失败"，张国焘也曾痛心地说："如果说与 4 方面军会师时的 1 方面军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那么西路军则是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不过，让许多西路军将士和 4 方面军官兵尤感心痛和不解的是，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似乎匆忙地作出了结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 4 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51 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 年秋季，红 4 方面军与红 2 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 10 月，红 2、4 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 4 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 1936 年 12 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 1937 年 3 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

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 1951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 1951 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但是，朱玉教授对这篇文章的的写作日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原稿中不可能有这个内容，因为原稿是 1936 年 12 月毛主席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一个报告，那时西路军刚过黄河，在一条山打了个大胜仗，随后孙玉清的 9 军在古浪吃了点亏，品迭下来西路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红星报》上还登了‘一条山大捷’之类的文章，在场听报告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都知道西路军还生龙活虎在河西走廊作战，根本不存在失败的问题。毛主席怎么可能在西路军并未失败时便说出‘红军第 4 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样的话？我在档案中找到了 1937 年 5 月的一份油印稿，油印稿上已经有这句话了。我估计，油印稿里这么写，是在 1937 年 3 月批判张国焘运动展开后才加上去的。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地言呢？那就是出于批张运动的需要，加上这段文字，就把责任一呼隆全推到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头上去了，而且几十年就这样宣传下来了。现在来看，这样做肯定是很不合适的。牺牲的上万烈士，真是死不瞑目啊！电报那么多在档案馆里摆着呢，也包括张国焘亲拟的两分电报，如果说张国焘与西路军有关系，那就只剩下了这两份电报，可张国焘在这两份电报里都说了些什么呢？他都是在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出现了分歧的关头，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劝导西路军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强调中央是正确的，你们不应当有任何的怀疑。张国焘那时两手空空，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指挥整个红军的是毛、周嘛！”

4、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陈昌浩回到延安城里没几天，毛泽东便和他谈了话。大约一个月后，陈昌浩写出了一份长达 7 万多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检讨，对自己痛加指责。但是，在这份报告的最后部分，他仍然坚持西路军严格执行的是中央的命令而绝非国焘路线。

这份报告自然不可能得到通过，因为中央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已经通过批张运动形成了定论。于是，陈昌浩在受到中央严厉的批评之一，不得不重新写了一分 3 万余字的报告。

很快，中共中央秘书处在内部公布了陈昌浩的写的第二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在《报告》中，陈昌浩对 4 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作战问题，作出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说法，对中革军委发给他与徐向前的数道命令，以及张国焘的两份电报忽略不提，而把主要责任一古脑儿往张国焘头上推。甚至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地写道：“我们当时同意 3 个军渡河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执行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还说，“渡河作战本身也是错误的”。

当初西路军 21800 名将士在河西走廊连遭败绩，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已被马家军重重包围的石窝山头主持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在决定与徐向前脱离部队回潜陕北时，他当着几十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高级指挥员激动地说：“我们回去和中

央斗争!”说这话时，他憋着一股子不肯服输认错的刚劲。

陈昌浩发誓“要和中央斗争”，就是要明确西路军战败的责任应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来负。他在石窝会议上气势汹汹地公开指责，“军委分散 4 方面军兵力”，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不定，变来变去，而又不派 4 军、31 军过河增援”，等等，直接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的往来电报之中，就曾受到过毛泽东和张国焘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显而易见，此时的陈昌浩也是汲取了张国焘的教训，为了尽早过关，咬牙闭眼不顾一切地抓起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因为，渡河作战执行的是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坚持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而且在渡河作战上，张国焘也是严格执行军委指示的。而这些，都是陈昌浩所亲历的一清二楚的事实。

毕竟，陈昌浩心里非常清楚，他与张国焘关系密切，是张国焘之下的 4 方面军的二号人物。张国焘在批张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他不能不用违心之言来与张国焘“划清界线”。

陈昌浩还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我长期执行与助长国焘路线，由于我自己本身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虽然在工作过程中，有某些反国焘路线与部分向中央路线转变的表示，可是在动摇、妥协、调和之后，终于在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国焘路线。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陈昌浩表现出的勇气还不仅仅如此，他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也仍然坚持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西路军是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队伍；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他写道：“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了，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当时中央决议已经对西路军作出了明确的全面否定意见，陈昌浩敢于在报告中部分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而是顶着批评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西路军是党的军队，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弦外之音自然是西路军无论胜利或是失败，都是按照党的指示行事的，胜利了归功于党中央，失败了责任也理当由党中央来负。而这，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竟之下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这些意见是陈昌浩为 21800 名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正名的基本点。他虽然在大势所趋的情形下对张国焘个人有“落井下石”之举，但对广大已经血洒荒丘和侥幸生存下来的官兵，他仍然牢牢地坚守着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底线。就冲着这一点，许多原 4 方面军的同志对他十分敬重。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发自内心地表现出对陈昌浩的这种敬重——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但陈昌浩或许没有想到，此时以及以后的他，已经是人微言轻，对中央已经作出的定论，根本无法撼动分毫了。写出第二份报告以后，作为严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从此失去了他的政治资格，被彻底晾在一边。

这口黑锅压在西路军和原 4 方面幸存官兵的头上，让他们忍辱负重了半个多世纪。许许多多从尸山血海中冲杀过来的老战士，就在这种盼望与绝望，痛苦与迷惘中撒手而去了。在他们的临终遗言中，依然希望总有一天，他们无比热爱和忠诚的党，能把这个冤案搞清楚，还他们一个清白之身。

和他们怀有同样感情的还有一位重要的历史老人，他就是当初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急赴星星峡，接出了 400 多名西路军幸存者的陈云同志。

陈云对西路军长期背着“张国焘错误路线”这口早已锈迹斑斑的黑锅心情十分沉重。为了把西路军问题彻彻底底搞清楚，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黑帽子，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同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做了很多工作，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

1981 年 11 月 22 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3 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竹郁”（竹郁即国防大学朱玉教授撰写此文时所用的笔名）写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 77 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 1983 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 1935 年 9 月擅自命令 4 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 年 1 月 5 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

同年 3 月 8 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 年 3 月 12 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 1981 年 10 月 30 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40 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据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但李先念的“说明”和邓小平的批示当时只限存档，故不为公众知晓。直到后来《陈云年谱》公开出版，西路军问题才总算得以公开澄清。

徐帅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为维护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之言。这让不少原4方面军的老同志也对他微有腹议。从1983年开始，徐帅用3年时间写成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这是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可惜的是，陈昌浩已经看不到这一天了。

对于西路军的惨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一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大大小小的检讨多不胜数。这年11月间，党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陈昌浩检讨西路军严重失败的错误及其个人应负的责任，同时对部分因执行任务未参加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运动的新学员进行“补课”。这次批判会开得很长，足足有一周时间，由张闻天和主持抗大具体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共同主持。其间，毛泽东也来参加了两次。张国焘、陈昌浩当然是会议的靶子。

陈昌浩作过检讨之后，张闻天极其严厉地批了他一通。随后，与会者毫不留情地揭发批斗，火力之凶猛如雷霆万钧。

“陈昌浩，你脱离部队后为什么长时间不肯归队？“

“你路过西安为什么不找党的办事处？”

“你不回中央跑回湖北老家去干什么？”

“陈昌浩，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待！”

……

面对这样的无端指责，陈昌浩无法争辩，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检查和说明。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做了一次长篇发言。他着重肯定了3个重大问题：一是张

国焘在川西反对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正确决定；二是张国焘在草地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三是张国焘另立“中央”，与抵达陕北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毛泽东讲完后，廖承志紧接着上台发言。

他愤怒地控诉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搞大肃反，把罗世文带去的四川地下党的同志杀了 200 多人，还冤杀了无数红军将领，邝继勋、曾中生、余笃三、刘杞、张逸民、舒玉璋……，点出了一长串被张国焘下令杀掉的红军将领。还诬陷他是反革命分子，把他关押了好长时间，企图置他于死地。他指着张国焘悲愤交加地怒喝斥道：“要不是党中央及时到达州西，及时营救了我，我廖承志也一定会像曾中生那样死在你张国焘的屠刀之下!”

廖承志对准张国焘放了一炮，就把原本主要是批判陈昌浩的会议重点，转向了几天来一直闷着脑壳不开腔的张国焘身上。

陈昌浩写的检讨报告过关后，中央总算给他分配工作了，虽然他早已作好思想准备，但分配的工作仍然让他恍若跌到了冰窟里！通知他去报到的新单位是延安县委宣传部，无任何职务，仅当个普通办事员。陈昌浩意识到这分明带有惩罚的意思，又不能不去。报到后，只好夹着尾巴做人，埋着脑壳做事。忍辱负重埋头干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回凤凰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 3 所学校的政治课教员。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是金子随便扔到哪里都会闪光。31 岁的陈昌浩把他并不热衷的本职工作也完成得非常出色。他在武汉上过大学，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年，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嘴巴非常能讲，文章也漂亮。这一期间他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党的理论和鼓动抗战的文章，在延安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教学工作也极受学员们的欢迎。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在他工作的 3 所党校先后开了社会科学概论、世界近代革命史两门课，还开了边区经济讲座这样一门新课，受到了红军干部、国统区干部、尤其是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他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参与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两部专著。他的努力工作，使他很快又成为了延安颇有影响的一介名流。

但是，这绝非陈昌浩的本愿。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国难当头之际，应当义无反顾重返抗日前线，率部杀敌，收复国土，建功立业，重振雄威，以弥补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中的过失。作为原 4 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一名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将领，陈昌浩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和经验带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与日寇作战。他数次向毛泽东和中央上书表达阵前杀敌的想法。但这一愿望却屡屡落空。

对此，他失望至极。他把中央对他的不公，不信任，简单地归咎到毛泽东对他本人持有恶劣的看法所致。

陈昌浩产生出这样的情绪也自有他的道理。作为他这个层次的领导人，当然认为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作为庞大的 4 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南下北上之争中几次拒绝毛泽东的当面劝告，对毛显失尊重，坚定支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甚至在决定卓木碉另立中央，把毛周张博开除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态度踊跃，表现积级。

凡此种种，换成心胸再博大宽广的政治家，恐怕也不太容易既往不咎。

换位思考，也只能使他徒唤奈何，听“天”由命了。

1938 年 9 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血气方刚满腹忧愤的陈昌浩再次上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批评中央对 4 方面军的历史作用没有作出应有的估计和评价，公开表示出自己的强烈不满。

陈昌浩这么做有一点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也做好了再次挨批的思想准备。不是最好就是最坏，只要他的“意见书”能引起中央的重视，重新关注他和西路军的问题，他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预想中的若干种结果中最不愿意见到的一种：没有人理睬他，好像他的“意见书”与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许多年后，当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再一次听到磨刀之声在耳边霍霍响起，登上南巡列车频繁密召军中干城，并向他们数次三番地大讲密电事件和“吕端大事不湖涂”时，早已自我解脱的陈昌浩，依然难逃被越描越黑的命运。

5、达摩克利斯之剑

陈昌浩后半生的坎坷命运与“密电”事件紧密相连。而密电的要害之处，就在“以武力解决之”这几个字上。

一封杀气冲天的“密电”，让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毛泽东果断率领中央直属纵队与 1、3 军团 7000 多人，脱离与 4 方面军的接触，紧急北上。

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聪明人。毛泽东绝尘而去，他就占了上风头，他当然懂得如何利用广大官兵的情绪来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就不失时机地宣布成立新的中央，还借势发力，把毛、周、张、博开除出党。

毫无疑问，“密电”事件，成了两军分裂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毛泽东始终对此事坚信不疑，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耿耿于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本书里写到：“1971 年 8 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范硕的文章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强烈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不单单是范硕，张鹏在他写的《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事。

“1967 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也曾与杨成武谈及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在 1972 年 6 月的一次会议上也说到叶剑英将电报报告毛泽东，因而使中央脱险，立了大功的事。周说：‘这件事情，是毛泽东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个吕端嘛，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

而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 1982 年 6 月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文章，澄清了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的原委。1962 年 9 月 24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著作’，指叶根据 1959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写的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根本与"武力解决"密电无关。

1960 年,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德加-斯诺说:“那是 9 月 10 日,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已经把因果关系强调得非常明白了：因为张国焘要用“武力解决之”，所以“我们才走了的”。

走进巍然屹立在巴中南龛山顶的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所有参观者都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4 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倪志亮、李先念的单尊汉白玉座像，以及王宏坤、傅钟、詹才芳、李卓然、倪志亮、张琴秋、许世友、王建安、周纯全、王维舟、杨克明、魏传统、陈锡联、陈再道……，包括死在张国焘手中的曾中生、邝继勋、任炜章……，以及在长征途中跳河自尽的余天云等 2666 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早巳牺牲或新中国成立后巳相继辞世的红军副团级以上指挥员的英名纪念单碑，一律面朝北方，整齐地挺立在山顶的绿草坪上。

大军列阵，铁马金戈，旆旗一动，气吞山河如虎，恍如林立于群峰之巅的红色“兵马俑”。而在将帅们的座像和英名碑林后面，则是 6 组阶梯形墓地。一方方花岗石墓穴，排列于绿树草坪之中。红军将士的骨灰安放其间，以供后人千伙万代缅怀。在纪念碑主碑，和由 268 块晶莹透亮的花岗石组成的碑墙上，镌刻着 78666 名红军将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江泽民、乔石、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的题词、贺诗。碑墙上有省军职以上红军名录 948 人，师职红军名录 808 人，司局地厅级红军名录 1024 人，在乡红军、流落红军、西路红军名录 1089 人，川北苏区 20 多个县（市）的红军烈士名录 72591 人。

今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气氛，令每一位参观者心灵震撼，醍醐灌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而更令参观者震惊的是，面对着红军将帅方队与红军将士墓穴的，竟然是与主要将帅们同样高大精致的张国焘塑像。用汉白玉雕琢成的张国焘半身像挺立在花岗岩基座上，方脸阔腮，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头戴红星帽，和面朝着他的将帅们一样神彩奕奕——没有丝毫丑化！

陵园方面的解释是：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也为当时的川陕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塑了像。由于在北上南下之争中，只有张国焘一个人坚持南下，所以只让他一个人的脸，永远面向南方。

（巴中将帅碑林中的张国焘塑像）

但是，那样一种排列方式，似乎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是川陕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袖在检阅他刚刚打了胜仗归来的指挥员们，或者正在向他们训话。

带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色彩的举措，显然不是陵园的管理者们能够决定的。

红军统帅与可耻叛徒，这就是张国焘！

党和人民承认了大叛徒张国焘人生中也曾有过的光芒闪耀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历史——党的历史！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红军将帅碑林，竟然是巴中一个退休共产党的区委书记首先倡议，并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此君姓张名崇鱼，12 年来，他和几个老同志靠着八方奔波，四处募捐，以民间行为建起了这座气势不凡的红军碑林。陵园初具规模后，张崇鱼等决定按照在红 4 方面军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首先给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 4 人树碑。为此，张崇鱼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前往北京走访征求 10 位老将军的意见，10 位老将军的意见却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尊重历史，张国焘在红军时期对革命建有奇勋，没有张国焘，将会形成重大历史缺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无论张国焘有多大的功劳，他最终成为大叛徒，给大叛徒竖碑，想干什么？简直难以想像！

鉴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张崇鱼又回到成都，征求西路军幸存者、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仁将军的意见。陈明仁听完汇报后表态，张国焘暂时往后放一放，先上李先念，理由是，李先念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直到 2002 年，为张国焘竖碑的意见才获得有关方面通过。只不过，他的塑像与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以及镌刻有千万个红军英烈姓名的花岗石碑墙相向而立。

在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刻着湖南刘剑文先生为他撰写的一副对联：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1997 年香港回归之日，在将帅碑林的落成典礼上，来自原 1、2、4 方面军的老红军们会聚在了旭日初升霞光普照的南龛山顶。当年英姿勃发红小鬼，均成佝腰驼背白发人。战友相见，敬礼拥抱，忆起当年经历，一个个老泪纵横。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概不再提那“令人不快的敏感之事”。

半个世纪过去，连昔日战场上的对手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同一面镰刀斧头红旗下出生入死翻雪山过草地的好战友、亲弟兄，自然更应当“历尽劫波兄弟在”了。

尊重历史的真实，过去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愿望与要求。而现在，已经成为成为了一种共识、一种现实。

1982 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笔者注：廖盖隆，1938 年 8 月到延安，1944 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当时主管 4 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时任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肯定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他说，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均没有"武力解决"的密电。

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也回忆说，凡是张国焘发出或收到的电报，都要经过他，但他从来没见过"武力解决"的电报。

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

徐帅发表此论时是堪与叶帅比肩的军内元老，由他来向毛泽东钦定的、已成为党史军史常识的、1982 年叶帅又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确认无误的“史实”质疑，作为这一重大事件另一方的当事人，全国也只有叶帅是最有资格来郑重回应徐帅的质疑的。

叶帅对此信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范硕后来写到：“叶帅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 1、4 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笔者注：引自范硕《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2002 年第 2 期）。

“还是免了吧”，说明叶帅对此确有难言之隐；“照顾大局，以 1、4 方面军的团结为重”，表明 1、4 方面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对“密电事件”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虽然经历了南下北上之争，也公开喊过打倒毛、周、张、博的口号。但是，我只不过是张国焘身边的一个小兵，对“密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没有资格知晓上层内幕的。我只能站在一个 4 方面军普通战士的角度，谈谈当时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在延安批张运动中，4 方面军的不少官兵就在私下议论过“密电”的真伪问题。既然由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密电”事件无疑算得上最重要的钢鞭。让人不解的是，凯丰的大块文章和中央关于“批张”运动的决议，都对“密电事件”只字未提。甚至 1938 年张国焘叛逃投敌，中央宣布开除张的党籍时，以及在延河边上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上，仍然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出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了这样一分要他们率部南下的电报。这是争辩的双方都予以肯定了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电文里是否有“以武力解决之”？

毛泽东和叶剑英、徐向前的态度已经明白摆在那里了，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其他几位重要的当事人对这分电报的不同说法吧。

陈祖莫撰文说：“父亲自杀前曾满含冤屈地对我说：‘我有错误，我承认，但密电的事，没有！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张国焘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笔者注：引自陈祖莫所撰《回忆父亲陈昌浩》)。

宋侃夫明确表示：“肯定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

宋侃夫当时是为张国焘管电报工作的主官，每一分电报都必须由他审签后方能发出。后来他担任过西路军第 3 局局长，建国后先后出任过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的证明的真实性应当强于陈昌浩亲人的分量。

而当年随叶剑英一起到右路军中的吕黎平，则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强调：当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正在通讯室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走进了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密电的内容：“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而且他还肯定地说是他亲手把这封电报交给了叶帅。

与宋侃夫一样，吕黎平将军也绝非等闲之辈，建国后，他相继担任过空军高级航校的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正兵团职待遇)。

双方旗鼓相当，均言之凿凿，使事件真相扑溯迷离，难辩真伪。

70 年前的这样一桩连当事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重大事件，要我们的后来人当裁判，判出是非真伪，也实在是太难为他们的了。

6、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统帅，在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眼中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畏的传奇人物，从此便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同 4 方面军的官兵一样，对他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然陈昌浩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虽然陈昌浩自杀已经 30 多年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扮成老板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国焘对他不单是信任，凡是还得让他三分。而且陈昌浩很全面，文能“等因奉此”，武能阵前杀敌。作为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他对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徐向前很尊重，很支持，两人的关系也很好。徐帅的回忆录就能证明我不是信口胡说。中央为陈昌浩落实政策后，他的追悼会也是徐帅让人搀扶着主持的。

陈昌浩高大英俊，人又年轻，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又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战争时期特别容易得到下层官兵的崇拜。

陈昌浩也的确在广大红军官兵面前表现出了人所不及的神勇之举。

1934 年打黄安时，我军把赵冠英的 69 师围得水泄不通。黄安守敌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鼠宰猫做口粮的地步。围城 40 天后，我军向黄安城发起了总攻。

战斗刚刚打响，随着一阵轰鸣声，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由北向南快速移动的白点，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机身上印着“列宁号”三个红色的大字。

这是一架飞机——而且是一架属于红军自己的飞机！

这架飞机，原是国民党空军驻武汉部队的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油料耗尽，迫降于河南省罗山县陈家河村，被我赤卫队员缴获。驾驶员龙文光是四川省金堂县人，经教育后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为表达对列宁的敬意，苏维埃政府便命名这架飞机为“列宁号”。

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战，被秦基伟在他的回忆录《故乡的战斗》中如实地记载了下来。他深情写到：“在一场大雪之后的一个晴天，我们的飞机果然出动了。大家高兴得简直坐卧不宁。有人兴奋地向飞机喊着‘同志，辛苦啦，下来休息一会再下蛋吧！’有的人嘱咐似地说：‘同志，要下准啊！叫他们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有的人把帽子、手帕丢上天空；有的人竟跟着飞机跑起来。大家都站在山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飞翔天空的红军第一架飞机。过去，当我们听到飞机声音的时候，感到是那样刺耳，可是今天听着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是那样悦耳和舒心。”

红军的“列宁号”向黄安城上空飞来，阵地上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红军战士们跳出战壕，挥舞着红旗枪支向着我军的第一架飞机致意。

“列宁号”飞越我军阵地后，开始在黄安城上空盘旋。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也会有飞机，纷纷从工事里跑出来，向着飞机招手，眼巴巴地等待着空投粮食弹药补给品，谁知接到手里的却是一枚接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声的爆炸，硝烟带着泥土腾空而起，十几个敌兵当场被炸死。敌人这才如梦方醒，哭爹叫娘，一片混乱。

这位在飞机上悠闲地往下扔手榴弹的英雄不是别人，正是年方 27 岁的 4 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他担心龙文光不可靠，就带上手枪亲自上飞机监视他，同时还往敌人脑壳上扔手榴弹。

在川北苏区的时候，陈昌浩更是八面威风。进城出城，他总是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将领外黑内红的斗篷，随着座骑的颠簸随风起伏，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一大帮孔武骠悍的警卫员，全骑着高头大马，背着 20 响盒子炮。头上颗颗红星闪烁，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鼓点般的响声，引得许多人追逐观看。

陈昌浩在 4 方面军中的地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就清楚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队伍成分的复杂性，4 方面军中的军阀作风还是相当严重的。在川北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倪志亮，在鄂豫皖时就当过 11 师师长，算得是 4 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也是 4 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但此人性格暴躁，作风霸道，一般人都害怕和他接近。就是他的警卫员犯了过错，他也习惯拿枪教训。当然，并不往你身上打，他枪法极好，打身边，打脚下，子弹“噗噗”响，目的就是吓你一跳，看你今后还敢不敢犯错误。不少人写文章把倪志亮爱使的这一招扣到了貌似粗鲁的许世友头上，让许世友替他背了一辈子黑锅。牛胯不能扯到马胯里，我得把它纠正过来。

有一次，倪志亮跟前线打电话，对方说话口气有些冲，他没听出是谁的声音，就习惯性地破口大骂起来：“你狗日的，妈那个屁的……”

谁知对方“啪”地一下把电话砸了。

有人胆敢砸红军总参谋长的电话！倪志亮这下更是气得发抖，大骂不止。

不一会儿工夫，陈昌浩带着几十个卫士一阵风冲进了通江城里的文庙大门，一边“咚咚”冲上楼梯一边厉声大喝：“倪志亮倪志亮，你狗日的好大狗胆，连老子你也敢骂！”

倪志亮一看惹火了陈昌浩，吓得不轻，赶紧认错：“政治委员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知道刚才是你打的电话。”

认错也迟了，陈昌浩抡起马鞭子“噗噗”就是一顿乱抽。连倪志亮的警卫员心中也暗暗解气。

后来把隔院的张国焘惊动得赶了过来，才将陈昌浩招呼住了。

陈昌浩来到延安没多久，他的弟弟陈昌浚也像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跑到延安来投奔革命。而且还从老家带来了陈昌浩的小儿子祖涛。

10 月里，张琴秋经党中央营救从南京出狱了。他们此前的最手一次分手，还是在石窝会议上，当时陈昌浩决定与徐向前脱离部队回潜延安。而且情况危急，说走就走，当着几十号指挥员的眼睛,他只和张琴秋紧紧握了一下手，相互默默对视了一眼。为不至增加即将面临血战的指挥员们的悲痛情绪，连巳经涌到嘴边的“保重”两个字，也强咽了回去。

名义上夫妻团聚，其实他们过的几乎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单身生活。他俩的文化和职务都很高，张琴秋又多才多艺，是著名的活跃分子。但他俩的结合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战争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做的工作，就是天天写材料说明自己被马家军俘虏后的情况，以及她这个西路军组织部长兼军政委员会委员当俘虏后的表现。这样的回忆无疑对她的精神和身体都是极为残忍的折磨，使她每天都处于痛苦与愤懑的心境之中。陈昌浩自身的处境也让他倍感压抑。夫妻俩的心情都恶劣透了，即使呆在一起也是相对无言，口角纷争也时有发生。一但拌了嘴，张琴秋索性就不回家。审查结束，张琴秋没有任何问题，重新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让她担任了抗大第 8 大队（女生队）大队长，领导大队所属的 5 个中队 5000 多名女学员。没干多久又被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但任教育长，兼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夫妻俩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把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到了工作上。只有到了周末，张琴秋才到凤凰山陈昌浩那眼小窑洞去团聚一下，也还得时时事事地关心照料陈祖涛。

这段时间能让陈昌浩感到安慰的是，他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此时都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他们常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望他和张琴秋。纯粹是出于深厚的战斗感情，因为没有人相信陈昌浩还会东山再起。

## 第二十章 半路夫妻

为了避免尴尬，陈昌浩在结发妻子带着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之前，选择了前往莫斯科治病……面对难堪，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风度与品格……毛泽东在怀仁堂作内部报告，张琴秋居然在笔记本上信笔涂鸦，写下了最后让她命丧黄泉的 8 个字。

### 1、两妇一夫，亲如姐妹

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恰遇顶头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陈昌浩来说真是恶运连连。

第一桩，1938 年 4 月 4 日，张国焘借与国民政府代表蒋鼎文黄陵公祭为由，逃离延安，叛党投敌。消息传回延安，人神共愤，宝塔山下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声讨会，陈昌浩也在大会上发了言。而这样的抛头露面，无疑是让他倍感羞辱的事。

第二桩，由于精神和工作双重压力过重，1939 年春，陈昌浩的老毛病胃溃疡又犯了，痛得他直不起腰，睡不好觉。每次解大便也是件痛苦不堪的事。这场病，拖了他半年也未能痊愈。

进入 7 月，陈昌浩又遇上了一桩让他挠头窝心的事。

张闻天通知他，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来电，说他的结发妻子刘秀贞带着儿子陈祖泽要来延安找他，现在母子俩已经到了重庆，问他怎么办？

人都已经到了重庆，还能怎么办？陈昌浩只好给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 3 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忙照料老婆儿子在渝期间的生活，并把母子俩送到延安来。

负责落实安排的是钱之光。半月后，刘秀贞与陈祖泽坐上了一辆由重庆开往延安的救护车。车过西安时，当时担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伍云甫（伍绍祖之父），是原 1 方面军中的老情报，也是个为人处事朴质端方的老同志。他曾在江西担任过中央苏区无线电总队政委，长征时任中革军委 3 局政委，经历过延安批张运动。他一听说刘秀贞是陈昌浩的原配夫人，带着孩子到延安去寻夫。如今张国焘叛变投敌，他对张国焘的追随者陈昌浩看法也不可能好，这下更觉得陈昌浩不但政治上犯了错误，生活作风也有问题。看看眼前这母子，不正像旧戏里演的秦香莲拖娃带崽地跑到京城找陈世美么！便对刘秀贞说，陈昌浩又和一人叫张琴秋的女人结了婚。张琴秋现在就在延安，和陈昌浩住在一个窑洞里。你要去就住下来等，几时有车我派人通知你。要是你觉得去了没啥意思，可以从西安直接坐火车回武昌。

听到这个清息，刘秀贞心中难受万分。她虽然在汉口与陈昌浩见面时就有了预感。但旧式的封建礼教与她天生的宽容善良，觉得男人独自在外闯荡，身边有个女人也是免不了的事情，但没想自家男人居然会背着自己在延安和另外的女人结了婚成了家！

痛苦不堪的刘秀贞呆在办事处旁边的小旅馆里想了几天几夜，终于去对伍云甫说，不管陈昌浩结婚没结婚，我是他名媒正娶的妻子，一定要去延安见他一面，把他的亲儿子交到他手里。

陈昌浩也时刻关心着刘秀贞的行程，得知她的态度，更是焦急万分，胃溃疡也愈发严重了。

没想到，这时候延安发生了一件大事，让他逮着个理由，避免了与刘秀贞见面的难堪。

1939 年 7 月 10 日。因为头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暴雨，雨后的太阳比往日更为毒烈，延安地区，闷热难挡。

下午 1 点左右，一支小小的马队出了延安城门，向着延河缓缓而去。骑在马上的，是周恩来，江青，蒋泽民和王来音。

他们正在前往中央党校的路上。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 3 个年头，虽然大敌当前，可国共两军仍然不断发生摩擦，甚

至酿成血案，抗日征途，风雨如晦。面对当前迷惘的局势，党校高级班的学员提出请毛主席去给他们作报告，指点迷津。不料这天毛主席正逢上要接待外国友人去不了，便请刚从大后方回来的周恩来代他去讲。

临时被安排侍卫周恩来的王来音本是毛主席警卫班的战士，这次周副主席回延安，身边只带了刘久洲一个卫士，这时又放了他的假，没有与周恩来住在一起。

毛主席见周副主席生活没人照料，便对王来音说："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开会没人照料，现在我派你去照料他的生活，一定要给我照料好。等周副主席回重庆后你再回我这里来。"

这样，王来音就成了周恩来的临时卫士。

这天午饭后，毛泽东叫警卫参谋蒋泽民通知汽车司机送周副主席去党校。司机说延河正在发大水过不去。中央党校在延河对岸，从杨家岭去中央党校必须通过延河。那时河上没有桥，车辆行人都是涉水而过。毛泽东听说河里涨水，就马上叫王来音先去探探水势，看汽车能不能开过去。王来音赶到河边一看，混浊的山洪滚滚而下，河中央平时裸露在水面上的几块大石头，都已不见了影。赶紧回去报告，汽车过不去，骑马可以涉过。毛主席就叫来王来音把他的大青马牵给周副主席骑。这匹大青马还是余洪远送给他的，跟着他走完了长征路，稳当可靠，爬山涉水又是老资格，有经验。

毛泽东格外仔细，临时又派蒋泽民随行。

马队里还有毛泽东新娶的"爱人"江青。这时她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听说周恩来要去党校高级班做报告，也要去听。毛泽东说："你有什么资格去听？不要一来就坏了我们的规矩。"（笔者注：中央党校高级班是由师级以上的干部组成的，江青级别不够）。

江青撅着小嘴撒了会儿娇，再加上周恩来在一旁替她说话，毛泽东就没法再坚持己见了。

江青骑的是警卫员的马。

王来音牵着周副主席的马缰，涉过齐腰深的洪水，平安地到了对岸。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子的时候，江青忽然心血来潮，打马急奔，向着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马是长期在一起喂熟了的，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农户窜出一条狗。这从未见过世面的狗，一见江青的马，便吠叫着扑过去。江青见状惊慌失措，拨马就逃。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哪里容得下两匹马？她的马一下撞在周副主席的大青马上，周副主席连人带马一晃，一头从马背上滚落到地上，摔了个臂折肉伤！

周副主席受伤，自然应向毛主席报告。虽有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夹在中间，王、蒋二人还是按原则办事，由王来音飞马回杨家岭如实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听后很着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把抓起电话找到八路军卫生部长王斌，告诉他周副主席坠马负伤，叫他带上最好的医生火速赶到中央党校。放下电话后，毛泽东一面叫上秘书叶子龙随他一同赶去党校看望料理。

毛泽东一赶到中央党校，就对江青大发雷霆："你出什么风头！你知道么，伤了周副主席，会耽误我们多少大事？"

江青也吓坏了，不停地认错抹眼泪。

王斌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后来知道周总理残废了，我真是后悔呀！那时我们自己没有一位专家，拐峁医院（笔者注：峁拐村，当时八路军总医院所在地）连一架好一点的 X 光仪器也没有。到 8 月中旬，才知道总理的右臂已经形成固定的向肩部方向弯曲而不能伸展了，也不能用来工作和生活了。这时 X 光片显示是：右肘右肱骨下端成丫形骨冠状顶在鹰嘴窝内发生粉碎性骨折，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我们的医治失败了。"

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不敢再耽搁，马上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

陈昌浩得知有专机送周恩来去莫斯科治伤，便马上向中央写了一个申请，要求自己也随机前往莫斯科治病。

这一次，他对请求得到了批准。

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 8 月 27 日。头一天夜里。陈昌浩对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坐不下，你就随后坐汽车、火车来。"

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莫斯科，高兴得祖涛一夜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早，陈昌浩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祖涛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记得毛泽东当时还东翻西翻地找出几块银元，当作礼物送给他。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是一架美制道格拉斯飞机，有 24 个座位，是蒋介石亲自为周恩来安排的。

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张琴秋到机场为陈昌浩父子俩送行。夫妻要暂时分手了，都有些依依不舍。

专机起飞之前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小插曲。

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也来送行。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养父一起去苏联吧。"

没想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马上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事我说了不算，得由毛主席批准。"

孙维世大叫一声："那我就去找毛主席！"马上跳上一匹马，向着杨家岭飞奔而去。

没过一会儿，她又飞马赶回来了，兴奋地大叫着："毛主席同意我去啦！"

再一个就是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当时飞机对延安人来说是个稀罕物件，所以飞机降落后大家都爬上去一饱眼福。当国民党的驾乘人员通知飞机马上要起飞了，不走的请下去时，被保姆带上飞机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双手抱住座椅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

小达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他想去，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卷起满天灰尘，载着周恩来夫妇和孙维世、奉召归国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陈昌浩父子，还有高毅、陈小达两个小孩飞上蓝天，消逝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飞机飞抵新疆首府迪化后，停留了好几天。陈昌浩陪同周恩来、邓颖超专门去看望了血战突围后被陈云从星星峡救出的数百名原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已经在这里学习整训了很长一段时间。

陈昌浩低着脑袋，向自己的老部下们作了沉痛的检讨："同志们，我是个犯了严重历史错误，对革命事业有罪的人。我犯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我们的党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付出了重大牺牲，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啊，现在只剩下你们这几百个人，我心里真是痛苦到了极点！我对不起同志们，对不起党。"

说到伤心处，陈昌浩热泪滚滚，泣不成声。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官兵看到自己过去的统帅悲痛欲绝，也都捶胸顿足，大放悲声。

几天后，陈昌浩一行经阿拉木图等地飞往莫斯科，从此开始了他为期 12 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陈昌浩这一厢刚离开延安，刘秀贞带着陈祖泽，千里迢迢赶到宝塔山下寻夫来了。

与丈夫失之交臂，刘秀贞倍感失落。在延安又举目无亲。无奈之下，她只好决定去找同是陈昌浩妻子的张琴秋，试试运气。

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刘秀贞及其孩子的问题上，张琴秋的做法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面对这种难堪的情况，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风度与品格。她热情地接待了刘秀贞，对母子俩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还将陈昌浩临行前给刘秀贞的一封信读给她听，大意是对刘秀贞说：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希望你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准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

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刘秀贞很快就办理了入伍手续，先在延安干部子女保育院工作，后又安排在保育小学工作。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文化与政治，进步很快，于 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琴秋与刘秀贞坦诚相见，亲如姐妹。延安的工作是紧张的，生活也是艰

苦的。她们白天忙完各自的工作后，晚上则住在一眼窑洞里，点起油灯，自己动手捻毛线，常常是边捻边谈，直到夜深。张琴秋常常主动地向刘秀贞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刘秀贞听了是又感动又钦佩。

但二妇同属一夫，无论如何是不能被革命风气弥漫的延安社会所允许的。对此，陈昌浩赴苏之前已经向张琴秋做了交待。

一天，张琴秋突然对刘秀贞说："你和昌浩是结发夫妻，感情也很好，又有两个孩子，过去是革命与战争使你们分离了；现在我应该退出来，让你们团圆。"她讲得诚恳而又真挚。

刘秀贞连忙答道："那不行！我没有文化，又没有做工作的本领，完全不能帮助昌浩工作；你和我不同，你有文化和工作经验，你过去帮助过他工作，今后还可能帮助他。你们的结合才是般配的，退出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琴秋姐呀，你若再这样说，那就是赶我快点走。"刘秀贞也说得十分坦诚。

这时，张琴秋才把陈昌浩临走时留下的话转告了刘秀贞。意思是：自己要去苏联治病，不能见刘秀贞了。刘秀贞含辛茹苦帮我把两个孩子抚养大，自己永远感激她。现在事情已经成了这个局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对自己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对谁都不忍心伤害，可又实在没有办法处理，只有请组织上帮助解决吧。

刘秀贞文化不高,却能识大体，虽然对陈昌浩的态度非常伤心，还是强忍悲痛对张琴秋说："昌浩遇到了困难，我要帮助他，也只有我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你和昌浩一起打了这么些年的仗，感情很深，还是我退出吧。"

不久，在组织的帮助下，刘秀贞正式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那时候结婚离婚并不需要办什么法律意义上的手续，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就算合法了。就这样，一场历史遗留下来的婚姻难题，在张琴秋、刘秀贞这两个女人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中，妥善地解决了。

张琴秋对刘秀贞怀有一种歉疚之情，所以对她依然很关心，后来，张琴秋为刘秀贞介绍了原 4 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益，见过面后，彼此都觉得不错，没过多久刘秀贞就和周益结了婚，重新建立了新家庭。周益怀着对老首长陈昌浩的崇敬与热爱的朴素感情，与刘秀贞一起,默默地担负起抚养陈昌浩后代子孙的责任。

2、张琴秋组织了新家庭

1941 年，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起了突然进攻，陈昌浩一家随同大批被紧急疏散的人员来到了中亚共和国一个叫做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中的一名重量级人物。他被安排到一家采石场，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苦力。身在异国，陈昌浩的心依然留在了国内抗日战场上。他不停地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谁也没有给过他只言片语的回音。

1942 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穿上苏联

红军军装，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 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 3 人找回莫斯科，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立即向苏共中央正式递交申请，要求回国，苏共中央回复说，他回国，必须有中共中央的调令。陈昌浩只得留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这一期间，他和莫斯科姑娘格兰娜组成的家庭中又增加了最小的儿子祖莫。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仿佛当年的革命战友们早已将他遗忘。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前去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强烈愿望。蔡畅回国后，他望穿双眼，结果依然如故。

（陈昌浩送儿子祖涛由苏归国前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昌浩欣喜若狂。陈祖涛回忆说："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我陪父亲在高尔基大街上买东西，他高兴啊，那一天特意穿上了西装，打上领带，戴着礼帽。还对我说，'哎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次我总算可以回去了！'"

他托每一位来莫斯科的老战友给中央带话，希望能尽快回国工作，可是，他的每一次要求，总是渺无音讯。

陈昌浩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1948 年，苏联方面又请他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旧版是 10 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后，陈昌浩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这部辞典后来成为在新中国的俄文学习者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部辞典中的经典。

陈祖涛回忆说："1951 年初，我父亲主编的《俄华辞典》终于完成出版了。父亲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大使等中央领导人签上名，送给他们做纪念。厚厚的一大摞啊，全是我一个人扛到大使馆去的。"

俗话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

这一次，北京城里的中南海终于有了回应。

"祖涛，你父亲回国的事，毛主席总算点头了。"1952 年 4 月里的某一天，陈祖涛突然接到莫斯科同班同学、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的电话。

"确实吗？"陈祖涛不敢相信。

"我爸爸告诉我的，还会有错？"

陈祖涛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

不久，离开祖国 13 年之久的陈昌浩终于携格兰娜和祖莫踏上了归国的列车。由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到达前门火车站时，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让他倍感温暖，对他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来自党中央的信任更宝贵的了。

当年的老搭档徐向前当时担任着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要职。为欢迎昔日老战友陈昌浩的归来，为人处事从来低调的徐向前破例在自己的寓所大摆家宴，邀请了王树声、倪志亮、周纯全、李先念、王宏坤、傅钟、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秦基伟、张震、刘华清、黄火青、张琴秋等几十名在京工作的原 4 方面军的老同志前来欢迎他们分别已经多年的“老首长”。

因为前面有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去前门火车站迎接陈昌浩归来垫着底儿，所以大家也就不存在什么顾虑。再说，建国初期，万象更新，党内军内的政治风气很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后来那样复杂紧张。

席间，红星闪耀,觥筹交错。这一大批共和国的将军政要，其中还有好些位后来成为党和国家、军队领导者的军人们，争相上前与陈昌浩敬酒，欢迎他的归来。

陈昌浩频频举杯，笑答酬酢。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同时也是让陈昌浩强作欢颜，而倍感难堪的一刻。

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 4 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短短六七年时光，是他人生最耀眼的巅峰阶段。这巅峰上下洇染着烟火和血色，也给他镌刻下了终生难以洗雪的“罪痕”。二次南下和“密电事件”犹如两道沉重的枷锁，早就牢牢地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在徐向前寓所宽敞的大客厅里，落魄的陈昌浩也处处显露出落魄之相，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手下的军长、师长，如今共和国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将军政要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

当他的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出现在大门前时，他更是既尴尬，又愧疚，赶紧主动迎上前去握住张琴秋的手，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张琴秋却大度地说：“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它了。我真要记在心里，今天就不会来参加这个宴会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也是你过去的老部下，我们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

陈昌浩一声惊叫：“啊，苏院长！”

苏院长就是河南潢川人氏苏井观，他是天津海军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红军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在通江时期，就担任王坪红军总医院院长。建国后参予了卫生部的创建工作，此时是卫生部副部长。张琴秋与苏井观应当说早就有了缘分，只不过往后推迟了五六个年头。陈昌浩随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病。一晃两三年过去了。张琴秋一直等待着陈昌浩养好身体早日归

来，可是忽然传来消息，陈昌浩竟然与一个莫斯科姑娘同居了！当张琴秋确认这一消息千真万确后，她果断地向中央写出报告，请求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

张琴秋与陈昌浩离婚后不久，一直暗恋着张琴秋的苏井观，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苏井观此时在陕甘宁边区晋绥 5 省联防军卫生部工作，他比张琴秋小 1 岁。张琴秋在 4 方面军总医院任政治委员时，苏井观担任总医院院长。这位知识分子也像张琴秋一样多才多艺，不仅医术高明，唱歌演戏打蓝球，样样在行，其性格与张琴秋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沈泽民牺牲的消息传来后，苏井观由对张琴秋的同情很快变成了爱慕。但在面对与自己上级的爱情的时候，平时活泼开郎的苏井观却缺乏主动进攻的勇气，一直不敢主动向张琴秋表白，最后眼睁睁看着“花落旁家”。而这一次，爱情的火花在他心中重新燃起，两人知根知底，原本就有感情基础，很快就相爱了。

1943 年春，张琴秋与苏井观幸福地结合了。婚礼在柳树店五省晋绥联军卫生部苏井观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 4 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从延安特意赶去向他们表示祝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 4 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这时苏井观已经 38 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 1 岁，都已不再年轻。与张琴秋、苏井观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因在重庆而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 年 7 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他们表示庆贺。

陈昌浩梦寐以求想回国效力，而最初国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表现出来的中兴之气也的确让他无比振奋。可是，几年之后，事情渐渐地变得令他担忧起来。毛泽东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地位权威已经坚如磐石，对当初追随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部下也开始不放心起来。随着“高饶反党集团”、“萧克、李达、郭天民反党宗派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清洗，再加上军内对刘伯承的批判，以及铺天盖地的“反右”、“反右倾”运动，使身戴罪枷的陈昌浩感到不寒而栗，昔日的老虎自觉地变成了绵羊，过去的锐气荡然无存，他深居简出，谨言慎行。并且在一些无法回避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公开地、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行”。

### 3、欲行不敢，欲罢不忍

1962 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靠着“三自一包”这一剂灵丹妙药，很快使嗷嗷待哺的中国老百姓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

大地回春之际，陈昌浩负责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发行了，组织上给了他一次较长的休假。不少老同志都劝他回湖北老家看看，还说：“共产党员也是人嘛，总不能断了故乡故土的根！”

陈昌浩从1927年离别故居，至今已35个年头不曾回过老家湖北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了。1937 年他从河西走廊死里逃生后，曾千里辗转到了鄂豫皖根据地英山县，因为国难当头，来去都很紧迫，也仅是通知母亲和刘秀贞把祖涛带到汉口旅馆里匆匆见了一面，根本就顾不上回乡探望。

就在这次休假期间的某一天清晨，陈昌浩出了他在王府井附近的住所红霞公寓，沿街长跑锻炼时，忽然拐进了景山公园。他知道家住景山后街的张闻天，每天清晨都在景山公园锻炼身体。陈昌浩对于是否回老家探亲，很想听听久经历炼，比自己更加老成持重的张闻天的意见。

时过境迁之后，这一对当初为了不同的政治识见而挺身于风口浪尖，曾经搞得来剑拔弩张的大人物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早已在历史的长河里烟消云散。由于编译工作方面的关系，两人之间过从甚密，近些年为了理论上的探讨，几乎时常见面，恳切交谈。

张闻天如此温良谦恭，谨言慎行，却仍然在庐山会议上闯下了一场塌天之祸，被解除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邃智的脑袋上被扣上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顶黑帽儿。其夫人刘英和儿子虹生亦受到株连，政治生涯已走到尽头。可身遭厄运的张闻天却不肯赋闲在家尸位素餐，被罢官后，几经写信申请，才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工作，在孙冶方手下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特约研究员”。连续 3 年大饥荒过后，1962 年早春日转清明的政治气候，使他这个“特约研究员”又豁然开朗了许多，钻研政治经济学的劲头较之以往更足了。

张闻天听陈昌浩说明来意，想也未想便说：“好啊，昌浩同志，有张有弛，文武之道嘛。辛苦了这么些日子，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陈昌浩说：“不少同志都劝我回湖北去一趟，我正犹豫不决呢。”

张闻天不禁摇了下头，抽抽眼镜说：“你当年的那股子刚劲怎么一点也没有了？怎么回国后短短几年工夫就把脾气改了？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陈昌浩吗？”

陈昌浩自嘲地笑笑，说：“人总是可以改变的嘛!”随后才说，离开老家 30 几年了，他当然想回去看看。可是，武汉地区有不少 4 方面军老同志，他这脸上烫了金印的人，很不好意思去见他们；即使回到湖北，人家不好办，他也难为情；再说，那些昔日的老部下假若真地张罗起来，他受人厚爱，今后也无法回报……总而言之，思想上顾虑重重，感到欲行不敢，欲罢又不忍。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张闻天挥挥手，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可顾虑、可犹豫的？犯了错误，你不仍然在努力地为党工作吗？你陈昌浩还是陈昌浩嘛？就像我张闻天，不当官了，还是张闻天嘛！把你过去的刚劲拿出来，趁这大好春光，赶快回老家走一趟！”

陈昌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昔日的战友与对手，心中汩汩涌腾起一股暖流。

陈昌浩知道，张闻天这几年所遭受的痛苦折磨，比起自己在延安受冷落时的境况更加凄惨，可他却丝毫没有消极遁世的念头，仍然是一副拿得起放得下的坦荡胸怀。

陈昌浩不无感慨地说：“闻天兄，你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在张闻天的鼓励之下，这年 5 月，陈昌浩终于圆了回乡探亲之梦。

令陈昌浩既担心又感动的事情果真发生了。在武汉军区和武汉市委工作的陈再道、宋侃夫等老部下听说他要回武汉，唏哩哗啦邀来了一大帮原 4 方面军的老战士聚在一起，欢迎他们昔日首长的归来。

席间，不少人谈到往事，尤其是西路军的遭遇和延安批张运动，虽然语多节制，但一个个声音哽咽，热泪盈眶。

陈昌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既害怕这样的情况会给前来欢迎的老部下们带来麻烦，又深为老部下们表露出来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最后，他站起来，痛心疾首地对大家说道："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 10 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这些年每当我想到这些血洒荒丘的英灵，犹如万箭穿心……我过去对不起毛泽东，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大错。西路军时打了败仗，我作为主要领导难辞其咎。但党中央毛泽东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提高。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很不错的了。同志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在面对着济济一堂的老部下们讲话的过程中，他曾三次深深鞠躬，以表疚愧之情。

当事人言之恳切，耳闻者无不为之动容。而一些含冤负屈、牢骚满腹的老战士，同样被感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在汉期间，宋侃夫特意派车把陈昌浩的结发夫人刘秀贞接到翠柳宾馆，让这一对离散多年的夫妻见了一面。

过去的夫妻，如今成了革命同志，让陈昌浩好生感叹。面对刘秀贞，他满怀内疚而又不无感激地说："秀贞，我这次能在武汉和你相会，多亏了张闻天同志，还有宋侃夫……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很高兴了。"

## 4、昔日夫妻，殊途同归

"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编译著述工作的陈昌浩被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强加上"张国焘忠实走狗"的罪名，无休止地揪斗，侮辱和毒打每日不断。陈昌浩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徐向前、贺龙、陈毅被戴高帽游街示众的情景，风闻李立三"畏罪自杀"、张霖之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了婚，但仍然被关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 8 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大叛徒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陈昌浩的老婆"。格兰娜生的儿子祖莫也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祖泽、

祖涛一样被逼得四处逃命。

（晚年陈昌浩）

陈昌浩深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1967 年 7 月 30 深夜，万念俱灰的陈昌浩在红霞公寓里吞下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深感痛苦和困惑不解的世界。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陈昌浩的墓穴里，还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陈昌浩是 1906 年生人，他在人世间刚走完一个甲子。

陈昌浩含冤而去，他过去的妻子张琴秋也恶运当头了。仅仅在了陈昌浩自杀九个月后，张琴秋也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半生戎马征战的张琴秋与苏井观结婚后，总算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她在成为马家军俘虏之前在冰天雪里生孩子的经历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但身边有 4 个女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除张琴秋与沈泽民的女儿张玛娅外，还有张琴秋妹妹张兰（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女儿张克宁，苏井观哥哥的两个女儿苏玉雪、苏桂芳。张琴秋与苏井观恩恩爱爱，一家 6 口人，其乐融融。但好景不长，1964 年 5 月 26 日，与他相搀相伴了 20 来年的老伴患癌症撒手而去了。

两年后，刚刚从丧夫之痛中解脱出来的张琴秋，又遭受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她这位副部长致祸的由头，却与所有罹难者不同。她是因为一件多年前的小事，待到“文革”风暴刮来时被小人告了“御状”，而招致大祸临头的。

小事太小，不过是 8 个中国字。

小事又太大，张琴秋是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写下这 8 个字的。

一件小事能给共和国的副部长招来灭顶之灾，是因为毛泽东在台上为他们作内部报告，她居然在台下信笔涂鸦。

时间是建国初期的某一天。台上的毛泽东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讲得来兴致勃勃，台下的省军级官员们一个个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当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顺手把这 8 个字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上。太随意了，那扉面上恰好印着小小一帧毛主席的彩色画像。一辈子大大咧咧的张琴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更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一位同志脸上掠过的微妙神情。

几年时间过去了，她已经把这件小事彻底忘掉了。可是“文革”一来，小事变成了滔天大罪！那位记忆超群的同志居然告了她的御状。这还了得！8 个字被定性为“恶攻罪”。为对付张琴秋，中央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参加专案组的成员全都来自公检法和军队，规格远比

对付陈昌浩的“红卫兵”、“造反派”高，斗争火力也更猛烈。纺织工业部大楼里的几间屋子被辟出来成了关押、审讯张琴秋的“禁区”。专案组整天围着她下工夫。既有“现行”，又有“历史”，张琴秋很快被定为“罪大恶极的反党分子”。接下来就是暴风雨般的批斗。日以继夜的审问。车轮大战，拳脚交加，弄得原本就有伤有病的张琴秋生不如死。张琴秋这才知道，这些理应是她的同志的人收拾起自己的同志来手段决不比当年大西北的马家军差。可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张琴秋无论他们怎样折磨摧残，她交待的主要问题始终围绕着三点。第一、8个字的动机无法形容，说不清楚；第二、当年被马家军俘虏后保持了大节，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第三、王明是叛党分子，自己早巳和他划清了界限，决不会包庇。

张琴秋还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但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分汇报交上去，她便含冤离开了人间。

关押期间，她曾给陈祖涛（笔者注：陈祖涛是中国著名汽车工业专家，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今犹健在）带过口信：“我是绝不会自杀的。”在清理“畏罪自杀的反党分子”遗物时，人们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份很像绝命书的“思想汇报”。张琴秋写道：“18 日晚专案组找我开会，批判我的态度不老实。……8 个大字问题，我所以要求鉴定和自己查毛泽东讲话的来源，不是嫁祸于人，而是因为自己实在挖不出头脑里反毛泽东的思想动机。我明知道党的政策，……但我思想上没有，怎么办呢？8 个字写在毛泽东像片上头完全是偶然的，无意的。……可是，交不出思想，谁也不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当天晚上开会回来久久不能平静，所以第二天又请示了——同志。他的回答很干脆，8 个字想不起动机，谁也不会相信。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

但是，在严密的看管下，她没有机会朝“剩下的一条路”上迈步。

1968 年 4 月 22 日深夜，纺织部办公大楼万籁俱寂，阴风惨惨。张琴秋无意中发现看守一时大意忘记了锁门。她喜出望外，终于抓着机会了！她忍住伤口的疼痛赶紧翻身下床，悄悄打开房门，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去……。

第二天清晨，专案人员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不见人影，吓得鸡飞狗跳，赶紧四处寻找。最后在大楼西墙根的水泥地上，发现了张琴秋。这位“盘子脸、大眼睛，短头发。身穿灰布军装，头戴红五星帽，打绑腿，扎大皮带，挂在腰杆上的手枪把上拴着两朵红通通的绒线花，惹眼得很”的昔日女将军，此时遍体鳞伤，身上和白发苍苍的脑袋上血迹斑斑，身体冰凉，早已经离开了这个曾经让她无比热受，并为之贡献出了毕生精力的世界。

张琴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决不能让她一死了之。

“张琴秋恶毒攻击毛主席，她生的女儿，也绝对不会是好人！”这是某个地位巳经高到了“德高望重”地位的领导人作出的指示。有这样的指示，专案组也就把炮口对准了领导明确指出的新对像。

在张琴秋自杀的第二天，女儿女婿就被分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在非法关押期间，与李纳、朱敏、刘爱琴等一起在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此后又一同回国的红色后代张玛娅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双耳失聪，惨景难以用语言形容。

关押审查两年后，好容易株连结束，张玛娅开始有了点自由，可没想到，又一场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把她逼上了绝路。

1976 年清明节后，在一次讨论会上，曾经亲自目睹和参予了“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感人场面的张玛娅不顾当时的政治气候，公然为被镇压的群众鸣不平。认为广大群众自发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没有什么不对，当局不应该用严厉手段进行镇压。

会议主持人正要查找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敌情上报，马上压抑下内心的兴奋，装聋作哑地向张玛娅发问。请她再仔细讲一遍。张玛娅又将自己的看法重复了一遍。于是，对她的政治迫害便接踵而来。同年，就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不堪折磨的张玛娅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间。

与母亲一样，她也留下了一份绝命书。

“……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也无法用虚伪的检查去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家人的安全。党性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交易。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一、我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我对他是坚定不移的。二、我到底怀疑谁？不相信谁？反对谁呢？这就是江（青）、张（春桥）两个人，我反对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搞私活、搞极左。他们两个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勾结起来整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材料。就是他们两个反对周总理，就是他们两个阴谋策划了《大参考》和《文汇报》的反总理事件……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勇气活着说出自己的这些观点。因为在同志们面前第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现，这是最难受不过的了。活着没有勇气讲，死了起码应该有这个勇气讲吧！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好。我知道我死后会名声扫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党组织能够恢复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誉。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能够加以保护。”

一个月后，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一个黑暗的时代划上了句号，一个伟大民族的悲剧总算是结束了！

新时代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扬眉吐气的全中国人民，同样也沐浴着冤死于九泉之下的无数亡灵。

在陈昌浩自杀身亡 13 年后，他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 年 8 月 21 日，党中央在八宝山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而他的老搭档徐向前对他的评价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

1979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八宝山为张琴秋举行了追悼大会。悼词称：“张琴秋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忘我工作。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人与人之间恢复了正常的感情，历史也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倘若陈昌浩和张琴秋这对昔日的革命夫妻九泉之下有知，也当瞑目了。

## 第二十一章 张国焘逃离延安

所以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即使张国焘在此之前已有了叛逃之意，也是王明的这次谈话促使他提前采取了行动……在京西宾馆，张国焘给我三条路，我选择了回延安，没想却被关进了保卫局监狱。

### 1、飞机秘密降落延安

大约在 10 月，张主席终于决定离开万花山中的古庙，搬到城内边区政府去居住。

促使他搬家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海威到延安来了。杨子烈在上海的助产学校学习过，到延安后，被安排到边区医院搞助产工作。海威那时已经十来岁了，在城里专为高级干部子弟办的保育小学读书。再住在山上就太不方便。

稍前一些时候，中央已对边区政府改组，由张国焘任主席，潘自力任秘书长（不久改由伍修权接任），马明方（建国后任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建国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后因妻子李健彤写了一部“反党小说”《刘志丹》而遭难）任建设厅长，周扬任教育厅长。

有不少写张国焘的史料上都认为他叛逃时是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有的写成副主席，这是不确的，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主席。

那个时候，边区政府已经安排了两眼宽敞的窑洞给张主席住，有洁癖的杨子烈嫌窑洞里空气不流通，不卫生，坚持要住平房。后来由刘景范派人专门给他修了几间平房，还砌了一道围墙把张主席一家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隔离开来。

杨子烈也是 1921 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她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 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 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章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

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 I938 年 6 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就在搬家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的小事。中央政治保卫局来了个通知，要张主席的警卫排全部到中央警卫团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张主席的警卫员由保卫局派来的一个叫李仁国的战士担任。

本来，张主席到延安后，他从川北带来的这个警卫排就隶属中央警卫团领导，警卫团长又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员都是由保卫局派出的。而张主席却一直抵制这件事，坚持把警卫排留在身边，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大群，确实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张主席看到这个通知后拍案大怒，气得不行。

最终，所有的卫士都走了，而我却仍然留了下来。为啥？这是因为张主席找我谈了话。他说他现在是虎落平阳，忍辱负重，卫士们跟着他，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他舍不得我，因为在所有的卫士中，他对我的感情最深。为了这事，他还飞马跑到凤凰山去找周兴理论了一番，说我每天都要给按摩，已经这么多年了，他离不开我。最终逼着周兴点头同意将我留下。

张主席去找周兴之前，先把我叫去谈了话，他让我先看了通知，然后说："小何，如果你也愿意离开，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跟他们一路走。我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你再跟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过去跟了我 6 年，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确也有许多想法。可是，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人，一辈子崇尚的就是个义气，莫看当兵多年，政治觉悟并不高，一脑壳"士为知己者死"、"主荣仆贵"的旧残余。从私人感情讲，我跟了首长 6 年，与首长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是理所当然之事，首长眼下暂时落了难，便撇下他不管，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泽东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志"，而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提到张国焘，谁都知道他是个共产党的大叛徒。

而且那时候党的高层领袖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思想认识上产生分歧的时候，他们可以争得来面红耳赤，甚至相互拍桌子，可事情过去后，绝对不是乌眼鸡似的，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一个个都显得非常的宽宏大量。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话有道理。那时，毛泽东的威望已经很高了。但威望再高延安的同志们仍旧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把他当成一尊不可冒犯的神。一个周末，鲁艺文工团到边区政府举行文艺晚会，大家像过节一样的高兴。晚上，毛泽东也来了，他个子高大，又和个子同样高大的张主席并排坐在前面专门为他俩安的椅子上。而机关同志和附近学校来的学员全都是坐地上，矮趴趴的一大坝。后面的学员看不见，急坏了，有的在低声嘀咕。不一会儿，就有几个学员商量好后一齐喊："毛主席，张主席，请你

们坐矮一点，后面的人看不见。”要是在建国后，这还不成重大的政治案件了！可你猜那时候的毛泽东咋个办？他听见了，马上站起来，笑嘀嘀地向后面的人招招手，示意对不起，然后把座椅交旁边的同志传出去，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张主席见毛主席坐地上，他也坐下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人认为喊话的人大逆不道，喊话的人也丝毫没有背啥思想包袱，事后也没有听说要追查是谁喊的。但建国以后，毛主席就不太容易听取与他不同的意见了。

已经当上主席夫人的江青给下面同志的印像就不太好。这绝对不是因为她后来成了“四人帮”，被关进了监狱我才这么说。那个年代在延安生活的人，不知道江青的人很少。毛泽东经常去鲁艺，有时给师生作报告，有时去看戏、参加文艺晚会。江青很活跃，人又长得漂亮，她还特别会打扮，当时男女学员穿的都是一样的宽衣大裤，女人穿上就没了女人样，可偏偏江清就不，宽衣大裤经她改一下，就变得十分的合体，大姑娘的身段也就显露出来了。她过去在上海拍过不少电影，还是个明星，各方面在女学员中都显得相当出色。也就成了延安青年人中经常议论的人物，都知道她是怎么样进入毛泽东的生活的。毛泽东每次去鲁艺作报告，江青总是端着小马扎坐第一排，全神贯注地盯着毛泽东听，认真作笔记。毛泽东讲完后，她总喜欢主动上前向虚心请教。这样，他们就认识了，而且很快江青便成了第三者，使贺子珍遭到终生的不幸。当时对她有看法、敢于在背后议论她的青年人就不少。我在边区政府，后来到抗大当教员，就听到不少这样的意见。江青主要的缺点是太爱出风头，演戏她是绝对的 A 角。当然，她的确也演得不错，追求她的人也不少。她当上主席夫人后，经常穿一双油黑锃亮的长马靴，在延安城里策马飞奔，好几个勾子上挎着短枪的卫士扯伸脚杆跟在马屁股后头追，一副“巾帼不让须眉”、“飒爽英姿”的模样（笔者注：据师哲回忆，为了满足江青要穿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看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 169。）

很快就到了冬季，陕北的冬天比川康高原的冬天还要冷。延河结冰了，满山遍野垫起了厚厚的雪被。

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周副主席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他来看望张主席时，还叫警卫员扛了一箱牛肉罐头，送了一件厚厚的黄呢军用大衣来，说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

周恩来告诉张主席，他过两天要赶到武汉去，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重庆的途中暂时驻节汉口，武汉一时已成临时首都。

张主席拜托周恩来，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救出来。他说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苦闷得很，身边也没个人照料，张琴秋如果能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

周恩来答应了，后来果然也把这事办成了。

他们正说着话，突然空中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以为是日机轰炸，一个箭步蹿了出去，周恩来的警卫员也跟了出来，抬头看，一架飞机在延安城上空盘旋。

我有些疑惑，说：“怎么搞的？没拉警报呀。”

“不是日本人的飞机。”周恩来也出来了，他对张主席说，“你看它越飞越低地在那里绕圈子，是在寻找机场降落。”

张主席问：“是谁来了？”

周恩来盯着飞机若有所思地说：“不知道呀，我刚从毛泽东那里出来，他也没有告诉我今天有人来。走，我们到机场去看看。”

等我们赶到机场一会儿，毛泽东和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也坐着几辆美国人送的吉普车赶来了。一问，连他们也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来了。

毛泽东猜测说：“会不会是王明和康生他们？半个月前，莫斯科就通知我们了，说他们已经到了迪化，要到延安来，可没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来，怎么个来法。”

直等到飞机降落，舱门打开，大家才看清楚果真是王明、康生和陈云、曾山。

我当时并不认识从飞机上下来的人，但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对他们热情的态度，便知道他们也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且，我对王明这个名字早巳从首长们的交谈中耳熟能详了。

飞机上下来的人和机场上的人热烈地握手拥抱，欢叙一堂。

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们对我们搞神秘主义呀，招呼也不打一个，就突然从天而降了。”

张闻天也说：“要能争取到莫斯科和延安的通航，给我们运点武器和物资来就好了。”

王明立即解释说：“那不可能，根据中苏外长签订的两国谅解备忘录，苏联空军的飞机在中国境内，只有国民党政府有权调遣。我们这次乘苏联空军的飞机从迪化过来，也是属于秘密非法的，所以没有在电报上通知中央。”

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挥挥手轻蔑地说：“斯大林这个老毛子，还是戴着副有色眼镜看我们，在他眼里，我们始终是不如蒋介石的。”

第二天上午，张主席到凤凰山去出席了政治局会议。这一次他表现得很热心，自始至终参加了，可能他不愿意在王明面前也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吧。

张主席对这次由王明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的结果是喜多于忧，在新通过的政治局委员的排名榜上，由于王明的坚持，他的位置上升了，排在了毛泽东、王明之后，而仍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则排到了第 7 位。

张主席回到屋里，精神看上去比过去好了许多。杨子烈和我知道他的地位又上去了，也都很高兴。次日上午，我站在一旁看张主席写字，他写的是狂草，认起来很吃力，但有几个字我却认出来了，那是“猛士如云唱大风”。

写完后他把毛笔往砚台上一放，对我说；“小何，你马上给陈政委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吃午饭。”

陈昌浩接到电话马上就来了。显然，他对张主席地位的上升同样感到高兴。

陈昌浩是个闲不住的人，这段时间，他不断地写出宣传抗日的文章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在延安影响很大。

张主席对陈昌浩说，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是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事前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王明虽然自作主张把他的名次提到了第 3 位，并且特意在会上就这一点作了说明，但他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危机感。他说王明仍然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高论，仗着他的特殊地位和他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说起话来像对部属下圣谕似的。仅在几天的会上，就已经引起了不少人对他有了看法。他估计王明把他从莫斯科搬回来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不会稳固。而王明真要一倒，他也肯定要受连累。

他还说王明虽然还保持着对他的信赖，但想必是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在他提出陈独秀的问题时，王明对他表示出了不够尊重。

这次会议上，陈独秀的问题也被提出来讨论了。

本来，在此之前陈独秀就派他的代表罗汉到了延安，与中央商谈陈独秀重新为党工作的问题。张主席说罗汉过去是他北大的老同学、老朋友，和毛泽东也有很深的旧谊，后来与陈独秀一起脱离中共，成为托派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罗汉到延安后先找到张国焘，请张出面搭桥，最好能直接与毛泽东面谈。张国焘把这个忙帮到了，罗汉与毛泽东见面时他也在场。罗汉说到了陈独秀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自己又被国民党判了八年徒刑，不久前才因抗战爆发提前被释放了出来。蒋介石派朱家骅出面，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他拒绝了，可是，共产党这边却不能容他，他现在非常苦闷。罗汉说陈独秀非常赞赏中共现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认为既然过去弄得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如今都能摒弃前隙，共赴国难，那么，像他们这一大批过去方向与共产党完全一致仅因认识不同而被关在门外的同志，不就更应该重回党内为党工作吗？

张国焘说毛泽东被罗汉的话打动了，他表示他也怀念他与陈独秀先生的旧谊，也欢迎他这种积极的态度。他说，我们现在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战，陈独秀如果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当然会欢迎他重回党内，一起抗日。

谁知王明在会上一听到这件事后，立即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

张国焘说因为他清楚毛泽东的态度，所以谈了一点与王明不同的看法。话刚说完，王明就非常武断地说：“中共和什么人都能合作，惟独对托派是个例外。我们的任何作法都不能违背苏联现行的政策，口径上必须和联共（布）保持一致。”他进一步明确地说道，“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动刽子手合作，但决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以及他部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决不可以与陈独秀这样的人合作。而且，在迪化时我还听说过，陈独秀现在已经堕落为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每月还给他 300 块津贴。”

毛泽东这时笑了笑，说了句棉里藏针的话："这样的传言，在延安早巳有之，说陈独秀巳经成为日本人的间谍，仅以传言为凭，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吧。"

可王明仍然坚持他的意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整肃托派，连皮达可夫、索科里尼柯夫、拉狄克这样的大人物都巳经被抓起来了，他们巳经供出准备和布哈林、托姆斯基一起刺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对托派恨之入骨，我们却准备和中国的托派头子陈独秀拉拉扯扯眉来眼去，如果让斯大林知道，那还了得！所以，他坚决认为，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我们的宣传工具口径一定要统一，即使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当肯定他是日本间谍。

听张主席说到这些事，陈昌浩连连叹气，说："我料定王明倒台不过是早迟的事，他那几板斧，根本斗不过毛泽东。"

张主席说王明进一步强调，党内必须加强对托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王明以提问的方式说道："联共（布）内部有如此众多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了吗？"自己又马上回答。"中共内部必然也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彻底，没有能够把他们揪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能与陈独秀团结合作，而必须加紧反托派。在抗战的大形势下，必然有些叛党和离开党的分子，企图重新混进党来，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对于现在党内，过去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人，党对他们也不能轻易放过。"

张主席忧心忡忡地说："王明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言者无意，他可能是泛指，或是专指洛川会议上的几个重要的反对者。因为洛川会议后，他们和中央的矛盾巳经冲淡了中央对我的成见。但听的人显然会把我也当成后一种对像。"

陈昌浩听到这话也颇为不安了，但他仍然对王明抱有希望，说："可能不会吧，王明既然坚持恢复你在党内的地位，就足以证明他对你的信任。再说，1931 年我俩去鄂豫皖开展工作，不也是他王明御笔亲点的么？我看，王明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2、来自王明的威胁

下面，我就要谈到张国焘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这件大事了。

在谈这件事之前，我想提一个我足足想了 60 多年的问题：张国焘为什么会跑？

这个问题很大。过去，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是没有资格和权力来谈论这样重大的问题的。这问题在我被关在保卫局监狱里写交待时，以及后来被押送到南泥湾劳改时，我都想过，但没敢写下来；建国几十年我在大巴山当农民时也想过，也没敢说出来。现大，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我觉得可以也应该说出来了……何况，我巳是这样一大把年龄，今天不讲，明天就不一定有机会讲了。

过去，一直到 90 年代，一些文章在谈到张国焘叛党这一重大事件时，口径大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张国焘叛党是出自他的反动本质，单纯依据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追溯到张国焘的封建官僚家庭出身，以此证明张国焘最后走向公开叛党是剥削阶级意识的必然行为。有的还说他参加革命原本就是政治投机。

这样的说法普遍得几乎形成了定论却缺乏常识，张国焘参加革命的时候，恐怕是无任何“机”可投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共产党。

以我的亲闻亲见，我总感到这样一些结论都未免过于简单、浅薄了。为什么我们党的另外一些出身非工农家庭的领袖级人物，或能为革命慷慨捐躯，或能为党和人民的壮丽事业建立卓越的功勋呢？如果单纯按照家庭出身来看，绝大多数革命领袖的家庭是可以被划到“黑五类”成份之列的。显然，用“血统论”解释不了党的领袖人物，同样也解释不了张国焘。

我认为，张国焘叛党的原因不管细究起来有多么复杂，其主要的却只有两点。

第一点，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已威望扫地，虽然由于王明的原因他仍留在了政治局里，并排名第三，但手中已无任何的权力。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政治路线的失败远甚于军事路线的失败，因而极其痛苦。以致于他被免去红军总政委之职后，拒绝新的工作，坚持搬出中央机关，带着我们隐居到万花山中的一座古庙里，不安电话，不看文件，装出一副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洒脱样子。其实是向党中央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

但是，我还不能认定张国焘此时说已经萌发了叛党的念头。即便何畏叛逃事件对他有所触动，也还不能肯地说他那时就已决意效仿。如果过去的矛盾不再激化，不给他造成一种生存威胁，张国焘是有可能不跑的。

我要谈的第二点，恰恰是张国焘受到了强烈的威胁。而威胁他的人，不是别人，偏偏又是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被张国焘视为救命菩萨，在政治局排名第二的王明。

我认为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史料涉及到这个重要的问题。

1938 春节前夕，王明突然带着警卫员来拜望受到冷落的张国焘。

在张国焘眼中，王明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初他作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接管党政军大权，就是王明的安排。而不久前又是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提高了张在政治局的地位。可以说，是王明重新鼓起了张国焘深藏在心底的政治欲望。

但是，同样是这个王明，又很快地粉碎了张国焘的欲望，甚至使他强烈地感到了生命之虞。

我记得那一天干冷干冷的，阳光明亮，没有风，在陕北的初春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

那时张主席以杨子烈住不惯窑洞为由，由边区政府为他建了一个有四间平房的小院子，

刚刚搬进了新居。杨子烈还弄了些花花草草，把小院点缀得生意盎然，

王明和张主席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一张石桌子边进行的。开始很亲切，王明告诉张主席，他过两天就要到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后来，他们谈到了毛儿盖，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

王明问张主席："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了，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我想问你一下，你认为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主席考虑了一阵，字斟句酌地说道："我巳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这不尽然吧，我看还有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

"托派！你是指……"

"你当时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李特、黄超怎么会是托派？"张国焘大为震惊。

"这一点不用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巳供认不讳。我巳经下令把他们枪毙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枪毙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冲动地嚷道："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张国焘也是托派，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黄超在供词中巳经承认了这一点。"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在过去的内部斗争中发生的苦打成招的事例难道还少了吗？在甘孜时贺龙就告诉我，夏曦在湘鄂西肃反时，采用刑讯手段逼供，冤杀了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差点把他也当反革命杀掉了。后来不少供词中涉及到夏曦，说他是'AB 团'、'改组派'的头子，这才使他醒悟过来，知道供词是不可全信的。我们为什么这样缺乏自信，总觉得党内到处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呢？"

张主席的态度激怒了王明，他板起面孔严肃地说道："国焘同志，我认为你目前这样的情绪是不利于党的建设的，也是相当危险的。我再强调一次，中央至今认为你还不是托派分子，还仅仅是受到了托派分子的利用。"

张主席仍然执拗地说："我认为我所犯的错误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仍然坚持李特、黄超不可能是托派分子。"

王明脸上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说："我看你党内斗争的意识还得加强才行，内部的敌人，他们总是隐藏得很深的。在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同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过去

在莫斯科时和你很亲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暴露，我对他们一直有怀疑。这次在新疆，我叫邓发把他们抓起来一审问，果然全都是托派……”

“你把俞秀松他们怎么样了？”张国焘又是一惊，急着问。

“对托派分子，我们决不能有半分的同情。他们是联共中央派到新疆的人，我已经派人把他们押送回莫斯科，等待他们的，当然是法律的严惩！”

张主席猛地闭上眼睛，长吁短叹，再无说话的兴趣。他万万想不到，王明居然会对俞秀松这样的中共创始人下毒手！他对俞秀松太了解了。他们一起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1920 年，陈独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后，由俞负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次年，受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党团组织的委派，俞秀松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俞秀松回国后，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和赴各地抓建党建团工作。1925 年冬，受党中央派遣，率领 100 多名党团员赴苏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任教。张国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副团长时，又与俞秀松过从甚密。1935 年 6 月，联共中央派俞秀松等 25 人进入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俞秀松化名王寿成，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并娶盛世才之妹盛世同为妻，利用特殊关系，和延安派去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徐梦秋等人相互配合，努力为党工作。这样的同志，怎么能是托派？而且还把他们抓起来送到莫斯科？（笔者注：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遭王明逮捕后转押莫斯科，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1962 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1996 年 8 月，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为俞秀松彻底平反）

王明见张主席情绪不佳，遂起身告辞。

“国焘同志，看来我们这次谈话很不投机，将来有机会再接着谈吧。”

“好，好。王明同志，你今天告诉我的这些情况很突然，对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我需要认真地想一想。”

请注意，这次谈话距离张国焘叛逃不过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朋的时间里，张国焘基本上再没有受到其它的刺激。

所以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起码可以认为，即使张国焘在此之前已有了叛逃之意，也是王明的这次谈话促使他提前采取了行动。

3、黄陵之行

叛逃是 1938 年 4 月 4 日这天开始发生的。张海同志已经有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

随张主席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主席信任的警卫员李仁国，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主席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从延安去西安，汽车必经黄陵。两端的里程基本相等。三点一线，如同一根扁担，黄陵一头挑着延安，一头挑着西安。

吃过早饭后，我们全部人员在边区政府大门前登上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便出发了。

翻过大劳山以后，沿途一马平川。黄土高原上的土地不像四川的红壤土那么肥沃，浑黄满目，沟沟壑壑，地里的庄稼也不太发旺。已经进入早春时节了，塬上本来就不多的树木都还没有发芽吐绿，见到一些水面，也都沉寂着好似冬眠未醒。

卡车“吭哧吭哧”响着，一路过了甘泉、茶坊，四周没什么吸引人处。虽是上午，也让人觉得有些睡意上泛。

就在众人昏昏欲睡时，前面一处绿色陡然扑入眼帘，平川里突兀起一堆翡翠。远远望去，就像墨绿色的核，外面包裹着一层水灵灵的雾汽，袅袅地向上蒸腾。近了，那些黛青翠绿渐渐活起来，竟是满山的苍翠古柏，直向我们拥来。在这满眼一片土黄的高原旷野，乍见如此奇景，马上令人精神一振！

有人惊奇地问：“嘿，这是什么地方？”

有人回答：“桥山！黄陵！”

我们赶到现今已更名为黄陵的中部县时，天色已近黄昏了。城里热闹非凡，灯火通明。所有的商铺都开着门，街边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黄陵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不单是西安，连成都，重庆、昆明都有不少人专门赶了过来。街上的人也大都衣冠楚楚，不是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 10 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国民党的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设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大员。蒋鼎文的随从去了十几个，随张主席去的有我和陆煜秘书。张主席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

参加完宴会回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主席、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贴身卫士住三堂。

我很快准备好了热水。

张主席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主席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下白开水对付了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主席不在屋里，就急着问：“张主席

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却沉不住气，连声说：“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身边，要出了事，回去咋个向领导交待？”

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我给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的警卫员，他现在在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主要的活动就是祭陵。

国共双方联合到黄陵祭祖，是从头一年清明节开始的。共产党的代表是林柏渠，国民党的代表是张继、顾祝同，孙蔚如。正值抗日战争高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委派代表，共同于 4 月 5 日前来陕西省黄陵县致祭中华民族元祖－－轩辕黄帝，这对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四万万民众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拯救危难的中华民族，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4 月 5 日黎明，旭日东升，万里晴空，初春的陕北高原，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桥山之上 8 万余株古柏郁郁葱葱。黄帝陵墓前香烟缭绕，供品祭器摆设庄严整齐。

蒋鼎文和张国焘带领的是官方代表团，一切有专人照料。但只要到了黄帝陵大门——中华民族所有人的老祖宗脚下，不管什么高官显要、“君民人等”，到此都得“一律下马”。

大门前面有一大片开阔地，巳经成了个热闹的集市，所有自己前来祭陵的人都要买一种红带子，说把这带子系在黄陵柏上，可以扶正驱邪，保佑阖家安康。意义非同一般，几乎无人不买，我看到多的买了 10 根 20 根，少的也买了三五根。

上午 10 时，蒋鼎文与张国焘各自携带祭文，同步来到桥山，列队鸣炮致祭，然后各自

宣读本党的祭文。

正式祭奠场面很隆重，但时间并不长。结束以后，就是参观桥山。

组织者也给国共双方的人员准备了红布带，蒋鼎文和张国焘一人手持一股红布带，走到前面，后面跟了一大群人。还有许多记者“卡嚓卡嚓”地拍照。快到山顶时，山路两旁的柏树上随处可见红布带飘动。黛绿的古柏枝头，飘起一缕缕火红，使千年古柏变得生机盎然。

晚上，张主席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主席回屋，就性急地问：“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主席回他：“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4 月 6 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主席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主席吩咐李仁国：“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去了。”

张主席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把他留下来，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主席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张海的那篇文章也是由他口述，别人代笔写下的。我和他从没有过联系。我在文章里看到，张海同志在离休前是宁夏军分区的副司令员。

然后，张主席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 4、西安分手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主席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腥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主席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担心地说：“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这八路军

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呢？”

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地方叫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里一个有名的地方，专门供国民党高级将领下榻的地方。

吃晚饭之前，我发现情况更不对了。过道上站着几名身穿毛料中山装的汉子，连我到张主席的屋子里去，也被这些人拦住不让进。我大吼起来，张主席这才出声，叫他们放我进去。

我当时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主席一个人，他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下，然后说道：“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强勉，现在我给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我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主席，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首长，我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首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主席见我紧张得不行，又说：“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一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回到屋里给陆秘书、张海一说，他俩也都惊呆了。过了一阵，陆煜心存侥幸地说：“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去找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想留在武汉工作吧？”

但往细处一分析，连陆煜也很快否定了自己的估计。

第二天，我们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早饭、中饭都是守在门口的便衣送进来的。我们三人苦脸对着苦脸，一整天呆在屋子里，都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里始终围绕着张主席给我指出的三条路打转转。我没把这告诉陆煜和张海，因为我心里有种想法，我是张主席的人，而他俩则不是，张主席肯定不会像对待我一样也给他们三条路让他们选择。

我方寸大乱，拿不定主意。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主席走，他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下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也觉得太不值，以前我在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何福圣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那时候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这么多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得么？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回延安！

7 日下午，一个生面孔进屋对我们说：“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到火车站去。”

我一听就大叫起来："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我吼道："要见就快一点，他巳经下楼去了。"

我们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我们后面跑。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我急忙追上去大喊："张主席，张主席！"

轿车没停，开出去了。

那人说："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我们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

到了火车站，果然张主席巳经先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就说道："陆秘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煜去了。可他这一去，我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即眼看着张主席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我几步追上去，鼓足勇气说道："张主席，我己经想好了。"

"什么？"张主席微微一诧。看来，他巳经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忘记了。

"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我一口气说了。

张主席这下明白过来，他望着我说："福圣，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说完，他慌慌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塞在我手里，说："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我站住了，目送着张主席和张海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脑子里很空。毕竟，我和这个大人物巳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 6 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对他巳经有了一种因职业而形成的强烈的依附感，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从鄂豫皖到川北，从川北到延安，我和他从没有分开一天。可现在，我曾经那样热爱那样崇敬的首长走了，走向了过去以及未来的敌人现在的友军的阵营……

## 第二十二章 阶下之囚

革命这么多年，没想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像”……挣不断的红丝线，女红军李玉兰被强迫嫁给了徐梦秋……我在南泥湾一干 3 年，纯粹就是犯人，白天上山劳动、晚上睡觉，都有武装士兵跟着看着……张国焘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要是还让我们替他背黑锅，你说冤不冤？

1、接受审查

“嘎——”

一辆敞篷中型吉普车停在了我的面前。我一看，是白发苍苍神色严峻的林伯渠主席从车上下来了。我赶紧跑上前去敬了个礼。“林主席，”我指着军列大声说，“张主席已经上火车了。”

林主席带着几名八路军干部匆匆向军列跑去。

这时，我是多么希望林主席他们能把张主席挽留回来呀。可是，当不久看到林主席他们气冲冲地从军列上下来时，我便彻底地失望了。

随后，我上了他们的汽车，一同回到了北新街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我刚跨进办事处的门槛，枪就被下了。然后，把我带到林主席的办公室里，由他亲自问我。我也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非同小可，凡是我知道的，我全说了。

我也注意到，办事处的人上上下下全都显得很紧张。

晚上，另外几名职务比林主席低得多的干部接着问我。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比林主席对我生硬得多了。

我仍然和下午的态度一样，知道的，我一星半点不隐瞒，不知道的，也不加油添醋地乱说一通。

这几位干部对我的回答明显地表现出了不相信，在许多问题上翻来复去地问，变换着角度、方式问，问得我既委屈又苦恼，就忍不住叫了起来：“张主席叫我跟他一路去武汉，我没去，自己要求回延安！可你们这样对待我，把我当成个啥呀？”

他们把我折腾到了下半夜，我困得很，他们也挺不住了，不断地打哈欠。这样，才让我睡了。人已疲倦得要命，可上了床却横竖睡不着，脑袋里像刚开锅的水，白雾茫茫，各种各样的想法“咕嘟咕嘟”直往外冒。当时一是后悔没和张主席一起去武汉，二是想，在西安就对我这样不客气，回到延安，还不知会把我怎样了呢？

不知到啥时候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刚打了个盹，又被叫醒了。来人叫我跟上他走，出了大门，看见有几名挎短枪的战士和一辆吉普车。

他们叫我上了后排，两个战士一左一右地夹着我坐。过了一会儿，夜里审问过我的一位领导也上来了，坐在司机旁边。他一上来就叫开车，那时天还没亮，四处朦朦胧胧的，街上没几个人影。

到了延安，汽车直接开进了保卫局。他们让我呆在一间屋子里，派人看着，就吃晚饭去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给我送了个馍，一碗菜汤来。我正吃，就进来好几个人，有两个还挟着本子。他们围着我站的站坐的坐，做出一副审重犯要犯的样子。当时我饭还没吃完，他们就不客气地叫我把碗放下，回答了问题再吃。

我心里本来就委屈得很，再加上我见过的大首长多了，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朝着他们大叫大嚷："我知道的一切情况，在西安办事处全都说了！林主席知道，办事处送我回来的首长也可以作证。我现在要求见周局长，见不到周局长，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我的态度激怒了他们，几名坐在桌子前面的干部沉下脸来喝斥我。任他们怎么说，我横竖一个不睁眼，不吭声。

他们拿我没办法，坐着的人全走了，站着的人留下来看着我。不一会儿，周局长来了。那几位刚才离去的同志也都跟着进来了。

周兴年龄虽比我大不了多少，但他早已身兼数职，继邓发同志之后担任了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又兼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员。中央的警卫战士都归保卫局领导，所以说他应该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过去我和他也是经常见面的。

我一见周兴同志的面，就像受尽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的面一样，伤伤心心地哭了起来，说："周局长，我不是反革命，张主席要带我去武汉，我没答应，我是自己要求回延安的!"

周局长的态度就比其他同志好得多。他说："小何，你不要冲动，我们仍然把你当同志对待嘛。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个知情人，我们当然需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情况彻彻底底地讲出来。你要相信组织，好好和同志们配合，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是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战士、老党员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我相信你是懂得的。"

周局长这番开导虽仍让我悬心吊胆，但我也只能照他的话办了。

周局长走后，我便把张国焘 4 月 4 日离开延安，直到最后在火车站与我分手，这几天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全都告诉了问我的几位同志。

他们非常重视，不停地往本子上记。而我说的这些情况，我在西安时即已经对林主席、对办事处的同志都反复讲过了。我也相信送我回延安的那位首长决不会粗心得把记录本忘在了西安。

可是，他们依然这样一天连着一天地问我，没一天松劲。

谁知十来天后，就好像绷得太紧的皮筋“砰”的一声断了，再没人来问我了。我被这忽冷忽热的态度搞糊涂了，反倒急着想问个明白，希望能尽早地对我有个明确的结论。可是，他们再也不理睬我，好像把我忘记了一样。

就这样，我被不明不白地关了有3个月之久。但是，他们对我这个“囚犯”也特殊，除了大门不能出，哪里都能去。分配我干的工作，是在伙房里帮厨。

终于，7月5日的上午，保卫局一直负责审我的钟处长来找我谈话了。从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张国焘早已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退党声明，已被共产党开除了。我提供的情况，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钟处长告诉我，组织上已经认真研究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在关键时刻主动要求回延安，立场是对的。但是，我跟随张国焘这么多年，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且，他叛党时给我三条路选择，又送给我钢笔作纪念，就足以证明我和他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感情瓜葛。现在，组织上作出决定，为了挽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安排我到抗大去工作。工作期间，还需继续写出检查。

钟处长说：“这主要是为加强你的思想改造，使你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听了这样的决定，我忧多于喜。喜的是我总算重新获得了自由；忧的是，革命这么多年，到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像”。还要继续改造，才能“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我到抗大报到后，被分配到抗大4大队4中队，担任正营级军事教员。

对于这级别，我还是满意的，因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干部大量裁减，降若干级使用的多得很。连长排长当战士的非常普遍，连李先念兵败祁连山回到延安后，不也只当了个营教导员么。当然，这带有几分处分的意思，没当多久又重新上去了。

4大队不在城里的校本部，而在延河东边的清凉山上。

清凉山，又名太和山。在延安东北面，延河对岸，隔河与凤凰山、宝塔山三足鼎立，遥遥相望，山势高耸峻峭。范仲淹登临此山后遗诗一首，被后人勒石以纪，诗曰：“金明阻西岭，清凉寺其东，延水正中出，一郡两城雄。”

那时延安里人满为患，《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原来在城里的单位，都陆续迁到清凉山上来了。《解放日报》社建在清凉山东侧，门额上石刻“解放日报”四个大字，是毛泽东的手迹。在清凉山下延惠溪的旁边，矗立一座古旧牌坊，牌坊两边刻有：“二水绕座晨望嘉岭塔边烟，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横额是：“清凉第一”。牌坊的石崖上有几个石窟，共产党的第一家新华书店，就诞生在这几个石洞洞里。

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古庙的大殿，能容纳300多人，破烂不堪，光线阴暗，地面也潮得厉害。这大殿却是4大队惟一的教室，各个中队轮流在这里上课。

教员在土台子上讲课，一块木板打上洞，用绳子穿起来往墙上一挂，就当黑板用。学生也没课桌凳子。上课时一人带一个小马扎，人往马扎上一坐，膝盖就是桌子。逢上天气好时，课堂就搬到殿外的土坝子上了。

学生也很特殊，有的胡子一大把，有的还是尿床的小娃娃。知识分子大都是从国统区跑过来的，也有从部队里抽调上来的骨干，大学教授和只读过几天私塾的半文盲被编在一个班上的并不少见。

朱德总司令的大儿子朱奇恰好正在 4 大队，还不满 20 岁。他并不知道我过去在康藏高原上曾对他父亲无礼，但是，他却知道我是张国焘的警卫排长。我第一次去给他们上课，朱奇就把我认出来了。

这样一来，我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因为张国焘公开叛党不久，消息传到延安，人神共愤，还在延河滩上召开了两次声讨张国焘的军民大会。学员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把对张国焘的愤怒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弄得我根本没法上课。

那时候学校除了上课、军训，还得搞生产自救。学校领导就安排我专门负责管开荒种地。

人这个东西呀，不可理喻。我最初被押回延安时，有抵触情绪，觉得自己没罪、冤枉。日子久了，上下左右的同志都在苦口婆心地教育我、挽救我，我也就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起码也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便逐渐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和赎罪感，总想把组织上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干得好一点，能改造成功，进步得更快一点。因此对开荒种地这样的苦累活，我也干得十分的卖力。

当时延安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每位同志按月也有一点补贴。一般同志一元抗币，干部则是两元。我领两元，享受干部待遇。

这对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多一元钱的问题，而是让我感觉到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这种抗币看上去极不起眼，比现在火柴盒上的商标稍大一点，印刷粗糙，纸质极差，就像前些年在乡下能看到的粗手纸，很容易破损，但却非常管用。按当时延安地区物价来说，一元抗币能买 20 几个鸡蛋。延安著名的羊肉大煎饼，每个 5 分钱，一元抗币足够两三人饱餐一顿。延安地区还出产一种口味很好的酸红果，一元抗币能买 10 多斤。

我这个人过去跟着张国焘，吃的是小灶，一张嘴巴吃得很刁。到了抗大，生活很难适应，就经常趁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跑到处面的小摊上，买上个羊肉煎饼，悄悄跑到没人的地方狼吞虎咽一顿。可惜，几个月后，由于边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这点宝贵的补贴也随之取消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广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亟需干部，抗大的学员也一批批被派往前线、敌后，我当时也想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了报告，可上面没批。

## 2、李玉兰抗婚记

现在应该说说李玉兰的事了。

在我落难这段时间里，和我接触最多的，就是李玉兰。她是一个红孩子，更算得上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人物。我和她不但是老乡，也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所以很谈得来。

1932 年底红军进入川北时，李玉兰才 15 岁。反动派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把通江城里的女人全都吓跑了，李玉兰也躲到了乡下舅舅家。两个月后，见红军秋毫无犯，才回到城里，而且很快便参加了童子团。

李玉兰参加童子团没多久，就当上了团长，率领她的团员们给红军宣传队当帮手，跑腿打杂。张琴秋对李玉兰也很喜欢、很器重，两月后，就推荐她去赤江县担任少共妇女部部长。过了 4 个月，她出席了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团员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一步登天”，担任了少共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不久，又担任了川陕省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长，成为全苏区的“红色孩子王”。

那一年李玉兰刚满 16 岁，上级就给她配了个女秘书，叫李正荣，苍溪人，比她大 5 岁。

红红火火刚过了一年，李玉兰就开始倒大霉了。她母亲请八字先生给她算命，说她命犯凶星，不让星拜斗，就要暴病身亡。

父母吓坏了，骗她回家，把她锁在屋里禳灾过关，并按地方上的风俗给她拜继了 10 几个干爹。谁知有两个“干爹”是“盖天党”的骨干分子，后来被红军镇压了。这样一来，李玉兰就被牵连上了，偏偏又逢上大肃反，组织上认为她拜反革命分子为干爹，丧失了阶级立场，就撤消了她的一切职务，抓进保卫局关了起来。

一天深夜，李玉兰被人用绳子反捆了，和几十个同样被反捆着的红军战士一起被押到了河滩上。她一看那场面，就知道死期到了，既委屈，又害怕，就哭了起来。执行队员不许她哭，还用大刀背砍她的手臂。

到了沙坝上，执行队员强按他们跪下，开始砍脑壳。蒙冤的战士们哭的哭，喊的喊。李玉兰也大声哀求不要杀她。

执行队员们抡起大刀片子挨着砍，满地倒下一大片，身子和脑壳全分了家，血腥味呛得李玉兰想呕吐。砍到最后，就剩下个李玉兰。

这时，当官的叫她站起来，说不杀她了，今晚是弄她来接受教育的。

李玉兰觉得脑壳“轰”的一响，就疯了。她一下跳起来，晃晃荡荡地去喊那些已经没了脑袋的尸体：“嗨，你们还睡起干啥子？快点起来开会，我要点名了。”

领导见她真疯了，就把她从牢房里放了出来，罚她每天做苦工。

张琴秋这时已调到红军总医院当政委，知道李玉兰的遭遇后，就去找到曾传六，把李玉

兰要了出来，接到王坪红军总医院治疗。

李玉兰的病，是遽然遭受强烈的刺激引起的，如今换了环境，消除了压力，加上药物治疗，慢慢地，她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

病好以后，上级恢复了她的团籍，见她相貌、身材还不错，就调她到 4 方面军前进剧团当演员。

在一份材料中李玉兰写到："我当红军，雪山、草地就来回过了三趟。头一趟是一般人员，第二趟第三趟时我在前进剧团里负点责。1936 年在西康时由团转党。组织西路军时，我调到 4 军政治部宣传队当指导员，军长那时是王宏坤，政委是周纯全。西路军按中央指示强渡黄河时，蒋介石一面派飞机轰炸靖远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想趁我军半渡时截击。西路军只能晚上渡河，花了 3 个星期，只过去了两万多人。张国焘指挥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大学，还有 4 军、31 军在会宁通往靖远的大道上，拼命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掩护部队过河。最后，我们没能过去。在奉命前往保安的路上，每个人脸上扑满灰尘，骡子一路洒尿，沿途骚味刺鼻。回民听信了反动宣传，都跑了。水井里也倒了粪便，或下了毒，而水沟里的水碱性太重，苦得连牲口都不喝。我们渴得快晕倒了，就喝自己屙的一点点尿。"

到了保安，部队整编，4 军被缩编成了一个旅，首长差不多都被集中到红军大学去学习，干部大量裁减。

到延安后，后方政治部主任派人把李玉兰叫去，对她说："你暂时到政治部搞青年工作，兼干内收发好不好？"

李玉兰愉快地答应了。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安排是有原因的。

后方政治部的秘书长就是徐梦秋。

两个月后，主任就亲自出面来动员她嫁给徐梦秋。

李玉兰一听就不愿意了。

为什么？徐梦秋过去在中央军委政治部负责秘书工作，现在是后方政治部秘书长，身居高位，而且极有才华，连毛泽东也非常欣赏他写的文章。当时红军中有一种说法，黄超是 4 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而徐梦秋则是中央红军中的第一支笔。过雪山时，徐梦秋的双腿被冻坏，抬到延安后才由马海德主刀做了高位截肢手术，他走路只能用手，一手握一个哑铃状的工具，撑起身子，像荡秋千一样往前"走"。中央对徐梦秋的生活也给予了特殊照顾，给了配备了勤务兵。陕北物资供应那样紧张，徐梦秋却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即每月 1 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了小灶。

李玉兰"兼干"内收发便长期和徐梦秋呆在一起。她从内心非常钦佩她的首长，包括他的才华、经历和残废的身体。但钦佩并不是爱情，何况他俩悬殊的年龄——那一年李玉兰 19 岁，而徐梦秋 44 岁——也使李玉兰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更像父女。

李玉兰明确表示不同意，可主任说："革命战士的婚姻，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你和徐秘书长结了婚，就能更好地照料他，他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也就包括着你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你应当认识到，婚姻不应该是个人的感情。"

在婚姻上，李玉兰偏偏表现了她的个性，无论首长怎样劝说、开导，她也不点头。

主任也有耐心，她不点头，就特地派了他的夫人和一位结过婚的女干部每天专门做她的思想工作。

李玉兰受不了，负气说："你们再这样逼我，我就自杀了。"

主任怕她真地自杀，就把她那支枪把上也拴着两朵红通通绒线花的勃朗宁手枪下了，还派持枪的战士一天到晚看着她。晚上，则把她带到徐梦秋的窑洞里，创造出一个让她和徐梦秋尽快培养感情的最佳环境。

李玉兰也豁出去了，她对自己采取了严格的"三不主义"：第一不和徐梦秋说话；第二不脱衣；第三不上炕。

这期间，徐梦秋的痛苦程度，决不压于李玉兰。

十来天后，"生米"终于成了"熟饭"。促使李玉兰最终放弃"三不主义"的原因，并非是徐梦秋持之以恒、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娓娓长谈，而是一位年轻女人对身残志坚的男性的同情与怜悯——归根结底，出于女人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

当李玉兰最终答应做她的首长的革命伴侣时，徐梦秋感动、幸福得哭了。

也就是那一刻，19 岁的姑娘突然产生了一种做母亲的感觉，伟大庄严、纯洁高尚，充满光辉壮丽的牺牲精神。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仍然不是爱情。

直到李玉兰怀上徐梦秋的孩子后，她才知道，她的丈夫在老安安徽寿县早已有了老婆和 3 个孩子——无疑，这样的婚姻一开始便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结婚 4 个多月后，徐梦秋和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张闻天的爱人刘英一起被送到莫斯科去治病，主要是安装假肢。

组织上同时安排李玉兰到抗大去学习。

这下，李玉兰感到思想上陡然轻松了许多。她虽然已经做了徐梦秋的妻子，虽然在俭朴的婚礼上有那样多她崇敬的大人物出席，但是，从感情上，她仍然没有把徐梦秋当成她真正意义上的丈夫。

李玉兰到抗大学习后的最大恐惧，就是肚里的孩子的出世。在她天真的意识中，一旦生下徐梦秋的孩子，她和这位她并不喜欢的首长的结合就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实出现，惟一的办法，就是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为此，她费尽心机，吃了太多的苦头。喝从医院里找来的酒精，结果没能烧掉孩子反而烧坏了她的嗓子，从此后说话声音沙哑干涩。用苦楝树皮熬水喝，害得她拉肚子拉得来瘫倒在床上。尝试了多种她发明的办法，全不见效果。最后，她孤注一掷，跑到抗大后坡一眼废弃的窑洞上，不顾死话地从窑畔上往下跳，想用剧烈的震动来打掉在肚里越长越大的胎儿，一次、两次、三次……，摔伤了腿，摔折了腰，摔得她鼻青脸肿，万幸的是，她的这一次"发明"总算是成功了！

李玉兰可以背着人采取这种自虐性的手段来消灭她和徐梦秋的不幸婚姻的"结晶"，但是，这样一根强加在她身上的"挣不断的红丝线"，却束缚了她整整一生。

徐梦秋到莫斯科装上装肢后，被联共中央派到迪化，和先期被莫斯科派来的俞秀松一批同志，与中共中央随后派来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一起，在盛世才身边开展工作。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担任盛世才政府的教育厅长，，而秘密工作则主要是做学生与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

那时的盛世才，表面上做出一副亲苏联共的样子，本人访苏时还当面向斯大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斯大林答应了他，然后给中共中央打招呼，就让他成了名正言顺的共产党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央才投入了这么大的力量来经营新疆。可盛世才混进了共产党骨子里对共产党却毫无好感，他这么做无非是借此讨好斯大林，以图获得苏联军火钱物的巨大援助，在新疆建立起他的强大的独立王国。

这样的联盟大厦无疑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德国人的坦克潮水般涌到莫斯科城墙下时，盛世才一看后台靠不住了，马上改换门庭投靠了蒋介石。他在新疆实施了多年的亲苏联共政策也变成了反苏反共，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大批党中央派去的干部由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并且相继遭到杀害。

徐梦秋也同时被捕，但在这生死关头，他害怕了，居然在盛世才编造出的共产党企图在新疆搞武装爆乱的材料上带头签字。国民党控制的新闻媒体一轰而上，把有徐梦秋签字的这份材，当成了打向延安的一发重磅炸弹。

徐梦秋叛党的消息传到延安后，许多同志对李玉兰白眼相向。

李玉兰这下冤得不轻，找到当初过分热心地促成了她的不幸婚姻的主任，又哭又闹地提出和大叛徒徐梦秋划清界限，坚决离婚。主任安慰她："徐梦秋叛党是他个人的问题，你仍然是个好同志嘛。"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尼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徐梦秋的情况作了介绍。说他是中国安徽一位贵族读书人的儿子，长征时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长，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著述甚丰，毛泽东对他的才华尤为欣赏。后来到了延安，毛泽东指派他为编写一部长征史诗着手进行准备。1936 年，徐梦秋在接受海伦-斯诺采访时告诉她，他

已经搜集了 700 多份文件、资料，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时间写作。他于 1938 年在上海英租界出版了第一部关于长征的亲身见闻的集子。1943 年，他在新疆背叛了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徐梦秋更是死心塌地地投向了蒋阵营。南京解放前夕他被解放军俘获，关进监狱，于 1952 病死狱中。

关于徐梦秋的落网，目前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１９４９年６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此时已是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丈夫）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在一次与他的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的闲聊中，意外获知出卖了毛泽民的徐梦秋的下落，甚至还听说当时徐梦秋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而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将徐立即逮捕归案。另一说是徐梦秋因走投无路，于１９４９年６月欲赴南京投案自首，即去面见昔日战友、时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结果被拒绝，旋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李玉兰，就因为她和徐梦秋的这一短暂的结合，从此坠入深渊。

主任的口头安慰并不能完全消除来自内部与社会上对她的成见，无论她怎样辩解，人们客观上仍然把她当成大叛徒徐梦秋的老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让她在延安这样一个视政治为人的最高价值的环境中倍感压抑。而在此后一次连着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她更是为这一段短暂的“捆绑夫妻”的经历饱吃了苦头。

李玉兰她和徐梦秋在一起生活了不到 100 天。这些年来，就因为徐梦秋，她没有轻松过一天。这些年来，她为离婚这事更是伤透了脑筋，下面的人说事关党内重要人物，凭她一面之辞他们不敢办，上面知情的大人物她又见不着。上级和同事，从来没有拿她当个党的好同志对待，明里暗里总还当她是个大叛徒的婆娘。还有个问题她想了几十年也没能想明白，当初她和徐梦秋结婚时，也没给个啥结婚证，为啥现在就非得办那张离婚证？

直到 1955 年，落魄通江的李玉兰才自费前往北京，找到当时的知情人，也包括那位当初出面动员她嫁给徐梦秋的主任的遗孀。她的不幸遭遇激起了这些老同志们的强烈同情，通过他们的帮助，李玉兰总算领到了一纸和当初强加于他，并于 17 年前便已分手，3 年前病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的徐梦秋的离婚证明。

然而，具有法律效力的离婚证明也同样无法斩断这根无形而神奇的“红丝线”。最令李玉兰伤心和愤怒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揪上台批斗时，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大叛徒徐梦秋的婆娘”，造反派们也总是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强逼着她交待她和徐梦秋的婚姻经历……

建国以后，李玉兰回到了通江工作，日子过得来一直磕磕绊绊，扑爬跟斗。她是第一任通江县委妇联主任，没当上两月就降调至县民政科担任副科长，退休时工资仅 67 元 5 角（包括粮差补贴）。她的家人，在 1987 年以前一直抬不起头。

1950 年 5 月，王维舟、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到大巴山看望老根据地的人民。李玉兰那时刚调任通江县民政科副科长。她听说中央慰问团马上要到通江，激动不已，亲自带着石匠上山，连夜把红军烈士墓的墓碑“帽子”戴起。

由王维舟主持，中央慰问团在烈士墓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首次为 4 方面军的烈士

扫墓。

遗憾的是，那是建国后的首次，也是迄今为止的惟一一次。

1958 年，甘肃省话剧团为创作出好作品来参加建国 10 周年赴京献礼，把团里的创作人员全分派到基层去体验生活。有个 20 多岁的年轻编剧叫姚运焕，一个人下到了河西走廊，一路上发现了许多说四川话的女人，一个个日子过得苦巴巴的，穿得像群叫花子，老得像截枯树疙篼。冲模样恭恭敬敬叫别人一声老太婆，等到坐下来把龙门阵一摆，才晓得这些老太婆老的不满 40，小的 30 才出头。深入一交谈一了解，姚运焕才知道这些女人居然是流散在大西北的西路军女战士！听了她们的动人经历和悲惨遭遇，姚运焕被深深地震撼了，一泡眼泪一行字地创作了一部话剧，剧名叫做《悲壮的历程》。剧本拿出来，看过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团里安心拿这个好东西到北京城去夺个头彩，投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把这个大戏排了出来。省里的头头脑脑们前来审查时，也都感动得不行。后来这戏就到了北京参加建国 10 周年献礼演出。在北京城刚演了一场，轰动得不得了，好些老红军在场子里捶胸顿足哭翻了天。可上面马上下来一道命令，该戏停演！原本想去拿头彩的领导们和姚运焕只好收拾衣箱灰溜溜地提前回大西北去写检讨。

这样子一搞，人们说长征，写长征，演长征，好像都不怎么提大巴山这块地方，也不说 4 方面军和西路军了。有时在电影里、电视上出现，也总是把 4 方面军摆在一个反面的位置，来衬托其它正面的东西，看得我们这些老东西欲哭无泪。提到川陕苏区、4 方面军、西路军，许多过来人也都含含糊糊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有个张国焘在里面。

今年已经挨边 90 岁的李玉兰身体硬朗，而且思维清晰。她和全家 21 口人住在通江县城虎晶巷一处带小院的老式民房里，四世同堂，享受着天伦之乐。

这些年来，每当有记者和党史工作者上门采访她时，李玉兰总会从箱子里拿出她珍藏多年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和“川北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胸章。这些记载着她人生足迹的珍品她已精心保存了接近 70 个年头，仍完好无损。而且面对记者的镜头，这位满头银发，戴着助听器，嘴里剩下不多几颗残牙的老太婆马上会拿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面是一位有着一张秀丽的脸庞和一双清纯的眼睛，腰里挎着一支枪柄上拴着两朵红通通绒线花短枪的女红军战士——然后感叹地说：“莫照我，老脸老嘴的，牙齿也落得差不多了，拿出去让人笑话。要照就照这相片，这上面的人就是我！我记得是 1938 年在延安照的。那时候人年轻喽，才刚刚满 20 岁。”

只有向现在的人展示自己年轻时候的戎装照片时，她那张多皱的老脸上才露出了真正的、由衷的幸福和自豪。

### 3、逃出南泥湾

等到“抢救运动”开始后，我的问题又被翻捡出来了。当时挨冤枉的人多得很，整得好多人投河上吊，延安刮起了一股自杀狂潮。红都延安在某些人眼里是永远的革命坚圣地，可在被大批遭到残酷整肃的同志心中，却绝对没有这份浪漫。

我的心头，自然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把我当作抗拒“抢救”的死硬分子，关起来不算，还捆、打、饿饭，随后，又把我们这批从抗大清洗出来的 200 多名“死硬分子”，和中央以及其它机关清洗出来的“坏人”，一起押送到延安东南方向几十里，属金盆区管辖的南泥湾，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

所以，许多“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南泥湾》，我是从来就不听的。

当时，王震同志率领的 359 旅也正好开进去。他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去搞大生产运动。而我们和他们干的是一样的苦累活：开荒种地、养牛喂羊。响遍南泥湾的口号是“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

可我们算啥？算劳改！是敌人！连喊那口号的资格也没有。

我在南泥湾一干 3 年，和众多改造对像们一起，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我们纯粹就是犯人，白天上山劳动、晚上睡觉，都有武装的士兵跟着看着。

虽然不断有改造好了的人被放出去，但也随时有新的改造成对像被送进来。我们这支灰溜溜的队伍，始终没有下过两百人。

到了抗战后期，南泥湾已经没有军队了。在这里劳动的，有军人家属，一些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和我们这样的角色。

而且，据我所知，像我们这样的劳改队伍，南泥湾并非一支。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到南泥湾迟了几天。大约是 18，或是 19 日，记不太清楚了。南泥湾所有的人都狂欢了！我们这些劳改对像也和看押我们的人一样，高兴得乱蹦乱跳，大喊大叫，像疯子一样地哭，抱在一起笑。

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多了一份期望：胜利了，总该赦免我们了吧！

可是，我们足足盼望了两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当初把我们弄进来的人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开始出现了逃跑、自杀事件。

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也是万念俱灰了。投敌，不愿意；革命，没资格。窝窝囊囊地干到现在，抗战总算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却没有我的份，日本人是其他的同志打败的，我没有看见过一个日本人，更没有向他们放过一枪一弹。既然现在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连毛泽东都已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握手言和”了，凭啥还要把我们关在这山沟沟里吃苦受罪？

有这种“反动情绪”的人，多得很。

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也强烈地刺激着我。人的忍耐总归是有个限度的嘛。老这么整，咋个遭得住？我终于也下定决心：跑它娘的！

虽然看守士兵已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每天要上山干活，到了野地里，机会总还是有的。

1945 年 11 月 22 日上午。我们这个小队的 30 名囚犯到离营地五里外的山上去为梯土加固堡坎。中午回营的半道上，我突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挣扎、痉挛，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叫声，还吐白沫，眼睛也鼓得老大。

半年多以前，我们劳改队有位同志吃了有毒的果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这副样子。

我把它学过来了。

果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中毒了。他们开始想把我抬回去，可“垂死”的我暗暗运起内功，挣扎起来几个人也休想动得了我。

他们没法了，负责看押我们的一位排长就说：“留下个人看着他，死了就回来报个信，没死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随后，他指定一个士兵留下来，就和战士们把犯人带回了营地。

我跟前只剩下了一个拿着步枪的小战士，看模样只有十六七岁。等到他们全走得无影无踪了，我才装着好像松活了一些，呻吟着要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支撑不住，又瘫倒了下去。

这位小战士就弯下腰伸出一支手来搀我。这样一来，我就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他。我把他的裤带解下来，反捆了双手，又撕破他的军装，塞进他的嘴里，用破布条捆牢，然后当着他的面往南（洛河、西安方向）跑了。等到跑出他的视线后，我又绕了个弯回去，躲在我们营地后面的高坡上一片灌木林子里。

我看见了营地里的人们如何惊惊慌慌地提着武器往南面去追捕我，傍晚时分，又如何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营地。

一直到了深夜，我才钻出藏身之地，向南面的洛河方向逃去……

一个多月以后，我终于回到了竹峪关。当我穿着一身陕北农民的黑衣黑裤，满身臭味虱子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时，她把我当成从安康过来讨饭的饥民了。

“熊顺芝！”我瞪着她大叫，眼泪“哗”地就滚了出来。

我老婆呆了，睁眉大鼓眼地瞪着我，两只脚杆打闪闪，嘴皮子直抖，就是出不来声。

“熊顺芝，狗日的憨包呃，我是何福圣，你男人呐！”

这下她总算晓得我是哪个了，高兴得哭喊起来：“何福圣……妈噫！你咋个……变成这副样子了哟？”

我儿子是我离开川北那年生的，都 10 岁了，我才第一次见着。顺芝拉他上来，按着脑壳叫他喊我爸，狗日娃娃犟着脑壳硬是不张嘴巴。

回到家里，仍不安全，虽然国共合作已经这么多年了，可大巴山上的地主老财反动民团对当年的红军仍然恨之入骨。顺芝说过去常有从部队上跑回来的红军、八路军被他们抓去朝死里整。而我过去又是张国焘身边的大红人，竹峪关的老百姓大都晓得我的名字，要让民团的人知道我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

老婆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呆在家里了。好在我还有身过硬的功夫，也懂得些治跌打损伤的单方，就靠这两样本事，我改名“田茂云”，到大巴山、华莹山中的各个乡场上去卖艺卖药为生。顺芝和我商量好，半月一旬带上儿子，到某个乡场上见上一面，拿上钱又回去。

1949 年快解放时，罗广文的部队拉兵，我正在合川县的三汇坝卖药，把我也拉去了。后来被弄到广安城集训，马上要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急得我要死，队伍集训了 10 来天，开拔前，幸亏壮丁炸营，我才趁乱跑了出来。

就这样，我靠卖“坝坝药”一直卖到解放，才回到竹峪关，老老实实地当农民。

川北是红军窝窝，红军红属遍地都是。解放初期搞过一次登记，对红军红属烈属实行优抚。有的挨不上边的也想方设法往红军红属烈属堆里钻。我却没敢去登记。

可没登记反而露出了破绽，等到肃反时把我当重点一查，我就全交待了。

最后给我作了个结论：叛党分子。

这顶黑帽子，我戴了 30 多年。

一直熬到 1986 年，我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红军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我已经 74 岁了。我最痛心的是，我老婆没能活到那一天。

4、最后的心里话

活到我这把年纪上，去见马克思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要说此生的遗憾，我也有，我把它说出来，希望你把它写在文章里。这遗憾不仅仅是我个人，也是我们还健在的川北老红军共同的。1996 年那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中央电视台搞的那次活动，好大的规模哟，组织了那么多红歌星红笑星沿着当年的长征路一边演出一边慰问，都走拢四川的泸定桥、毛儿盖了，我们这些老不死的在大巴山上把眼睛都望穿了，盼望他们也能到我们这里刹一脚，拍几个镜头。可最后，他们硬是不肯来，这让我们咋个想得开哟？没有 4 方面军，红军写不

全；反映长征，不拍出了 10 万红军的大巴山，也有重大残缺。

这些年，省政府拨专款给我们盖新房子，给每个老红军送大彩电，还给行动不方便的送轮椅。县里的头头照顾得也很仔细，逢年过节都要到家里来问寒问暖，吃的穿的啥都送。要有个头痛脑热，政府还专门安排医生登门医治护理，生活费、医药费，民政局都按时派人送到家里来。

改革开放后，百事都好，就这一点，弄得我们不舒坦。张国焘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要是还让我们替他背黑锅，你说冤不冤？

以前乱整了几十年，现在的党中央把方方面面都理顺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那么长的革命征途中，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左”过去“右”过来的抽风打摆子，那个年代的首长、干部，一点不受传染，一点不犯错误，还不成神仙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毛主席一辈子有功有过。还有哪个能永远正确？

我现在快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场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却不是梦，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失意得意，我啥都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复杂了，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毛泽东过世、朱德过世，周恩来过世，来一个消息我哭一场，还有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徐向前、刘伯承，他们一个个都走在了我的前面，我守在电视机面前哭，比死了我的亲人还伤心！

也曾经有人问我，你跟了张国焘这么多年，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感情？

这问题我以前不敢回答，现在可以完全可以实话实说不打诳言。我何福圣是人，他张国焘也是人，是人总归是有感情的。要不，他跑的时候为啥给我三条路选择？为啥送我钢笔？我心头也清楚，论理，他是个钦定的大叛徒，论情，他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于理于情，我都应该恨他才是。可偏偏，当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张国焘晚年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敬老院里，孤苦伶仃，落气时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我心头也酸得很，几顿没吃好饭，几夜没睡好觉……唉，人这个东西呀，你说得清楚么？